

基督的僕人I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夏天

(西元1581年至西元1687年)



依納西·艾坎立 著

尤淑雅 譯

基督的僕人Ⅱ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夏天

(西元1581年至西元1687年)



依納西·艾坎立 著

尤 淑 雅 譯

Passion and Glory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II

Summer 1581-1687

By Ignacio Echániz, S.J.

Translated by Sophia Shu-Yia You

Copyright © 1999 by Ignacio Echániz, S.J. Borgo S. Spirito 4, 00195 Rome

Published by X. Diaz del Rio, S.J.,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P.BOX 70, ANAND, GUJARAT, 388 001,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夏 (1581-1687)	009
輝煌盛夏的時期	
I. 在羅馬學院	
1. 聖師：	
羅伯·伯敏 (Robert Bellarmine, 1542-1621)	015
2. 兩位青年楷模：	
磊思·公撒格／若翰·伯滿	031
(Aloysius Gonzaga, 1568-1591) / (John Berchmans, 1599-1621)	
II. 遍布廣闊世界	
1. 各國的耶穌會傳教士：	
伯納定·雷亞利諾 (Bernardine Realino, 1530-1616)	067
若望·雷濟思 (John Francis Régis, 1597-1640)	075
儒廉·茂諾 (Julian Maunoir, 1606-1683)	085
2. 完美的朋友：	
葛樂德·高隆汴 (Claude La Colombière, 1641-1682)	096
3. 師徒二人：	
雅風·羅德里格／伯鐸·克拉威	109
(Alonso Rodríguez, 1531-1617) / (Peter Claver, 1580-1654)	
4. 在蒙兀兒宮廷：	
傑洛尼莫·薩威／鄂本篤	131
(Jerónimo Xavier, 1549-1617) / (Bento de Goes, 1562-1607)	
5 尼格斯的最愛：	
伯多祿·裴茲 (Pedro Páez, 1564-1622)	152

6. 開教先驅：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164
陸德 (Alexander de Rhodes, 1593-1660)	182
羅伯·諾比理 (Roberto De Nobili, 1577-1656)	195
若望·布理道 (John De Brito, 1647-1693)	212

III. 血的見證

1. 英國國教的絞刑：

艾蒙·坎庇恩 (Edmund Campion, 1540-1581)	233
亞歷山大·布萊恩 (Alexander Briant, 1556-1581)	243
羅伯·邵思衛／亨利·葛內 (Robert Southwell, 1561- 1595) / (Henry Garnet, 1555-1606)	245
尼古拉斯·歐文 (Nicholas Owen, 1560?-1606)	259
若望·歐吉威 (John Ogilvie, 1579-1615)	263
道明·柯林斯 (Dominic Collins, 1566-1602)	271

2. 胡格諾派教徒暴亂：

雅各·撒肋／威廉·索特慕 (Jacques Salès, 1556-1593) / (Guillaume Saultemouche, 1557-1593)	277
--	-----

3. 在科希策的困境：

雅各·龐格斯／麥基奧·柯樂茲／瑪爾谷·柯利吉 (Stephen Pongrácz, 1582-1619) / (Melchior Grodzienci, 1584- 1619) / (Mark Krizevčanin, 1588-1619)	284
--	-----

4. 哥薩克的暴虐：

安德·保保拉 (Andrew Bobola, 1591-1657)	288
-----------------------------------	-----

5. 長崎十字架：

保祿·三木／若望·五島／雅各·喜齋	293
-------------------	-----

(Paul Miki, 1564-1597) / (John de Goto, 1578-1597) /
(James Kisai, 1533-1597)

6. 大洋洲的圈套：

狄雅哥·維多 (Diego Luís de San Vitores, 1627-1672) 299

7. 印第安戰斧：

若望·卜瑞伯 / 依撒格·饒格 306
(Jean de Brébeuf, 1593-1649) / (Isaac Jogues, 1607-1646)

8. 瓜拉尼 (Guaraní) 的石斧：

羅格·公沙來 321
(Roch González de Santa Cruz, 1576-1628)

基督的僕人 I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夏天

(西元1581年至西元1687年)



夏

1581-1687

輝煌盛夏的時期

耶穌會的黃金世紀充滿可歌可泣的事蹟，可謂廣揚聖教的盛夏輝煌時期。統計數字說明了此一事實：耶穌會名列聖人與真福的 184 位會士當中，多達 144 人屬於這個時期，比率高達 78%。隨著信教人數拓增與宣教幅員的擴張，成聖之路上不乏志同道合者。

這個時期始於 1581 年克勞迪奧·阿奎維瓦（Claudio Acquaviva）出任總會長之時。教宗國瑞（Gregory）十三世在接見推選阿奎維瓦出任總會長的修會大會成員時所說的一段話，無異正式承認耶穌會在這個時期宣教活力充沛的事實。「耶穌會勢力拓展遍及全球各地。我們舉目可見耶穌會所建立的學府與會所。」他更以明顯誇張的語氣說：「你們指導無數的王國、省分，的確整個世界都受到你們的影響。簡言之，你們神聖的修會是當今上主舉揚對付異端最大的工具。」

「到了 1580 年，」史學家威廉·斑格（William V. Bangert）指出，「歐洲、天主教與基督教都注意到一股新的精神力量已進入這個世界。當時耶穌會全體會士共有五千人。耶穌會特別注重以下兩項事業：設立學校與海外傳教工作。由耶穌會督導的學校總共 144 所，海外傳教站網絡遍及全球，遠從日本、東印度、非洲，到達拉丁美洲。」

畫家波佐（Andrea Pozzo 1642-1709）在羅馬學院（聖依納爵）教堂圓頂上繪製的壁畫，極其清楚明白的描繪這段時期耶穌

輝煌盛夏的時期

會的拓展情形。畫家以絕妙的透視手法，繪出無窮深遠的穹蒼。從位於至高處的天父發射出來的一道光，傳到聖子身上，耶穌再將這光傳給耶穌會會祖依納爵，然後自依納爵再分出四道光，迸射到全球四大洲。至於光進入這個世界後產生的影響，則以大約 200 人展現曼妙舞姿，各自表達不同的反應說明一切。



I.

在羅馬學院

耶穌會的擴展中心有兩大重鎮：設在蓋素（Gesù）負責指導與策劃的總部，以及推廣包羅萬象的教育活動的羅馬學院。

羅馬學院始終是依納爵個人構思的產物，是他最重視的珍寶。他希望羅馬學院成為一流的學府：他要延攬學富五車的教授，吸收全球各地的學生，這個學府將稱之為「環球學院」。套一句維拉史拉達（Villoslada）所說的話，「正如蓋素的教堂成為後來無數耶穌會巴洛克式教堂風格的原型，羅馬學院也成了其他學院效法的典範，因此開創了或可稱之為耶穌會的教學模式。」

羅馬學院造就了日後許多偉大人物：伯敏（Bellarmine），公撒格（Gonzaga），伯滿（Berchmans），克勞迪奧與羅貝托·阿奎維瓦（Claudio與Roberto Acquavivas），范禮安（Valignano），利瑪竇（Matteo Ricci），羅伯·諾比理（Roberto de Nobili），羅伯·邵思衛（Robert Southwell），以及其他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殉道者。

羅馬學院初建時簡陋得很，經數度改建，歷經好幾次的財務拮据，直到教宗國瑞十三世慨贈資金，並在 1583 年完成最後的興建（註一）。後來為羅馬學院的兩千名學生加蓋了一座教堂；羅馬學院獻與聖依納爵，並於 1640 年啟用。

註一：耶穌會於 1773 年遭到解散時，羅馬學院落入教區神職人員手中，1814 年修會重建時並未物歸原主，自從 1870 年義大利統一以來，羅馬學院成了政府的產業，目前改成國家圖書館，以及素享盛名的 Liceo Visconti 中學。至於原有的廣場依然沿用舊名 Piazza del Collegio Romano。

1. 聖師： 羅伯·伯敏

(Robert Bellarmine, 1542-1621)

羅伯·伯敏原是羅馬學院的學生，後來成了教授與院長。他在 1560 年 10 月 25 日完成註冊入學手續，這時他剛剛完成初學。

教宗才祿二世 (Marcellus II) 的侄子

羅伯·伯敏帶著一張名片來到羅馬學院，敲開了所有的大門。原來他是當時教宗才祿二世的侄子。他的父親是文生佐·伯敏 (Vincenzo Bellarmino)，母親是辛蒂亞·瑟維尼 (Cinthia Cervini)。後者正是當年在位僅三週 (1555 年 4 月 10 日到 5 月 1 日) 的教宗之妹。此時伯敏家家道已中落，文生佐並不富有。因此他才華橫溢的兒子表明心跡決定加入修會，讓他很不悅。直到他聽說他兒子的一個表哥，也就是瑟維尼家族的後輩也決定加入耶穌會時，他的心才軟了下來。

這兩個年輕人於 1560 年 9 月 16 日離開蒙特普契亞諾 (Montepulciano) 城，徒步前往羅馬。他們剛抵達羅馬，同一天就獲准發初願，並且立刻進入羅馬學院就讀。在學第一階段歷時三年，這段時期伯敏經常生病，但是最後的結業成績依然耀眼；他甚至脫穎而出，獲選為由樞機主教與其他尊貴人士親自主持隆重結業大考的佼佼者。

完成三年的哲學課程 (1563-1569) 之後，接下來的六年顯示他終其一生不變的活躍特色：十三個月在佛羅倫斯教授長得比他高大的學生，由於他的講道異常成功，他受邀前往前輩薩沃納羅

拉 (Savonarola) 一度登台講道的講壇向信友宣講；此外，他曾在義大利杜林附近的蒙多維 (Mondovi) 新設的學院短暫講學；調到帕多瓦 (Padua) 時，他擅長宣講的名氣似乎達到最高峰。1569 年春天，他接獲意料之外的上級命令，奉命前往比利時魯汶。

在魯汶 (Louvain) 當教授兼傳道者

伯敏受命接替著名的艾斯翠達 (Francisco de Estrada) 負起宣道重任。7 月 25 日他在聖密雪爾 (St. Michel) 一所大學首次登壇講道，在座的聽眾都想聆聽這個年輕的義大利耶穌會士要來告訴他們什麼訊息。他的外表看起來像個大男孩，身上甚至沒有披聖帶，因為他尚未晉鐸。然而他一開口之後，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顯然愈來愈重，大家都說從義大利來了一個年輕的巨人，宣揚上主的聖言。

伯敏抵達魯汶時，魯汶大學正因為巴依烏斯 (Michel Baius de Bay) 充滿爭議的教導鬧得風風雨雨。這件事並不利於嚴肅研究所必備的平和氣氛，耶穌會於是提出申請，要求由自己人來教授他們的學生神學。所請獲准後，第一位被派赴這所名校的耶穌會士就是伯敏。當年他還不到 28 歲，卻已經當上教授，且是學院的教務長兼神師。

第一次講課

他第一次講課是在 1570 年 10 月 17 日，來自各國的百來位學生，其中有些人年紀比他還大。魯汶大學的傳統教科書是彼得·隆巴 (Peter Lombard) 所著《四部語錄》 (*Liber Sententiarum*)，伯敏汰換改用聖道茂 (Thomas Aquinas) 所著《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ica*)。在耶穌會的檔案中，我們找到了四冊由這位新

教授註記的手稿卷宗，其中不下 1,500 頁是雙欄筆力遒勁潦草字跡的手稿。他逐步追隨聖道茂的思想，善盡詮釋、演繹、補充完整的工夫。他的講道新意銳出，大名遠播比利時海內外，位於杜艾（Douai）的英格蘭學院當局對他印象深刻，該學院多位教授取得了他的註釋複本，乾脆照本宣科，直接對自己的學生口授。

伯敏無法漠視巴依烏斯在他的大學裡惹出來的問題，但是他行事極其謹慎，巴依烏斯早已以代表身分參加特利騰大公會議，權大勢大。「我們的年輕大衛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挑選他要丟擲的石頭，因為他的周遭盡是門外漢。」（依布魯迪克所言）他在指正錯誤時，態度恭謹，面面俱到，始終認清巴依烏斯大權在握。

這一段與異端直接接觸的經驗，使他直接了解新教徒所提出的問題，因此他自覺有必要加強聖經知識，於是他潛心鑽研希伯來文。伯敏決定深入研究，編纂了一套文法，為了說服學生希伯來文並不難學，他提議以一週時間教導，學生們自可借助於字典讀懂聖經。有一名學子接受挑戰，結果發現教授所言不差。

伯敏名氣遠播，當時在米蘭的波羅蜜歐（Charles Borromeo）樞機主教正渴求耶穌會士與司鐸祈禱會士，他提出申請希望伯敏前來服務，但在此同時，羅馬學院也希望爭取伯敏。比利時方面則不願放人，並設法留住伯敏直到 1576 年他因健康因素不得不再返回義大利休養為止。無論如何，此時學子已擴增到兩千人的羅馬學院，有優先爭取他的權利。總會長穆克安（Mercurian）指示他勿取道米蘭，而要經熱內亞返回羅馬，唯恐在米蘭的波羅蜜歐設下圈套留人。

「打擊異端的鄉頭」

套一句本篤十四世教宗的話，他稱伯敏是「打擊異端的鄉

頭」，不過這句話用在一位溫文儒雅的人身上，顯得似是而非。伯敏是以說理論證有力折服人，並非藉蠻力掙得此一封號；只要奉命出馬，他一定猛揮鐵錘，打擊異端不遺餘力。

羅馬學院自 1561 年以來即設有「辯論神學」教席，然而成績並不如意。十年後力圖振興，由一位傑出的神學家萊德斯馬（Ledesma）出任，不過在這位中庸的教授領導下，此一計畫於一年後又告吹了。伯敏剛返抵羅馬即接受這個教職，他在教宗與總會長的鼓勵下，從此投身於堪稱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

當年伯敏才三十四歲，辯論神學教職是個空前的創舉，今天許多著作談論的辯論神學，在當年根本是一團混亂，稱不上科學。伯敏開始探索這個領域，以期透徹了解一切。1576 年 11 月 26 日，他首次設堂講課，座無虛席。亨利·葛內（Henry Garnet）是他的同僚兼友人，此人受到他影響，甚至於捨棄自己的數學教學，決志投身英國傳教工作。其他好幾位英國殉道者都是伯敏的門生，包括若望·洛威（John Lowe）、克里斯多福·布克斯頓（Christopher Buxton）、愛德華·詹姆士（Edward James）、愛德蒙·杜克（Edmund Duke）、若望·尹格蘭（John Ingram）、若望·康尼柳斯（John Cornelius）、亨利·瓦爾波（Henry Walpole）、羅伯·邵思衛（Robert Southwell）、愛德華·歐德孔（Edward Oldcorne）……

他為了講課必須閱讀新教徒作品第一手資料。不過，新教徒的作品如果真能送達羅馬，往往馬上遭到宗教法庭的沒收，因此他不得不私下設法祕密取得資料。雖然如此，他仍能夠徹底了解每一位重要新教徒作者的思想。他的講道盛名日增，後來各界紛紛要求他出版講課內容，總會長本人頗為熱中。但是他沒有充裕時間去準備出版事宜；舉凡學者委員會的任命，或者學術調查的

成立，他一定都有份：例如參與 1581 年的禮儀年曆改革，希伯來語著作修訂工作，新版七十賢士譯本（*Septuagint*）的出書工作等。

神學辯論

第一冊《神學辯論》（*Controversies*）在 1586 年面世，在茵格斯達（Ingolstadt）印刷，除了教宗思道五世（Pope Sixtus V）、羅馬皇帝魯道夫二世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的印璽，還有認可證書。內容包括七篇論文，論述詳盡，例如有關教宗的論文，直到現代仍算得上是內容非常紮實的著作。第二冊討論聖事的講道內容，在短短一年之內，於 1588 年問世。第三冊有關恩寵與成義，則在五年之後才出版。在這些著作中，伯敏引經據典，出處精確之外，還展現了其他的特質：他抨擊異端不忘謙恭有禮，且立場不偏不倚。

「新教主義的號角聲難掩驚慌失措：門口出現了攻擊作風前所未見的敵人，不曾見過羅馬有人像他這樣的一身功夫。」（布魯迪克說）新教徒的一流學者也無不心悅誠服，像是聖若望學院院長兼劍橋大學教授威廉·惠塔克（William Whitaker）即坦承：「我推崇他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快樂天才，他博覽羣籍，判斷犀準。」對聖公會的神學家而言，護衛新教主義意即針對伯敏發動攻擊。

1587 年，伯敏停止教學，專心著述；不過在耶穌會的情況是，他只要卸下一項職務，上級總是再派給他另一項職務。新的職務是要他去擔任羅馬學院眾多學究的神師。其中之一就是磊思·公撒格（Aloysius Gonzaga），根據博蘭德研究團（Bollandists）的說法：「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聖磊思，因沒有人可以對聖磊思出

凡入聖的言行作出更不厭其煩的證明，更沒有人能以最後一位告解神父那樣充滿情意懷著崇敬之情紀念他。」如果說磊思沒有死在他的懷裡，那是因為 1591 年 6 月 20 日當晚，理家神父要他休息之故。

教宗任務

1589 年，可敬的教宗思道五世賦與他一項微妙的任務：出任教宗駐法國使節蓋塔尼（Gaetani）樞機主教的顧問，當時法國正陷入一場混亂的宗教戰爭中。蓋塔尼樞機主教絕非外交人才，他只會照字面闡釋接獲的指示，無力針對不斷演變的情勢作適當的順應對策。他害怕未能圓滿達成任務而遭致他的上司激烈的反應。有一次他請教伯敏，問教宗還會活多久。後者肯定的回答：

「他會在今年（1590）過世。」

蓋塔尼不相信他的話，反問一句：「你真的認為今年他會回到天鄉？」

「我確定，樞機主教。」

這位使節面臨的麻煩可多了。當時納瓦拉（Navarre）的亨利大軍圍攻巴黎，造成饑饉問題。連狗食貓食都得配給，據說還出現了吃人肉的現象。伯敏慷慨與窮人分享物資。總會長阿奎維瓦送給他一些錢供他私人花費之用，他全數轉交給當地的耶穌會，因為此時耶穌會為了維持校內六百名學生的生活，財務頗為拮据。

但這還不是他最困難的處境。他最不好過的時光是與駐法使節交往期間難以避免的政治性質的事情。碰到這種情況他會悄悄地消失無蹤。蓋塔尼注意到這種情況，問過他：

「你生病了嗎？伯敏神父？」

「喔，沒有。但我既然奉派來針對宗教事務提供意見，我認

為我沒有權利參與此時您正加入的討論。」

1590年9月初，樞機主教接獲了教宗去世的惡耗，奉命回國參加教宗選舉會議。一行人自9月24日啟程，直到11月11日才抵達羅馬。

過去伯敏為了思道五世教宗的緣故，在巴黎受到胡格諾派（Huguenots）圍困吃盡饑饉之苦，後來他發表在《神學辯論》中的見解，與教宗發生衝突；他認為教宗沒有過問世俗事務的直接權力，世俗事務應交由民間權力去處理。思道教宗對此感到非常不悅，將伯敏納入禁書名單。任何人都阻擋不了他，但他的及時過世，使得已經付印的目錄沒有對外公布。

從院長及省會長擢升為樞機主教與總主教

無論地位身分，伯敏都有資格填補任何出缺的職位。1592年12月18日，他受命出任羅馬學院院長；1594年11月24日，出任那不勒斯省會長；1596年底他奉召赴羅馬，出任宗教裁判所所長；1599年3月3日，他晉升為樞機主教，1602年4月21日，他出任卡普亞（Capua）總主教；1605年3月5日，教宗克勉八世（Clement VIII）去世後，繼任者解除了他這項職務，將他調返羅馬。這段期間，他每個職務都只擔任兩、三年。

伯敏似乎並不特別擅長行政管理。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是一位非常超凡空靈的人物，不過他或許不切實際，不太注意細節問題，而這些都是一位良好的行政管理所必備的條件。這點不算瑕疵，但要是他不懂得去調度別人，他就可能受到任何人的擺布。

他一開始出任學院院長，就是這麼做的。到任的次日，他召集全校師生，向各位保證他不分晝夜願為大家服務。同時他下令

卸下院長室內一幅貴重的圖畫，並撤走一件奢華的家具。他當校長的特色展現無遺。

羅馬學院共有來自歐洲各國的學員共計 220 人；伯敏特別注重學員間彼此的團結，致力消除國與國之間的歧見。他本人總是展現歡迎、愉悅的神色，他為人徹底開誠布公，同時要求其他人必須與他坦誠相待。他熱愛音樂，藉音樂增進兄弟手足的凝聚力。他的歌喉雖然不怎麼出色，卻會拉小提琴，也會彈奏魯特琴；他甚至還會作曲，每逢全校有娛興節目，他都能作些改編曲，達到眾樂樂的目的。

他有音樂為伴的夜晚很快就成為過去；他料想不到自己會被派到那不勒斯去當省會長，而這段時期也非常短暫。雖然如此，他仍有兩度造訪那不勒斯省的紀錄。最令他滿意的事情或許是與義大利最南端的雷西（Lecce）學院院長伯納定·雷亞利諾（Bernardine Realino）的會晤。這是兩位聖人典型的交會，當伯敏會見雷亞利諾時，他屈膝下跪示敬，而當伯敏離城而去時，雷亞利諾也嘆道：「一位偉大的聖人離我們而去了。」

返回羅馬

到了 1596 年底，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應克勉八世教宗的請求，要伯敏返回羅馬。原來當時教宗十分重視的一位神學家方濟·托列多（Francisco Toledo）在這一年去世了，教宗希望伯敏能夠以神學家的身分來接這個遺缺，同時擢升他為樞機主教；伯敏希望住在耶穌會會院內，並且獲准與聖伯多祿教堂的耶穌會告解神父一起定居在潘尼騰提亞利（Penitentiary）（今為哥倫布飯店）。

有關他即將獲得拔擢升任樞機主教的消息早已傳開。他的兄

長托瑪索（Tommaso）對此一展望表現熱衷，相反的，羅伯本人則很不願意捲入這場遊戲，他極力推辭。克勉教宗則毫不讓步；到了3月3日，教宗正式任命他為新任樞機主教，並且派了一位使者傳令，未經教宗許可不准他離開會院；同一天他正式戴上樞機主教的帽子；伯敏在整個儀式中從頭到尾泣不成聲。3月6日耶穌會總會會長將這個「悲慘的消息」告知耶穌會全部三十二個省，指稱伯敏神父奮力抗拒受命，但教宗強迫他接受新職，並以不服從命令就要將他開除教籍迫他就範。

伯敏並未犧牲自己的自由。他把自己定位為僕人，而非侍從，因此他有意見表達，一定坦率直言。這位曾經悍衛教宗權威，對新教徒抨擊不遺餘力的人，如今以真誠講實話為教宗服務，絕無阿諛諂媚。由於他幾乎是羅馬教廷各部會的成員，不乏對每一個重要問題提供建言的機會。其中之一是有關道明會與耶穌會針對協助恩寵（*de auxiliis*）所引發的著名長期爭議。道明會維護神恩效力凌駕人類自由之上的立場，耶穌會則悍衛甚至在聖寵神恩作用下人類依然擁有自由的主張。教宗公開支持道明會的詮釋，據說決心一勞永逸的擺平這件事。他或許真的可能這麼做，因為他剛將布魯諾（Giordano Bruno）以異端邪說罪名給活活燒死。1601年，戴爾·蒙特（del Monte）樞機主教與伯敏有這樣一段談話：

「我確信教宗即將發布有關神恩效力的定義。」

「教宗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怎麼那麼有把握？你必須承認，教宗擁有為這個問題界定定義的權力，我了解他已下定決心要這麼做。」

「是的，他是有權，但是他不會行使這個權力。」

「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

「因為他沒有機會這麼做，他會先去世。」

就我們所知，這是伯敏第二次預言教宗將會在某個確切日期過世。1602年，克勉八世教宗創立了特別的協助恩寵部（Congregation De Auxiliis），當時伯敏奉命出任卡普亞總主教，因此並未參與其事。1602到1606年間，這個新設的部門總共集會六十八次，展開三十七次正式的辯論，但是始終未作成定論。克勉八世於1605年3月5日逝世，到了1607年8月28日，他的繼任者終結了這個部，對此事不作任何結論。

處境困難

伯敏與克勉八世的關係並不平順，他們兩人彼此敬畏對方。1603年伯敏到卡普亞上任後，他一如往常在耶誕節期向教宗問候祝願。克勉教宗的回覆真情流露，但加上這麼一段文字：「要是你能擱置你那多少像是侍臣的作風，不必提起這一年來你注意到『我們』的諸多缺失，提醒『我們』、教導『我們』明年『我們』應如何匡正、如何修補這些缺失，又如何更上層樓的侍奉上主，我們會覺得更高興接到你的耶誕賀卡。」心靈單純得像個兒童的伯敏對此信以為真，到了次年耶誕節，他什麼都不寫。

身為卡普亞總主教，他立下了真正牧者的榜樣。除了將臨期與四旬期，任何時候都有講道，這在當時當地是新鮮事兒；在他擔任總主教三年期間，每個主日與瞻禮日他都親自講道，從未缺席過一次。他嚴厲抨擊賭博，細述道德敗壞導致的謀殺、自殺、打架與誹謗等罪行，他更採取具體行動，促使行政管理當局查封賭場。他著手進行主教座堂的整頓，尤其是，主教座堂的教士團體，四十位教士之中，只有十位是神父。同時他也不忘宗教社團的更新計畫，因為許多宗教團體已經喪失起初的精神。此外他對

貧苦者的照顧不遺餘力，尤其關懷那些羞於開口求助的窮人。

伯敏抵達卡普亞不久，他就利用閒暇搜集在他之前歷任總主教的名字與在位期間的資料，按照先後次序，完成「從聖伯鐸的門徒——聖普斯克斯（Priscus），直到當代」的彙編工作。他注意到他的前任管轄教區長達三十年，他有所感的為自己加上一筆：「羅伯·伯敏任期三年。」

兩次教宗選舉祕密會議

教宗克勉八世去世之後，伯敏奉召參加他個人的第一次選舉教宗祕密會議，結果發現自己處於他極為厭惡的政治氣氛中。怪的是，第一回合審查結果，他名列選舉名單首位；但這並不意味反對黨派戰術的某些危險。1605年4月1日，亞歷山大·米德西（Alexander dei Medeci）樞機主教當選教宗，取名良十一世（Leo XI），不過他在一個月內去世了，因此再度召集推選教宗祕密會議。

負責仔細觀察候選人的西班牙大使，向菲利普三世國王傳回以下情報：「伯敏是個好人，神學學問好得很，但是處理實務能力欠佳。」根據密報，他不適合成為教宗候選人的主要障礙是他屬於耶穌會，為人正直廉潔，他從來不接受禮物。於是菲利普國王決定「聽天由命」。換句話說，西班牙既不支持他，也不反對他。最後，在同年5月16日晚上，經過最後的激烈競爭，卡米洛·波吉斯（Camillo Borghese）樞機主教脫穎而出當選教宗，他取名為保祿五世（Paul V）。至今在聖伯多祿教堂正面主立面正中央，還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居於醒目的地位，有一行文字說明：教堂建築於主曆1612年 PAVLVS V BVRGHESIVS ROMANVS 竣工。

新任教宗活力充沛，立場超然，而且年輕（52歲），可望成為在位長久的教宗。不過有人預言這位教宗會在同年1605年9月過世。對前兩位教宗的死期預測準確的伯敏則推翻謠言。

「他會在位很久一段時間。」伯敏告訴祕密會議的神師路易濟·阿拉嘉吉（Luigi Aragazzi）蒙席。

當這位神師問會在位多久，伯敏接口說：「十六年，他會在位十六年。」

保祿五世死於1621年1月18日。

新任教宗非常敬重伯敏，希望他能待在自己身邊輔佐。伯敏婉拒了；他寧可回復在卡普亞的牧靈生活；保祿五世則堅持不讓，要求他放棄總主教職位，並為照顧他的生活，撥給兩千scudi的年薪。不久之後，樞機主教找機會晉見教宗，勸服教宗將自己的年俸折半。

「其他的樞機主教首次見我都會要求一些好處；唯獨你要求捨掉你已經擁有的部分。」

「聖座，我生來貧窮，更在貧窮中長大，今後我當甘之如飴過著貧窮樞機主教的生活。我已經擁有我要的很多東西，今後我不會再為自己任何要求前來煩勞教宗。」

伯敏難掩心頭之痛：他的繼任者很少住在教區，而是長時間待在努西亞圖瑞斯（Nunciatures）不同的天主教法庭。1618年4月10日，他以向來坦率的態度致函當時人在馬德里的這位缺席總主教：「原諒我必須一提，我為我十分重視的教堂，長期得不到它牧者的關懷感到難過。當你人在波西米亞擔任皇帝的教廷使節，我常乞求教宗把你召回，讓你回到你配偶的身邊，我常提醒你，一個作丈夫的如果常常跟他的妻子分離，那既不可能增加子女數目，也不可能將上主賜給你的子女帶好。」

停泊依然活力充沛

1605年伯敏返回羅馬，猶如大船入港停泊。然而這位老練的水手善於把握偶爾回到公海的機會施展長才。他是羅馬教廷四個聖部（其中包括信理部）的監牧，也是幾乎其他所有各部的委員。他必然針對各重大事項提供個人意見，而他的判斷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

舉例而言，英格蘭詹姆士一世國王就當時兩個最棘手的政治問題——神聖王權與教宗對世俗事務的轄權——掀起爭議。詹姆士國王提出「天賦王權」（*Basilikon Doron*）的主張，伯敏則回敬以「天賦祭司權」（*Hieratikon Doron*）。他並且透露，詹姆士國王當年仍在蘇格蘭角逐英格蘭國王大位期間，曾與克勉八世教宗以及他本人書信來往的情形，這點對詹姆士的打擊最大。詹姆士否認他曾經傳達信息給教宗或者伯敏，反而指控他在蘇格蘭的首席祕書巴默里諾（*Balmerino*）勳爵偷偷摸摸將這些信件跟其他待簽文件放在一起。

伯敏與詹姆士一世國王交鋒不只一次。奉教宗之命，伯敏不得不反駁國王為捍衛他強迫天主教徒「宣誓效忠」的作法。開始時只是兩個人對決，到了最後成了政治鬥爭。詹姆士國王召集他的神學家；而所有耶穌會神學家——蘇亞雷斯（*Suárez*）、范德貝克（*Vander Beeck*）、皮勒提耶（*Pelletier*）、葛雷策爾（*Gretser*），都聯合起來支持伯敏。雖然羅馬神學家們論述圓滿成功，但英國的天主教徒可是繼續在遭緝捕、迫害與打擊中過日子，首當其衝的便是伯敏從前的同伴與學生。

可悲的伽利略案

伽利略案是可悲的一章。這位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兼出色的演講家，根據可靠的數據早已證實哥白尼的革命理論：地球圍繞著太陽公轉，並非宇宙的中心。伯敏接受此一理論視之為假說，而非既成事實，他持反對態度，但要給伽利略一個解釋其觀念的機會，而且告訴對方，教會準備頒令對付他。

伯敏盡量跟每一個人作朋友，因此贏得每一個人對他的感激。天性使然，即使他被迫面臨爭議，也都能夠迎刃化解，他的心地善良，總是為每一個人著想。方濟會士感激他從禁書目錄中撤銷一本某方濟會士為敦司·思高（Duns Scotus）辯護所寫的書，此人遭到一位道明會士惡意的抨擊；道明會總長請求在伯敏去世百年之後將他列真福；一位聖衣會修女甚至說，要是伯敏再生的話，他會加入聖衣會，而不是耶穌會；威尼斯的奧斯丁會（Augustinians of Venice）則致贈一大籃價昂的珍饈塊菇給他；聖方濟·沙雷（St. Francis de Sales）感謝他解決一個不過隱修生活，也不發鄭重誓願，卻遵守修道生活美德的婦女團體，如何保有原始神恩的問題；福爾達（Fulda）修道院院長巴耳沙爾（Dom Balthasar von Dermbach）因異端邪說在 1579 年遭他所屬的團體逐出，部分是由於伯敏的關心與奔走，在二十五年之後得以恢復名譽；此外，伯敏還主動對英國本篤會修女隱修院展現同樣具有實效的關懷。

退休

當教宗要求伯敏捨棄卡普亞總主教職位，改調羅馬為教宗服務時，他特准伯敏自選寓所，並且在教廷內為伯敏準備了幾個房

間，讓他在必要時住宿。伯敏在崔士帝維爾（Trastevere）區的聖瑪利亞教堂附近居住到 1608 年；然後遷居那弗那（Piazza Navona）；1611 年他定居羅馬學院旁，隨時可以聽到學院鐘聲，並依此作息。然而他十分謹慎，甚至不提自己希望到羅馬學院或蓋素的耶穌會總部去參加宗教儀式活動。他只容許自己一件事，那就是修建位於奎里納爾（Quirinal）的聖安德初學院，好讓自己在那裡祈禱、作默想。起初他只作八天或者十天的退省，後來延長到一個月。這些避靜的直接結果是完成了許多虔敬的著作：《聖詠評論》（*Commentary on the Psalms*）（1611），《循受造物之梯心靈昇向上主》（*The ascent of the mind to God by the ladder of created things*）（1614），《聖人的永福》（*The eternal happiness of the Saints*）（1616），《白鴿之慟或淚水的價值》（*The mourning of the dove or the value of tears*）（1617），《十字架上基督的最後七言》（*The seven words pronounced by Christ on the cross*）（1618），《對 Teano 主教的勸誡》（*Admonition to the bishop of Teano*）（1619），《善終的藝術》（*The art of dying well*）（1620）。

最後這本書證明是未卜先知，他在世的最後三年是最難過的時光。1619 年出現異乎尋常的嚴寒，造成他的雙手因痛苦的凍瘡而出血；他的雙腿腫脹得厲害，他使用了十八年之久的鞋套不再合用。人家告訴他買雙新鞋套頂多花五、六個 giulii，可是他卻回答，這筆錢對一個窮人而言還嫌太多了，他要求將老的鞋套繫上鞋帶，這樣就可以穿上腳了。

此時他極渴望卸下尊貴地位，以一位平凡的耶穌會士度過餘生。他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申請信給教宗，並且開始有條不紊地為他的工作人員尋覓新職，然而保祿五世不認為他能夠豁免他這

位朋友的服務。

保祿五世於 1621 年 1 月 18 日去世，伯敏不得不再忍受第三次推選教宗祕密會議的艱辛。所幸這次大會為期甚短，新任教宗為國瑞十五世（Gregory XV）。當時高齡七十九歲的樞機主教懇切要求新任教宗准許他返回耶穌會。國瑞教宗親切傾聽他的心聲，但不肯放他離去；他必須在教廷繼續服務。伯敏服從了，但數月後教宗親眼看到了樞機主教的羸弱，因此特准他如願返家。

回家

伯敏於 1621 年 8 月 25 日非常開心的退休，回到位於奎里納爾的聖安德初學院。他聽說若翰·伯滿（John Berchmans）已於兩週前的 13 日在羅馬學院過世的消息，他要求知道細節。人家告訴他，這位年輕學者在臨終前吐露，他一生當中沒有故意犯小罪。這位德高望重的樞機主教對於有人說：「要是如何如何……」的話，顯然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三天後他病倒了，發了高燒，一度失去知覺。第一次高燒退了以後，他恢復敏捷，開始談他體驗到返回天鄉的喜樂。教宗特派私人醫療顧問來探病，8 月 31 日醫生的診病報告結果顯示病情非常不樂觀。聖父派人傳話給這位臨終的病人，他將在第二天一大早去探望對方。當教宗踏進房間時，伯敏不斷重複聖經上百夫長說的話：「我當不起你到我的屋裡來。」教宗兩次擁抱他，告訴他會為他的病情復元祈禱。病人接著說：「不是祈禱我會康復，而是順遂上主的旨意，無論生死，隨主安排。」

他在 1621 年 9 月 17 日傍晚六、七點鐘之間安詳離開人世。

2. 兩位青年楷模：

磊思·公撒格／若翰·伯滿

(Aloysius Gonzaga, 1568-1591) / (John Berchmans, 1599-1621)

這兩位都是羅馬學院的學生；磊思使羅馬學院與耶穌會名聲大噪；三十年後，又見另一位風頭稍遜於前輩的若翰。這兩人堪稱上主賦與年輕耶穌會的無價之寶。

家庭背景

這兩位耶穌會士的家庭背景截然不同。兩位都具備聖德，足為歷代耶穌會士效法的楷模，其中之一是神聖羅馬帝國王子的後嗣，另一人則為鞋匠之子；磊思來自大權在握，能夠決定廣大民眾生死的統治階層家庭，而若翰則是一個十七年間七度遭軍隊占領的貧窮凋蔽小鎮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說前者屬於高壓階層，後者則屬於受壓迫階層。但正如「靠劍生活的必死於劍下」，磊思家族不乏暗殺事件，而若翰則成長於平安和諧的環境。

公撒格家族圍繞著曼圖亞（Mantua）大宅羣聚，後者是他們共同的祖先，是他們整個家族的元首。磊思的高祖父母是曼圖亞的世襲貴族路易三世（Luigi III），與來自布蘭登堡（Brandenburg）的霍亨佐倫（Hohenzollern）的芭芭拉（Barbara）。公撒格家族有一個奇特的習慣，那就是將采邑封地平均分配給各個子女，再由每一個子女自行決定去爭取皇帝的授爵。這個制度固然使野心茁壯，卻也不時導致暴力陡升。因此之故，這個家族史充滿了奮進、英勇與罪惡並陳的事蹟。

聖人祖父路易·阿雷桑德洛（Luigi Alessandro）分到的采邑

是卡斯提利歐（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傳給聖人的父親費朗德（Don Ferrante）。

聖人的母親是瑪莎·塔納·桑提娜（Martha Tana de Santenna），她的父親是塔納男爵，母親是拉洛維爾女男爵。瑪莎出生於皮耶蒙（Piedmont）的奇里（Chieri），年幼時即被送進巴黎的瓦盧瓦宮廷（Court of the Valois），在宮廷內她獲得亨利二世國王女兒，亭亭玉立的伊莉莎白的喜愛，當她下嫁菲利普二世時，即挑選瑪莎當自己的侍臣。費朗德在馬德里結識了貴族小姐瑪莎，他們兩人可謂截長補短。男爵揮霍成性，膽識過人，女的則盡責謹慎，為人溫和且正直。

這對佳偶結婚時，國王與王后少不了致贈許多禮物。王后慨贈新娘珠寶首飾，菲利普封新郎為宮廷大臣，並賜贈那不勒斯王國與米蘭公爵領地，後來還任命他當國王手下的副將，此一職階是無數王公貴族志在爭取的目標，因為有了這個資歷，必然將順利朝向軍界大展宏圖。

時至今日，卡斯提利歐的公撒格家族城堡，只剩下少數殘石堆疊。然而在 1565 年，這個城堡可是占地遼闊，到處可見角樓、高牆、防禦土牆林立，其間不乏寬大的房間、曲折的迴廊、陡直的梯階，有些甚至與堅固的岩石連成一體。

這就是 1568 年磊思來到人世的背景。此外瑪莎還撫育了七名子女：魯道夫（1569），費朗德（1570），卡洛（1572），佛朗契斯柯（1577），克利斯提耶諾·文生佐（1580）以及喬柯莫（1582），這七個子女的人生大多以悲劇收場。其中三個早年夭亡，有一個遭刺殺，另一個被一名火繩槍手擊斃，死在他母親懷裡，而他的母親也遭人刺死，第六個孩子成了人人痛惡的暴君兼殺人犯，最後一個雖然比較幸運，卻終日活在子民切恨的陰影

下。而在這個充滿悲情的家族中，竟出現了一個天使般的頭胎長子。

法蘭德斯的一個小鎮

若翰·伯滿的世界則截然不同。戴依斯特（Diest）是曾經有過輝煌時光的法蘭德斯（Flanders）當地一個沈悶遺世而立的小鎮。過去環繞四周的高牆已不復見，一度聳立的高塔也不可尋。此地的歷史充滿諷刺：一個名為查爾斯五世的法蘭德斯人，繼承了卡斯蒂利亞與亞拉岡的王位，引進了西班牙的統治方式。當權者課稅的目的並非用於照顧人民的利益，加上新教教義鼓吹反西班牙思想，以致叛亂戰爭時有所聞。丐幫、喀爾文教派、「無聲者」奧倫治的威廉一世、艾格蒙與霍恩的伯爵等，輪番上陣對抗法蘭德斯的兩位統治者：艾爾巴公爵（Duke of Alba）率領的軍隊與高壓打手瑞桂森（Requesens）以及奧地利的若翰；此外還有「軍事天才」之稱的亞歷山大·法內塞爾（Alessandro Farnese），此人由聖依納爵付洗。長期對峙局面使得法蘭德斯成了一個經年飽受摧殘的戰地，干戈相向的軍隊來來去去，導致一連串的報復劫掠。

身為市區有頭有臉人物的亞卡瑞·伯滿（Jan-Karel Berchmans），從事製鞋鞣皮業，他跟其他人一樣，因為戰爭變得更為貧窮。22歲那年，他娶了當地最顯赫家族亞卓安（Adriaan van den Hove）與瑪麗亞（Maria Vleugels）的女兒伊莉莎白為妻。亞卓安是鎮上的市政委員會委員，也是前往安特衛普（Antwerp）洽商一筆五萬金幣鉅額貸款的代表團成員之一，這筆鉅款是奧倫治的威廉手下軍隊於1580年7月8日攻占戴依斯特時要求的贖金數額。兩年後亞歷山大·法內塞爾在1582年5月25日光復了該鎮。

小倆口住在畢佛街上，他們的店名就叫金色的月亮，店門口顯眼的地方掛有店徽。他們的長子生於 1599 年 3 月 13 日周末，次日主日就在聖蘇爾比斯（St.Sulpitius）教堂受洗。

其他的子女陸續出生，包括亞安、瑪利亞、卡瑞以及巴特。若翰自始就顯示與眾不同的平和安寧與責任感特質。他的母親總是放心的讓他幫忙照顧年幼的弟妹。她一手操持家務，讓丈夫沒有後顧之憂，專心鞋店與鞣皮生意。

1603 年 8 月 11 日若翰才四歲的時候，黑死病奪走了他外公的性命。一年後，沒有拿到軍餉的數千名西班牙叛軍直搗戴依斯特鎮而來，占領了市場與市政府，準備要洗劫全鎮。所有鎮民羣起反抗，組織自衛隊自保，鎮民這一著棋成功了。然而叛軍卻繼續駐留該鎮，直到黑死病流行迫使他們離城。1607 年，叛軍在附近的草原上宿營，兩個月後他們被逐出該國國境，從此不再復返。

求學期間

此時若翰已在座落於市場一帶的克萊學校上學，這個學校歷經戰爭蹂躪，所幸依然屹立。若翰在此讀書寫字，每天他去上學的一路上，都可看到廢墟處處的悲涼景象，因為市府當局沒有資金迅速重建。在靠近舊市場的地方，矗立著聖蘇爾比斯教堂，那是全鎮最感自豪的地方。若翰每天上教堂，有一位神父注意到他，叫住他，跟他談彌撒的事，並且教導他輔祭的方法。這個小男孩學會了彌撒禮儀與拉丁文應答，輔祭成了他的最愛。此後他成了盡忠職守的輔祭。

他在家中常一再談起法蘭德斯人的點點滴滴。大家記憶最深刻的是有關蒙丹（Montaigu）聖母像顯奇蹟的故事。由於戴依斯特鎮一個名為佩卓妮拉·李德斯（Petronila Ridders）的盲婦奇蹟

似的重見光明，1603年9月8日這一天，這個聖母像吸引了約兩萬人前來朝聖。次年同一天前後，荷蘭軍人見機攻擊羣眾，想要從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身上大撈一筆。所幸警告及時，朝聖羣眾分途迅速四散而去，一名到現場聆聽告解的耶穌會士，帶著顯聖蹟的聖母像避逃到附近的古堡，另一個耶穌會士名人拉皮德（Cornelius a Lapide），則搶救了至聖聖體。一般將北部的新教徒與南部的天主教徒終於在1609年4月9日達成停火協議、公推亞伯特大公為國王一事，歸功於聖母。三個月後的7月16日，亞伯特當著梅林總主教瑪竇·霍維斯（Matthias Hovius）以及廣大羣眾的面，為新的聖像奠立了第一塊基石。

此時若翰已經十歲了，早已會讀會寫，跟從名師史堤旺（Val-eer van Stiphout）受教。可惜這個時候他的母親癱瘓了，所有的子女分別被送到兩位事主虔誠的阿姨瑪利亞與伊莉莎白處。這兩位阿姨住在類似修道院的教堂旁的靜修院裡，她們並非修女，卻過著虔誠事主的生活。但這只是暫時的安排，必須設法找到更穩定的解決辦法。

當時許多神父習慣留幾個學生跟在身邊，對這些寄膳宿生只收取微薄的費用，特別是如果這些學生適合培植為神父。戴依斯特的本堂神父艾默利克（Pieter van Emmerick）留了一羣這樣的男孩在他的牧區司鐸住宅內，當時還有一個空的房間，於是接納了若翰住進來。若翰滿十一歲時初領聖體，傍晚首次辦告解。艾默利克神父讓住宿生自由選擇聽告解的神父；若翰寧可選擇本堂神父，神父體察到這是信任他的明證，因此特別關注這個年幼的悔過者心靈。這個男孩真的與眾不同，他自動坐在桌前讀書，常可看到他從神父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裡「取一本小書，坐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裡閱讀」。

家中其他子女日漸長大，他們的母親繼續臥病在床，一家之主則榮膺許多公職：除了獲任命為市議員與市政委員會委員，還當上教堂執事，兼聖喬治主任。然而這些頭銜沒有一個有助於他解決財務拮据問題。1612年暑假有一天他告訴他的長子：

「若翰，你現在已經十四歲了，該是你自己出去掙錢的時候了。我們家並不富有，你必須放棄學業才行。」

母親在一旁啜泣，若翰懇求道：「親愛的父親，請您讓我讀書。我只要麵包、白開水就可以過日子，但請讓我當神父。」

若翰的兩位阿姨適時伸出援手。她們跟她們靜修院的院長堤孟門司（Aimont Timmermans）磋商，後者對這個男孩有深刻的了解，同意照顧若翰。不過這段時期不長，其他友人出面幫忙，其中主要的一位人物是公禱司鐸葛洛倫東克（Canon Frans van Groenendonck），此人建議將若翰送到梅林（Malines）高中。如果若翰在高中的表現良好，他將不難爭取到修院的獎學金，此後當可一帆風順。

梅林高中歲月

葛洛倫東克向在梅林主教座堂任職的友人公禱司鐸佛洛依蒙（Canon Jan de Froymont）提到若翰的問題，對方表示願意收留若翰寄宿。只要若翰願意在佛洛依蒙外出時協助處理事務，同時幫忙伺候進餐，他就可以免費寄宿，學費全免。

梅林與戴依斯特大不相同。梅林是個大城，是法蘭德斯首席主教所在地；公禱司鐸的家就位於主教座堂巨大的塔樓底下，若翰在閣樓擁有一個小小的房間。

1612年秋天，若翰開始在大主教的學校上課。學校大門口上方的石頭刻著以下的文字，保證讓勤奮向學的學子們獲得完整的

教育：

*Arte probus, probitate pius, pietate beatus
ut vere fias, haec schola culta dabit, 1574.*

學業活動十分緊湊：每天四堂課，每堂兩個小時，夏天從早上六點上課，冬天從上午七點半開始上課。連主日與瞻禮慶節，上、下午都各安排了一堂課。

若翰在佛洛依蒙家只不過是個卑微的僕役，但是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這個角色。像佛洛依蒙這樣有身分的人物，單獨出外是不適宜的，即使只是去參加主教座堂會議也不宜，他的身旁總有若翰跟隨著。其他公禱司鐸也是一樣。不過其他公禱司鐸的男童僕役聚在一起總是喋喋不休，要不然就藉機找樂子玩耍，唯獨若翰總是利用時間手不離卷。

這位司鐸還收容了其他寄膳宿生，包括荷蘭鹿特丹附近的羅登（Roden）與任德瑞契（Rendrecht）的領主彼得·羅登的三個兒子邁可、威廉以及康尼爾，若翰還得照顧他們，督導他們的課業，注意他們的言行舉止。若翰非常盡責，這三人的父親再次前來探視時，對三個兒子的進步神速留下深刻印象。

耶穌會開辦學校

耶穌會克服諸多困難，在梅林開辦一所學校，情勢變得不安起來。艾爾巴公爵並不喜歡這個發展，因為他不信任任何非百分之百西班牙的事物，然而亞歷山大·法內塞爾卻喜歡，而且繼他之後上任的歷屆總督也是如此。起初表示歡迎的霍維斯總主教，在聽說新校的設立將不利於他的學校之後，他開始感到不悅。直到他獲得保證情況並非如此之後，他才勉強同意，於是耶穌會在1615年設立了學校。

若翰是第一批註冊入學的學生之一，他並不十分清楚吸引他的力量，他只不過道聽塗說，對耶穌會略有所聞罷了，不過當他知道耶穌會即將開辦一所學校之後，他就一心嚮往進這個學校。這個舉動引起了反對聲浪；范·歐費姆（van Ophem）院長根本不願聽到有關的話題；霍維斯總主教感到不悅；其他人都表示遺憾損失了這麼一位前途無量的學生；只有佛洛依蒙反應不同，倒不是對耶穌會有好感，而是因為他一向與總主教不和。遠在戴依斯特家鄉的若翰父親則是感到驚惶失措，因為他考慮到轉學可能帶來的影響，還有修院獎學金被取消等問題，於是火速衝到梅林。新校的教務長麥爾柯特（van Maelcote）神父向他保證他的兒子將在魯汶大學獲得獎學金，他才放下心來。若翰上的是最高的班級，研習修辭學。

這個新校對若翰的學業成績，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生活，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是由羅馬學院創立、不久後拓展到其他所有學校與學院的基督生活團，以及磊思·公撒格以拉丁文寫成的初版自傳（也可能是同年 1615 年安特衛普出版的法蘭德斯文譯本），若翰熱切地捧讀再三。他開始情不自禁受到耶穌會吸引，並且堅定決心，要成為像他的偶像那樣的耶穌會士。

家人的反對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他也準備奮戰下去。

公撒格家族的世界

磊思·公撒格的童年則大大不同，他所生長的環境也很不一樣。他從來沒有欠缺東西，身旁每個人都寵他。他的母親對他充滿柔情，教導他如何祈禱，他的父親以他為傲，準備教導他戰爭的藝術。等他長大到可以自己玩的年紀，還讓他擁有一把特別為他製造的小小火繩槍，以及一個玩具射石炮，這兩樣東西似乎頗

得這個未來戰士的歡心。不過他卻也顯示喜愛祈禱的傾向，而且只要遇到窮人就會行善。

就在此時，他的父親獲得了人人稱羨的新職：菲利普二世國王任命他統率三千名步兵去征服突尼斯（Tunis），於是委任他訓練新兵，並請他帶領這些士兵前往著陸區。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他將在波河（Po）岸邊的卡薩馬吉歐瑞（Casalmaggiore）訓練他的手下，而且他將帶著兒子一道前往。那將是鍛鍊他成為真正軍人的最佳途徑。

磊思身處軍營中，士兵的大志只不過想要贏得割喉勇士的名氣，和在吵架與講髒話中出風頭。一個五歲大的小孩子，耳濡目染學會講髒話，模仿他所見的行為。有一次，當軍人正在午休，他逮到了機會，將小手放在槍座上，點燃了引線，火槍向後移動，差一點將他困在輪下。槍響驚醒了每一個人，費朗德非常氣惱，想懲罰這個罪魁禍首，士兵們都喜歡這個小孩，大夥為他求情。其實在為父的心裡，他為兒子感到自豪：這個孩子是塊料，可望成為戰士。

1573年7、8月之間，這位世襲貴族前往墨西拿（Messina），聯合奧地利的若望攻打突尼斯；此時學會了許多新字彙的磊思則返回卡斯提利歐。有一天，他當著侯爵夫人與家庭教師特科（Pier Francesco Del Turco）的面，講出在軍中學到的粗話，兩人都驚呆了，磊思繼續說個不停。貴族小姐出身的瑪莎從來沒料到在她家中會有人講這樣的粗話。經過家庭教師一番小小的教訓，小男孩雙眼圓瞪反問道：

「紳士絕不說這樣的話？」

「絕對不。」

「好吧，那我以後絕不再說。」

海征行動只持續十七天，結果圓滿成功，但是費朗德·公撒格並未返回卡斯提利歐；由於軍事的理由，他必須駐留馬德里，他在此地一直待到 1576 年年中。

變了一個人

費朗德返回家鄉後，對他所見到的情形感到失望。原本堪稱戰士可造之才、如今已八歲的兒子，竟然變了樣，不但勤奮向學，而且熱衷祈禱。他只好希望兒子適合當官，這個想法讓他稍感安慰。

費朗德作為王朝元老的地位在 1574 年獲得鞏固，他正式獲授爵為卡斯提利歐世襲貴族，這個頭銜可以由他的長子繼承，到了 1579 年，他更上一層樓，如願實現了畢生的大志：獲得神聖羅馬帝國親王的頭銜。

瑪莎的熱望則截然不同。她時常當著兒子的面講，如果兒子能進修會，她會很感欣慰。有一次磊思聽到母親又這樣說便回答：「母親大人，我想上主會賜與您這個恩惠。」在另外一個場合中，他還加了句：「我必定是那個進修會的兒子。」

1577 年 11 月，磊思與弟弟魯道夫一起前往佛羅倫斯進修。在當地，他結識了大公的三個女兒：伊蓮娜拉、安娜以及瑪利亞。瑪利亞後來成為法國的皇后，嫁給亨利四世，生下兒子路易十三；伊蓮娜拉後來嫁給文生佐·公撒格，跟磊思成了親戚。三個女兒都愛跟磊思在花園或宮廷裡玩耍，但是他更常告退，照他自己的說法：花費時間去建祭壇。這是首次明顯出現的不協調特質，也是首次顯示他對既定行為模式的反叛。

在佛羅倫斯的兩年半裡，他覺得有需要常辦告解。他請家庭導師提供意見，後者建議他去找耶穌會學院院長多瑞神父（Fr de

la Torre)。磊思懷著尊敬、冥頑不靈罪人的羞愧與混亂的心情，在他面前雙膝下跪。此時他的靈魂到底經歷了什麼事呢？

辦了總告解後，他的心靈獲得了平安，從此過著更嚴謹的生活。他決定克服公撒格家族典型的憤怒性格。他注意到在他的言談中，會無心地提及別人的行為，為了不為這個缺點再找藉口，他乾脆連在家中都不跟人來往。

公撒格家族的怪胎

然而他並非遁世之人。這個捨棄軍職發展的隱士，比從前更加服從他的導師特科以及布瑞西安尼（Bresciani）；要是他的弟弟魯道夫開口抱怨兩位師長，磊思總會溫和的勸導他要聽命。

他的翅膀漸漸長硬了，他準備作一次重大的單飛。身為公撒格家族的一員，他熟識這個家族史沾染了罪惡與不潔；他感覺到祖先包袱的重荷；他知道這個世界正如一把鉗子，他可不想陷入其掌控。當他跪在聖母領報教堂聖母像前時，這些念頭一一浮現。有一天，在這座半明半暗的大教堂中，他向聖母發下守貞誓言。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自我設定要遵循的生活模式，守住了他的承諾。

「父親大人，我隨時聽從您的一切吩咐，但請不要教我跟女人交談。」

兩個弟弟適時返回卡斯提利歐，讓磊思大舒一口氣。直到當時，他的祈禱一直偏好口禱，此後他練習熱情的祈禱。他花了數小時又數小時沈醉在祈禱中，不時淚流滿面。家中僕役都注意到他的情況，還透過鑰匙孔偷看。

就在此時，米蘭的樞機主教兼總主教波羅蜜歐跟他長談，建議他初領聖體，樞機主教親自在 1580 年 7 月 22 日為他送聖體。

正當磊思下定決心要棄絕世俗生活時，他的身旁卻被歐洲頂尖的貴族環繞：他以隨從成員身分，伴隨瑪利亞皇后——查理五世的女兒，馬克西米連二世（Maximilian II）的妻子——前往馬德里。公撒格家族於 1581 年 9 月在維琴察（Vicenza）與隨扈隊會合。在這趟著名的旅行中，據說磊思從來不曾看皇后的臉一眼。

在菲利普二世國王的宮廷中

隨扈隊一行人於 1582 年 3 月 7 日抵達馬德里，磊思與魯道夫被任命為年僅七歲的王位繼承人狄耶哥（Don Diego）的男侍，當時磊思十三歲，魯道夫十二歲。馬德里宮廷是全歐洲「最嚴肅」的宮廷，甚至連微笑都是僵硬的。然而這種嚴肅、清教禮儀，反而為磊思帶來隱憂。因為他本人自然流露的尊貴氣息，根本就是西班牙宮廷尊貴作風的版本；他那近乎威嚴的舉動，比在義大利或者法國更為西班牙所接受。而這種親和力卻可能促使他產生嗜權與愛慕榮耀的野心，在馬德里也不乏這些權勢虛榮。

他還發現另外一個困難：他的作息時間表緊湊與職務的繁雜，使他沒有時間虔敬的生活。他想找一位有經驗的告解神父，最後找到了耶穌會神父巴特諾（Fernando Paterno）。他還運用其他的方法：強制自己目不斜視；走在馬德里街道上，他的雙目始終下垂；由於他總是被護送，他大可像個盲人一樣跟著前人的腳步前進。他連穿著都作苦行打扮，愛穿破舊的衣服。他的父親終於忍無可忍發了脾氣：

「這真是丟盡公撒格家族的臉！」

同時，磊思為了一心希望擁抱的修道生活，開始尋求上主的旨意。他傾向加入耶穌會，但是他希望獲得靈修上的肯定，為此他熱切的祈禱。

1582年11月21日，磊思開始思考自己的前途時，王位繼承人狄耶哥因天花去世了，這一來磊思就免除了在西班牙宮廷服侍的職責。不過到了次年4月29日，菲利普二世國王從葡萄牙之役戰勝歸來，磊思依然待在馬德里；事實上，他還是遵照宮廷傳統規矩致歡迎詞的人。

到了1583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他找到了他所尋求的前途方向的曙光。第一步，他去望彌撒並且領聖體；第二步，他在聖母像前駐足祈禱，結果「聽到了一個清楚的聲音告訴他去加入耶穌會」西帕瑞（Cepari）說。這個聖母像就是如今出名的善導之母（Our Lady of Good Counsel）。

這一天他去見告解神父巴特諾，請求神父跟長上商量，讓他能夠盡速的加入耶穌會。告解神父堅持兩點：當然他的聖召是已確定的，但他必須獲得他父親的同意。

接下來是父子倆之間爆發的重大衝突。

對峙

同一天，磊思向母親和盤托出自己的心事，母親去跟丈夫說明，磊思的父親大發雷霆，他表明絕不會讓可望成為明智統治者的繼承人，捨棄世上一切而去當個耶穌會神父，何況還是個無法在教會中獲得尊貴地位的修會。

磊思跟父親長談，解釋自己的計畫：無論如何，他是一定要走修道的路。父親瞪著眼前這個態度堅決的十五歲少年，不禁破口大罵：

「滾出去！你要不滾的話，我會剝光你，痛鞭你一頓。」

火氣難消地過了幾天，費朗德心情平靜之後，他派人去請巴特諾神父來家裡，當著磊思的面，他指控神父逼他寄所有希望於

一身的長子拋棄家庭。這位耶穌會神父鎮靜的回答：

「我四天前才知道磊思的心志。的確，觀照他的整個生活方式，他會作成這個決定不足為奇。但是我們從來不曾談過這件事。」

稍感安慰之後，這位世襲貴族開口道：

「我兒，至少我要你考慮其他修會，因為進別的修會你仍然會有光耀門楣的尊貴地位。」

「那正是我選擇加入耶穌會的理由之一，我想毅然決然的關閉通往野心的大門。我要是想追求尊貴的身分，我早就安享上天賜與我長子地位的現況，不會放棄既有的一切，去換取不可確定的未來人生。」

第一回合的交手到此為止。世襲貴族體認到他必須發動全方位的攻擊，於是他請出位高權重的教會人士來說動兒子。

當時聖方濟會（the Fathers Observant of St. Francis）的總會長方濟·公撒格（Francesco Gonzaga）神父，也就是未來成為樞機主教的席皮翁·公撒格（Scipione Gonzaga）的弟弟，正好來到馬德里，費朗德便與他商量此事。這位方濟會士與磊思長談了兩個小時後，告訴世襲貴族說：

「不容置疑，磊思的聖召是來自上主。」

先斬後奏策略

磊思採用先斬後奏（*faits accomplis*）策略。他去上一所耶穌會學校，並且秉報父親。費朗德深知這套遊戲，贏得了上風。他告訴一個可信賴的律師，後者去找磊思，讓他跟著回家去。

1584年7月回到卡斯提利歐之後，費朗德向磊思提議來一趟義大利宮廷之旅。於是磊思與弟弟魯道夫在十月間啟程，隨行攜

帶了極盡展現財富的華服。磊思有兩件金絲織繡的衣服，他不肯穿上身，只願穿一件黑色的精紡背心呢及膝短袖束腰外衣。

一行人造訪曼圖亞、費拉拉（Ferrara）、帕爾馬（Parma）、帕維亞（Pavia），最後抵達杜林，與舅舅厄可勒·塔納（Ercolo Tana）會合，塔納帶他們到親戚住的地方奇里。塔納家族為歡迎他們擺設宴席，宴會之後還舉行了舞會。磊思起身告退，表示想要獨處。人家告訴他宴會是為他特設的，強迫他留下。於是他留下來，但是在熱鬧的場合中，他不為所動，他的親戚對他的態度都表示尊重。不過後來有一位女士前來邀請他跳舞，他只表示感謝，就起身離開舞廳了。塔納舅舅在僕人住處一隅找到他的時候，只見磊思雙膝跪地，正在專心祈禱。儘管舅舅多方央求，他始終不肯再回到舞廳去。

如果聖人的父親曾經希望看到愛子回來的時候回心轉意，願意就此繼承封邑的世襲地位，那他可是大錯特錯了。三次攻勢失利，他仍不死心。這一回他去找家族族長曼圖亞老爺古格利耶莫公爵（Duke Guglielmo）。古格利耶莫認為，有關教會事務，最好委託給教會人士，於是請求一位主教朋友去開導磊思。這位高級神長的論點正是磊思選擇加入耶穌會，藉此摒棄尊榮生活的理由，為此他推拒了對方的好意：

「我非常感謝曼圖亞公爵一向對我的厚愛，我也同樣感謝您閣下的美意。不過請相信我，也請您轉告，我之所以選擇加入耶穌會，是為了永遠杜絕一切可能的尊榮機會。」

大人物出列

為了勸阻磊思一意孤行，請動了大批的大人物，結果都徒勞無功。其中之一是卡斯提利歐教區神父巴斯托里歐（Gian Giacomo

Pastorio)，他採取不同的途徑：他明白告訴磊思將來管轄封邑，會有多大的好處。磊思展現了振奮心靈的忠信精神，巴斯托里歐低下頭來：這個年輕人說得對。他結束談話走出去，對碰到的第一個人說了這麼一句話：

「磊思先生是個聖人。」

不過父子倆絲毫不肯退讓一步，磊思愈來愈堅定自己的決心，而費朗德則希望動搖兒子的決心。

費朗德患了嚴重的痛風，那幾天他的病情惡化，不得不躺在床上，他思索自己的封邑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賭博惡習已導致他的財務瀕臨破產，他就快遮掩不了自己的財務窘境。只有磊思有能力明智處理他的事務，他不能說走就走！

費朗德召叫兒子進來，問他想要怎樣；磊思重申前言：他想要進耶穌會服侍上主。這位世襲貴族聞言再度發怒，下令他滾出房間。

磊思離家前往卡斯提利歐附近的一個小修道院隱居，開始過起隱士的生活。他的父親注意到這種情形，立刻要他回家，譴責他未經父親同意擅自離家的行為，接著怒吼一聲：「回到你的房裡！」

磊思一語不發的服從，走向自己的房間，關起門來，跪在十字苦架前，開始淚流滿面，祈求上主賜與他力量。接著他脫光衣服，開始長期的克苦。

憤怒轉為悲痛

世襲貴族從憤怒轉為悲痛，他請正在前廳候著的市長，去看看磊思在做什麼。一個負責守門的僕役阻擋他入內，他說：

「磊思先生不希望被打擾。」

「貴族大人命我來看他在做什麼。」

他用匕首將門撬開一道小縫，看到磊思跪在十字苦架前，無情的鞭打自己，他含淚來到世襲貴族面前說：

「喔，我主！如果閣下您親眼目睹磊思先生在做什麼，您一定不會阻撓他完成他的心願。」

「他在做什麼？」

市長請他自己去瞧瞧。世襲貴族感到惶惑。第二天同一時間，他派一個親信去監視兒子，然後他命人抬著自己坐著的椅子，從兒子房門縫裡一瞧究竟。只見磊思哭得好傷心，一面鞭打自己。父親趕快叫人去請夫人，敲門進屋裡去，只見地板沾了血跡，父母親心痛地把頭別過去。

這一幕使費朗德開始軟化。

若翰·伯滿為修道苦戰

在另一方面，若翰為爭取進耶穌會修道與雙親的苦戰，所耗費的時間較短，過程也較為單純。1616年8月某一天，他拿出紙筆向父母親表達心聲：

「可敬的父親與親愛的母親：

上主來敲我的心門距今已三、四個月了。至今我還未打開心門，但是我逐漸體認到，無論我讀書、走路、玩耍，或在做其他任何事情，總有一個念頭緊跟著：選擇某種生活狀態。因此我下定決心，將自己完全獻給耶穌，我要在以耶穌為名的修會中繼續打他的戰役。我只希望你們不要以你們的計畫來反對他的計畫。

服從耶穌與你們的兒子 若翰·伯滿敬上」

他父親立即有所反應。他趕到梅林去跟兒子深談，勸阻他，因為整個家庭需要他。若翰說他已跟告解神父葛利夫（De Greeff）

商量過了，而後者早已上報耶穌會省會長。

「我要到學校去。」

他說要找葛利夫神父，於是他被引去見一位剛晉鐸的年輕神父。

「神父，你對我兒子做了什麼事？難道你不明白家裡需要他嗎？我為了讓他讀書，早已負債累累，他是要來養家的人，你卻把他給帶走了。」

葛利夫神父以平靜但清楚的語氣，將自身修道的歷程述說了一遍：

「和若翰一樣，我也是個鞋匠的兒子，而且還是獨生子。七年前，我的父親跟您一樣，對我的聖召，也是持反對態度。雙親期盼從他們子女獲得的幫助完全不確定，尤其是如果他們與上主的召叫背道而馳的話。要是您讓若翰順從他的聖召，你的全家肯定將獲得好處。」

伯滿先生聞言稍感寬慰，但是並未完全被說服。正如費朗德，他也去找一位教會人士插手此事，此人是卡普欽方濟會的院長神父。若翰面對每一個問題，以及他所引起的難題，都能提供得體的答案。最後這位院長非但未勸阻他，反而對他鼓勵有加：

「不必遲疑，孩子，上主的確召叫了你。努力去做一個優秀的耶穌會士吧！」

隱藏的能力

然而，卡普欽會院內有一個人卻持不同的意見，這個人是伯滿家的親戚，他盡全力勸阻若翰不要加入耶穌會。他開始經常到若翰借住的佛洛伊蒙的家去探視他。起初，若翰還以禮相待，但是有一天，這個托鉢修會會士說得過火，若翰毫不客氣的指著門

告訴他說：

「神父，你要是講不出好話，最好請你出去。」

整個學期已經結束，若翰的修辭學成績拿下全班第一。他的父親還未點頭同意他入修會。相反的，他的父親捎來一封信，要他兒子延後入學幾個月。到了 9 月 10 日，若翰回了一封信，表示對父親的要求感到「震驚」，他說明將在兩週內加入耶穌會初學院。

他的父親使出最後一招。他要若翰回家一趟作最後的告別。佛洛伊蒙懷疑這個提議可能有詐，勸他再寫第三封信「給他住在黃金月球的可敬父親」，乞求他雙親「至遲在週三傍晚前來一趟，以便我能跟你們道別。」這位司鐸還自己在信末加上一句：「若翰·伯滿先生，請於本週內盡早前來報到。」

勝利在望

到此只能算是半勝。若翰並未順利爭取到他父親全心全意的首肯，這個可憐的男人說，他將放手讓他的兒子去做他想去做的事，不過休想得到他任何的幫助。若翰率直回答：

「父親，如果我穿的衣服使我無法前進，我願立刻脫下，赤身裸體進入耶穌會。」

他向佛洛伊蒙與同伴道別，1616 年 9 月 24 日，週末，十七歲的他進了梅林耶穌會初學院。

另一方面，磊思的父親費朗德則分階段退讓，謹守貴族應有的禮節。首先，他透過夠格的中間人，亦即將升任樞機主教，當時正好在羅馬的席皮翁·公撒格，向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正式提出申請。阿奎維瓦的答覆是，他很歡迎新人申請加入，他決定讓磊思到羅馬完成他的初學，而非在靠近卡斯提利歐的諾維拉拉

(Novellara) 進初學院。磊思滿心歡喜的回信，表示願意聽從他的命令。

放棄世襲貴族身分

下一步是公開放棄世襲貴族身分。因為授爵是皇帝獨有的權利，要放棄世襲貴族身分也必須經由皇帝之手，而相關的繁文縟節則是曠日費時的。費朗德依然抱持著一份希望，明顯有意的繼續玩遊戲。由於他的健康欠佳無法遠行，因此他派兒子到米蘭去照顧一些家族事務。從 1584 年底出發，這一去就待了八個月之久。磊思可自由運用時間，就趁便在當地的耶穌會學校選修研讀。

這次接觸是未來終身修道生活的序曲。到當時為止他一向只有個別的接觸；而今他終於呼吸到了依納爵創立的修會的空氣。

在接獲皇帝批准他將世襲貴族權利轉移給弟弟魯道夫的特許狀之後，磊思還得簽署放棄世襲貴族頭銜的正式文件。他的父親沒有召喚兒子回到家鄉來，相反的，他親自前往米蘭，想要在決定性的一步之前，發動最後一次攻勢。磊思以堅定不移的立場答覆他的父親。費朗德開始既感性又嚴肅的告訴他，自己並非差勁的基督徒要反對上主的旨意，主要是他認為兒子的願望怕只是年輕人一時的衝動，並非真正來自上主的召叫。最後他動之以情，談到自己的病苦，以及面臨的諸多問題，他擔心自己的死期會提早來臨等。講到這裡，他禁不住老淚縱橫。

做兒子的聽到老爸的真情告白，心也軟了。他感謝父親多年來的疼愛，不過他仍說了句：「我確信我的聖召是來自上主。」只是他沒有說明細節。

費朗德並不就此罷休。他請來加格里阿迪神父 (Fr Achille Gagliardi)，請他當著自己的面檢視兒子的聖召。加格里阿迪通盤

仔細的考核讓費朗德感到滿意。神父向磊思問了許多尖銳的問題。磊思一一清楚、直接、肯定的答覆，讓這位學識淵博的耶穌會神父感到驚異。他不禁以幾乎大叫的聲調驚呼：

「公撒格先生，你說得對，我非常滿意。」

費朗德開始讓步

費朗德先要兒子離開房間，然後他告訴這位耶穌會神父說，他也感到滿意；接著他開始回述磊思從童年以來的生活點滴，最後他說：

「是的，我願意讓他成為一個耶穌會士。」

幾天之後他返回家鄉，準備世襲貴族的權益轉讓給次子的事宜。1585年的夏天此時已到了尾聲。

不過費朗德的腦袋雖然表示同意，他的心卻還不肯放手。這場戰爭還稱不上得勝。當磊思回到家時，整整七天呈現緘默的緊張氣氛，到後來磊思不得不開口提此事：

「父親大人，您答應過我，回到卡斯提利歐，接獲來自布拉格的頒令後，我就可以宣誓放棄世襲貴族頭銜，我想該是時候了吧！」

貴族大人望著兒子說，他認為應該要等到兒子的聖召成熟，或許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他才會考慮同意此事。接著他冷冷的又說了一句：

「你要走，就走好了；但要記好，我永遠也不會點頭，從此以後你也不再是我的兒子。」

這一次磊思沒有保持緘默，他帶著啜泣的聲音，祈求父親不要讓他這麼痛苦。貴族大人立場堅決；磊思提議折衷，雙方各讓一步：他願延後入會兩、三年，但是有兩個條件：第一，這段時

期他要待在羅馬。第二，他的父親「此刻」就必須先同意，過了這段時期，他就得同意讓兒子進入耶穌會。

費朗德遲疑了一會兒，最後讓步了。但提出他的兒子必須住在羅馬學院的一個私人套房，並且要有一批隨扈跟著，配合他的地位身分，所有開銷由貴族本人支付。這根本不合學院的規矩，就算費朗德跟最高階層多方聯繫，也不可能實現。磊思則透過祈禱與懺悔，尋求上天的幫助。

最後一擊

有一天，磊思內心受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驅使，來到臥病在床的父親面前，傾心坦陳：

「父親大人，我將自己完全交託在您手中，請照您的意思定奪吧！不過我言明在先，上主召叫我進耶穌會，您反對這個聖召，等於違抗上主的旨意。」

說完了話，他頭也不回的走出了房間。

一場危機就這樣化解了。世襲貴族大人驚駭不已，竟至無言以對。他別過頭去面壁，淚水不聽使喚的直流。他痛哭的聲音，整屋裡的人都聽得到。過了一會兒，他召喚磊思來到跟前，對兒子說了這段感人肺腑的話：

「我兒，你傷透了我的心，因為我十分愛你。我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全家的希望都寄託在你一人身上。既然你說上主召叫了你，那我就不攔阻你。去吧！我兒，照你的心意成全。我祝福你。」

他開始嚎啕大哭，久久不能平復。

這場戰役到此終於宣告勝利。

啟程赴羅馬

正式宣誓放棄世襲貴族的儀式，於 1585 年 11 月 2 日在曼圖亞舉行，公撒格家族依序有資格繼承的全體成員都出席觀禮。當書記宣讀冗長的文件時，費朗德毫不感到難為情，當眾哭了起來，而在他身邊的磊思則是一臉幸福模樣。

簽字儀式一結束，磊思即退回自己房間，其他賓客則漫無目的地來回打轉，等著按照慣例擺設的宴席開席。磊思早已取得一套耶穌會會士穿的長袍，他換穿這套會服出來坐席。這一身戲劇性但正確的打扮，少不了惹人注目，有些人見狀，臉上的笑意馬上凍結，有些表親則說些挖苦的話；只見「這個叛徒」平心靜氣但意志堅定的反駁各方的冷嘲熱諷。費朗德看到這一幕終於舒了一口氣；這個長子展現的安詳寧靜，讓他頗感寬慰，也一舉掃除了壓在心頭的疑慮；他終於了解多年來他所未能看清的真相。

第二天，11 月 3 日，磊思向曼圖亞公爵們道別，到了傍晚，他雙膝下跪在父母親大人面前，懇請他們賜福。這對貴族雙親又一次落淚，他們的兒子卻一滴眼淚也沒流。隔天早上，他在弟弟魯道夫的陪同下，踏上前往羅馬的旅程。魯道夫一路相隨來到義大利北部的波河畔，兩人在此分手後，由世襲貴族遴選的一批隨從，護送他抵達羅馬。兩兄弟分手後，有一個人在船上跟磊思說：

「魯道夫必定樂不可支繼承了你的產業。」

「他為接下繼承權開心的程度，絕對比不上我捨棄這一切的歡喜程度。」

前往羅馬的一路上，他不得不要在費拉拉、波隆納以及佛羅倫斯各地的宮廷駐留，這一趟簡直就像金牌得主奔向勝利奪標的遊行活動。

安抵羅馬

他在 19 日或者 20 日抵達羅馬，在樞機主教席皮翁·公撒格的家中小憩之後，即前往耶穌會總部去見總會長阿奎維瓦神父。他將父親在 1585 年 11 月 3 日手寫的一封信親交給樞機主教，信上寫著：「我將愛子託付給你，他是我在世最鍾愛的人，本來我寄望他能承繼家業。」

這是貴族大人最後一次泣訴。

磊思不能免俗必須去見與公撒格家族過從甚密的其他樞機主教們，包括法尼斯（Farnese），阿里山卓納（Alessandrino），戴斯特（d'Este）以及麥迪西（Medici），他們全都給他英雄式的歡迎。此外，他也去晉見教宗思道五世，接受教宗的祝福。思道五世從年輕時宣誓守貧的方濟會士，經漫漫長路才登上集顯耀於一身的教宗寶座，而磊思則是歷經千辛萬苦，才如願放棄了他自出生就繼承的一切權益。

兩天之後，到了 11 月 25 日，磊思與他的隨扈人員道別分手後，即被領到位於奎里納爾山聖安德的私人專用房間。

一切安頓就緒後，他立即改變態度；此前他一直在拒絕身邊四周的種種禮俗規矩；從今以後他拚命地努力完全融入新的環境。他帶來的衣物清單，檔案中記載得很清楚。他捨棄了所有行頭，就為了跟別人一樣。

他十分熱切地祈禱，往往祈禱結束後，自己一時還搞不清楚身在何處，既認不得所在地方，也認不得路；他有過人的祈禱本事，分心走意的干擾微乎其微。

初學兩年期間，他在耶穌會總部待了兩個月，其餘三個月在那不勒斯研習數學；到了 1587 年 11 月 25 日，他發了初願，主禮

的是羅馬學院院長布魯諾神父（Fr Vincenzo Bruno）。

他盡量做到不引起注意，但是他的兩百名同學可是不時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

和平任務

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家庭出現糾紛，使得他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家鄉去斡旋。他的父親已於 1586 年 2 月間去世了，魯道夫正式繼承世襲貴族爵位。三年後，費朗德的弟弟，索佛林諾當地的世襲貴族歐拉齊奧也過世了，由於他身後沒有子嗣，他的封邑照法律的規定應該歸屬魯道夫，然而他生前所立遺囑卻屬意另一個侄子文生佐，也就是卡斯提利歐公撒格家族的第二個表親。魯道夫針對這個行為的適法效力發出挑戰，他組成一支武裝隊伍，想要用武力強占古堡。磊思在 1589 年 9 月 12 日啟程前往卡斯提利歐，希望達成排難解紛的目標。

他果然達成目標，他在家鄉停留期間，獲得原本是他子民的羣眾熱烈的歡迎。在展開談判期間，他暫住在米蘭的耶穌會學校內、每走一步路就會咯吱作響的樓梯下方一個小單間。在米蘭他首次隱隱約約知道自己來日不多。

他似乎應該就會在米蘭繼續他的學業，然而羅馬學院的院長卻要他回到羅馬來，希望他的年輕學子都能親眼目睹他成聖的榜樣。他向總會長提出申請，總會長隨即下達命令。這個結果令磊思頗為開心：「世上我只承認羅馬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度裡我生於耶穌基督。」

同樣的，在羅馬學院，他也找到了一間對他味口的房間：在樓梯上方的一個住起來並不舒服、跟米蘭那個小臥室一樣不得安寧的房間，這個房間沒有窗戶，倒是有一道天光射進來。

黑死病流行

可怕的黑死病在 1590 年底到 1591 年初之間爆發大流行。各地醫院不久即人滿為患，必須設法改善。有一天，阿奎維瓦神父在距離發願住屋不遠處，發現兩名黑死病患者躺在路邊。他召喚人將這兩人抬進屋內，親自照顧他們。相同的情況不斷上演，於是安排附屬總會長公署的一家小醫院接納處理。神父們協助的患者人數增至 56 人，緊急情況促使羅馬學院學生採取行動；利瑪竇的同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神父剛剛從中國返回，帶回許多奇妙的故事，然而大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嚴重的黑死病疫情上。

磊思全力投入救助行列，承擔大部分令人生厭的工作；他走遍該地的三家醫院，寫了封信給母親大人與弟弟魯道夫，要求他們提供援助。二月間，死亡人數高達六萬人。在一個人口不超過十三萬的地方，這樣的死亡人數十分驚人。

磊思被派赴其中一家醫院康索拉日（La Consolazione），有一天他正在幫助一個身上湧出膿的患者時，他的同伴瞧見他的臉色蒼白，彷彿無法繼續工作，但過不久他又回復常態，滿懷熱情的投入工作。

3 月 3 日，他被躺在馬路正中央昏迷不醒的一個黑死病患者絆倒了。他把這個人扛在肩上，送到醫院去，給他立即的援助。然而他返回羅馬學院後自己就覺得身體不舒服，不得不上床休息。他發了高燒，他有預感這一病將不起，他懷著希望得永生的喜樂之心準備去見天主。

「神父，我的這些願望會不會過分？」他問告解神父羅伯·伯敏。

「不會的，我兒，只要決心順從上主的旨意，希望與天主同在的願望就不算過分。」這位後來出任樞機主教的聖師這樣回答。

與基督同在

生病第七天，他辦了告解，領受了臨終聖體，準備去見天主。接著高燒退了，發病以來出現的肺炎延緩發燒現象，到了春季使他的元氣盡消。他寫了封信給母親：「一個月前我差一點就到天主前報到，領取一個人所能領受的最大恩惠。然而天主的意思是要我延後取得神恩，祂賞賜我緩慢的發燒，至今依然。因此我天天開心的準備好心靈，希望在未來幾個月能夠蒙主恩召，從死亡之地進入永生國度，從世俗的事物幻象，奔向與全善的天主同在。」

他比平常更頻繁與伯敏神父晤談，有一次結束談話後，他進入狂喜狀態，當下他了解到他即將在八天之內去世。

果然如此。他設法口述寫封信給他的母親。訪客絡繹不絕，擠滿了他的房間，所有人離去的時候都留下同樣的印象：他在世的最後幾天，經歷了不平凡的事情。由於身體虛弱，他幾乎不言不語，但卻依然保持深度的鎮定，緊緊握著十字聖架。他的雙唇不時重複念著：

「我但願大化與基督同在。」

這一刻終於到來，時間是 1591 年 6 月 20 日到 21 日的半夜。

在梅林初學院

時隔二十四年，1615 年 9 月 24 日，週末，克服最後難關的若翰·伯滿，向佛洛依蒙與寄宿同學告別，來到梅林耶穌會初學

院敲開大門。另一個有意入會的德瑞克·米爾（Derick van der Meer）跟他一起。眼見一位修士正在花園挖土，若翰自然而然的告訴他的新同伴說：「我想，我們開始修道，最好從謙遜與慈善起步。」

他一把抓過園丁手中的鏟子，開始全力使勁挖掘。

初學生約來了一百人，絕大多數是法德蘭斯人，另有五個愛爾蘭人與一個英國人。1616年11月，若翰得知他的母親即將去世的消息，他的家人希望他能回去探望母親，但是照會規不可以，於是他只能寫封文情並茂的信表達情意，這也是他最後一封家書。他的母親於12月1日去世，過了幾天，他的父親來探望他，要求他回家去幫忙。與父親的這一席談話，使若翰內心起了巨大的變化；他作了退省，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神父。梅林的霍維斯總主教在1618年4月14日為他主持晉鐸禮，任命他出任駐家鄉的聖蘇爾比斯教堂的公禱司鐸。

雖然有磊思·公撒格這位前輩可作為榜樣，若翰並未放棄自己的個性。舉例而言，他天性樂觀，他的同伴給他取個綽號叫歡樂修士。他對法文一竅不通，被要求去學法文，從此他每天花時間將法蘭德斯文譯成法文，再把法文譯成法蘭德斯文。初學階段結束時，他已能在餐廳用法語發表短篇講道。此外他還前往附近四周村落教導天主教教理，他深入淺出的解說，吸引了不分老少的無數慕道者，展現了他非凡的適應力。

告別

他在1618年9月24日發過誓願後，隨即被派到安特衛普去研習哲學。不過到了10月18日，院長卻通知他要前往羅馬到羅馬學院進修。他的同鄉巴特·潘尼曼（Bart Penneman）將與他同

行。兩人一起出發，來到了梅林時，他不意間獲悉父親剛剛於 10 月 12 日過世；他的家人根本沒有告訴他這個惡耗。面對此一冷酷無情的行為，他難掩內心的痛苦，於是立刻寫了封信給他的叔叔嬸嬸：「起初我對這個惡耗感到茫然，我非常傷心你們居然沒讓我知道消息。我請你們照顧我的兩個弟弟，讓他們在敬畏上主的環境中成長，養成良好規矩。我本應前來道別的，可惜時間不夠，只能寫這封信致意。」

若翰與巴特在 10 月 24 日啟程，多半徒步千里迢迢經比利時西北部的根特（Ghent）、法國的巴黎、里昂，順著萊茵河谷，登上阿爾卑斯山，抵達義大利北部的米蘭，再經理瑞多（Loretto），最後在 12 月 31 日抵達羅馬。

羅馬學院

哲學系學生分成兩派：一、二年級的初級生住在樓上，三年級的高級生住在樓下。「來了個法蘭德斯的小傢伙，看來像個天使。」這是對初到羅馬學院的若翰的介紹。

學院的初級生極親切的歡迎若翰的到來，大家拭目以待。這些初級生可分成兩類：好喧鬧的與沈默寡言的。前者簡直就是霸占了這名新生，若翰跟他們相處顯得十分自在，但是大夥兒休想獨占他；不到一個月，他跟兩邊的初級生都作了朋友。負責管理初級生的戈利神父（Fr Camillo Gori）注意到這個現象，曾經告訴其中一人說：「注意，別寵壞了法蘭德斯之子，相信我，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優秀的。」要不是因為他對若翰有一點軟心腸，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若翰是另一個磊思·公撒格，反正他指定若翰住進三十年前磊思住過的同一個房間。

「羅馬學院總共有 200 多名神父與修士，幾乎全是學生。他

們來自不同的國度：西班牙、波蘭、葡萄牙、（南斯拉夫）達爾馬提亞、西西里、那不勒斯、比利時、立陶宛、法國；然而所有人都因對天父之愛，與孝敬同一個母親而緊密團結。」若翰寫給佛洛依蒙神父的信中，披露了羅馬學院的特色。

當時羅馬學院院長是塔格利亞瓦神父（Gkrolamo Tagliava），不過到了 1620 年 1 月，就改由維格利歐·塞巴利神父（Virgilio Cepari）接任，此人正是磊思·公撒格生前的同伴，他正準備撰寫這位聖人的第一本自傳，他也有意撰寫若翰·伯滿的自傳。他有機會多多了解若翰，因為若翰每個月兩次與他晤談。

若翰的原則

在若翰心目中，他最重視將自己的本分做得盡善盡美；這可以從他為自己訂下的座右銘看得出來他的靈修生活特色：「專注當下」，「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盡心盡力」，「我最重要的苦行就是平凡度日」，「厭惡豁免如同除害」，「我寧可粉身碎骨，也不願違逆最小的規則。」

雖然他全副精力投入學業，卻看得清楚靈修的界域，這也是促使他努力向學的意義所在。他曾經告訴聽告解的神父，也是他的知交皮科洛米尼神父（Fr Piccolomini）說：「一個耶穌會士必須胸懷大志，他的心必須像世界那麼大。」他渴望傳教，特別是到中國去傳教，他熾烈的希望為主殉道，這種精神在當時十分普遍。他並非不可親近，他是和藹的、樂於助人、且謙抑自下。他細數長上與同學美德的名單，如今已傳為佳話：「總會長的仁慈與謙恭有禮；省會長的學識淵博；院長的冷靜沈著；布法洛（Buffalo）神父對所有人懷抱敬意；皮科洛米尼神父對學生的關愛；康尼里斯（Cornelius）神父的偏愛獨處；歐里瓦（Oliva）修士

（後來出任總會長）的溫良」，諸如此類。

病倒

不斷的勤奮向學與緊張生活，終於使他的健康亮起了紅燈。一路跟隨他來到羅馬的同鄉潘尼曼夭折了，這個事實顯然讓若翰看清楚自己的情況，他開始關切。7月8日，他哲學期末考考得非常好，好幾位義大利學校的校長都希望他能到他們學校去教學，但是耶穌會省會長告訴若翰，要他回到老家比利時去。

沒有一個學校爭取得到他。據塞巴利告訴我們，7月31日傍晚，若翰就有預感，曉得自己距死期不遠。果真如此。8月2日那一天天氣非常炎熱，儘管他人覺得不舒服，他仍陪同喬望尼·塞魯提修士前往瑪利亞天使之后（St. Mary of the Angels）教堂，去取得當天的特赦。到了5日週四休假日，他跟其他人一起到羅馬近郊的一座別墅去。到了6日，羅馬學院與希臘學院有一場公開辯論會，由於本來擔任首席辯論的學生因故未出席，若翰臨時被要求取代上場。他力撐整整一個鐘頭，表現可圈可點，但是隔天晚上他就發高燒了。到了7日，週末，他整個人覺得虛脫無力，竟連早晨默想過後的簡短註記都無法動筆。捱到下午3點鐘，他才拖著身子到院長房間，告知自己生病了。塞巴利要他去醫務室，醫務人員要他回房休息。8日主日，他在床上領受聖體，有一位醫生來看病，發現他病情稍微好轉。可是當天傍晚，再度發高燒，他還出現了嚴重的腹瀉症狀。到了星期一，9日，醫生開給他吃一種很難下嚥、而且明顯無效的藥，可是若翰卻毫無怨言的一口氣喝光，然而他的病情卻愈來愈壞，顯然出現了初期肺炎症狀。第二天，來看他的人都被他的樣子給嚇壞了；唯獨若翰本人鎮靜自若。

「我實在不知道我面對的到底是個凡人或者天使，」醫務人員這麼說，「我無論給他什麼東西，他二話不說，全盤接受，還一再說我們過分擔心了。」

由於病情沒有起色，塞巴利神父決定給他終傅。

他問若翰說：「告訴我，如果吾主就要接你回天鄉，你是否準備好心靈隨祂而去？」

「早已準備好了，院長神父；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家鄉的人聽說潘尼曼和我都去世了，法蘭德斯的長上可能會不願再派其他人到羅馬來了。」

臨終日

11 日週三清晨四點鐘，院長神父為若翰送聖體，一大羣神父、學生伴同至聖體一起來到。若翰穿著耶穌會士服，躺在地板上的一張草蓆上。當關鍵時刻來臨，他跪下來，以出乎意料的堅定聲音說：

「我確信並且公開宣布，這真正是全能天主之子，也是萬福童貞瑪利亞之子。我在此聲明，我希望在世與死時都真正是我們神聖母親、從宗徒傳下來的羅馬天主教會之子。我在此表明，我希望在世時成為真正的耶穌會之子，死時亦然。」

儀式結束後，所有人都上前來擁抱他，而他也跟每一個人講話。最後一位要擁抱的人是生性害羞的數學教授葛拉西神父（Fr Grassi），他一直站在某個角落。若翰雙手環抱著他的脖子，感謝他的教導。深受感動的葛拉西，不禁雙膝下跪，乞求若翰原諒，因為他沒有充分的照顧若翰；接著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要求，要求若翰為他取得祈禱神恩。若翰覺得尷尬，趕快切斷他的話說：

「振作起來，神父，振作起來！」

到了週四 12 日，訪客更多了，大家都準備最後的告別；最後一人是匈牙利籍的尼可拉斯·拉凱（Nicholas Ratkai），他是若翰的知己。

「這是我們在世最後的相聚，」若翰說，「我在天上也絕不會停止愛你的。」

談話本來到此該結束的，但尼可拉斯提出最後的要求，若翰稍微想了一下才回答：

「是的，尼可拉斯，我將為你取得祈禱、貞潔與克己的精神。」

每一個人設法接近醫務室，不想錯過若翰離開人世前的時刻。過了一個多少有點不安寧的夜晚（用若翰自己的說法：「我最後的考驗」）後，若翰恢復平常的鎮定。

到了 1621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黎明，若翰雙手緊握著十字架、玫瑰唸珠以及守則小冊這三樣他最寶貝的東西，要求旁人為他誦唸聖母德敘禱文。他在眾人「至潔之母，至貞之母」的禱聲中，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參考資料：

BRODRICK, *James* : *Robert Bellarmine, Saint and Scholar* (London, 1961) .

PAPASOGLI, *Giorgio*: *Il rielle di Dio* (Milan, 1969) .

SHOETERS, Karel-GENSE, *JamesH.: St. John Berchmans, the shoemaker's son* (Bandra-Bombay. 1965) .

LIOBA, *Marie*: *Le vrai visage de Jean Berchmans* (Bruges, 1962) .



II.

遍布广阔世界

走出羅馬學院，放眼望去，世界各地都看得到耶穌會的蹤跡，耶穌會士為了傳教，有時甚至穿著奇裝異服，介入無所不有的各式各樣活動。他們的足跡遍布歐洲大陸，向西拓展遠及南北美洲，向南直達非洲，向東伸入日本與中國；耶穌會採用傳統的方法在傳統的組織內，奉行幾乎隱修的生活，然而在必要時，耶穌會士也能毫不遲疑的將自己扮成亞美尼亞的商人，像個探險家一生充滿驚險刺激。

耶穌會曾經嘗試好幾個大膽的任務，像是設法讓瑞典國王回歸天主教的信仰，促使幾個東方教會與羅馬天主教會合一，致力於感化回教皇帝阿克巴（Akbar）、日本大名、以及印度的上流社會人士，希望他們皈依。有些情況下，他們的確達成了目標，然而好景不長。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則顯得不切實際，太過於天真；又有些情況，雖然他們的直覺與方法膽識過人，事後證明是正確的方向，卻因外在的迫害或遭內部的反對而功敗垂成，其中後者因素造成失敗的成分大過於前者。要是當年耶穌會士入境隨俗的傳教方式後人能夠奉行的話，亞洲的教會發展史很有可能改寫；基督宗教或許早已扎根，而不會在中國、日本與印度這些有著偉大宗教傳統的國家受到排斥。這一點現在已經是公認了，然而為時已晚。

1. 各國的耶穌會傳教士： 伯納定·雷亞利諾 (Bernardine Realino, 1530-1616)

我們離開羅馬，來到義大利北部摩德納（Modena）附近的一個小鎮卡爾皮（Carpi），這裡是我們要介紹的第一位耶穌會傳教士出生的地方，他的名字叫伯納定·雷亞利諾，生於 1530 年 12 月 1 日。他的父親是佛蘭西斯科·雷亞利諾，母親是伊莉莎白·貝蓮塔妮。他的母親素雅慎重而且堅強，對他早年的教育有莫大的影響。伯納定終其一生一直都喜愛想念她。至於佛蘭西斯科，一生大半時間都在外伺候他的主子，而他的這些主子正屬於我們知道的以下人物活動圈：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公撒格家族以及特利騰的領主主教（Prince-Bishop of Trent）克里斯多福·馬德魯佐（Cristoforo Madruzzo）樞機主教。

學生兼詩人

伯納定離開本鄉前往摩德納完成他的學業時，他獨特的友善個性早已顯露無遺。在摩德納停留期間，他研習人文，接觸到義大利文化，寫詩創作，暴露在畢生最早的風險中。到了 1548 年秋天，18 歲那一年，他在父親雇主馬德魯佐樞機主教贊助學費的情況下，進入著名的波隆納大學就讀。

來自歐洲各國總共 6,000 名的學生，全都講拉丁文，雖然難免帶有本國腔的鼻音或者喉音，整個小鎮簡直成了大學校園。伯納定選修文學與醫學，前後研習三年，選讀註冊的學院是當時時尚所趨的幾所學院之一。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書，銷路不錯。他交

出了亮麗的成績單。

不過，就在稍早之前，1550年11月24日，他的慈母去世了，這件事令他感到悲痛。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似乎還重視一位女士，那是一位年輕貌美、高雅嫺靜的少婦。他開始寫詩獻給這位女士。有些傳記作者寧可略而不提這位女士，然而伯納定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卻作了公允的交代，他自述：「我全心愛她。」

他的這位夢中女士說服他放棄習醫，改念法律。他的父親贊成這個改變，他自己在王宮裡的經驗告訴他，國王祕書與各國使節掌握的權力多麼大，而且享有厚祿。

成功與失望

這個仁慈的人有一次大發脾氣，結果使他付出慘重的代價。

他的詩名大噪使他得以出入費拉拉公爵的宮廷，有一次社交聚會中，他朗誦了一首詩，使他獲得用劍的特權。這個特權差點毀了他。

他的父親早就要他了結一樁一拖再拖的宮廷訟案。伯納定訴諸仲裁，想不到仲裁者賈利（Giovanni Girolamo Galli）懶得研究案情，竟然偏袒宣判對方勝訴。伯納定禮貌的請問他作成這個奇怪判決的理由何在。賈利非但給不出理由，還將伯納定污辱了一頓。氣憤之餘，伯納定抽出配劍，在對方臉上劃下一道傷口。雖然只是小小的擦傷，但碰到賈利這樣地位顯要的人物，事情難以善了。伯納定正式被控暴力攻擊，判決結果是伯納定必須砍斷一隻手。「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只有離開家鄉卡爾皮，才能躲避懲罰。

他暫時返回波隆納，取得教會法與民法的博士學位。既然回不了家鄉，他就前往米蘭，希望此時已出任公爵領地總督的恩師

馬德魯佐樞機主教，能夠給他安插個一官半職。1556年12月12日，他獲任命為皮德蒙特地區（Piedmont）費里札諾（Felizzano）市市長。如果他希望靠這個市長職位當跳板，快速節節高升，那他可是打錯算盤。一年之後，他卸下公職，被人遺忘，直到某人想起了他，任命他出任阿勒桑德里亞（Alessandria）的財務長，此處距費里札諾約16公里。後來他還出任亞潘尼（Appennine）山區小鎮的卡辛（Cassine）市市長。1562年1月7日起，他擔任距米蘭不遠的卡斯特利翁（Castelleone）市市長。

此時他已展現非凡的公共行政管理長才，贏得大家的尊敬。他從此步步高升，他的公職任期一結束，義大利東部佩斯卡拉（Pescara）的侯爵兼米蘭總督便將他調到自己身旁擔任機要人員，任命他到那不勒斯王國去監管他的封地。1564年5月，伯納定出發往南走馬上任。

在這一段時期，他一直保持虔敬的態度，以事奉上主的心態善盡職責，然而他不曾想要改變現狀。他已在生活中找到上主。有一天，兩個耶穌會初學修士在街上跟他擦肩而過，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設法蒐集有關耶穌會的資訊，因為這個機緣，他去聽耶穌會神父卡米納塔（Gianbattista Carminata）的道理，辦了總告解，最後心裡起了想離開俗世職位，專心事主的念頭。他在1564年10月13日星期五向佩斯卡拉侯爵遞出辭呈，時年34歲。他進了那不勒斯的初學院正式走上修道之路。

極快板

進修會這一天他寫信給父親：「喜樂吧！因為我將滿心喜樂。」事實上，他的一生充滿喜樂。

他在耶穌會的陶成時間甚短：同年11月30日他穿上會服，

到了耶誕節就領受小品，第一年初學結束，他開始哲學課程，1566年秋天他發了初願，次年五旬節過後沒幾天，他領受了正級神品，到了聖體節他首次主持彌撒。1565年當選總會長的博日亞（Borgia）建議任命他去當初學院長，取代不適任的佩德倫戈（Pedelvngo）神父時，他尚未完成學業呢！伯納定代理了幾年，展現他的作風：他本人與其他初學生平起平坐，跟其他初學修士一起在餐廳內公開認罪。

1571年5月31日，他發了終身願，但仍繼續在那不勒斯執行使徒職務。他不擅講道，因為他欠缺講道者的口才，不過他在聽告解和私人交談的能力方面特別出色。他撥出大部分的時間傾聽奴隸的心聲。隨著勒班陀（Lepanto）的勝利，那不勒斯海港來了一波波摩爾人奴隸。伯納定來到他們中間，帶給他們禮物，以溫和的微笑迎人，打破了語言不通的隔閡。他並不多言，但是他為基督徒的慈善作了有力的見證。

雷西的使徒

1574年12月他奉調到位於半島另一端的雷西（Lecce），他的那不勒斯生命樂章就此劃下休止符。雷西有過美好的時光，當年阿普利亞海岸是與東方貿易必經的橋頭；時至今日，這裡依然矗立著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建築，這些都是繁榮時期留下來的遺跡。有些人稱之為「阿普利亞的佛羅倫斯」（the Florence of Apulia），另一些人則稱為「義大利的印度」。

市府當局早已要求耶穌會來設立分會，這一次他們以具體的行動證明他們的承諾。首先他們興建了教堂與寓所，接著蓋學校，全都用自身的資源。

「我來到這個城市還不到三天，」雷亞利諾神父致函省會長

薩爾梅隆神父（Fr Salmeron），「許多人已來要求我聽他們的告解。我竭誠歡迎他們，為拯救這些好人，我內心切願自我犧牲。」

這種態度對他有所啟發。他不讓富有者與有權有勢者主宰他；在拜會過了教區高層當局之後，他首先去探訪的地方是城裡的監獄。城區監獄有兩處，情況都很可怕。原來獄吏的職責只是將犯人安全送達法庭，並不管他們的吃，犯人的飲食唯賴私人慈善機構提供。不久，人們就看到雷亞利諾神父帶著柴薪與飲水到監獄去，為犯人準備膳食，擦洗鍋壺，並招募義工來做慈善工作。此外他還對死刑犯伸出援手，有一個拒絕領受聖體的死刑犯即將被帶到絞刑架，他被鐵鏈拘禁在一輛低矮的馬車上；伯納定跳到車上，雙臂緊抱著這個死刑犯，輕聲對他說些溫暖人心的話語。這個可憐的傢伙在被絞死之前，適時辦了告解。

雷西城裡到處充斥摩爾人與黑人奴隸，他們也成了伯納定神父關懷的對象。有一次他在城裡講道時，特別強調這些奴隸跟其他人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並非次等人類；福音是為所有人，他努力針對這些奴隸傳播福音。有一項統計顯示，他爭取皈依的地點多達 200 處。

他的講道切合實際，口才並不流利，但他在聽告解時會使盡全力，他成了城裡的聽告解神父。他為不同類別的人們建立基督生活團，其中包括教士在內，他也沒有忽視修女院，當時這些修女院已出現程度不一的散漫問題。

然而他最喜愛的對象是兒童，無數兒童湧到他的道理班，他對乏人關愛的殘障者與病患特別關懷。雷西城所有街頭流浪兒童都是他的朋友。他跟羅馬的聖人斐理·乃立（Philip Neri）一樣，備受城裡人歡迎。他有透視人們良心的本事，知道隱晦不明的事情與未來事實發展，有關他的神視、有時候他整個人外圍會發光

以及其他奇蹟的報導，一傳十，十傳百，更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出任學院院長

1594年，也就是他在雷西城待了二十年之後，奉命出任學院院長。他首次對整個學院發表的談話，就已確定他的管理計畫，不用說將以愛為基礎。同時他宣布他將毫不遲疑的運用依納爵會憲賦予長上的權力，針對一些證明正當的情況特免持守規定，因為「我們的管理是仁慈的」。

在這種情況中，他任憑自己對人的非凡感覺來行事。他的前幾任都曾強制執行不准在兩餐之間飲酒的規定。在盛夏期間，這個規定顯得不盡人情，在他任內他就批准可行。此外他還同意延長傍晚涼快時段的娛樂時間。雖然只是小事一樁，這些姿態卻是意味深長。

除此之外，他還顯現過人的謙虛。有一次一位修士犯了過錯，院長命他在修院餐廳公開認罪，這在當時是常見的嚴厲懲罰。這位修士到處抱怨說他的壞話，伯納定體認到這樣的悔罪方式事實上太過分了，因此傳話給這名修士，不必再悔罪了。傍晚在餐廳吃飯時，他公開請求這名修士原諒，因為他讓後者受苦了。有些人感動得淚水盈眶，至此這位修士完全臣服了。

身為院長有權將學院的資源拿出來照應貧窮者。他毫不遲疑的拿出來，即使打破了既有的傳統，讓會院中比較不慷慨的人感到不安。有一次，來自外地巴里的一個人路經當地病倒了，孤家寡人，舉目無親的他，請人帶話給雷亞利諾神父。院長不理會他人的反對，讓這個人躺在擔架上來到會院，不但給那人一個房間養病，還親自照顧他二十二天，直到病體痊癒。他對一個無處可去、身無分文的法國人也做了同樣的事；他讓這個法國人住在會

院裡長達六週，對方離去時，伯納定還提供他一套衣服、一匹馬，讓他踏上漫漫長路返回法國。

有些神父不免抱怨這樣會浪費學院亟需的寶貴金錢。事實上，捐款卻增加了。為窮人與患者儲備的珍貴桶酒，經過數月後依然像原來一樣滿滿的；唯一的不同是，酒的等級愈來愈高級。難道是奇蹟嗎？人們都這麼想。

再見

雷亞利諾神父從 1574 年到 1616 年，前後 42 年待在雷西城工作。事實上，有好幾次想要將他調離雷西城，轉調到那不勒斯或羅馬的蓋素，但要不是因滂沱大雨，就是生病，使他調不成。還有一次市議會甚至下令關閉城門，不讓他離城。

可是大限到來，市民再也無法阻止他離開他們。開始的老化跡象包括彎腰駝背、臉色蒼白、滿臉皺紋、雙腿無力、時常感冒、聽力漸退。他 80 歲時，僵硬老化的雙腿先報廢了。1610 年 3 月 3 日早上，他正在聽告解，一個懺悔者請求他賜給一些聖物。他站起身來離開告解亭，緩步走過教堂中殿，步上樓梯到他的房間去。他回來的時候，一個不小心，一腳踩空，就這樣一路跌落下去。人們發現他躺在地上，他的頭倚在石頭地板上，下巴跌破了，深長的創口血流如注，漫過了他的左眼。醫生羣逐漸使他痊癒，但是這一跌顯然元氣大傷。

他的大限已近，市議會當局作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在 1615 年 12 月 21 日嚴肅的會議之中，市議會議決懇求教區主教提報伯納定·雷亞利諾神父列真福品。

在他去世前夕的 7 月 1 日，類似的動作又出現一次。市長與市政府首要官員聚集在他臥榻四周，屈膝環繞，同時市長宣讀一

份文件，請求伯納定繼續護衛這個城鎮。

在隨後的一片靜寂中，只聽到伯納定一聲嘆息，代表團認為這是他同意的表示。然而市長還不滿意，希望看到更有力的跡象表示他接受。於是代表團在次日重返，市長再度提出請求。這一次，瀕死老人的臉上出現了慈祥溫柔的表情，他口中喃喃自語，可是沒有人聽得懂他說些什麼，不過大家認為這表示他已同意了。於是大家口親伯納定的手，魚貫退出房間，大夥兒毫不感難為情地痛哭了起來。

大限的時刻在中午過後來到。他顯然心裡有數，跟著唸為死者祈禱文。不久他的呼吸變得重濁，他的雙肩開始聳起。有一陣子他恢復講話能力，只聽他口誦最後的禱文：

O Madonna mia santissima

這是他最後的遺言。他睜開雙眼，吐出最後一口氣，告別人世。

若望·雷濟思

(John Francis Régis, 1597-1640)

從義大利東南部我們來到法國東南部；前面我們介紹一位溫文儒雅的聖人，他畢生四十多年一直待在都市裡從事牧靈工作；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位不畏天氣冷熱，無論颶風下雨，常在險峻的山嶺上山下山熱心傳教，其足跡甚至遍及人跡罕至的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一位傳教士。

陶成歲月

若望·雷濟思於 1597 年 1 月 31 日出生在法國東南部一個僅有 30 戶人家的無名小村方庫維特（Fontcouverte）。此地位於納爾榜（Narbonne）與卡爾卡松（Carcassone）半途。他屬於強悍一族，他所生長的地方，冬季常遭寒風肆虐，夏天難逃豔陽炙烤，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他，鍛鍊出堅強的心志與體魄。

他的雙親是老雷濟思（Messire Jean de Régis）與德蓮·達思（Madeleine d'Arse），家境富裕，若望在村裡完成小學教育時，年紀 15 歲，他的父母親將他送到距家鄉六個小時路程的貝濟埃（Béziers）當地耶穌會設立的中學就讀。在這裡若望的聖召成熟了。19 歲那一年，他思量自己的前途，他的幾個表兄弟加入格臘斯（La Grasse）的本篤會，他自己則選擇進入耶穌會。

1616 年 12 月 27 日，他進入法國南部土魯斯（Toulouse）的耶穌會初學院，差不多同時，若翰·伯滿加入梅林的初學院。15 年後，他完成學業，並在畢雍（Billom）、勒浦伊（Le Puy）、

奧希（Auch）等學校教書後，他以神父身分返回家鄉接受「第三年培育（Tertiaship）」。

他的第一個任務並非鄉間傳教，而是代替一位生病的教師，前往帕米耳斯（Pamiers）學校教學。雖然名為學校，這裡其實是個沒有門窗的簡陋小屋，然而衷心喜愛貧窮的雷濟思，卻甘之如飴。不教書的日子，他致力於傳教工作，直到今日他在靠近西班牙邊界的小鎮阿克斯累太姆（Ax-les-Thermes）傳教的事蹟仍為人津津樂道。

1632 年夏天，他奉派到蘭奎多（Lanquedoc）的行政首府蒙特皮勒（Montpellier），從此到八年後去世的這段時光，他一直在雷西文斯（Les Cévennes）山區一帶從事傳教工作。

首次考驗

當他抵達蒙特皮勒時，漫長的宗教戰爭已經結束，不過人們卻處於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由仇恨形成的嚴重對立情境中，法國南部新教徒人數特別多。他的第一個任務是以言以行帶來和平。

他的言語簡單，他不說他已知道的事物，只說他看見的、經歷的事物。一位知名的布道家朱勞梅·巴斯卡（Guillaume Pascal）在聽完他的演講後說：「我們只顧修飾我們的演講詞藻，是多麼徒勞無功啊！人們都來傾聽這個人淺顯易懂的教理，而我們人為的滔滔雄辯根本打動不了人心。」

他的行為更加具有說服力。他挨家挨戶去分發麵包，照料病患。他還去探訪靠皮肉營生的妓女家庭，把她們安置到安全的地方，替她們找到在人前抬得起頭的差事，作為收入來源。

除了蒙特皮勒，他在外地的第一個傳教工作是在索米瑞斯（Sommières），而這只是前奏而已。當時當地年僅 13 歲的貴族

拉任提耶 (Largentiere) 男爵路易斯·巴姆·蘇茲 (Louis de la Baume de Suze) 已奉命出任維維耶 (Viviers) 的助理主教，剛剛接管這個教區。他為人進取，是一位小獨裁者，年輕的他欠缺經驗，但是為人正直。他急欲探視自己的教區，然而他需要協助，因此轉向耶穌會求助。耶穌會推薦蒙特皮勒的雷辛恩神父 (Fr Leysène) 與雷濟思神父。

整個教區涵蓋維瓦瑞斯山 (Vivarais)，由於宗教戰爭的關係，此地受到的戰亂之苦甚於其他任何地方。許多教堂被洗劫一空；教士的人手不夠，留下來的神父寥寥無幾，而且都不夠格；天主教徒對自己的信仰一無所知；四分之三的教會財產全都由基督教的胡格諾派掌管。這裡是新教徒的堡壘要塞，由於山區曲徑通幽，山谷狹長、森林密布，這樣的地理環境因素，使得此地更加顯得難以攻克。

我們的使徒在 1634 年春天復活節過後數日展開他的牧靈工作。他由聖安德鎮 (Bour-Saint-Andéol) 進入，年少的主教在當地等候他與他的同伴。他們的計畫是以兩年時間走遍教區各角落。兩位神父先行出發，為信眾接受主教將在每一主要堂區教堂主持的和好聖事與聖體聖事作好準備工作。

雷濟思神父負責執行這項計畫，但是他不以維持原有信徒信仰為滿足，他設法前往無法來到他身邊的教友，他不畏風雪大雨，挨家挨戶拜訪茅舍，逐一探訪每一個農莊，照顧病患，不論對方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他都努力宣揚聖言。常有許多人要求他「留到明天再走吧！」

他很快地向剛復的神父發難，設法將他們帶回正確的道路；有些神父願意接受，有些則不然。他們趁教區副主教不在的時候，發抗議信函指控雷濟思神父粗魯，透過講道急躁的破壞了既

有的秩序。教區副主教是了解情況的人，如果知情他一定會阻止此事發生。

主教起初不信這些指控，然而抗議聲浪大起，於是開始考慮採取行動；事實上當教區副主教返回時，主教已要求耶穌會高層撤換雷濟思，陰謀拆穿後，主教坦承自己處事太過急躁了，於是雷濟思恢復原職。

這是發生於 1634 年夏天與秋天的事情。雷濟思恢復工作，但傳教最艱難的部分尚未克服，那就是非常靠近奧比納斯（Aubenbas）的布提耶（Boutieres）山區；早些年前，雅各·撒肋（James Salès）就在奧比納斯殉道。

第二階段的工作持續八個月（從 1635 年 1 月到 9 月）。傳教士們在雷契拉（Le Cheylard）設立他們的總部，由此展開使徒出擊任務。雷濟思不畏寒冷大雨，也不在乎吃什麼，他每天出發，起初他每天傍晚還會回來，到後來他不回來的時間愈來愈長，有時八天，有時十五天。有一次，一場暴風雪籠罩整個鄉間，大雪覆蓋了路徑，甚至連山間人家也不見蹤影。雷濟思過了三週才返回，整個人更加消瘦了。

懂得欣賞體力的蒙塔格納德人（montagnards），從來不曾在當地見過神父，他們見狀口語相傳，說是山區來了一個聖人。謠言滿天飛，連聾子都被迫聽講；甚至最冥頑不靈的人都公開流淚痛悔，「在任何了解上維瓦瑞斯山上住民心靈熱火溫度的人來看，這簡直就是奇蹟。」（引述吉頓（Guitton）的話）

由於並非所有人都能到達像雷契拉那麼遠的地方，雷濟思便設法蓋幾個附屬中心，例如位於 1,300 公尺高的拉查姆-拉斐爾（Lacham-Raphaël）中心，這裡是維瓦瑞斯山上海拔最高的沒有教堂的小村子。結果鄰近的人們開始靠攏來，有時候整村子的人

都移動過來，全村只見空蕩蕩的住屋。有一天，雷濟思正當忙完一天的工作，筋疲力盡的走出教堂時，看到一整支軍隊在行軍。

「神父，我們來自非常遙遠的地方。我們全軍十二個聯軍從昨天起在森林裡走了一整夜，只為了聽你講道。你會把我們趕走嗎？」

「來，來，我的孩子，我全心擁抱你們每一位。」

想必這樣的情景經常發生。

1635年9月到10月間，接著到新教徒占大多數的普利瓦斯（Privas），此地情勢特別緊張；11月到12月間，來到聖艾格瑞夫（Saint-Agrève），這是一個山賊出沒的地方，當地的蒙塔格納德人嗜飲人家送的酒，到此他信守跟主教的承諾。雷濟思在1636年前幾個月全心致力走訪屬於瓦倫斯（Valence）教區、但是位於上維瓦瑞斯的杜克斯（Doux）山谷。他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廣大的羣跟隨著他。

宣教士

他在復活節過後返回勒浦伊時，發現當地的氣氛變了，1634年秋天他感受到的敵對氣氛不見了，他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

當地善妒的主教傑斯特·塞瑞（Just de Serres）不久就召見他，要他在該市推動井井有條的慕道計畫，雷濟思同意立刻進行。他在音響效果特佳的耶穌會教堂展開慕道班活動，可是不久證明這個教堂太小了，容不下那麼許多人；於是他改到較寬敞的本篤會教堂去辦活動；慕道羣眾將教堂擠得水泄不通，有些人甚至擠到祭台上與飛檐上。

正如早期在蒙特皮勒的方式，他一方面講道，另一方面投入慈善工作。人們開始給他一個封號，稱他為「窮人之父」。他親

自探訪窮人，以登記簿的方式，詳列亟需幫助者的名字，以及願意出錢出力的女士名單。有一天，在一個簡陋的小屋內，他發現一個全身病痛的男人遭人遺棄，自生自滅，雷濟思難掩鬱悶難過的哭泣。他為這個男子找來一張床，送來乾淨的衣物，每天來探視他、照顧他、餵他吃東西。深受感動的患者淚水盈眶的告訴他說：

「你解救了我，你是我的神父！」

「我的好兄弟，該感激的人是我，原諒我這麼遲才來幫助你。」

一如在蒙特皮勒的情形，他首先關切的是妓女；這個舉動讓利用妓女的無賴痛恨他，伺機報復。

然而，他依然心繫山區的傳教工作。1636年起，他將工作整理成利用天氣良好的四月到十月，專心做市區使徒工作，十月到次年四月天氣惡劣的時段，則為山區人們服務，這是因為好天氣的時候，山區的人們必須勞動耕種，而寒冬期間則閉不出戶，因此1636年底雷濟思神父現身於費雷佛洛伊（Fay Le Froid）。

偉大的任務

費雷佛洛伊是一個寒冷的地方。冬天的寒風越過海灘的樹林與松樹到處吹送。暴風雪是頭號敵人。一個人只要離開家門走不到幾公尺就會因暴風雪給弄瞎了眼，困在暴風隆起的雪中被凍死。

這些困難並沒有使雷濟思卻步，反而激勵他向前。他一大早外出來到簡陋小屋與農場去教授教理。那些向來熱情款待的村民儘管自己擁有的少之又少，仍然提供一片黑麵包、牛奶、一些水果給他吃，他一點都不計較，人家給他什麼就吃什麼。

有些小村子在這些困難的環境下簡直成了避難所。其中一處

名叫馬赫斯（Marlhes），雷濟思有意將這個地方修建成耶穌常去的伯達尼（Bethany）。不過每逢冬天此處對外交通斷絕，正如他的同伴班薩克修士（Br Bensac）所說的：「我們費了整整兩個小時在森林與山區裡徘徊，在冰天雪地順著陡坡上上下下，根本不知道走的方向。在這些地方，黑夜伸手不見五指、時常遇到大雪與野狼，一切非常恐怖。」

「那又怎樣？修士。難道這樣我們就失去勇氣了嗎？上主是我們的嚮導。」

「我禁不住想像我隨時都會滾下懸崖峭壁，或者被出沒的野狼吞噬。最後我們才找到我們要走的路徑，過了半夜才抵達馬赫斯，又餓又累半條命都沒了。」

神父來了，村民們喜出望外。「每個村民都跑出來跟在他後面，他的聖德吸引了大批的人潮。」當地神父傑克斯·安德瑞（Jacques André）告訴我們，「人們從非常遙遠的地方湧來，為了聽他講道。他不多言，幾句講道，就能讓聽眾的心火熾熱。護送他的人潮，不因颳風下雨而減少。人們在十字路口等待他，加入隊伍，一路相隨。我看著他不得不停下腳步，來到一處空地，立在嚴寒中，開金口送給大家幾句發人深省的話，滿足大家的期待。我曾看到他站在僵硬的雪堆上講道，他本人與聽眾都不在乎天氣寒冷。」

直到 1640 年，他一連四個冬季有系統的走遍整個山區。到了 1640 年 2 月，他正在蒙法康（Montfaucon）時接獲緊急命令，要他返回，取代一位在勒浦伊學校任教的老師。他必定覺得不可思議，但仍服從遵命，當天就打道回府。

勒浦伊的議員們

當他抵達勒浦伊時，整個城鎮正陷入混亂中，原來梅迪西（Medici）的凱瑟琳女王進口了威尼斯的花邊流行服飾，所有上流社會都接受這種時尚，連馬匹都披戴上鑲著花邊的轡頭。整個鎮的工藝人員都在埋首學習其中的奧祕，工商界造就了空前的繁榮。突然間，王室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各式各樣的花邊產品買賣，違者將受到最嚴厲的處罰。禁令明白規定，一一詳列不准使用花邊的項目：配劍繫帶、劍花結、襪帶、腰帶、方形披肩、花結、蝴蝶結等等。

這項禁令果真實施的話，將使得約四萬人失業。難道能為勒浦伊的妓女另謀生路——因為花邊工作而找到差事——的那位神父，不能為全體鎮民請命嗎？

「這道法令不可能持久的。花邊生產事業將恢復舊貌的；這個行業絕不可能走上絕路；相反的，業務將蒸蒸日上。」雷濟思神父向前來拜訪他的代表團作此保證。

事實上後續發展果真如此，自此而後，勒浦伊的花邊業者對雷濟思神父尊敬有加，視之為主保聖人。

秋天到來，緊急情勢化解了，於是雷濟思返回蒙法康，專注於他被交付的任務。完成了在維林斯（Veyrines）傳教的他，準備在拉盧維斯（La Louvesc）講道，可是他卻先回到勒浦伊。彷彿他預知自己死期將至，他靜靜的作了三天的個人退省，最後辦了總告解。然後他啟程前往拉盧維斯。所有人都尊重他的計畫安排，希望他早去早回。

他有自知之明。「不，神父，」他告訴他的告解神父，「這一次我不會再回來了。」

消失在暗夜中

他往拉盧維斯出發，他早已答應過會在聖誕節前幾天到這裡傳教。途中他在蒙崔佳德（Montregard）與勞庫勒斯（Raucoules）兩個地方停留了幾天。隨著他的腳步走過一個個小村莊，他適時教導民眾、傾聽人們心聲、安慰、赦罪。到了12月23日，他揮別了朋友；當時雪下得很大。他比原先預定的時間晚到聖邦尼雷佛洛伊（St-Bonnet le Froid）時，天色已經開始轉暗，修士建議停下來。

「我的兄弟，人家在等我們傍晚到呢，打起精神來吧！」

他們摸黑在冰天雪地找路，暴風雪使他們看不清前進的路徑，他們迷了路，走偏了，轉向左方，一路上看不到住家燈火，沒有人發現他們。他們猜想前方有一團外形像似被人遺棄的茅舍黑影，這個晚上勉強可以在這裡安頓。一陣刺骨的寒風吹進整個房間，細雪紛飛，滲透全身。他們潮濕的衣物開始變得僵硬、冰冷，稻草無法帶給他們溫暖，一整夜難以安眠。

熬到天亮，他們又得穿過寸步難行的小徑往上爬六、七百公尺，整個人又冷又餓，而且還發燒。

過不了幾天，雷濟思神父就與世長辭了。他是在1640年12月24日早上抵達拉盧維斯的，死前幾天，他仍馬不停蹄的活動。

任務完成

拉盧維斯不過是個僅有少數幾戶人家的小村莊，由身在維林斯的貝爾神父（Fr Bayle）負責照顧。這位神父在教堂附近有一棟房屋可以自由運用，他很歡迎兩位耶穌會神父到來。他本來以為這兩個神父已在暴風雪中失蹤了。聽完了他們的故事，他乞求

雷濟思神父先吃點東西再開始傳教。然而教堂裡已坐滿了不畏風雪來聽他講道理的蒙塔格納德人。他不能讓他們繼續等下去。12月24日，他花一整天的時間開導羣眾，聽他們告解。到了聖誕節當天，他仍是空著肚子在早上講三次道理，晚上聽告解到很晚。

26日一整個早上他都在忙著聽告解、祝福、赦罪、教導、鼓舞人心；下午他主持了兩台彌撒。彌撒結束後，羣眾阻擋了他的去路，使得他無法前往告解亭；他被迫在人羣中坐下來聽靠近祭壇的教友辦告解。在他的頭上方，有一個破洞的窗戶，寒風不斷吹送。到了傍晚，他就昏倒了，從椅子上倒了下來。他被抬到教區神父的住所去。

他靠著煙囪坐著，逐漸恢復了意識，他張開眼睛，向隨他進入屋內、滿臉驚恐的農夫張開雙手。即使到這個時候，他仍為要求罪赦的人們赦罪。然而他的腰部發疼，稍微動一下都感到灼痛。無法言語的他，只能比手勢；他的雙唇蠕動，請求寬恕，他的雙手做出赦罪的手勢。在前後兩個小時中，共有二十個人以此方式接受赦罪。接著他又昏了過去，被人送到教區神父的床上。

消息不逕而走。醫生與藥師從土儂（Tournon）趕來，盡力而為，可是雷濟思的情況愈來愈糟糕。高燒使他耗盡了力氣，他為自己惹出的麻煩抱歉不已，他不願占用神父的床位，希望人家把他移到地上，或者馬廄。

12月30日，他再一次辦了總告解，領受臨終聖體與終傅。「春蠶吐絲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他歡迎所有希望見他的人，為他們赦罪，他希望在眾人中間吐出最後一口氣。

31日近午夜，他告訴畢都（Bideau）修士，他已經不行了，然後他加了一句：

「喔，修士，我看到吾主耶穌與聖母迎接我到天堂去。」

儒廉·茂諾

(Julian Maunoir, 1606-1683)

儒廉·茂諾神父在法國西北部揚名，一如若望·雷濟思在東南部山區成聖，不同的是，茂諾溫文儒雅，跟伯納定·雷亞利諾很像；布列塔尼人以當地方言 **An Tenmad**——意即「好神父」稱呼他。

聖召

出生於布列塔尼 (**Brittany**)，後來奉命赴當地從事使徒工作的儒廉·茂諾，其實本來並不會講當地方言；他是在聽到聖召要他去為布列塔尼人服務之後才學的。

他在 1606 年 10 月 1 日出生於法國布列塔尼東半部 (即上布列塔尼) 的聖-喬治-狄-雷騰波特 (**Saint-Georges-de-Reitembault**) 小村，當地只講法語，不像西半部 (下布列塔尼) 講的是古老的凱爾特語 (**celtic**)。他在家排行第五，父親依薩格·茂諾 (**Isaac Maunoir**) 是個小布商，母親佳播·狄洛利絲 (**Gabrielle Deloris**) 在他們簡樸屋子一樓小店裡幫丈夫做生意。

小茂諾在村中小學學會讀、寫、算之後，他的雙親將他送到耶穌會在雷恩斯 (**Rennes**) 剛剛開辦的學校就讀。當時他 14 歲。1622 年 3 月 12 日，耶穌會會祖依納爵·羅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 與方濟·薩威 (**Francis Xavier**) 列入聖品的大事，以及赴中國、日本與印度傳教的事蹟引發狂熱；在大西洋另一岸的新法國，法國耶穌會面對大有可為卻艱困的傳教工作，以及他在學校

中，特別是透過校中蓬勃發展的基督生活團所獲得的心神照顧，在在促成他加入耶穌會的聖召。臨畢業的一年，適逢耶穌會省會長兼法國國王亨利四世顧問與聽告解的神父皮耶·柯通（Pierre Coton）到當地作一年一度的視察，19 歲的儒廉把握機會申請入會。

完成初學後，茂諾到阿奴（Anjou）的拉佛雷契（La Flèche）學校修讀三年哲學。從這裡，恩蒙·馬塞（Ennemond Massé）成了第一個赴加拿大傳教的人，繼他之後的是依撒格·饒格（Issac Jogues），他必定是儒廉一年來的同伴。至於我們這位年輕的布列塔尼人，他的念頭不斷在休倫人（Hurons）與依洛郭亦人（Iroquois）的身上（譯註：北美原住民）打轉，壓根兒沒想到他的同胞。

到布列塔尼傳教的聖召

前往布列塔尼傳教的念頭是在他受訓的下一個階段「試教」（regency）出現的。1630 年他被指派到布列塔尼最西端的康諾艾利斯（Cornouailles）地區首府奎姆普（Quimper）的聖伊芙（Saint-Yves）學校去服務。上主透過兩個關鍵人物來喚醒茂諾的特別聖召：米歇爾·諾布列茲（Dom Michel le Nobletz）（1577-1652），以及皮耶·伯納神父（Fr Pierre Bernard）。前者是偉大的布列塔尼使徒，其實是唯一的傳教者；因此他尋覓某個人能夠接手，而且他有預感這個人會是來自奎姆普學校的耶穌會士。皮耶·伯納則是駐校神職人員，儘管比茂諾年長 21 歲，他與茂諾成了忘年交。他並不教學，只負責牧靈工作，他為自己不懂布列塔尼方言感到遺憾，要不然就能為他們服務了。因此他鼓勵這個年輕後輩去學這個語言。

米歇爾憑預感來到學校自我介紹，請求與年輕的試教者談話。這次訪談十分簡短，可敬的布列塔尼使徒非常擅用隱喻。他先提到伯鐸與安德使徒受到召叫，再談到聖召意味的恩寵，以及聖召要求的忠信。然後他擁抱茂諾，就告辭離去了，他確信他找到了後繼者。

茂諾開始認真思索學習布列塔尼方言的需求。距奎姆普約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獻給聖母的教堂叫 Ti-Mam-Doué，意即上主之母之家。就在跟米歇爾晤談後幾天，茂諾來到了這個教堂，想到下布列塔尼人牧靈工作遭到忽略的問題。跪在聖母像前，他做了以下的祈禱：

「我的好母親，如果您俯允教我講布列塔尼話，我願立刻學習，並為您爭取獻身服侍的僕人。」

1631年五旬節當天，他獲准學習布列塔尼方言，不過兩天工夫他就大膽嘗試以布列塔尼語教授第一堂教理問答；兩個月後他已能不用註記宣講道理；再過一陣子他就開始在主日與教會的慶節，到附近村莊去講道，而這些傳教工作都是他利用教學課餘時間完成的。

確認

成功的傳教工作帶給他精神鼓舞，使他期待晉鐸（1637年6月6日在波吉斯 Bourges 升神父，時年31歲）與通過「第三年培育」（1640年8月在魯昂 Rouen 完成這個階段）以後，他將可回到布列塔尼來。事實並非如此；他被調到奈佛斯（Nevers）擔任人文學教授。為什麼不派他到布列塔尼去呢？原來奎姆普沒有人要他，因為主教反對推動「傳教」使徒工作，而學校校長也有意見，因為學校的財務窘困，承受不了這種額外的負擔。

他的恩師米歇爾·諾布列茲將正在小漁村勒庫奎（Le Coquet）退省的他給召了回來。茂諾去拜訪他，這位可敬的老者眼裡噙著淚水擁抱他，如同耶穌誕生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正直虔誠老人西默盎看到獻主於聖殿的耶穌聖嬰那樣的驚呼：

「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將我從這個人世召回了，我將心滿意足的回歸天鄉，因為我親眼看到了你答應接替我的人，你為交給我的人們皈依天主所準備的這個人，我以雙手覆在他的頭上祝福他。」

難題迎刃而解。本來反對的主教去世了，他的代理人比較了解實際情況。找人與茂諾為伴的問題也適時獲得解決，米歇爾鼓勵伯納神父自告奮勇爭取這個機會，不必在意年紀以及不太會講布列塔尼話。伯納神父將去幫茂諾神父的忙，也就是成為後者的屬下。茂諾後來將兩人的關係比為伯鐸與安德：他自己猶如伯鐸，伯納神父猶如安德。最後的財務拮据問題也因為奎姆普首長出乎意料的捐獻獲得解決。這個地方首長甚至向樞機主教黎留（Richelieu）陳情，樞機主教致贈了 1,200 英鎊。教區當局開始以較具前瞻性的眼光來看待布列塔尼傳教問題。該是開始傳教的時候了。

成功與矛盾

頭一個偉大的任務是到布列斯特（Brest）對面外人難以接近的奎桑島（Quessant）去傳教，這個地方懸崖林立，四周有許多小島嶼。要進入這個地方必須循著岩壁砍鑿出來的台階攀爬，緊抓住岩石以免掉落。對外交通不易，是當地 3,000 名居民的靈修乏人照顧的原因。從來不曾有過主教造訪，很少神父願意自我流放到這個幾乎不適合居住的地方。

儘管不識字，當地的人道德觀念健全，對教義的反應絕佳。兩位傳教士在 1641 年 6 月 29 日聖伯鐸與聖保祿慶節當天抵達，受到島民真正喜樂的歡迎。次日，全島居民都到教堂來聽講道。茂諾結束講道後，在座的島民都繼續坐在位子上，意猶未盡。茂諾主持了一台詠唱的彌撒，後來再次講道。可是島民依然不肯離去，因此到了傍晚，在唱完晚禱之後，又恢復布道。

告解的情況也是一樣。島民顯然懷著痛悔的心情，啜泣、捶胸，大排長龍等著辦告解。為了滿足島民，兩位神父清晨三點鐘即起床；為了做到這點，伯納神父睡在桌上，茂諾神父睡在地上，兩人一醒來，十五分鐘內即解決早餐。

這次布道會一共持續三週，盛大的聖體遊行活動帶來最高潮，最後在茂諾神父諄諄告誡、叮嚀規勸之下宣告落幕。分手的時刻終於來到，兩位神父坐上了小船，回首舉目，只見座落在懸崖峭壁的整個島，高高低低，到處有人影揮手向兩位神父道別。

兩位傳教士直接前往莫倫斯（Molènes），此處是一個只有 500 名居民的小島，跟奎桑島的居民處境一樣，布道結果令人十分安慰。就在這個時候，米歇爾捎來信函，警告他們有人蓄意不利於他們。原來有兩位神父向主教與耶穌會省會長上訴願，要求解除茂諾神父講道的資格，理由是他太過魯莽，他不但設計不合宜的舞蹈，還為這些舞蹈作曲。

主教與省會長都落入陷阱；主教下令禁止那些歌曲，省會長則對兩位神父嚴厲訓斥一番。兩位神父針對指控作出回應，然而據說島民頗不得體的又唱又跳，才是最佳答案。兩艘船載來約一千名島民前來接受堅振禮，島民上岸後才獲悉教會的禁令。然而島民才不管禁令，只見男女孩子分列兩邊，整個遊行隊伍蜿蜒而行，朝聖瑪竇修道院前進，一路上不停的唱歌跳舞。有些人想要

遏止他們，他們卻唱得更大聲。所幸當時從佛戈洛特（Folgorot）來了一位懂得布列塔尼話的神學家潘克利契（M. Pencrec'h），由於他的緣故，這項爭議才告平息。他聽出了歌詞的意義；他去見主教，透過有力的辯論，用真相讓主教改變初衷，從此撤銷自己針對當地發出的這道命令。

還有一個被遺忘的島嶼塞恩（Sein）需要去傳教。當地只出產一種惡臭的草，這種草可用來作為肥料與燃料，後來它成了寶貴的東西，因為它富含碘。這個小島長不到三公里、寬不到一公里，一個人要到這個不適合人居住的島上來，只能冒著生命的危險。我們這兩位神父前後花了 36 小時，避過暗礁，渡海來到與歐洲大陸相隔八公里的這個小島。他們抵達時，半條命都沒了。

島民高興的唱著〈伏求降臨〉（*Veni Creator*）！歡迎兩位神父來到。他們哪想得到兩位神父又饑又累，暈船得厲害？當茂諾神父整裝在聖器室內主持彌撒時，他幾乎站不住，而窗戶邊擺著曬乾的魚發出的惡臭，幾乎讓他不支倒下。他祈求「布列塔尼總領天使」保佑，設法穩住。島民放下工作，參與所有的宗教儀式；許多人還親自求見兩位神父晤談。成果出乎預期的好，但要如何能夠確保這個成果並維持下去呢？

推動神父聖召

這是茂諾神父最妥切的主張，事情是因為島上一個名叫吉爾徹（François Guilcher）的人所引起的，當地人給這個人取了個綽號叫拉蘇（Le Sû）。兩位神父發現島民作了很好的心靈準備，這一切全都虧有了他。儘管島上長久以來沒有神父，島民們卻都熟悉所有宗教儀式，還會唱聖歌。拉蘇可以說是「島上的領隊」；他是個漁夫，但年輕時曾到過歐洲大陸，懂法文，也能唸拉丁

文。米歇爾交給他普恩特（La Puente）所著的默想小冊，帶給他神操。他每個主日召集島民到教堂聚會，早上與傍晚各一次以唱的方式進行禮拜儀式。

何以未讓他當神父？因為他已經 60 歲了，是個鰥夫，名聲很好，只要幾個月的研讀，他就可以完成不可或缺的學術準備。

茂諾試探他的心意，發現「領隊」重視這個構想。他向藍德文尼克（Landevennec）修道院的道明會神父提起此事，為這位老海員作好安排，讓他跟修院神父共處一段時間，選讀一些課程。兩個月後，他出現在奎姆普學校，他已經準備好了。然而他必須先通過主教座堂公禱司鐸組成的理事會的審查。茂諾只吩咐他換衣服，不要穿討海人必備的羊皮夾克與藍帽，唯恐可敬的教會人士看了這副打扮會嚇一跳。

結果沒有用。可敬的教會神長帶著反諷的微笑接見他，以他為話題彼此調侃，並不認真檢驗他，就請他離去。

茂諾並不就此罷休，他想辦法送拉蘇去接受嚴格的考試，結果表現出色，令主考者大吃一驚。他以純正的拉丁文讀一段福音章節，口譯無誤，闡釋的功夫比一些主考官還要好。然後他被要求處理聽告解時可能遇到的「良心情況」，結果也令人滿意。

於是這位資深的老水手獲准晉鐸升為神父。

特瑞馬利亞主人

特瑞馬利亞主人尼古拉斯·狄薩丹（Nicholas de Saludem）的情況，也值得一提。他是凱拉然古堡堡主，曾經是雷恩斯議會顧問，是個聲名狼藉的浪蕩子。他的母親事主虔誠，不斷為他的皈依祈禱，她請茂諾神父來感化兒子。堡主有禮的傾聽，但依然我行我素，不過良心的聲音愈來愈大聲，最後終於屈服了。

茂諾後來造訪古堡，並不知道堡主的內心已經有了改變。他在前往為特瑞馬利亞主人祈禱的路上，祈禱詞的第二部分是這樣的：

「上主，要是特瑞馬利亞主人能夠受到感召，決心成為神父，陪同我傳教，那該有多好！他的加入勢必大大光榮天主，拯救無數靈魂。」

他抵達古堡後才知道他祈禱的第一部分已經獲得上主垂允；但是第二部分還未成功。這位先生會不會成為神父為主宣道呢？茂諾神父手持棍杖，背上揹著背包，為傳教事業奔波的景象感動了他。在巴黎經過三個月的準備，特瑞馬利亞主人終於在 1656 年 6 月晉升為神父。同月 24 日，他就協助茂諾神父傳教。特瑞馬利亞主人當起神父，將在傍晚聽告解的消息一宣布，羣眾莫不感到震驚。自八歲起不曾說過布列塔尼話的他，從此講的是布列塔尼話，而且成為茂諾神父的忠貞助理，長達 18 年。

喚醒一個人的聖召並不夠，還必須爭取他走上修道之路，並且投入傳教工作，這是他花費最多心力的工作，不過辛勞有了結果，逐漸邁入安定。首先他延攬一些定期的幫手，然後他將這些人召集起來形成一個組織。每一個組織成員約數百人。紀律是嚴明的，工作要求很高，但配合牧職目標，這些幫手都獲得了紮實的神修。這個組織持續運作直到法國爆發大革命為止（1789 年）。

全力以赴

每次舉辦運動過後，茂諾神父總要到奎姆普學校去靜養，同時充電。他從 1641 年完成奎桑島與塞恩島的傳教工作後開始這麼做以來，畢生 43 年的使徒工作，他都繼續保持這個習慣。他向來喜愛安靜的定期退省與團體生活，藉此重獲神力。年度退省

結束後，他會在市區與市區周圍一帶從事傳教工作。他常去醫院探視患者，鼓舞人心，聽患者告解，為臨終者準備終傳聖事。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後，他才又回復走訪布列塔尼各市鎮與村莊的緊湊傳教活動。

布列塔尼的傳教工作自始就順利，一路拓展。次年，1642年，他在奎姆普、聖波狄隆（St-Pol-de-Léon），聖布里耶（St-Brieuc）以及杜爾（Dol）等幾個教區共 13 個城鎮拓展傳教。通常他都是步行傳教，這樣做雖然比較辛苦，但比較像是在傳福音，而且跟人也比較親近，分享際遇，走過泥地，忍受風霜雪雨，如此他有機會跟每一個人交談。

1640 到 1683 年間，他在布列塔尼七個教區總共布道 400 次；包括前面提到的布列塔尼語的四個教區，以及在杜爾、雷恩斯與瓦尼斯（Vannes）三個法語區，平均每年布道十次，每一次持續四、五週。大批人潮湧進，一開始來聽道的羣眾約 30,000 人，等到建立神職組織後，人數增加到三倍；1664 與 1665 年，望教友人數高達 100,000 人。

他同時兼採傳統與創新手法。正如他的前輩導師米歇爾，他也善用描繪天主教教義與道德的象徵性場景；無論大人小孩都可以參與的場面；他還為許多歌曲填上歌詞，首次出版是在 1641 年，後來還重印了許多次；此外他還常利用遊行，推出象徵性的代表人物，讓大家都可積極參與。

萬一布道的效應流於膚淺，他會開始為那些無法到瓦尼斯剛剛啟用的避靜之家參加「閉關式」退省的人們，舉辦「開放式的退省活動」。這些避靜之家起初只是試辦，結果大獲成功，後來即定期舉辦。

忠良的僕人

他展現的吸引力，追根究底其祕密在於他有一顆完全獻給天主的良善之心。每次有某個主教反對他的計畫，結果都因看到他溫良的接受這樣的結果而改變初衷，由此證明他的溫良。他是如假包換的好神父。

過了 70 歲以後，他開始感覺到歲月催人老；人生旅途可能隨時終止。他在 1682 年接到第一次警訊，當時他正在克洛榮（Crozon）作四旬期講道，第二次警訊出現在布爾卜里亞克（Bourbriac），他從講壇走下來時昏倒了。這位年邁的傳教士預感自己死期不遠，但是心裡明白要等到他回到康諾艾利斯（他以此稱呼奎姆普）才會撒手人寰。因此他告訴同伴馬丁神父：

「讓我們盡速返回康諾艾利斯吧！我們必須到那裡去，上主已警告我了。」

他們差不多抵達奎姆普教區的普雷文（Plévin）時，茂諾感到筋疲力盡，不得不立刻上床。他的體溫升得很高，他覺得一邊腰側劇痛。消息不逕而走，傳遍整個下布列塔尼，卡海克斯（Carhaix）省長與奎姆普主教都前來探問病情；一向熱心慷慨贊助的帕拉提拉斯夫人，帶來了城裡醫術最高明的醫生。人們開始聚攏了來，他們都希望展現他們對「好神父」的敬仰與感激。其情其景簡直就像是朝聖。

高燒愈來愈嚴重，茂諾辦了告解，接受臨終聖體。他大聲的作了以下的祈禱：

「耶穌是我的生命，對我而言，死亡乃是勝利。耶穌，我的救贖，我鍾愛切盼的對象。瑪利亞，聖寵之母，慈憫之母，請保佑我免於仇敵侵凌，請在我臨終時接納我。」

他尚未接受終傅，因為他要等到臨終的一刻到來才自己提出要求。臨終時刻來臨時，他提出了要求，請大家大聲祈禱，以便他能夠跟隨誦唸。他的祈禱非常動人，令有些人感動得掉淚。

他直到最後一口氣都神志清楚，其中有一陣子還請人端張椅子給他的恩師米歇爾。大夥兒以為他神志失常，沒有理會他的要求。他堅持說道：

「請搬張椅子給米歇爾。」

跟他一起傳教的同伴請他祝福，他祝福了他們。然後大家為這位臨終者誦唸祈禱文，到了晚上 8 點鐘左右，他斷了氣，與世長辭，這一天是 1683 年 1 月 28 日。

2. 完美的朋友： 葛樂德·高隆汴

(Claude La Colombière, 1641-1682)

若望·雷濟思與儒廉·茂諾屬於普羅大眾，他們走遍各村莊，與一般老百姓打成一片；葛樂德·高隆汴則屬於法國貴族，他的傳教事業以個人為對象，他針對特定的聽眾宣講。我們將看到一位截然不同的人物，他的聖召也與眾不同。

家族史

高隆汴的傳記必須從他的家庭背景談起，特別是從他的先祖談起。

如今這個家族的房屋已經不在了。他的祖先屬於來自伯根第 (Burgundy) 的一個貴族家庭，這個貴族家庭在他們的姓氏高德 (Gaude) 前面加上他們的源出地名「高隆汴」。「高隆汴」(原意為鴿子籠) 是他們在查隆 (Chalon) 附近據點的名字。1632 年左右，這個家庭在瓦倫斯安頓下來，捨棄了他們的父系姓氏 (即高德)，而只保留他們的源出地名字 (高隆汴) 作為姓氏。

年輕一個支脈的成員在聖辛佛里恩 (Saint-Symphorien) 找到庇護所；1562 年一羣基督教胡格諾派新教徒經過該地，洗劫教堂，將管風琴熔化製成子彈，還將九個神父身上穿的長袍與鞋子給剝走。為首的教徒名叫龐提耶 (Pontier)，下令交出所有宗教物品與衣服。他語帶威脅的警告：「否則的話，我會讓整個城鎮成為廢墟。」

許多貴族遵命照辦，其中葛樂德的曾祖父貝諾伊·高隆汴

(Benoît La Colombière)，當時聖辛佛里恩的城堡主人，交出一些衣服、一個銀質十字架和一個祭壇華蓋。龐提耶從他手中一把搶走了銀質十字架，對著窗台石頭猛敲，直到它粉碎為止。貝諾伊恭敬的彎下腰來，撿拾碎片。

「把它們帶走，」龐提耶揶揄，「但不准你再在你們的愚蠢儀式中使用它。」

貝諾伊將這些寶貴的碎片貼緊胸膛抱著。

這件事在家族中代代相傳，塑造了葛樂德的宗教良心。那些野蠻人的褻瀆聖物行為與他曾祖父的虔敬態度，預示了後來他接受派任到巴萊毛尼 (Paray-le-Monial) 的啟示，更具體的說，為耶穌要求的補償作了準備。

1633 年底，貝諾伊的孫子伯特朗·高隆汴 (Bertrand La Colombière) 迎娶了瑪格麗特·康達 (Marguerite Coindat)，生了七個子女；葛樂德排行第三，於 1641 年 2 月 2 日出世。

1650 年春天，這對夫妻遷居老城維恩 (Vienne)，城裡有羅馬文明遺緒，有主教座堂，還有耶穌會學校。然而葛樂德並未去上學，反而前往里昂的耶穌會學校就讀。起先在佛維耶里 (Fourvière) 山腳下的「仁慈聖母」(Notre Dame de Bon Secours) 學院就讀，1653 年 10 月以後則進入「天主聖三」(La Trinité) 學院就學五年，學習人文與哲學。到了 1658 年秋天，17 歲的他決定工入耶穌會，令家人感到痛苦。他向來敏於結識友人，天生熱愛詩詞歌賦，事後他坦承，對於他決心擁抱的生活方式，曾經感到「十分反感」。

準備階段

1658 年 10 月中旬，他登上一艘江輪前往亞味儂 (Avignon)，

同月 25 日，他敲叩初學院的大門。他的初學導師是若望·帕朋（Jean Papon）神父，早期在里昂就是他的校長，這位神父在初學結束呈給總會長的報告中只用兩個字形容他：溫和。

從初學院起，他沒離開亞味儂，直接攻讀完哲學，一年後他的教授們給他評語是：哲學成績優異。

接下來五年是「試教」期，從低班級開始，跟著他的學生一路唸到拉丁文學。他的才華出眾，因此在 1665 年 10 月，開學時由他代表致詞。同樣的，他的安靜與溫和談吐也已經顯明。

1666 年，按照總會長歐里瓦神父（Fr Oliva）的意思，高隆汙沒有到他該去的里昂唸神學，他改赴巴黎進入名校克勒蒙（Clermont）學院，在這裡的四年求學，對他形成決定性的影響。學校的教職員出色沒有話講，講學談到自由意志、好色、聖寵、命定、聖體，他們也沒有錯過楊森派（Jansenists）的觀點。（譯者按：十七世紀楊森所倡異端，認為人的意志沒有內在的自由，不過受自身貪慾或基督恩寵兩種力量所左右。）這些教導為這位日後傳揚耶穌聖心的使徒厚積了資產。面對楊森派教義對上主的愛設限，並且暗示耶穌實際上並非為全體人類奉獻至死，耶穌會神學家之間湧現一股強烈的樂觀清流，強調天主教教義比較鼓舞人心的一面，作為因應。高隆汙懷著熱情關注這個劃時代的爭議問題。因此日後有人就巴萊毛尼的神視問題請教於他時，他才能毫不困難的察覺到，儘管表面上看來異乎尋常，卻與基督宗教的基本教義沒有衝突，相反的，這還是最和諧的高峰經驗。

此外，他呼吸到巴黎的空氣，目睹由白呂耳（Bérulle），康瑞（Condren），布爾德士（Bourdoise），哦利耶（Olier），文生·德保（Vincent de Paul）等人創立的天主教復興運動，更見證了羅亞爾港（Port Royal）兩大族羣逐漸形成對立的戲碼上演：其

中一方是有德之士羣集狂熱反抗另一方主教、國王與教宗的勢力；「純潔如天使，傲慢如惡魔。」

高隆汴還趕上耶穌會的另一項創舉。原來耶穌會開放一萬五千名男童進入克勒蒙學院，也就是他曾研習神學的學校；其中400名是寄宿生，由30多位耶穌會神學家負責照顧。高隆汴負責照顧法王路易十四權大勢大的閣員柯柏特（Colbert）的兩個兒子。使他有機會受邀參加這位閣員的沙龍晚會，會晤當代許多名流，這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因此接觸到像是歐利維耶·巴楚（Olivier Patru）這樣「語驚四座」的人物，此人日後與葛樂德有長期書信往來。這位年輕的耶穌會士感受到這些關係的吸引力，但是他不容自己陷入像另一個耶穌會士那樣常周旋在同一批人之間，據說「一半的時間忙世俗的事情，另一半時間用來服侍天主」的境地。

他在1669年4月6日晉鐸，接下來在里昂他以前就讀的學校「天主聖三」學院當修辭學教授四年（1670-1674）之後，下一個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訓練階段是在里昂市南邊風景優美的德內島（Iled'Ainay）接受「第三年培育」（1674年9月到1675年2月）。

根據保留至今的日記，我們得以一窺當時他的內心世界，清楚看到他為克服虛榮與愛朋友這兩點所作的努力。他擔心人們對他的想法；他看到自己備受尊重與愛戴，儘管他與人保持距離，並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他仍覺得自己應該有所回應。如果順其自然下去，上主賜與他而且他誓言用來為主工作的一切天賦，勢將浪擲了。認清自己的虛榮心，他決心避免任何外炫的舉動，尋求隱匿的生活。察覺到自己的缺點，促使他全心委順信賴天主，以及採取後來使他揚名的捨棄行為。為違規感到不安的他，發誓將遵守會規。

日期載明為 1674 年 11 月 20 日的一封信致省會長蔡茲 (de la Chaize) 神父的信中，總會長批准葛樂德這項莊嚴的宣示。他在 1675 年 2 月 2 日鄭重宣示，此時的他即將接受派任，他清楚覺得將會面臨不少痛苦。事實上他曾寫道：「要離開一個熟悉與被愛的地方，感覺簡直就像死去一樣。」

他接受的這次派任，讓許多人不解，因為憑他的才幹，他的成功，他應該獲派到一個大都市去才是，相反的他卻被派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叫巴萊毛尼。到底蔡茲神父心裡在想什麼？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蔡茲神父自有盤算。原來當時發生了一件特別重大的事情，亟需一位行事謹慎而且膽識過人者去擔任導師，因此省會長任命一位他十分了解的人。同時上主的話顯示出這個奉派者所必須具有的導師特性：「我將派遣我忠信的僕人，完美無缺的朋友，到你這裡來。」

巴萊毛尼

高隆汴在 1675 年 2 月底首次到聖母往見女隱修院 (Visitation Convent)，院長紹麥絲 (de Saumaise) 姆姆向全體修女介紹他是非凡的聽告解神父。他說了些客套的話，傾聽他講話的修女瑪加利大 (Margarita Maria Alacoque) 聽到內心有聲音說：

「我派遣到你這兒來的就是這個人。」

他在四季齋期的 3 月 6 日、8 日、9 日首次聽告解，從城裡流傳的謠言，高隆汴知道，在隱修院裡有一位修女讓她的長上感到興奮。據說她有神視的能力，而且別人的祈禱型式已無法滿足她。她被視為愚蠢、虛偽，甚至有人說她著了邪魔。隱修院院長紹麥絲已讓她見過好幾位神職人員。有一位說，讓她喝一大碗溫熱的肉湯就能解決問題。其他人顯然比較謹慎與理性，不知道要

怎麼想，因此未下判斷。

不久，高隆汴在微亮的告解亭認出了她。「從未晤面的這位神父跟我講話，好像他早已了解在我內發生的事情。」瑪加利大後來的紀錄顯示，這次晤談維持了一個半鐘頭，但是告解者這一次還不想「對神父坦露心聲，唯恐讓外面等著辦告解的修女不方便」。

過了幾天，葛樂德返回，那時已是三月中旬。在此時，紹麥絲姆姆已告訴瑪加利大要對神父傾吐。這一次，她克服了心裡的矛盾，告訴神父她內心經歷的一切。神父鼓勵她放心讓聖神引導，以尊敬謙虛的態度接受她所受到的恩寵與這種溝通。

神父與修女溝通的次數愈來愈增加。有一天當高隆汴正在隱修院內主持彌撒時，瑪加利大看到了耶穌聖心像個火爐似地燃著熊熊火苗，另外有兩顆心朝向耶穌聖心飛射而去。此時她聽到上主這樣說：

「我純潔無瑕的愛就這樣永遠地結合這三顆心。」

耶穌要她向高隆汴神父透露祂珍貴的聖心，由他設法傳揚敬禮耶穌聖心。

「只要告訴他，不必擔心。」耶穌鼓勵瑪加利大修女。

天大的啟示

在下一次的訪談中，瑪加利大首次告訴神父有關她看到耶穌聖心的神視。此前她一直守口如瓶，甚至連她的長上都沒有透露。人稱「耶穌聖心的天大啟示」的這一天就要來臨了。高隆汴神父要瑪加利大修女寫下發生在她身上的事。葛樂德自己註記如下這段文字：

「請看這顆心，多麼深愛世人，無限付出，甚至耗竭到底，

證明對世人的愛情。而大多數人對我的回報卻只有忘恩負義……這就是我要求在基督聖體節八日慶期過後第一個星期五，舉行賠補耶穌聖心敬禮，特別奉獻紀念我聖心的原因……去向我的僕人 N 求助，告訴他竭盡其力去推動建立敬禮耶穌聖心的活動。」

高隆汴根據神學研究，看得出奉獻耶穌聖心的敬禮，十分符合基督宗教教義。雖然如此，他卻不無疑問。耶穌託付他的使命，至少面臨前所未遇的兩個新問題：敬禮的目標（耶穌聖心是肉做的），以及申請公開慶祝。超越私下敬禮的範圍，這一點讓他猶疑不前。由於加利剛主義與楊森主義（Jansenism）猖獗，法國的主教與羅馬當局並不輕易答應所請。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正確。

他停留在巴萊毛尼一年七個月之久，直到 1676 年 9 月底為止。他再度受命接下困難的工作——向倫敦的約克公爵夫人傳道。在巴黎接受數日的指示後，他在同年 10 月 5 日啟程前往英格蘭，13 日安抵聖詹姆士宮（St. James Palace）。

倫敦

這項任命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其過程不乏煽動的因素。約克公爵，也是查理二世的繼承人詹姆士（James）娶了莫迪納（Modena）公爵阿豐索（Alfonso）的女兒瑪麗·畢翠絲·戴斯特（Mary Beatrice d'Este）。這項婚姻的協議條件之一是，公爵夫人必須「有權擁有屬於自己的教堂」，同時必須請一位法國神父來講道。第一位主事的神父是聖日爾曼（Saint-Germain），但是他陷入一位法國叛教者安排的陷阱中，後者指控他千方百計設法要調回羅馬教會，聖日爾曼根本未等開審就回法國去了。接下他這項遺缺的神父，必不能引起懷疑；這個人要有本事在驕奢淫逸而且腐敗的王宮裡過苦行僧的生活，他身處講究陰謀的社會，必須

懂得如何去避禍，同時還得展現自身超脫於每一種陰謀之外；他面臨即將來臨的迫害危險，內心必須保持堅強鎮定。蔡茲院長再度選定高隆汴神父去擔當這個重任，即使這位神父年僅 33 歲。

從抵達倫敦的這一天起，他就住在聖詹姆士宮內為他保留的公寓。從東邊的上窗，他可以俯視泰晤士河上熙來攘往的輕快多桅小帆船。從他的房間可以看到王宮前面的廣場，但是他從未走近窗戶，從來不把視線朝向下，也不曾去參加任何的展覽會。他只去探望患者，以及需要幫助的人們。

他首次講道是在萬聖節。早在幾天前，外國使節已接獲通知，英格蘭國王的子民不准前往他們的使館教堂去望彌撒或者聽講道理。戒備森嚴得很，為公爵夫人講道的神父不得留神。他寫道：「自我到此地以來，所有教堂門口都有人站崗，連女王的教堂亦然，這是為了抓可能衝出來的任何英國人。」在約克公爵夫人的教堂，這項禁令並未嚴格執行，大批英國人聚集此地，在某些日子，甚至來了一些新教徒。然而他的聽眾大多屬於王宮貴族，特別是法國人與義大利人，這些上流社會人士通常舉止輕浮。教堂總共可容納 150 人，雖然不大，卻是倫敦天主教運動的主要中心；神父慷慨地傾心宣講，直到身心受傷。

宮廷陷阱

在他短暫駐留倫敦期間，他是瑪麗·畢翠絲公主的聽告解神父兼神師。瑪麗·畢翠絲是一位非凡的女人，聰敏活潑，美麗而且虔誠。她因為教宗的緣故，出於責任感而勉強同意與王位繼承人結婚。然而她同意與詹姆士結婚，卻也等於同意接受英格蘭女王的角色以及伴隨而來的一切後果。她本來在莫迪納的聖母往見隱修院準備入會當修女，這個決定使她離開了隱修院。當她道別

時，她答應將繼續做聖母往見隱修院的好女兒。她最喜愛的奉獻之一就是獻給耶穌聖心。她住在「貼近耶穌聖心的至聖密室」，她是第一位向教宗申請建立耶穌希望推廣的敬禮耶穌聖心活動的王室成員。

高隆汴在倫敦停留的時間也不長，當地的宗教迫害氣氛使他難逃像他前兩任神職人員一樣的命運。

根據大衛·休姆（David Hume）的記載，「最惡名昭彰的」泰特斯·歐特斯（Titus Oates），假裝皈依天主教，其實他的目的是要深入那些他想要背叛的人的生活之中。他曾在西班牙的巴利阿多里德英語學院就學，被退學以後，進入聖歐默學院接受第二次考驗，不過耶穌會拒絕他入會。他的目的只有一個：蒐集所有可能不利天主教，特別是不利耶穌會士的情報。1678年，他杜撰了天主教的密謀，指稱耶穌會士陰謀殺害查理二世國王。這是非常明顯的騙局，每一個理性的人，包括國王在內，聽了都一笑置之；不過羣眾普遍恐懼，信以為真。因此引發了迫害行動，單單這一年就有十一名耶穌會士在十月間遭到处決。

葛樂德·高隆汴神父連間接涉入歐特斯瘋狂的誣陷都沒有，可是他也不得不付出代價。同年11月13日晚上，輪到他被捕。「我是在午夜過後兩個鐘頭，在自己房間內被捕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指控他的人是一位來自道菲尼（Dauphiny），名叫費奎（Fiquet）的鄉下人。原來這個人假裝皈依天主教，葛樂德以為這個人已經皈依天主教，資助了他約三個月。但由於他起疑，同時也缺錢，就不再對這個人提供補助。為此費奎展開報復行動。

高隆汴起先被關在自己房間裡兩天，到了11月16日週末早晨，溫徹斯特貴族大人聽說此事，他未傳喚任何證人，就下令將

高隆汴神父移送到國王的班契（Bench）監獄。兩天後，神父被傳喚接受審訊，只見上議院 12 個或者 15 個議員在座，由他與原告進行對質。上議員禮貌相待，清楚顯示他們並不相信他有罪。然而為了不引起反彈，他們只得以犯人身分對待神父。「事情過後，」高隆汴接著說，「他們領我回到監獄，我受到非常嚴密的保衛達三週之久。」

英格蘭的公平法律救了他一命。根據英國法令，單單只有一位證人不算數，因此到了 11 月 23 日，上議院判決，經查並無犯罪事實，不必處以懲罰，更談不上叛國罪。因此上議員決定減輕處罰，改判放逐。

問題來了，這位犯人有嚴重的出血，不適旅行。12 月 6 日舉行的全院會議，國王與他的 24 位陪審推事發布了一道新的命令：「鑑於犯人身體虛弱，有出血與吐血現象，硬要上路可能造成他有生命危險，又因他目前病體未癒，為了體力的恢復，休息幾天絕對有其必要。如果能讓他呼吸清新的空氣，而不要回到監獄，可能使他恢復體力。」據此，葛樂德有了十天的修養期。十天過後，十二月中旬，這位約克公爵夫人的證道神父，啟程揮別霧都倫敦，離開紛紛擾擾的英國。

遭逢挫折

他已在兩方面遭到挫敗：健康與名譽。冗長的官方訓令充分有力的說明了前者。呼吸清新空氣而不要讓他再回到監獄的說詞，其實正反映出那些骯髒的地牢不人道的環境實況；清楚明白提到他身體虛弱與感染肺炎，充分顯示他的病情不輕。然而讓他的自尊更感到痛苦的是，他直到打道回府都揮之不去的挫敗感。他是否已因他自以為是的魯莽而毀了大好前程？有關英格蘭的宗

教與政治事務，他是否應該採取另一種態度？法王路易十四一定對英國的天主教徒感到不悅。是否這一點點的不悅構成了他的污點？

這些都是令他感到痛苦與羞辱的問題。他覺得受到挫折，覺得他的餘生被迫不得再有任何活動。然而難道這不就是他所企求的「不足為外人道的」神聖嗎？

他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健康。到了 1679 年 1 月底，他踏上返回里昂的旅程。那一年冬天出奇的寒冷，冷到塞納河水結冰。天寒地凍使得我們這個病人無法利用比較舒服的駁船行舟旅行方式。他一路堅忍一切的不適感，他在巴萊毛尼停留了十天，發現了一些新鮮事：原來聖母往見隱修院新上任的院長似乎很喜歡折磨瑪加利大，此外醫院方面迫切的需要資金。高隆汴神父仔細傾聽所有人的心聲，療傷解惑之餘，還積極促請全城的名流為醫院募集資金。十天忙完之後，他離開巴萊毛尼，3 月 11 日抵達里昂。

23 日當天他寫下以下文字：「我發覺自己的健康情況比離開英國以來更為糟糕。我已少量咳血了，我的健康又回到從前的情況。我相信少量的放血助我免於再發作，過去兩天來我似乎有點好轉。」既然里昂的薄霧顯然對他的健康不利，他接受了哥哥的建議，到聖辛佛里恩去接觸家鄉的空氣，直到天氣轉好。「你看，我跟親戚在一塊兒。對我來說，這是讓我感到羞愧的原因。」

最後的獻祭

1679 年的基督聖體節是在 6 月 1 日，當慶節日子近了，他無法忘記他慶幸領受這麼多恩寵的基督聖體節八日慶期。他還記得委付於他的任務，要去傳揚敬禮耶穌聖心。這段時期有好幾封信見證此事。我們也知道這段時期他的健康有了起色；他寫道：

「我覺得從來沒有這麼好過；至少自我返回法國以來是如此。」

恢復健康的高隆汴被認為可以到他在里昂讀書的「天主聖三」學院去做一些輕便的工作，他受命照顧十五、六個剛完成初學的年輕學子，這些學生即將展開兩年的哲學研修。其中一位傑出的學子名叫若瑟·賈利費特（Joseph de Gallifet），後來當上里昂省會長兼法國副總會長，此人溫和堅韌，神學知識豐富，日後就靠他克服許多阻撓敬禮耶穌聖心的絆腳石。半個世紀以後，賈利費特緬懷先師高隆汴，感激之情溢於言表：「1680年我完成初學，很幸運的接受葛樂德·高隆汴神父的靈修指導。從他身上我領教到敬禮耶穌聖心的第一課。從此，我開始敬重耶穌聖心，而且喜歡這麼做。」

葛樂德的健康狀況惡化了，他發現自己竟連讀信都有困難，遑論回信。他被迫坦承，「彌撒是我唯一的神操，連這件事我都做不好。」1680年10月的記錄顯示：「他們以為我過不了這個秋天。」復活節過後的一次舊疾復發，不只一次差點害他死掉；咳血現象持續了三天。

羅納河與塞納河之間的氣候，顯然不適宜肺癆患者的健康。再者，長上們都知道一名吐血的患者可能將細菌傳染給年輕的告解者。巴萊毛尼的小學校既沒住宿生也沒有耶穌會的學者，危險性比較低；此外大家都知道高隆汴備受愛戴，人們張開雙手歡迎他都來不及。1681年8月，他出發前往發揚敬禮耶穌聖心的城市。

當他抵達時，身子十分虛弱，無法照顧自己，必須靠別人幫他穿衣脫衣。到了9月與10月，他的健康情況略有好轉，他還可以起來走幾步路，不過陰雨綿綿帶來的濕氣，使他的健康又倒退回到從前的狀態。在聖方濟·薩威的八日慶節期間，他還能走上祭壇主祭，但是過不了多久，他就只能每天領聖體了。從1682

年年初起，他就很難開口言語。患者本人不存幻覺，他確信自己的病好不了，會死在巴萊毛尼。比勒醫生建議將他移到高緯度的地方，那裡「空氣流通而且清新」。耶穌會省會長一聽說葛樂德的弟弟，時任維恩天主教教堂總執事的佛羅里斯·高隆汴，已驅著一輛坐起來舒適的馬車趕往巴萊毛尼，立刻批准所請。

葛樂德在 2 月 9 日出發，但是只來到瑟瓦斯（Survau）丘陵，身子就受不了，無法繼續前進，只好再返回學校去。他高燒不退，到了 2 月 15 日，四旬期第一個主日，傍晚七點鐘，他大量吐血與世長辭。

3. 師徒二人： 雅風·羅德里格／伯鐸·克拉威

(Alonso Rodríguez, 1531-1617) / (Peter Claver, 1580-1654)

雅風·羅德里格的一生行誼與著作，使他成了一位偉大的神修導師，不過他是歷經畢生痛苦的失敗，才獲致這個地位的。他經商失敗，喪偶喪子，孤子一身；或許有人會說，人生遭遇如此，他當然只有轉向宗教走修道之路。然而，他的修行成就非凡值得一記。

布商、鰥夫、耶穌會士

雅風的父親狄亞哥·羅德里格 (Diego Rodríguez) 是西班牙塞哥維亞 (Segovia) 的一位織布工，他的織工技術高明，為人誠信可靠。他娶馬利亞·葛梅茲·狄艾瓦拉朵 (María Gómez de Alvarado) 為妻。他們一共生了十一個孩子。只要美麗諾羊毛繼續稱霸市場，他們的生意就會一直興隆下去。不料廉價的外國羊毛開始打進市場，當地的美麗諾羊毛競爭不過，危機開始出現。1545 年底或者次年年初，一家之主狄亞哥先生垂死之際，他的兩個大孩子小狄亞哥與雅風正在亞卡拉 (Alcalá) 上小學，當年雅風才 13 歲。母親不得不要求雅風輟學，幫助家計同時照顧弟妹，讓他的哥哥一個人繼續升學。

這樣做並沒有使他們位於塞哥維亞阿索奎佐 (Azguevo) 小廣場上的布店生意好轉，事實上生意更冷清。當時規定不准出口羊毛到歐洲，原料也不准進口，特別是原產地為歐洲北部的原料；此外，法蘭德斯的布匹開始流行；更要命的是，雅風沒有管理的

才幹。他不是個行動派的人，他有滿腦子的想像力，非常容易流於情緒化，事情在他手上總是搞不定。這些都是經商大忌。

馬利亞採取的補救辦法是讓他討個富家女為妻。時年 27 歲的雅風，不敢違抗母命，溫馴的順從，迎娶馬利亞·蘇亞瑞茲（*María Suarez*），這對新婚夫婦很快就生了一女二男。

家庭財務拮据更甚從前，雅風的哥哥狄亞哥是個研習法律的學生，他想要幫忙，但是沒有成功。其他的挫敗接踵而來：他的一個兒子夭亡了，接著他的女兒、他的妻子都離開人世。

雅風尋求宗教慰藉，他經常祈禱，有數次充滿安慰心靈的體驗，不過這卻使他愈來愈脫離現實，他並不正視事業失敗的殘酷現實。有一天他決心收攤，放棄貿易，回到家庭的懷抱，跟他的母親與兄弟在一起。他還有一個寶貝小兒子，但是後來這個孩子也活不長，接著他的母親回歸天鄉，至此他在這個世上已了無牽掛。

正在此時，他有了如夢似幻的神視經驗，其中的訊息是告訴他應該去加入耶穌會。雅風知道耶穌會，他的雙親曾經慷慨的招待過最早到塞哥維亞來的幾位耶穌會士，其中之一可能是神師法伯爾（*Peter Faber*）。

他申請加入耶穌會，但主審人員認為他已 38 歲了，不適合選讀當神父必修的課業，而且他的健康欠佳，也使他無法勝任耶穌會修士的工作。雅風確知這一切，而且自認不配成為耶穌會的一員。

不過他棄俗的心意已決，他決心跟他在瓦倫西亞（*Valencia*）的神師桑坦德神父（*Fr Santander*）商量。他在 1568-1569 年間冬季前往瓦倫西亞，桑坦德神父給他的意見是，他應該先修讀晉升神父所必修的課業，一旦晉鐸，他即可輕易加入耶穌會了。雅風

開始埋首用功。然而不久之後，桑坦德認為最好還是讓雅風當個在俗的修士；他願幫雅風申請入會。他於是親自去向負責審定申請加入耶穌會者的省會長安東尼奧·柯迪西斯（Antonio Cordeses）關說，結果事情辦成了，上主在這個人身上工作。雖然多位諮商意見不同，柯迪西斯卻駁倒他們：「各位神父，我已跟雅風談過話了，我真的應該接納他，因為我確定他將對耶穌會大有貢獻，他的榜樣與美德將為耶穌會增光。」

真是洞燭機先的一席話。1571年1月31日，雅風被推舉為列聖品的候選人。

接受考驗

他在瓦倫西亞的聖保祿學院開始初學，但是過了半年，他被派到馬約卡（Majorca）的帕耳瑪（Palma）一個名叫蒙提席翁（Montesión）的學校去，學校緊鄰一座正在興建的敬獻聖母堂。他在8月10日抵達，被派去做些家務。

他小心翼翼到了瞎操心的地步，旁人對此的解釋是他不適任。他擔心被解雇，認為這會是「他此生最大的憂慮」。他再次躲回祈禱的安全庇護所，天主安慰了他的心靈；他聽到一個聲音說：放心，上主會伸援的。他於是定下心來。

然而事情沒那麼單純。他本來就要在1573年2月1日發誓願的，可是他的事情被提出來討論時，有些審定者表示保留的意見。事實上他直到當年的4月5日才發誓願。

直到此時，「上主一直把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帶領他」，賜給他許多大安慰的恩寵；然而此後他就進入受考驗期，「直到他抵達上主的聖山，而要到達這個目標一定得經過狂風巨浪的諸多試煉與考驗」。

他首先遇到的風暴是強烈而且持久的反貞潔誘惑。他愈努力反抗揮之不去的不潔想像，這些意象愈是清晰鮮明。難道他的修道聖召是錯的嗎？他靈魂的至愛天主何在？精疲力盡的他沈沈入睡；突然他被頭上方一聲巨響給驚醒了，只見一道強光顯示一直在折磨他的無來由的良心不安。

他一跪下做早晨的默想，立刻被不舒服擊倒，身體不支四腳朝天倒在地上，幾乎死去。但是他不曾放棄祈禱，晨禱完畢，他會起身，迅速準備去做他份內的工作。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八到十年之久。

雅風從日常經驗中領教到，遇到磨難，與上主緊密結合，依靠天主的聖寵，是最寶貴的，因為這是歷經千錘百鍊，屢試不爽。

蒙提席翁的守門人

到了 1580 年，他被指派去當守門人，為的是使他忙碌，讓他不至於一心專注於自己心靈困擾的問題。他當守門人長達 37 年之久，從來不曾不耐煩口發怨言，或者表現出厭煩的動作，即使他受到嚴厲的挑釁亦復如此。他以溫和的微笑化解每一次的憤怒、火爆脾氣，他總是靜靜地傾聽到底。為了試探他的耐性，街坊男童常會惡作劇，前來拉鈴，然後跑開躲遠，從藏身處偷瞧他的反應。他總是不生氣，笑一笑，心甘情願地等著下一個上門者。

當時有一位受到鎮民敬重的聽告解神父生病了，暫時無法離開他的房間。跟這位神父辦告解的一位地方顯要，也是捐錢給學院的人，獲准到這位神父房裡探視，雅風接獲命令，只要這位要人前來，此人可以進到神父的病房。這位紳士獨自一人前來，一切相安無事。可是有一天這個人卻帶了一位也很想探視神父的朋友一起來，一向恪盡職守的雅風非常有禮的請求來訪者稍候，他

進去請示院長該怎麼做。院長告訴他不能兩個人一起進病房，如果是常獨自前來探親神父的那位先生想要進神父的病房，他必須一個人前往。雅風盡量委婉地轉達了上級的命令。經常來探病的那人惱羞成怒，不肯進去，返身就走。生病的神父按照習慣一直等著他的教友前來辦告解，等不到人而詢問雅風時，聽說如此這般，這位神父以為是雅風自作主張，於是將雅風痛罵了一頓。這位可憐的守門人，只溫馴的聽訓，一句辯白也沒有。

別樹一格的行事作風

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風格。「每當門鈴響起，他就舉心向天主，在內心向天主說：『主，為了愛你的緣故，我必須去開這扇通向你的大門。』然後他就去把大門打開，去開門的一路上，他會表現出喜悅的行為，彷彿他就要去開通向天主的大門，他一面走會一面說：『來了，來了，我主。』要是有人猛按門鈴或者急得要命的按鈴，他儘管覺得有些惱火，也會按捺住火氣，鎮定下來，平心靜氣的走到門邊溫和地開門。如果他必須找人，儘管他得到處搜尋，等他終於找到了人，他也會像是正好找到似的，二話不說，直接傳達訊息了事。」他自己也說：「你若奉命去傳訊息，就把這當成是為主傳話，不是人家派你去帶口訊；由於是上主的事情，你就會滿懷喜悅與感情地去為至善天主工作。等你帶著回音回來，就想你是回到你的天主身邊，盡量帶著喜悅與愛意，將你的靈魂雙目釘住天主，彷彿你是在跟祂說話，而不是跟人講話，如此這般你必能傳達你帶回來的音訊。又如果有人想出門去，你必須想你是去開通向天主的大門，是天主要出去，不是人要出去。懷著這樣的感覺，同時以完全謙下與慈愛的態度，將大門打開，讓他離去。」

以雅風的性情，他不算是個敏於行動的人，不過他這種忠信到底的精神，卻使他成了一個完美無缺的守門人，他一心專注於每一個細節，從不感到厭倦，始終謙恭有禮。

他的親和個性使他與來者輕易建立交情，立刻展開屬靈的交談。因此他開始針對天主教的善會成員開設正式的神修討論會，許多「重量級的紳士」都受到吸引，來到他的小辦公室做靈修談話。不過他並不忽略自己的職責，他仍得常去開關大門，以致有些人要求修院院長備妥鑰匙，這樣雅風就可以輕鬆地跟他們談話了。他專注於三個話題：玫瑰經、告解以及勤領聖體。此外他還特別關注帕耳瑪當地的窮人、遊民以及遭逢船難者；他喜愛跟他們談天主的事，邀請他們愛天主、為天主服務。

非凡的經歷

雅風的一生出現一連串非凡的超自然經驗，令人不解。

早在他想要加入耶穌會的時候，他就曾經體驗到我們難以評估的事情。他的一個朋友想勸阻他不要入會——這個朋友要不是扮演魔鬼的工具，就是魔鬼的化身。然而這件事是否真的發生，抑或只是他豐富想像力的結果，不得而知。有些人懷疑是他想像出來的。無論如何，魔鬼的伎倆並沒有得逞。

差不多同時他還有另外一個經驗。雅風曾經看到童貞聖母瑪利亞手心捧著他的靈魂，他的護守天使在一側，聖方濟在另一側出現。他無法說明到底他的靈魂有沒有離開他的肉體，「因為他極速而且徹底地陷入神魂超拔的狀態，以致他後來在街上行走，仍無法恢復理智。」

像這樣異乎尋常的超自然體驗，在帕耳瑪一再發生。當他受到極猛烈的肉慾誘惑時，是天主像個母親來安慰他；天主擁抱著

他，將他抱在自己的胸懷裡。有一天，他陪伴必須趕到貝爾維古堡去聽住在那裡的一位行動不便女士胡艾娜·狄巴斯（Dona Juana de Pax）告解的波拉薩神父（Fr Borrásá）一起同行。這一段路很長而且要爬陡坡，這一天氣溫很高，雅風發現自己沒辦法跟上波拉薩神父。到了最陡峻的地方，他不得不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就在這個時候，聖母顯現了，她拿了一塊手帕，幫雅風擦乾臉上的汗水。雅風對此一殊榮大感糊塗，不過他因為所獲得的安慰而滿懷喜樂，他的雙腿有了力量，於是他在後來的登山行進中，完全不再感到疲累。波拉薩神父在聽胡艾娜女士告解的時候，雅風則待在附近的房間裡，全神貫注回味聖母對他的仁慈。傳說聖母要把汗水濕透了的汗巾給雅風，但是雅風不敢接受，「因為沒有得到長上的許可」。

他與上主直接溝通的名氣，有一次為他帶來很大的苦惱。1608年10月，有一艘從帕勒莫（Palermo）出發，準備駛往阿利康特（Alicante）的維利納號（Velina）船隻，正好在該市港口停泊。船上載有西西里總督之子與他龐大隨行行李以及一大批負責看守的火槍手。學院院長心想這是派遣一羣耶穌會士前往西西里島的絕佳機會，便將他的計畫呈報耶穌會諮議，他這個構想並不獲得支持。院長不肯讓步，便請雅風為此事向天主祈禱。雅風為此事請示天主，得到的答覆是：「如果這羣人走水路，他們將會有一段黃金之旅。」這聽起來好像極為傳統的古希臘女祭司的神諭。

雅風如實回報，這位可憐的院長完全按照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加以詮釋，認為這是上主保證這一趟會是個快樂結局的航程，於是一意孤行。1608年12月7日傍晚，耶穌會派了兩位神父、五位學者、三位初學登上維利納號。結果這艘船落入了荷蘭海盜

之手，耶穌會士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Algiers）上岸，被當成奴隸拍賣。事隔兩年後，吃盡了許多苦頭，又經最高階層（法國國王亨利四世都出面營救）展開冗長的談判，這些人才被贖回。雅風在這段期間始終為這些可憐的俘虜不斷祈禱，內心覺得有點愧疚。原來「黃金之旅」真正的意思是十位耶穌會的成員將受到各式各樣的考驗。

門徒

這位謙卑的守門人收了一個門徒，此人後來成了大師。這個人名叫伯鐸·克拉威（Peter Claver），他在 1605 年 11 月 11 日抵達帕耳瑪，專修哲學。

克拉威出生於雷達（Lleida）省的佛杜（Verdú），繼承了當地人的特質：忠信、勤奮工作、專注目標、外表嚴肅。

克拉威在 1595 年 12 月 8 日接受維契（Vich）當地主教的入修會削髮儀式；次年他來到巴塞隆納，起先修習「通識」，自 1601 年起，在耶穌會士指導的白冷學院就讀。1602 年 8 月 7 日，他獲准在塔拉哥納（Tarragona）進初學院，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吸收了終其一生引導他為人處事的基本觀念；他把這些觀念作成筆記，雖然這個筆記本後來遺失了，不過他的同伴尼可拉斯·龔薩雷茲（Nicolás González）曾經持有這個筆記並且展閱過。其中主要的原則有四：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嘗試發現天主的臨在；徹底地聽命於長上；為光榮天主做一切事情；不惜代價設法拯救靈魂。

他在 1604 年 8 月 8 日發初願。根據他的筆記，不難了解他發誓願所懷的精神：「我將謹記在心，付委發此誓願者所將擔負的重任……我矢志獻身於主，並為主服務，直到生命結束，我將像

個奴僕一心一意服侍主子。」這個觀念早已銘刻在他的心版上，至於「我像是上主的奴僕」這句話，在他發初願時只有模糊的一般概念，到了他發終身願時，則變得具體而且可歌可泣。

有些史學家認為，上述的宣示看得出有一種戒慎恐懼、擔心當神父的這種心情，在他專注學術研究的歲月，特別是快到晉鐸日時，更加明顯浮現。有兩個人一路開導他，為他解惑。雅風·羅德里格在帕耳瑪督促他過內心的使徒生活，桑多瓦神父（Fr Sandoval）則確認他的修道晉鐸聖召，並為他指點迷津，指出向奴隸傳教將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成就。從雅風的記載，我們可以探索克拉威的精神旅程，而根據桑多瓦的紀錄，我們看到了克拉威向黑奴傳教的過程。

克拉威耳聞許多有關超凡入聖的守門人的事情，他想像雅風或許能夠解決有關他在耶穌會內確切聖召方式的疑慮。他一抵達立刻央求院長准予他每天傍晚跟這位修士交談十五分鐘。

「兩個人晤談，彼此進入另一人的心靈；克拉威發現雅風的聖德遠超過外傳的名聲，雅風則發現眼前這個人被老天選定為去執行大計畫，以光榮天主」（據諾奈爾 Nonell 所言）。這個 75 歲的老人面對著 25 歲的年輕後輩；老人的一生即將走完，而這個學生則剛要起步；一方是果實纍纍的樹，另一方是前途無量的嫩株。「克拉威是雅風成就不了的一面」（引自洛依格 Rosendo Roig 語）。「要不是雅風，我們無法解讀克拉威，他也不可能有所造就。」（瓦提耶拉 Angel Valtierra 語）。

向大師請益

雅風接下他的工作，猶如這是天意。跟往常一樣，他又有了神視。「在閃耀著極大亮光的地平線，他看到了依序安排的候選

者寶座；其中一個空著的位子，比其他位子更顯得莊嚴與光彩奪目。雅風問道為什麼位子是空的，他聽到一個聲音說：『這是為你的弟子克拉威準備的位子，為的是獎賞他的美德以及他在東西印度羣島（Indies）辛勞拯救無數靈魂的成果。』」

「穿過庭院的那兩個人是什麼人？」有人看到克拉威與胡曼（Juan de Humanes）走過院子，曾向雅風詢問。

「這兩位修士將前往西印度羣島，他們將在當地大有收穫。」他回答，清楚知道自己說話的分量。

不可能成為克拉威的雅風，利用傍晚交談時光，傾力傳授他的理想給他這位如饑似渴的弟子。克拉威的筆記對這個過程的一些階段有些記載。有一天他們兩人坐在學院院子裡，雅風告訴克拉威說：「好多目前在歐洲閒適的人，可以到美洲從事使徒工作！」這話簡直就是呼應聖人薩威的名言；薩威常覺得要對法國索邦神學院（the Sorbonne）的神學家猛烈抨擊，向「滿腹經綸卻欠缺善用學問意願的那些人」大吼大叫。

又有一天，老人家作了以下的反省：「許許多多冒險家為了追求世俗的利益，飄洋過海去做生意。你受得了世人熱切搜集商品與追求可朽壞東西的程度，勝過基督的僕人拯救世人靈魂的熱心程度嗎？天主子為了拯救人靈，不惜犧牲了自己的性命。」這與聖依納爵在〈至善通訊〉（*Letter of Perfection*）中與孔布拉（Coimbra）學者討論時所持的論點相同。這些正是大無畏的時期，雅風與克拉威之間的交談，反映了時代的精神。雅風不像他的同胞，橫渡大西洋為的是尋求黃金，他望著西印度羣島並非看中世俗的黃金國，而是看到了有待精神收割的領域。

「我的聖人大師」

克拉威對雅風的教導不敢或忘，他終其一生尊敬雅風，稱他為「我的聖人大師」。他到了老年，有一天，尼可拉斯·龔薩雷茲（此人擁有他的筆記）進入他的房間，給他看不久前剛剛出版的加泰羅尼亞文（Catalan）寫成的雅風傳記（1652）；克拉威拿起了書，放在自己的頭上說：

「感謝主，讓我看到了我渴望已久的書付梓出版。」

尼可拉斯心想這是個好時機，不妨多探問一些資訊，因此提問是否修士確曾告訴他前往西印度羣島，前往新格拉納達（New Granada）（今之哥倫比亞），特別是到該國的卡塔赫納（Cartagena）港埠去。克拉威回答，的確如此，而且不只提一次，而是好多次。

克拉威對他的大師的忠誠，可從他將雅風修士的照片放在床頭、直到呼出最後一口氣始終保留這張照片得到印證。他每天呼求的主保聖人中，雅風是其中之一：「還有你，我的雅風。」

顯然在他與雅風修士談過話後，克拉威一再要求請調到新建立的格拉納達王國去。不久他的所求獲准了，1608年他在巴塞隆納開始研讀神學，次年西班牙各省省會長接獲總會長阿奎維瓦的指令，要求每一個省每年必須派遣一位年輕的傳教士前往新設的哥倫比亞省。為回應這項籲求，克拉威的省會長荷西·維利加斯（José de Villegas）於1610年1月21日致函克拉威：「我必不再抗拒吾主的旨意，我在祂對你激發的熱望中清楚看出了祂的旨意，你滿腔熱血願意為主工作去教化印第安人。」

為克拉威而言，他在馬約卡島的三年，是「個人一生當中最美麗的時光」。當分手的時刻來到，雅風徵得院長同意給克拉威

帶走他手寫的 Little Office of the Immaculate，以及一些收納精神座右銘的筆記。要帶走雅風的筆記一定要獲得院長同意，因為有些人私自占有雅風的筆記，離開學院時到了大門口就被攔下來，被迫打開行李交出來。

根據學院的日誌：「本月（1608 年 11 月）中，胡曼與克拉威兩位修士搭乘一艘英國船隻航向加泰羅尼亞，天氣良好，安抵薩洛（Salou）港，後來到了塔拉哥納。」

最後的歲月

雅風到了晚年又開始受苦。然而他已安然接受：他自認為是個罪孽深重的人；他想如果他不該得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因此他平心靜氣安然忍受一切；他把受苦當成是自己應得的，並且乞求上主給他更多的十字架。

夜復一夜他忍受最劇烈的痛苦；良心不安的情形又回來了，除了肉體的痛苦，又加上道德方面的受苦。就像舊約聖經中的約伯一樣，他受到魔鬼任意的擺布。

1613 年 1 月某個傍晚，他正奮力爬上樓梯，幾乎就要踏到最後一個台階的時候，突然一陣令人氣悶的惡臭向他襲來，就好像他被拋到臭水溝裡。他在台階上暈了過去，然而一陣清風迎面吹來，他甦醒了，這才使他沒滾落下去。

過了幾天的一個下午，就在他對幾個教育程度不高的修士朗讀守則規定之後，準備上樓去，又是到了最後一個台階時，突然一隻強有力的手揪住他，將他拋到空中。他翻了好幾個筋斗，重跌到地上，頭部觸地受傷。有人目睹這一切事情的發生，拉鈴叫人，所有的人都火速趕到現場。只見雅風躺在地上失去知覺，頭上受到重傷。醫生召來了，他說像這把年紀重跌在地可能生命不

保。

事實並非如此。有一天晚上，吾主顯現給他，以權威的聲音命令惡魔離開受苦者，不要擾亂；然而吾主轉向雅風，以喜樂充滿他的內心，助他恢復健康。次日早晨醫生發現連日來一直不變的傷口，竟然完全痊癒。

「上主讓聖人受到創傷，上主親自治癒了傷口；對此我們既無法了解，也無力治癒。」醫生事後坦誠相告。

在加爾瓦略山上

1617年是他在世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他多了許多病痛。有人問他身子什麼地方病痛，他一口氣講了一大串：「胃痛、腎痛、腳腫脹、嘴痛、膽囊結石、腹部絞痛、莫名其妙的發燒，體溫時而上升，時而下降。」

他喪失了記憶力，記不得像天主經這樣最常念的祈禱文，以往他對天主經並不需花費力氣去背誦。他一秉慣有的謙卑，懇請旁人為他唸聖詠詩篇以及聖思定的短篇獨白。

四月他看到耶穌與聖母一身莊嚴華麗的打扮，耶穌與聖母溫柔的安慰他，鼓勵他忍耐受苦，他們保證會在他身旁幫助他。這件事過後他的健康繼續惡化，他的體溫奇怪地忽上忽下，讓醫生羣感到窘迫。

死前八天，人家告訴他該是領受臨終傅油的時候了，他讓大家明白他暫時還不會死；護理員問他大限的日期，他告知不出一個星期。此後他就不再言語，無論旁人如何大聲跟他講話，他都聽不到。

他領了聖體以後，身體的病痛逐一消失，他的臉龐變得「比我們看到他健康的時候還要明亮」（引述馬力門Marimón神父的

話)。偶爾他還會張開雙眼，口中念著耶穌與瑪利亞的名字。

10月30日近午夜時分，他恢復意識知覺，不斷的喃喃自語：「耶穌、耶穌、喔耶穌、我的耶穌！」當他的胸膛開始隆起，他的脈博突然停止，於是大家了解臨終的一刻就要來到。他幾乎無法呼吸的時候，在場的神父們開始誦唸為臨終者祈禱文。到了最後，雅風張大雙眼，環視大夥兒，「他的眼神充滿明亮與愛情，這位一生謙下自抑始終雙目垂視的人，最後看大家的這一眼，非常稀奇。」然後他轉向手中的十字苦架，親吻它，發出長長的一聲：「耶……穌……」，與世長辭。

前往西印度羣島的卡塔赫納

克拉威於1610年4月15日從塞維爾（Seville）揚帆啟碇，與他同行的另有三位耶穌會士，一行人於耶穌升天節前夕在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登陸，立刻轉往首都波哥大（Santa Fe de Bogotá）。他本來應該恢復研讀神學，但是當時沒有教授教書，於是他在學校裡不斷忙著在俗修士的工作。等到教授終於抵達，克拉威在1613年底完成神學課程。由於他不想考期末考試，人家鼓勵他說，為晉升神父，這是必要的。結果他答道：

「對幾個可憐的印第安人講道理，要這許多神學幹麼？」

人家告訴他，通過這一關還可發初願。對此他說：

「早知道，我就不回答，我哪配得這樣的殊榮。」

接著他於1614年在騰亞（Tunja）展開他在耶穌會的「第三年培育」，在波哥大短暫停留之後，他調頭順著馬格達雷那河（Magdalena River）來到卡塔赫納。

時年35歲的他，從此在卡塔赫納定居直到過世。當地共有三個戍衛部隊駐防的堡壘，卡塔赫納的港口是主要的販奴中心。

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與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是黑奴輸入美洲僅有的兩個入口。舉例而言，1615年9月27日，一名葡萄牙人安東尼奧，經手引進多達5,000名黑奴，此外每年透過付稅金幣115,000達克特（ducat）的方式，再引進不下於3,500名黑奴。這些奴隸大多數來自非洲幾內亞灣國家，有些是主人將他們賣掉，有些是遭奴隸販子襲擊「獵得的」。我們都知道這些奴隸在極不人道的環境下，被迫飄洋過海橫越大西洋來到了美洲。

這些奴隸是克拉威致力拯救靈魂的對象。

他的第二個導師

然而他仍須擺脫困惑不定的窘境。蒙提席翁那位年老的守門人莫大的影響力，顯然讓他對未來是否當神父感到有些遲疑。天主是否召叫他去做一個謙卑的在俗修士呢？難道沒當神父的雅風不是一個偉大的使徒嗎？克拉威啟程前往美洲之前在西班牙並未晉升神父，結束「第三年培育」後在騰亞也沒有晉鐸。

第二個影響克拉威的人物適時出現了：那就是雅風·桑多瓦（Alonso de Sandoval）神父。克拉威早在抵達卡塔赫納時就跟他會過面，然而那一次只有短暫的晤談；而今他來到桑多瓦神父跟前，成了他的門徒，只不過這個時候的克拉威尚未升神父。他是在1615年11月抵達的；12月21日升五品輔祭，次年2月23日升六品執事，3月19日晉升神父。

他已克服猶疑不決的毛病。他遵照桑多瓦神父著作《衣索比亞的自然、神聖與褻瀆組織體制，習俗、禮儀以及迷信，塞維亞，1627年》（*Nature, sacred and profane polity, customs, rites and superstitions of the Ethiopians, Seville 1627*）中所確立的準繩，展開使徒工作。「本書沒有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誇

張與狂熱，但其重要性無可評估。可以這麼說，這是一本以黑奴為傳教對象必讀的教科書；最重要的是，這本書激發人心去做為奴隸傳教的使徒工作，而他就是其中一個。」（引述瓦提耶拉的話）只不過，「弟子的成就勝過老師，所謂青出於藍，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1622年4月3日，克拉威跨過了最後一關，他鄭重的發了初願。他手寫的紙上添加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在常規的誓詞前出現：「愛，耶穌，瑪利亞，若瑟，依納爵，伯鐸，我的雅風，多默使徒，樂倫（Lawrence），祿茂使徒，我的諸聖人，我的主保以及我的護慰者，還有我最鍾愛的黑人，請俯聽我。」換句話說，在我們可預期的諸聖和他的雅風之後，也加入了黑人主保們。而他在署名伯鐸·克拉威之後，還加了句：「永遠願為黑人的奴僕」。

時年42歲，往後他還活了32年之久。

來了一艘船！

他的起居間光線暗，又隱蔽，最糟糕的是，連他的通譯員奴隸都不願意住。不過這個房間有一大優點：它就位於入口上方，不論晝夜任何時候要是有人來叫他，不會麻煩到任何人。

他的使徒工作分階段進行，一開始是靠一名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信差來通報：

「克拉威神父，克拉威神父！一艘滿載黑人的大帆船就要進港了；波卡格蘭德（Bocagrande）附近已經可以看到船帆。」

於是克拉威立刻衝到住屋的主臥室，從陽台眺望港口，他的臉因為興奮而紅光滿面。看情況而定，他召集手下團隊中與船上奴隸同一個國家或者同種族的通譯員來協助他。這些人有來自安

哥拉 (Angola) 的安德·薩卡布契 (Andrew Sacabuche) 與依納爵·阿魯亞尼 (Ignatius Aluanil)，幾內亞大河流域的依納爵·索佛 (Ignatius Sofo) 與方濟·尤洛佛 (Francis Yolofo)，還有以馬內利·比亞法拉 (Emmanuel Biafara)、若瑟·邁歐洛 (Joseph-Maiolo)、姚阿辛·納胡 (Joachim Nahu)、文圖拉·柯科里 (Ventura Cocoli)、道明·佛魯波 (Dominic Folupo)……這些人是克拉威一生當中心愛的工作夥伴，是他的左右手。其中一人名叫卡雷皮諾 (Calepino) 一共會講十一種語言。

在其中一些人的協助下，他駕著輕舟登上那艘大帆船，跟船長 (他與許多船長結交成為朋友) 打過招呼後，他下到擠滿了人的底艙，從人羣中穿過，透過通譯員，他告訴黑人他是來陪伴他們，做大家的朋友，他歡迎大家來到白人世界。這個開場白自有其必要，因為奴隸們以為自己將被帶到異鄉宰殺，人家要從他們的黑色皮膚榨取油分。克拉威神父會探詢患者以及航海途中出生的新生兒情況。

奴隸棚屋

他會將他帶來的禮物分發給大家。首先分給大家清水、水果、香蕉、餅乾、糖果。到了快下船的時刻，他會照顧已無法行動的患者，用擔架將他們送下船到奴隸棚屋去。這些呈長方形的建築物，屋內沒有任何陳設，只有四面牆壁，一個進出的門，以及一扇開在頭頂上方的窗戶。在卡塔赫納，總共有 24 處這樣的棚屋。成羣奴隸被關在這個地方，直到雇主來到，在此之前，克拉威便乘機宣講福音。

由他的一個口譯員如下的描寫，我們不難體會當時的情景：首先，他會到市場去買檸檬、香蕉以及其他水果，還有菸草；由

於奴隸們不堪天氣燠熱而大量流汗，加上心情苦悶與身體病痛，他常以自己的手帕去擦拭奴隸的臉，而以自己的教士外袍褶邊擦拭自己的汗水（他穿的外袍每天要清洗七次。）

妥善照顧了黑人的肉體需要後，他才將注意力轉移到對他們的精神協助。他站在講台上好讓全體看得到他，然後他拿出一張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畫片，告訴大家這位是救世主，圖的下方畫著張牙舞爪的魔鬼。他講道理一連持續好幾天，每天花四到六個小時不等。他是一個天生的導師，他技巧高明的透過圖像解說宣講福音。

他的安哥拉籍口譯員安德曾經憶述：「他首先教導的是用右手在胸前正確的劃十字聖號，單單這件事他會花上一個鐘頭的時間，因為他會一個個去檢查所有人的動作，而每一個棚屋內總有 300 到 400 名黑人。學習成果最佳的人，他就賞以菸草，學得慢的人，他就用手上的十字架輕敲那人的腦袋。接下來，他會教他們天主經與聖母經等等。」

等大家得到充分教導後，他就給大家付洗。必要的話，他會延後付洗的行動。他會用「一個上等的瓷罐與相同材質的大淺盤」來進行洗禮。付洗過後，他在每個人的脖子套上一個獎牌，擁抱每一個人，給大家一些道德忠告，最後分發禮物。

暗夜光輝

這樣狂熱的活動只能有一個解釋：他有深厚的內在生活基礎。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他的導師雅風的忠實弟子。

他每天晚上祈禱長達五個小時，三次苦修，只有短短三個小時的睡眠時間，這是他每晚的例行活動。他獲列真福品的審定過程中，有 140 個目擊者證實這一點。他的同伴也是知己尼可拉

斯·龔薩雷茲修士告訴我們：「只要不在聽告解，不需開導黑奴，他始終專注於祈禱。他住的房間就在入口上方，夜間任何時候人家找他，他都立刻回應，甚至沒有時間穿衣，還要守門人不要叫醒其他神父，因為他們太累了。我住的房間就在他的房間隔壁，前後有八年，熱帶暴風雨與閃電打雷是家常便飯的事情，碰到這種時候，害怕的我就會跑到神父房間去，沒敲門也沒事先打招呼，我總看到神父跪在床腳邊，雙手放在雙眼上，整個晚上燈都亮著。」

任何人無論什麼事情晚上來到他房間，總看到他維持這個姿勢。這件事已眾所周知，不過有人還是想要確定一下。當時利馬（Lima）的省會長正好途經此地，他以各式各樣的託詞來到克拉威的房間，始終看到他雙膝下跪，或者其他一些虔誠祈禱的姿勢。換班的士兵許多人注意到他所住的房間始終亮著燈，還聽得到可怖的鞭打聲，不免會問起那個房間到底有沒有住人？

克拉威神父最喜歡默想的主題是耶穌的苦難。「其實我們不必看其他書」他曾說過。他最喜歡讀的一本書是祿茂·里奇神父（Bartolomeo Ricci）所著的基督行傳。對尼可拉斯·龔薩雷茲而言，這本書必定是克拉威一生熟讀的，顯然它經常被翻閱以致磨損不堪。後來克拉威又添加了其他幾本書：普恩特（La Puente）所著的默想（*Guide Book of virtue and imitation of Our Lady*）總共三集，還有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箴言。然而他片刻不離手的是十字架，他隨時隨地攜帶著十字架，還有一本抄自聖納德默想，向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全身祈禱文筆記。

他也會運用對望教者講道理時使用的視覺工具。每次他祈禱時，他都會選一張跟他所默想的奧祕有關的畫片，特別是耶穌在山園祈禱時的痛苦，或是頭戴棘冠，更常選的是釘死在十字架上

的畫面，而且白天觸目所及都是這張畫片，一整天桌子上擱的聖經就翻到那一頁。

他以謙卑恆毅的態度不斷祈禱的結果是體驗到神祕現象，這一點許多證人都提到過。不少人談到他的房間會發出光來，其明亮程度絕非房間微弱的燭光所能及，還有人看到他的身子離地而起懸浮於空中。

痛苦的日薄西山

他的一生已經夠辛苦了，不料卡塔赫納在 1633-1634 年，1636-1637 年，1639-1641 年以及 1651 年四度遭到流行疫病的打擊，其中 1651 年的情況最為嚴重，終於把他擊倒了。

1650 大赦年使得卡塔赫納的耶穌會有機會加強周遭地區的傳教工作。在葡萄牙脫離西班牙之後，過去大批奴隸湧進的現象已不復可見，因為絕大多數出口奴隸的國家都是葡萄牙的領地。克拉威奉派前往托魯（Tolu）一帶，上溯到辛努河（Sinu River）。在一個村莊裡，他一個早上聽了八個小時的告解，下午又聽了六個小時的告解。有一天他實在撐不下去了，終於體力不支昏倒了；他無法主持彌撒，他內心明白他的體力不行了。他的長上要他返回卡塔赫納。

回來的時候，正好碰上著名的 1651 年黑死病開始大流行。身體虛弱的他立刻受到感染；他一度恢復健康，但卻染上一種奇怪的痼疾，這個病使他在往後四年之內去世。當代有一個人如此描寫那個痼疾的情況：「患者顫抖得很厲害，最厲害的情況是呈現癱瘓。這個病不影響當事者的心靈，但是雙腳雙腿卻虛弱無力，乃至於必須靠旁人幫忙與支撐才得以站立，手腳與嘴巴始終不由自主的抽搐。」顯而易見，這是巴金森氏症。他的生活無法

自理，任何需要都得靠人家幫忙。

更痛苦的是他處於遭人遺棄的狀態。黑死病重創了耶穌會，二十個會士走了十一個，而日常的工作量並沒有減少。克拉威不再住在已住了 35 年的房間，他被移到另一個房間去。他原來的房間被保留用來收容重病或慢性病患者；他移住的房間在整個屋子的底端，可通到教堂樓廂，景觀很好可以看到大海與港口。

照顧他日常起居的是一名年輕黑人，這個人天資既不高，對照顧人也不感興趣，與其說照顧，還不如說折磨他。有的時候，他不給克拉威麵包，又有的時候不給他水喝，可能好多天不給他口糧。他會不情願地為克拉威穿衣服去望彌撒，而當他幫克拉威穿衣服時，「他會東扯西拉，將他的手臂扭到背後，粗心大意極盡折磨。」克拉威從來不發一句怨言，相反的，他會說：「我的罪孽深重，理應作更大的補贖。」

痛苦的日薄西山階段即將進入尾聲。1654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有人認為他可以領臨終聖體，但是他不願在自己的房間裡領受；他堅持要到教堂去領臨終聖體。拖著身子緩慢前進，他最後一次到顯靈聖母像前，在她的祭壇上他曾經主持晉鐸後的首台彌撒，在聖母眼前他聽過數以千計的告解。他經過聖器室時告訴尼可拉斯·龔薩雷茲修士說：「我快要死了。」

那天傍晚他發了高燒，第二天他已不能言語，他接受了為患者送的聖體。消息傳遍整個城市，奔相走告的結果，許多人前來搶他們能拿得到的遺物，連神父簡樸的衣物也不放過，甚至撕裂它們分而得之。但有一樣克拉威神父視如至寶的東西，他想保存下來，免遭搶劫，他交給了尼可拉斯修士，那就是一張聖像以及雅風·羅德里格送給他的一本筆記。「把它們帶走，免得被搶走了。」他告訴尼可拉斯。

夜幕低垂，學院的大門已經關閉，只有耶穌會士在那兒。
「我手持十字架放在他的眼前，」尼可拉斯寫道，「他沒有蘇醒，9月8日凌晨一、兩點之間，他把他的靈魂交託給天主。我知道他已經斷氣，因為突然間他蒼白的臉孔發出了非凡的亮光與動人的模樣。」

4. 在蒙兀兒宮廷 Mughal (註一)： 傑洛尼莫·薩威／鄂本篤

(Jerónimo Xavier, 1549-1617) / (Bento de Goes, 1562-1607)

阿拉伯人入侵印度數百年後，在印度出現了來自中亞的兩大外患結合的後裔領袖：此人的父系是韃靼人泰摩蘭 (Tamerland the Tartar)，母系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後裔，他的名字叫巴布 (Babur, 1483-1530)；他在極短時間內征服了北印度廣大地區。他的兒子胡瑪允 (Humayun) 不像他父親那樣驍勇善戰；不過他在 1555 年收復了他原先喪失的土地，他在次年過世，由兒子阿克巴 (Akbar) 繼承王位，此人是印度史上最偉大的蒙古裔皇帝。

全名 Jalal-ud-din Muhammad Akbar (1542-1605) 的阿克巴，是一位出眾的人物。正如柯里亞-阿風索 (Correia-Afonso) 所形容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外交家，絕頂出色的政治人物，允文允武，兼具行政管理長才。」他先是將勁敵一個個擊潰，到了 1562 年，整個印度北部全部納入他的王國版圖；接下來的十四年間，他奪占了印度中部；從 1586 到 1595 年，他接連攻下喀什米爾 (Kashmir)、辛德 (Sind) 以及奧利薩 (Orissa) 部分地區；然後他越過納瑪達 (Narmada) 河，展開一場激烈的運動，最後兼併了德干 (Deccan)。到了 1605 年，他的帝國從印度庫什 (Hindu Kush) 拓展到中部的哥達瓦利 (Godavari) 河，再從古茶拉特 (Gujarat) 擴展到孟加拉 (Bengal)。

他不但是個軍事天才，還是一位手腕高超的行政長官，他建立了工作效率高的公共行政總署，其一般行政大綱直至今日依然管用。他不會寫字，但是他對每一方面的文化都感興趣：建築、

文學、服飾、運動，甚至美食。最重要的，也是跟我們直接相關的，他對宗教亦感到興趣。不恥下問的結果，他的宗教思想從不激進正統的遜尼派回教，轉向折中主義，收錄在他《神的信念》（*Din-i-ilahi*）中的資料，具體呈現這一點。他不僅包容而且同情印度教，這個態度使他極受愛戴。他建立新都法特普斯克里（Fatehpur Sikri），並在其中興建一座膜拜屋，由他本人主持，舉行各式各樣的宗教討論，起先只限於各個回教派系代表參加，到了第二階段，廣邀印度教、耆那教與拜火教的代表，後來更邀請基督宗教的代表，也就是在這段時期，耶穌會士開始打進印度社會。

1578年阿克巴曾請孟加拉的副主教皮雷拉神父（Fr Gil Eanes Pereira）前來參加宗教討論，但後者認為他無法滿足這位君王強烈的好奇心。由於他景仰耶穌會，他便建請跟在臥亞（Goa）的聖保祿學院的神父聯絡。阿克巴刻不容緩地立刻派遣一位大使與一名通譯員前往，請耶穌會「派兩位博學的神職人員，順便要帶來主要的律法書與福音，好讓我學習律法，吸收其中最完美的知識。」

使節一行於1579年9月抵達臥亞，神父們相信偉大的蒙兀兒希望成為基督徒；如果他能皈依，勢必影響他的所有子民一起皈依天主。這該是多麼令人陶醉的美好前景！

首次傳教

被選中的三名耶穌會士包括時年29歲、義大利貴族出身的魯道夫·阿奎維瓦（Rodolfo Acquaviva）；時年43歲、來自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安東尼奧·蒙塞拉特（Antonio de Monserrate）；以及本來信仰伊斯蘭教，後來皈依天主教的方濟·亨里克斯（Francisco Henriques），此人出生於歐姆茲（Ormuz），他以通譯員身

分跟著前往。

一行人在 1580 年 2 月 28 日抵達阿克巴的宮殿，然後來到新都法特普斯克里（註二）。當天傍晚，他們受到君王非常親切的接待，阿克巴渴望看他們帶來的書籍，特別是聖經。過些時候，這兩位歐洲傳教士與回教宗教法律學者展開宗教討論，這一討論就是幾個月之久。阿克巴通常會到場聆聽，他受到的初步影響顯然大為有利。他證明他對各宗教展現的同情絕非虛偽，因為他表示願意在他的帝國各地遍設教堂。

這次的成功鼓舞了兩位神父，他們斗膽直率地向君王建言，希望了解他的意向。阿奎維瓦提醒阿克巴，是他遣人找神父來談基督教信仰的，兩位神父將讓他如願以償，既然他了解天主教是真正的信仰，何以他自己不皈依，好讓天主教在他的皇天國土內廣揚呢？

被將了一軍的阿克巴說，暫時他有嚴肅的理由不能擁抱基督教。

這樣的場景一再反覆出現，君王起初的熱衷，已因日增的難題給澆冷了。單舉兩個例子來說：一是回教反對勢力龐大可想而知；二是阿克巴自己也娶了好幾個妻妾。事實上，上述宗教討論活動到後來就停辦了，兩位神父閒著沒事做。

有一天，阿奎維瓦進諫，既然所做的承諾未受到尊重，他們兩個神父大可離去。但他們並未打道回府，阿克巴國王開始展現友好姿態，不過宗教討論活動從此叫停。後來單獨留下來的阿奎維瓦病倒了，於是在 1583 年 2 月返回臥亞。

這是耶穌會士第一次到蒙兀兒宮廷傳教寫下的徒勞無獲的一章。

殉教者的流血犧牲

阿奎維瓦返回臥亞時，他發現自己陷入當代典型的引發迫害與殉道潮的情勢中。原來殖民當局不以基督教鞏固拓展為滿足，當局採取的是有計畫的摧毀印度教寺廟。

1567 年在委託耶穌會管轄的索西特（Salcete）半島，就發生這樣的事情；大約 280 座印度寺廟與一、兩座清真寺遭到了摧毀。1570 年底，臥亞所屬的回教蘇丹領土比查普（Bijapur）的軍隊，揮兵進入索西特半島，借助當地印度人的協助，他們摧毀了基督教堂與耶穌會士的住處。1578 年，他們再度入侵索西特，在篤信基督教的村莊造成重大破壞。1579 年雖然簽署休兵協議，可惜和平並未完全到來。

五個村莊——阿索那（Assolna）、康可林（Cuncolim）、瓦洛達（Veroda）、瓦林（Velim）以及亞伯林（Ambelim）——繼續動亂，既不肯上繳稅收，還公開舉行印度教慶典活動。1583 年初，當阿奎維瓦剛剛從阿克巴的宮廷返回不久，一支葡萄牙探險隊懲罰這五個村莊，摧毀寺廟與偶像。假裝懺悔的叛徒要求得到寬赦，由於神父們代為求情，所請獲准了，神父以為藉著這個善意的動作，應該可以感化他們皈依。

他們的判斷錯誤。阿奎維瓦獲任命為索西特的耶穌會會長後，與三位神父在 7 月 25 日抵達康可林。這三位神父的名字是雅風·帕契柯（Alfonso Pacheco），安東尼奧·方濟（António Francisco）以及伯多祿·伯諾（Pietro Berno），另外還有一位修士名方濟·阿蘭哈（Francisco Aranha），這位修士工於建築，他將負責選擇地點蓋新教堂。就在他們準備在選定的土地上樹立十字架的時候，他們遭到一羣由一位印度教教士率領、身配茅劍與

其他武器的暴民包圍。帕契柯神父試圖安撫暴民，暴民不予理會，對整個團體發動攻擊。五個人遭到劍茅與箭的攻擊，立刻不支倒地，五個人的屍體被丟進一座水井裡。

第二次傳教任務

再也沒有人向阿克巴宮廷提到傳揚基督宗教的事，直到 1590 年情勢才改觀。當時有一個新的使節團抵達，團長是一位亞美尼亞的執事，名叫良·格里孟（Leo Grimon）。他提出同樣的要求：國王既已研究所有的宗教，而且有心幫助神父，「我本人敬重神父，而且喜愛聽神父講道」，最好能夠深入了解基督宗教。

臥亞的耶穌會又燃起了希望。據說，皇帝已遣散了他許多的嬪妃，而且在耶穌升天節這個大日子，公開禮拜聖母瑪利亞。情勢看來跟第一次一樣的樂觀可期。

省會長挑選杜爾特·雷陶（Duarte Leitão）與克里斯托巴·維加（Cristóbal Vega）兩位神父，以及依斯特班·里貝洛（Esteban Ribeiro）修士。一路上三人受到各地權威當局的熱烈招待，抵達拉哈爾（Lahore）時，新任國王也熱情款待。然而這位國王也只是講好話而已。神父們開始思索是否應該放棄傳教計畫的事，尤其是他們已經聽說，阿克巴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個他可以自封為教主的新宗教，這點使得他與印度教徒、回教徒的關係都疏離了，而這種敵意終將使得神父們難以置身事外。幾乎未跟國王打招呼，一行人匆忙打包回鄉，這個舉動事後遭總會長阿奎維瓦批判。

皇帝聽說了以後感到驚異，他又一次要求派一些神父前來宮廷。他致函總督以及省會長提出的新要求，在 1594 年送達臥亞。經過磋商，決定選擇傑洛尼莫·薩威（Jerónimo Xavier）挑起重

責大任。

傑洛尼莫是何許人也？他有什麼事蹟呢？

方濟·薩威的侄孫

事實上，他的姓氏並非薩威，而是伊茲佩勒塔（Ezpeleta），因為他的父親是米堯·伊茲佩勒塔，母親是雷娜·狄戈妮，他的祖父是狄亞哥·伊茲佩勒塔，祖母是安娜·雅索（Ana de Jasso），也就是聖人方濟·薩威的姊姊。1549年他出生於納瓦拉（Navarre）的貝瑞（Beire）。他在1568年5月7日，19歲時加入耶穌會，獲得文學士學位。其後他改了姓氏，採用舅公的姓氏。

十二年後他即將啟程赴印度之前（1580年4月20日），致總會長的信函中所寫的：「我甚至在加入耶穌會之前，就已滿懷希望能夠前往東方的印度，我之所以加入耶穌會，正因為能夠前往印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是在前往亞卡拉（Alcala）途中聽說有耶穌會的時候興起這個意念的，在我的出生地納瓦拉，從來不知道耶穌會。」

他花了十二年的工夫才一償心願。1574年當范禮安（Valignano）徵募前往東方印度的助手時，傑洛尼莫首度嘗試提出申請，但那時候他還沒有升神父。那一次似乎是他最後一次機會爭取被派往印度。直到此時，西班牙的耶穌會神父一直沒有自己的傳教計畫，都是幫助在巴西與東方傳教的葡萄牙主內弟兄傳教；因此大批人力都流向美洲，事實上，在1575年到1579年間，赴印度的遠征隊名單中，並沒有西班牙人。

難道這位方濟·薩威的侄孫就此吃了閉門羹嗎？他或許已經放棄希望了，然而可能就在他在福恩特斯（Villarejo de Fuentes）進行「第三年培育」時，他意外接到了派他前往東方印度的命

令。1580年1月底，他出發前往葡萄牙，1581年4月8日他搭船遠去——距他舅公1541年4月7日離開里斯本前往東方傳教的日子，前後相差40年。這支傳教遠征隊由14位耶穌會士組成：包括兩位西班牙人（傑洛尼莫·薩威與雅風·帕契柯），兩位義大利籍，其餘都是葡萄牙人。一行人分乘四艘船。傑洛尼莫搭乘的是船長自己的聖羅倫佐號，船上載有代表國王行使權力的總督大人，一行人在9月26日駛抵臥亞。

「東方的印度，我的出生地」

他終於來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地方，他在臥亞寫信給總會長穆克安（Mercurian），「既然總會長指派我到此地，這裡就是我的出生地」。他一到了第二個母國，自始就被委以重任，新來乍到的他，立刻扛起初學導師、巴塞因（Bassein，今名瓦塞Vasai）學院院長的大任，接著肩負交趾（Cochin）學院院長，表現令耶穌會與外人同感滿意。

1592年，在事前沒有任何徵象的情況下，他奉命出掌臥亞發願修院的院長。這個舉動遭來一致的抗議聲浪。這是耶穌會在印度的第一大修院，出任院長等於他可以在省會長不在的期間，代理省會長處理事務，如此一來，將來即可被任命為省會長。在葡萄牙的領土內任命一個西班牙卡斯蒂利亞人（Castilian），是一件犯眾怒的事情。

發願修院的同修讓他了解情況。此外，出於職權致函總會長的那些人士，也提高吶喊聲浪。舉例而言：「薩威神父年紀尚輕，沒有威望，而且還是個卡斯蒂利亞人。大家的意思是，他頂多當聖保祿學院院長就了不起了。如果他真有可能當上省會長，本人在此致函總會長，特別秉報這會是這個省區所將面臨的極惡

之一；不服、違抗與各種麻煩勢必相繼出現，因為即使上述這位神父的確擁有出任省會長的一切優點特質，每個葡萄牙人還是不會接受卡斯蒂利亞人當領導，特別是在目前這個時候，這個省區可能遭遇的極惡事情就是被一個卡斯蒂利亞人管理。」不要忘記，那個時候正是菲利普二世身兼葡萄牙與西班牙國王的時期。無論如何，政治團結意謂凝聚人心。

當阿克巴國王的代表團抵達臥亞時，傑洛尼莫當發願修院院長已經兩年了，會省正好差不多在此時集會。令人費解的是，會中決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選擇傑洛尼莫·薩威加入向偉大的蒙兀兒國王傳教的行列。人選是經無記名方式決定的，但是其中是否有詐？根據立場公正的義大利籍證人雅伯·雷吉歐（Alberto Laerzio）的說法，這項遴選的工作甚至在進行推選一位代表之前展開（推選代表是為參加在羅馬召集的大會）。這個作法有「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方面讓傑洛尼莫不再當發願修院院長，二方面阻擋他獲選為代表的機會，三方面封殺他將來出任省會長的希望。「傑洛尼莫神父，」雷吉歐指出，「開心的接受了這個決定，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

從亞速爾羣島到蒙兀兒宮廷

他帶了兩個同伴，一個是 42 歲的馬諾·品黑洛神父（Fr Manoel Pinheiro），另一個是 32 歲的鄂本篤修士（Br Bento de Goes），兩人都是亞速爾羣島（Azores）的聖米琪島（San Miguel）人。傑洛尼莫與鄂本篤隨時為阿克巴國王服務，而品黑洛則負責照顧在拉哈爾的天主教徒。品黑洛於 1614 年返回臥亞，不過這個好人不斷懷念在蒙兀兒傳教 19 年期間的一點一滴，以致有人給他取了個綽號：「蒙兀兒」。

鄂本篤是一個獨樹一格的人物。他「長大到足以肩扛一把火槍的年紀」（引述布魯迪克的記載），就在印度加入葡萄牙殖民軍隊。不過由於他接受過高於一般士兵的文化薰陶，可能他年輕的時候有幾次逃兵的經驗。他沒有淪落到流浪漢的地步，一直過著野地自求多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來到特拉凡哥（Travancore），信步走進一座供奉聖母像的小教堂，驚恐地看到聖母懷中的聖嬰正在流淚。這個經歷引導他加入耶穌會成為修士，不過以他所受的教育與天分才幹，他其實足以擔任神父。

初學院的單調生活令他感到厭煩，於是他放棄修道生活。不過當他在波斯（Persia）漫無目的的遊蕩一陣子以後，他又決定返回「和平的修道院」中，此後他唯一的心願就是懷著英勇的心，獻身服侍上主。他在臥亞的修院內做了六年的雜務，機緣成熟，他奉派隨傑洛尼莫前往阿克巴的宮廷。

阿克巴宮廷

一行人在 1594 年 12 月 3 日出發，直到次年 5 月 5 日抵達拉哈爾的王宮大門。

阿克巴派遣手下一名副將出面迎接他們，安置他們住宿。次日新來乍到的三個人，到宮廷向阿克巴致敬。宮廷滿朝文武百官，可是他卻遣走所有的人，獨自接見他們三人。阿克巴要求他們趕快學會波斯語，以便能與他們直接交談。阿克巴對他們展現的善意，讓他們滿懷希望。他們觸目所見的一切事物，令他們深受吸引。他們所住的屋子緊鄰河邊，只見河上熙來攘往的駁船載運器皿與食物及其他民生必需品到市集去，景象好不熱鬧。抬眼望去，對岸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備受歡迎的慶典活動，大象、獅子、老虎的打鬥，是身在王宮內的皇帝愛看的節目。

每天清晨，在王宮前總會聚集一大羣人來陪伴國王進行一天的晨禱。每天早晨太陽升起，阿克巴必向太陽彎腰禮拜，然後他會現身子民眼前，讓大家沾光得福。清晨的儀式結束之後，王宮四周恢復關閉，閒雜人等不得接近。此後神父們即可自由去學波斯語。（註三）

一開始的情況又是令人可喜。國王給這三人一切的方便：優渥的待遇，可出王宮去宣講福音及爭取人們改信天主教，他甚至出錢興建教堂。至於他自己本人，他對基督教既感興趣，也表示同情，甚至有意願要擁抱它。每次他走出王宮，神父們都會謙恭有禮的步出自己的屋子前來問候致意，國王會跟神父們交談一會兒。他會詢問神父們學習波斯語的進度，他會興致勃勃的傾聽神父以波斯文書寫的「家庭作業」。有些時候他還會帶著他的子女與家中其他成員一起來望彌撒。

這幾位傳教士又滿懷希望國王與他的帝國能夠皈依天主教。然而現實並非如此，薩威神父很快就察覺這一點，只不過他仍抱著希望，遊戲繼續玩下去。

他們依然忙著學習波斯語文，到了 1597 年 5 月，一場大火燒毀了王宮。這場火災損失難以估計，據說連實心黃金打造的王座都給熔化了。重建工作進行之際，阿克巴暫時遷移到喀什米爾，他請薩威神父與鄂本篤修士陪伴他一起離去，品黑洛神父留在拉哈爾照顧當地的基督徒團體。等到當年 11 月他們返回時，教堂已經啟用了。

薩威開始注意到阿克巴國王有一種冷漠的態度，因此他將希望寄於薩林王子身上。這是一個過渡階段，因為一年後，1598 年 10 月，阿克巴出兵討伐普恩（Pune）以南德干高原的某些族長叛亂時，他再次邀請薩威與鄂本篤同行。不過，這一次他們並未再

返回拉哈爾；就在結束戰役的回程途中，1601年5月阿克巴在阿格拉（Agra）另設宮廷，從此留下來。

薩威神父一直陪著阿克巴國王，鄂本篤修士則奉派以大使身分，與前駐坎貝（Cambay）大使一起到臥亞去。葡萄牙當局以盛大的排場歡迎兩位到來——而且擺出震懾人心的禮砲伺候，原來據說阿克巴想要奪占臥亞，他經常派使節的真正目的就是來評估葡萄牙的軍力。

鄂本篤並未參加盛大的歡迎儀式，他悄悄地隱退到一所耶穌會的會所去休息。

尋找「國泰」（Cathay）

就在這段期間，鄂本篤奉命執行一項特別的任務：尋找「國泰」。

傑洛尼莫·薩威在1597年5月到11月間停留喀什米爾期間，從一個曾在中國十三年的回教商人口中，首次聽說「國泰」的傳奇，獲悉在印度與中國之間有一個完全基督教化的國家。是否那就是相傳已久的中世紀基督教國王兼祭司若望（Prester John）？相傳方濟會修士若望·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受蒙古王忽必烈汗的邀請，在一個名為汗八里（Cambaluc）（這或許就是忽必烈國王名字的訛誤寫法）的地方，建立了一個由數千名基督信徒組成的社區。熱情好客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1367年被明朝推翻，此後與這個新興社區的聯絡就此斷訊。在印度境內有基督徒團體的存在，被認為是中亞類似團體可能存在的跡象。回教商人的說法聽起來可信度頗高，果真如此，那麼不無可能形成一個涵蓋東方的大基督教社區：其中包括「國泰」、印度、中國與日本。利瑪竇是唯一持異議的人，他說汗八里就是北京，

「國泰」就是中國。他是從他所定居的北京「野蠻人王宮」中的回教徒口中得知的，他將這個訊息傳給在歐洲的耶穌會兄弟們，可惜沒有人相信。

薩威開始夢想，並且擬訂了探險計畫。既然凡事都得經過阿克巴的批可，而且探險隊必須穿越他所管轄的領土，於是他向國王提出計畫。阿克巴核准所請，並且說了句客套話：「上主保佑你們。」

鄂本篤修士在1602年初返回阿格拉，到了10月29日，經過一夜長談互道再見與聽取忠告後，他喬裝成一個亞美尼亞的商人，出發前往拉哈爾。只見他一身短袖束腰外衣打扮，頭戴雅緻的包巾，腳穿尖翹的便鞋，腰間配著一把短彎刀，肩上扛著一副弓箭，並且聽從薩威神父的建議，改名為班達·阿布杜拉（Banda Abdulla），意即上主的僕人。到了拉哈爾，他不去住耶穌會的宿舍，反而到一個威尼斯來的義大利人家裡歇腳。

2月14日，整團人仍在拉哈爾，但已準備離去；這一天他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道別信給薩威神父：「我提筆寫這封信是為回覆您給小兄弟我捎來的告別信函。我的神父，只有我們的主了解，當我捧讀來信，字字斟酌，玩味再三，我的內心充滿了溫暖。」

他還說他隨身攜帶薩威神父給他的特許狀，以及「一封要給在『國泰』人們的信，以及另一封給在中國北京神父們的信……我將這些信收在我的腦袋，信上有我們可敬的總會長、博瓦迪利亞神父（Fr Bobadilla）、巡察尼可拉斯·皮曼塔（Nicholas Pimenta）神父，以及省會長努諾·羅德里格（Nuno Rodrigues）神父的署名……我的神父，我們必須上路了，因此這封信就在這裡打住，但是我對您的思念將永不停息，您一向對您這個鄂本篤小兒

弟展現親愛仁慈，我的心將緊守這份情意，永不分離。」

拉哈爾—喀布爾 (Kabul) — 莎車 (Yarkand) — 肅州

三個基督徒包括兩名希臘人與一個名叫依薩格的亞美尼亞人，陪伴鄂本篤遠行。一行人在 1602 年 2 月 15 日出發。他們的行程穿越中亞許多人跡罕至的地方，翻山越嶺，走過一個又一個險峻的山峰，終於在 1605 年耶誕節前抵達目的地，近三年來他們不斷的步行，歷經驚險，忍受孤寂——因為這個耶穌會士想念他的兄弟夥伴。

他的第一個主要階段是行經開伯爾隘口 (Khyber Pass) 與賈拉拉巴德 (Jalalabad) 這個盜匪出沒的山區，到達喀布爾。這一段旅程花了他七個月的時間。到了喀布爾，他為了找一支沙漠旅行隊，不得不等了八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期，老天讓他結識了一位剛從麥加返回喀布爾，卻被搶匪洗劫一空的女士哈吉·康努 (Hajji Khanum)。對這位僅剩一身衣物、一文不名的女士，鄂修士發揮葡萄牙人的俠義精神，慷慨解囊助她回國的一切所需。這個善舉事後證明好心有好報，原來這位女士正是喀什噶爾 (Kashgar) 國王穆罕默德的妹妹，也是和闐 (Khotan) 國王的母親，這兩個國度都距莎車不遠。既然哈吉·康努與鄂本篤修士旅程相同，他們便決定結伴同行。

下一個階段的旅程，引導他們穿越險阻重重的興都庫什山脈，到達位於喀布爾北部的帕米爾高原；然後他們折往東方前進，經過十個月的驚險歷程，1603 年 11 月，他們來到了莎車。這位公主直接回到和闐去，並未邀請她的大恩人到她的王宮，鄂修士則留在城內。

外國人的出現在當地引起了不安，鄂修士很快帶著禮物朝覲

國王，這使得國王解除戒心。鄂修士帶來的禮物包括一支錶、一面大鏡子與三面小鏡子、華貴的衣物、三袋白糖以及一些蜜餞。這些禮物令國王大為開心，他邀請鄂修士為他大聲朗誦一段基督教經文。鄂修士隨便選了一段，並且作了詮釋，大感滿意的國王不禁高聲大叫：

「這個人肯定是個穆拉（Mullah）！」

莎車還不是中國，只能算是東土耳其斯坦，要前往中國的肅州，必須從這一端穿越到另一端。要進入中國必須獲得准許，要獲准少不了貴重的禮物。和闐以盛產玉石著名，鄂修士接受了這個國度母后的邀請去拜望她，這一去值回票價。她以上等的玉石相贈，償還她欠鄂修士的債務。所贈的白玉帶有綠色、粉紅與金色條紋，珍貴可見一斑。鄂本篤修士得以進入中國了。

阿布杜拉·依薩威，耶穌的僕人

他在1604年11月14日離開莎車；他必須越過大戈壁（Takla Makan）沙漠。途中有個利瑪竇稱為開利茲（Chalis）的城鎮，在此鄂修士接獲第一個可信的情報，顯示在北京有「許多位耶穌會神父」；有人還給他看一張用葡萄牙文寫的一些文字，這是他對所要尋找的不存在的「國泰」的第一個模糊概念。當地回教統治者很客氣的批准了他申請的護照，問他護照上要寫什麼名字。他就用了阿布杜拉·依薩威（Abdullah Isawi），意即耶穌的僕人。那個回教徒顯然大吃一驚，但是修士確認道：

「旅行這麼久一直用耶穌的名字，我一定應該繼續使用這個名字到底。」

在最後這段旅程中，耶穌之名的確救了他的命。橫亙在他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戈壁大沙漠，其間充斥韃靼匪徒。旅者向來畫

寢夜行，一路上嚴守噤聲規矩，避免惹人注意。有一晚暗夜騎行時，鄂修士從馬背上跌落下來，而他的同伴則繼續前進。大夥兒直到歇腳的地方才發現他失蹤。善心的依薩格回頭循原路去找尋，但是在暗夜中搜尋全無頭緒，直到他聽到了一個在呼求耶穌的聲音。

一行人終於在 1605 年 12 月 22 日平安抵達肅州。在此他聽說了北京以及中國許多其他城市的事情，他的疑慮一掃而空，原來「國泰」就是中國；至於傳聞中的汗八里，指的就是北京。他的搜尋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他首先送信給在北京的利瑪竇，通知對方他本人已來到中國。可是他不知道利瑪竇的中文名字，因此只寫拉丁文的名字，這封信從來不曾抵達目的地。他在 1606 年 3 月又寫了一封信懇求利瑪竇協助他到達北京；在肅州他受到的苦遠比他在最後一段旅程中受的苦還要多，根據利瑪竇的說法，因為「撒拉森人（回教徒）」（Saracens）的緣故。這封信直到十一月才寄出。在北京的神父們從印度的來信，得知鄂本篤將到中國來的消息，利瑪竇說他們「年年盼望著」。他們對這個消息非常高興，但是認為他們這些神父最好不要前往肅州，因此他們派了一個即將加入耶穌會的中國人名叫鍾鳴禮（Chung Ming-Li）代為前往。此人頂著寒凍的低溫，歷經艱險，終於在 1607 年 3 月 31 日抵達肅州，發現這位修士已經病得很重。他跟修士講葡萄牙語，甜蜜的母語使他甦醒過來。鄂修士讀著鍾鳴禮帶來的一些信，不禁流下歡喜的眼淚，一面說：「主啊，現在可以讓你的僕人安息了。」

一整個晚上，他把這些信件緊貼在心窩。鍾鳴禮奉命要將他帶到北京去，然而這位修士已經病入膏肓，無法成行了。鄂本篤於 1607 年 4 月 11 日去世，得年 45 歲。（註四）

陰謀與死亡

鄂本篤修士去世的消息以及他的夢想並無根據的事實，讓薩威神父備感哀傷，原來「國泰」並不存在，原來在亞洲心臟有一個偉大的基督教帝國，只是一個神話。

在此同時，阿格拉的情勢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希望阿克巴國王改信天主教的希望也破滅了，薩威神父開始將希望寄於阿克巴兒子兼繼承者薩林身上。的確，薩林一再明白顯示他希望擁抱基督教；薩威相信他，兩人開始發展一段偉大的友情誼。

然而薩林比他父親更不可信賴。阿克巴人雖精明，卻高尚寬宏；而薩林則多疑、嗜酒、殘暴不仁——這點在事後得到證明。奇怪的是薩威一直寄希望於他，他與這位王位繼承者過從甚密，使得他與阿克巴已經有些緊繃的關係更顯脆弱。薩林等不及繼承王位，反叛了父王，而且暗殺了國王最親信的得力大臣。事情爆發後，父子表面取得和解。

一場針對薩威神父與西洋傳教士而來的運動，掀起了另一場風暴。一名葡萄牙叛徒指控薩威神父是個奸細、是個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羅織了各項罪名。薩威不願在阿克巴國王面前為自己的清白辯護，他要求屬下不要回答任何指控，他將自己的辯護權交在天主手中。這樣做果然贏得叛徒的悔改，這個葡萄牙變節者公開在教堂撤回一切告訴，匍匐神父腳前，請求原諒。

然而另一樁陰謀卻在暗中進行：1603年英國大使約翰·米爾登霍爾（John Mildenhall）從阿格拉前來此地。當時正是英國勢力開始凌駕葡萄牙之上，這個英國人想要像葡萄牙人得到同樣的便利——在阿克巴宮廷，神父們代表著葡萄牙的利益。

薩威神父懷憂觀察到這個現象，在宮廷與回教的穆拉（宗教

學者) 公開討論時，國王愈來愈常公開地與回教徒站在同一線上。他雖然接受了一尊聖母像，放在宮廷裡一陣子，可是他無法接受基督的神性。

1605 年伊始就發生這些動盪不安。到了 9 月 21 日，正當我們可愛的鄂本篤修士抵達肅州時，阿克巴國王病倒了，10 月 16 日，他與世長辭——據說是被人下了毒，要不是他誤喝了他本來要讓別人喝的毒藥，就是某個陰謀者狡計得逞；無論如何，真相不得而知。

新國王翻臉無情

王位繼承人薩林登基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宣誓效忠回教律法。他這麼做是為安撫子民，因為大家對他傾向基督教感到不安。為進一步爭取人心，他下令修繕清真寺，並且恢復了他父親在位期間抑制多年的回教盛宴與拜功（祈禱）。為了使自己的「皈依」更顯徹底，他甚至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回教名字加罕格（Jahangir），名垂青史。

不過正如他反叛自己的父王阿克巴，他的兒子庫斯魯（Khusru）也率眾反叛他。然而他不像他父親那樣寬宏大量，他以難以置信的殘酷與惡毒手段懲罰親生兒子。

至於神父們，加罕格仿效他父親的做法，要神父們伴隨他一起旅行，並且召集回教代表組成宗教討論會，由他親自主持會議。不過這個舉動可能完全只是做個樣子，配合攸關重大的事情，他會借力使力，發揮強大的影響力。這方面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暴力脅迫一個 11 歲與一個 14 歲的基督教男童改信回教。可能他的目的是要向占大多數的回教徒讓步，但這顯示危險的投機主義作風，與缺乏原則。

反其道而行的另一個影響是，1610年他決定讓他的三個侄子接受基督教洗禮。這件事在歐洲引起共鳴，大大鼓舞希望。然而這也是曇花一現。1613年9月25日，薩威神父報導王儲叛變事件。這樁變節事件可以說是加罕格個人的傑作。

最後的風暴

其他的烏雲接踵而至，終於引發最後的風暴。截至此時堪稱天下無敵的葡萄牙勢力，開始感受到英國的威脅。雙方利益的衝突暴露了耶穌會在蒙兀兒宮廷傳教所面對的政治複雜處境，因此其宗教角色不免打了折扣。就某方面來說，這些神父使耶穌會與葡萄牙當局的關係具體呈現，他們是葡萄牙派駐印度的非官方大使。

1611年情勢開始轉變，英國船艦在這一年駛抵古茶拉特沿岸的蘇拉特（Surat）。英國船艦並未獲准泊靠；不過兩年後，英國人拿到了帝王手令，可以在蘇拉特開設一家「工廠」。英國人取得了據點；英國勢力進駐印度，直到1947年8月15日才退出。

這些情勢發展對阿格拉當局造成直接的影響。英國的一位大使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與加罕格過從甚密，他能以土耳其語跟加罕格交談，他是神學討論會的座上賓，對耶穌會神父的說詞，百般挖苦嘲諷。

霍金斯卸任後，由保羅·康寧（Paul Canning）接任，此人獲英國國王詹姆士任命為全權大使，英國與葡萄牙間的較勁達到最高點，要是英國人展現號手的炫技，葡萄牙人就找來那不勒斯雜耍變戲法還以顏色。加罕格公開顯示喜愛新來者，而這批新來者則將耶穌會士貼上虛偽陰謀術士的標籤。

遲早要發生的事情終於來了。一羣蒙兀兒的船艦避過了葡萄

牙人在坎貝灣的警戒區，未支付過路費給葡萄牙人。其中一艘載著重要貨物的船隻遭到葡萄牙攔截，被迫引入蘇拉特港。這件事發生於 1613 年，造成葡萄牙當局與蒙兀兒當局開始交惡。所有歸葡萄牙管轄的沿海港口，全數遭到侵擾，包括坎貝、巴魯（Bharuch 舊名 Broach）、戴莫（Damao）、巴塞因、喬瓦（Chawl）；此外德干的小國王也與蒙兀兒皇帝攜手合作。

加罕格親自主導拉哈爾與阿格拉的報復行動；他沒收了葡萄牙人的資產，封掉教堂，阻止發給傳教士的津貼。薩威神父遭到逮捕（根據英國消息人士的情報，他被關進監獄），被護送到臥亞，要他運用他的影響力簽署和約。他做到了；1615 年 6 月 7 日，那瓦·穆佳里伯（Nawab Mugarrib）與傑洛尼莫·薩威代表蒙兀兒當局，跟代表葡萄牙當局的龔薩洛·品托·馮西卡（Goncalo Pinto da Fonseca）簽署和約。

加罕格對這項條約感到不滿意；他認為條件不利。在此同時，阿格拉與拉哈爾的教堂全數物歸原主，王室的津貼恢復供應，神父們恢復原職，但是薩威與品黑洛這兩位資深的神父，卻被派到臥亞去。

1617 年 6 月 27 日破曉

薩威被任命為聖保祿學院院長，這是他前往阿克巴宮廷之前的舊職。「我的健康不那麼好，在這個學院我要處理的公務，需要更大的體力。」他在 1617 年 1 月 5 日致函一位朋友，「蒙兀兒國王已讓教堂重新開放，神父們支領原薪。三天前我收到國王一位副手代表國王的來信，要求我回去。我想神父們不會讓我走，因為他們認為我的健康與體力應付不了；雖然我的生命已走到盡頭，我卻渴望返回摩爾人的國土；我樂得被他們奪去生命。」

他沒有機會殉教，但是他的死也是夠悲壯的。

他自己先做了個人的年度八天退省，到 6 月 24 日結束。為重發誓願舉行的三天祈禱將於次日展開，薩威每天接見重發誓願的人們，為此他不得不拄著拐杖爬 57 個台階。

到了 27 日清晨大約四點鐘，負責管學院大門的修士照常進入薩威神父的房間，去取整個屋子的鑰匙。修士看到薩威神父坐在床上看書或者祈禱。等到耶穌會打鐘喚醒人們起身時，大家被瀰漫整個屋子的味道給嚇壞了，屋子某個地方著火了，原來是院長的房間，有人將門打開來，衝進去一看，瀰漫的濃煙遮住了視線，但還是看到了床上起火，他再近身一看，床上沒有人，他想走到房間的另一邊時，腳給絆了一下，原來地上躺著一具屍體，那正是薩威神父。

註一：蒙兀兒 Mughal（與 Mogul 一樣）是 Mongol 正字的訛誤體，用來指巴布創建的朝代，也就是入侵印度的蒙古人。至於往西亞發展，直抵多瑙河的蒙古人，史上用的字眼是 Mongols。

註二：這是一個完全以石頭建造的嶄新城市，部分都城遺跡留存至今。距印度北部阿格拉（Agra）約 45 公里，是一個觀光客經常造訪的城市。至今屹立的宮殿中，有一個曾經是耶穌會士下榻的地方。

註三：傑洛尼莫·薩威神父積極學習，獲得長足的進步，據說他是現存以波斯文完成基督文學作品的第一人。他顯然在一位學

者的協助下，寫了好幾本書；其中之一是《耶穌的一生》（*Mirat-ul-quds* 意即神聖榜樣）以及《基督教教義對話》（*A'ina-haqq-numa* 意即反映真理）。

註四：筆者提供的是大幅節略的報導，不過我們所擁有的資訊是最豐富的。除了寫給傑洛尼莫·薩威神父的幾封信，這位勤懇認真的修士還保有一本日記。這本日記與許多文件由鍾鳴禮（Chung Ming-Li）帶回北京交給了利瑪竇，利瑪竇在他的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著作中，即引述鄂修士的日記。

鄂本篤修士的東方之旅引起許多作家的興趣，最新一本著作是喬治主教所著《尋找國泰》（*In Search of Cathay*）（Gujarat Sahitiya Prakash, 1998），其中根據鄂本篤的日記逐哩重建旅程。這趟旅程有幾個主要的階段如下：拉哈爾、喀布爾、巴達克善（Badakshan）、帕米爾高原、騰吉-塔（Tengi-tar）、雅卡里克（Yakarik）、莎車、阿克蘇（Aksu）、庫車（Kucha）、烏干（Ugen）、柯拉（Korla）、卡拉-夏爾（Kara-shahr）、烏魯木齊、吐魯蕃、Pijang、Hami、Kara-Kital 沙漠、肅州。

5. 尼格斯的最愛： 伯多祿·裴茲 (Pedro Páez, 1564-1622)

若望的王國

蒙兀兒皇帝的宮廷並非耶穌會勢力在這段時期唯一伸入的地方，另一個成功的例子是在衣索比亞。耶穌會神父在中亞尋找的基督教王國，確實存在於非洲的心臟地帶。自始耶穌會神父就夢想能夠進入這個國度。聖依納爵本人曾經擬訂一整套策略，希望能夠感化衣索比亞皇族尼格斯（Negus）；他草擬的指示中，務實綱要與天真夢想並陳；1554年，他爭取到派遣一位宗主教若望·努恩斯·巴瑞托（João Nunes Barreto），以及兩位輔理主教安德·歐維杜（Andrés de Oviedo）與梅契奧·卡尼約（Melchior Carneiro）。

克勞迪亞斯皇帝（Emperor Claudius）是第一位接受葡萄牙國王與教宗聯合派遣使節的人。他的虔誠聖潔名聲使得依納爵與約翰三世（John III）相信，任命一位宗主教，並派遣一支小規模的傳教士團體，可望爭取這個國家皈依羅馬天主教。耶穌會派出兩位耶穌會會士龔薩洛·羅德里格（Gonzalo Roldrigues），以及一位修士，陪同這兩位的是一位特使。抵達衣索比亞的王宮一個月後，羅德里格整理出一份駁斥衣索比亞人諸多謬誤的文章。克勞迪亞斯皇帝在1555年6月23日宣布衣索比亞教會信仰作為回應；衣索比亞的宗主教瑪谷下令不准任何人閱讀羅德里格的論文，違者將以開除教籍論處。

內定宗主教人選巴瑞托終究無法成行，未能來到衣索比亞；至於歐維杜則於 1562 年才抵達，在衣國十五年間，過著孤獨貧困的生活，到 1577 年去世。他要寫信給教宗，由於缺乏紙張，不得不撕下自己的祈禱書邊緣空白處。事實上，他不只缺紙張，他還欠缺圓融處事的能力，而這正是他此次傳教任務失敗的原因。二十年後，裴茲憑著圓通與外交手腕，造就了成功的事業，他的前任孟德斯是一位不夠圓融、心胸狹隘的人，裴茲接棒以後，盡力拆毀前人高砌的無形城牆。裴茲在尼格斯宮廷的行事作風，跟傑洛尼莫·薩威在阿克巴宮廷的作法相同；而裴茲在衣索比亞的傳教方法，則與利瑪竇在中國相仿。

俘虜、監禁、贖金

第烏 (Diu) 是印度紹拉斯特 (Saurashtra) 半島南岸的一個寂靜小島，至今當地一些居民除了會講當地的古茶拉特語，還會講葡萄牙語。16 世紀的第烏是一個非常忙碌的港口，這裡是來自印度洋極遠端的海線，以及來自北方印度次大陸的陸路匯合的中心點。當然第烏成了駛往紅海馬薩瓦 (Massawa) 港船隻最理想的停靠地點，由馬薩瓦可以直達衣索比亞。

裴茲與蒙塞拉特 (我們從阿克巴宮廷認識此人) 於 1589 年 4 月間尋找一艘駛往馬薩瓦港的船隻。裴茲出生於馬德里附近的塞波拉斯 (Olmeda de las Cebollas)，早在進入耶穌會初學院時，就已經想到要前往衣索比亞傳教。因此他申請赴印度，耶穌會士都是從這裡接受派遣到各地去傳教，其中包括衣索比亞。裴茲擁有果斷的決心、風度翩翩與個人魅力等特質。

由於沒有直接通往衣索比亞的航道，他們兩人只好接受一名亞美尼亞人的提議，搭船前往波斯灣的巴斯拉 (Basra)，從此地

經陸路到阿勒波（Aleppo），然後折往開羅，從開羅跟著車隊旅行一段，再順水而下抵達馬薩瓦港。他們在 4 月 5 日出發，抵達波斯灣入口處的馬斯喀特（Muscat）時，兩人遇到一位準備航行到索馬利亞北部蔡拉（Zeila）的摩爾人，他提議兩人一起搭船同行。對兩人而言，這簡直就是天意安排。兩人於是在 1589 年耶誕夜出發，距離開印度臥亞，差不多十一個月之久。

可是兩人運氣不佳，海風吹的是相反的方向，船隻漂向岸邊，從岸上可以看到這艘船靠近。兩艘小型的海盜船立刻出海，登上船，將船帶往阿拉伯海南岸的佐法爾（Dhofar）。一上岸，兩位神職人員立刻被剝個精光，關進牢裡五天。認定他們兩人是間諜，於是決定將他們交給當地哈德拉茂（Hadhramaut）的統治者。

兩人打赤腳在烈日下走過沙漠，二十天來吃盡苦頭，白晝的強光令他們睜不開眼睛，又饑又渴，經過村莊時，村人當他們是異類。抵達首都海寧（Hainin），他們被帶到歐瑪（Omar）蘇丹面前審問，歐瑪將他們監禁了四個月。本來他要釋放兩人，後來他覺得必須將這兩個「葡萄牙」囚犯交給他的君主，那是在葉門桑納（Sanâ）的土耳其高級官員。

前往桑納的一路上，備嘗煎熬，監獄環境之惡劣更加令人難以忍受。過了五年，這位巴夏（高級官員）才將他們兩人送往紅海岸邊的穆哈奴隸市場去拍賣。由於沒有人出價購買他們，兩人被帶到設有三排槳的槳帆並用的大木船上去擔任划槳的苦力工作。這是他們所受折磨最痛苦的部分，他們遭到殘暴不仁的虐待，挨餓忍渴是家常便飯，與他們同在一組的同伴身上的惡臭與邇邇，成了凶猛蟲子成長的溫床，害得他們徹夜不能闔眼。

身處這樣的情況一年以後，他們透過所交的一個敘利亞（Sy-

ria) 的年輕朋友，知會臥亞的總督。總督聞訊立刻指派一名印度商人趕去，要他不論花多少代價，務必贖回兩位耶穌會神職人員。最後伯多祿·裴茲與安東尼奧·蒙塞拉特於 1596 年 11 月 27 日平安返抵臥亞，兩人前後被俘虜了七年之久。

亞美尼亞人阿布杜拉

裴茲要前往衣索比亞傳播福音的聖召非常強，甚至不怕再經歷艱困，他不改初衷。1601 年 1 月間，他再度來到第烏，「因為這是唯一能有船隻航向北非的港口」。

受俘的歲月教會他許多事情；他對這個世界瞭如指掌——無論類型、風俗習慣與把戲。於是他自薦為一名廚師，願用廚藝交換人家送他一程到馬薩瓦，但是人家不用他。他並不失望，他去結識馬薩瓦北部蘇亞金 (Suakin) 島的巴夏拉如亞姆的土耳其僕役，因為拉如亞姆正在準備歸航之旅。自稱阿布杜拉的他，打扮成亞美尼亞人的模樣，他告訴人家他急著要返國。拉如亞姆同意順便讓他搭一程到蘇亞金島，從那兒可以到開羅，到時候他就可加入前往耶路撒冷的車隊，回到亞美尼亞去。裴茲問道是否他們抵達馬薩瓦後，他可以到內地去找一批他最近去世的友人的貨品。他用這個藉口是為了擺脫巴夏，以便折往衣索比亞。沒問題，拉如亞姆如是說。

一行人在 1603 年 3 月 22 日揚帆啟程，一個月後的 4 月 26 日，平安抵達馬薩瓦港。裴茲確定自己可以從容跟他的恩人道別。巴夏不但未查覺這位耶穌會士的真實身分，還跟他結交成為好朋友，甚至提議要在馬薩瓦等裴茲辦完他的內地事務再走。

這一次裴茲走的都是好運。拉如亞姆撥一支隊伍，護送他到弗雷孟納 (Fremona) 的第一階段旅程。耶穌會在這個地方有一

個組織機構。他在 4 月 15 日抵達。耶穌會在弗雷孟納的組織包括一個為葡萄牙兒童特設的小學，以及一座教堂和鐘塔。「所有人都出來歡迎我，」裴茲在寄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大家喜極而泣，感謝吾主拯救我脫免所經歷的這麼多苦難。我們一起進到教堂，祈禱之後，我告訴他們我來跟他們作伴，為他們服務，我在經歷被俘與曲折旅途的勞苦之後，發現自己身處一羣虔誠忠信的信友團體中。」

當時，除非皇帝下詔邀請某人進宮，否則任何人都不准私自前往王宮。裴茲在這年冬天過後獲得這樣一個機會，「此地的冬天是從每年五月底開始，直到十月結束。在這段期間，我忙著將教理問答翻譯成當地文字。」

當時在位的皇帝是年僅 13 歲的雅各，他登基已六年了；不過就在這位耶穌會士前往晉見他之前，他的叔叔札登格爾（Za Dengel）推翻了他，自立為王。新君是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對神學很感興趣。他在致裴茲的信中，要求裴茲盡速進宮，並帶來葡萄牙律法書籍，他渴望學習。

裴茲在 1604 年 4 月離開弗雷孟納，進宮晉見新王。

希望落空

衣索比亞皇帝沒有在固定的地點建立首都。皇族紮營所在地就是行政中心，他本人與他的王宮貴族過的是游牧生活。由於叛亂時起，他為前往救平，不得不四處移動。

札登格爾剛剛打勝仗回來，外人敬畏他，他的子民崇敬他。裴茲抵達皇族紮營所在，發現有兩處廣闊的圍場，四邊以高聳的圍欄護著，其中設立了好幾個住房，遠觀比較像是茅草屋，沒有王宮的氣派。走近皇帝身邊，裴茲高舉他頭上戴的禮帽，並且親

吻皇帝的手。

札登格爾應該有 26 歲，裴茲心裡想，長得英俊、陽剛又挺拔。皇帝請裴茲就座，傾聽這位耶穌會神父的旅途見聞，顯然深受吸引。晉見的時間已近尾聲，札登格爾作了一個手勢，看得出来他被裴茲的魅力迷住了。

次日，裴茲再度奉召晉見，皇帝主動談起衣索比亞與羅馬天主教教義各自的優點。裴茲展現他細膩的謹慎功夫，正如在北京的利瑪竇，裴茲在衣索比亞也是一面學習，一面教授，他以尊重他人意見的態度來就事論事。

過些時候，札登格爾向他吐露心聲，說他有意皈依羅馬天主教。裴茲聞言感到不安，他勸說要謹慎行事，並且鼓勵皇帝等到他接獲羅馬的回信再議。札登格爾不肯接受他的忠告，逕自公告下令從此以後聖日改為星期天主日，而不再是猶太人的安息日（衣索比亞的教會原來是遵循猶太教的規矩）。此外，他交給裴茲自己致教宗與兼葡萄牙國王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的信，要他翻譯。在一封日期載明為 1604 年 6 月 6 日致教宗克勉八世的信函中，札登格爾承認羅馬天主教的至高地位，聲稱他對裴茲神父的學識淵博印象深刻。

札登格爾的急就章壞了大事，遠比裴茲預期的還要糟糕。他力促緊守的保密並沒有做到，王室信件的內容外洩了，引起教士們的緊張。當皇帝親信之一，皇家侍衛隊長宣布他有意改信天主教，不滿的情緒滿漲到極點。就在此時，阿姆哈拉（Amhara）當地的統治者拉斯·阿丹納特斯（Ras Athanateus），在造王者札西拉塞（Za Selasse）的默許之下，決定罷黜札登格爾。他們勸服僧侶，指稱札登格爾背叛了國家，在這個基督宗教立國數百年歷史中，第二度出現一位宗主教准許人民不必效忠君主的情形。

札登格爾處理宗教事務猶如他發動戰爭一般的輕率。1604年10月14日傍晚，他被拖下馬，遭到圍攻，被矛刺死，他在位還不到一年。接著爆發血腥內戰，札西拉塞與拉斯·阿丹納特斯密謀推出另一位新皇帝：時年32歲的蘇森約斯（Susenyos），此人是一位王子與奴隸所生的兒子。他後來成了裴茲很要好的朋友。

皇帝之友

蘇森約斯為王時，整個國家陷入混亂。各省首長都想要自立為王，新上任的君王設法運用他的權威，他逐省討伐，使得謀叛的諸侯乖乖就範。他登基三年後在1608年3月18日，也就是衣索比亞國曆明訂紀念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日子，他在帝國古都亞克瑟姆（Aksum）接受正式登基敷油與戴冠儀式。當時這個古都幾乎看不到村落。據裴茲憶述，當天共有25,000名步兵與1,500名騎兵參加這個大典。

這位皇帝早在戴冠禮舉行之前就賜給耶穌會在塔納（Tana）湖濱的戈戈拉（Gorgora）一大片地產。裴茲將費南德斯與羅曼諾兩人安頓在此，另外兩人安頓在弗雷孟納。至於專門研究衣索比亞教會謬誤的安東尼奧·佛南德斯（António Fernandes），則返回臥亞，他擬妥了一份有關兩個教會主要不同之處。最大的絆腳石，正如裴茲很快指出的，並非某個特定的信念問題，而是衣國人民以他們古老宗教為傲的自豪之情。在四鄰虎視眈眈的回教國家強敵環伺下，衣國人民保存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已經有一千一百年歷史了。裴茲了解直接的對立只會使得衣國人民更加倔強抗拒；葉門的經驗告訴他，在與西方斷絕通訊的東方國家，宗教變革之事只能慢慢來。他設法在異中求同，並且認為除非必要，否則不必強求改變。

懷著這樣的想法，1610年他蒙皇帝召見，從戈戈拉出發前往王宮。本來以為這只是一趟謁見之旅，想不到他就此永遠留了下來。皇帝愈來愈欣賞裴茲，「一位貨真價實的使徒，無論何時我注視他，我好像看到的是天使。」據悉蘇森約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堅持裴茲繼續跟在他身邊，並且開始在出征討伐時帶著裴茲到處活動。裴茲的魅力十足，口才生動，皇帝的隨從都非常喜愛他。在第一波一系列討伐諸侯的行動過後，蘇森約斯確定要在丹卡茲（Dancz）建立一個常駐的王宮。這個地方距耶穌會所在的戈戈拉只有半天的行程，裴茲從此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此地。

三腳貓

「我幾乎所有時間都跟隨在皇帝身邊；他不願讓我走，當我務必視察我們的會所時，他就限制我外出的時間。他非常敬重我，他跟大公或者他的弟兄在一起的時候，他不准許我站著。」裴茲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透露，甚至皇后與其他高官到後來都來求助於他：「他們若希望皇帝給他們一些恩惠卻得不到的時候，就會來找我代為求情，而皇帝總會施恩於我，幾乎從未拒絕我任何事情，不論這件事情有多麼重要。」

裴茲遣人到臥亞，在當地製造一個戒指圖章，上面刻有猶大之獅頭戴衣索比亞王冠的圖案，蘇森約斯國王非常高興。這次的成功鼓舞了裴茲，他冒險提議興建王宮與修道院，以證明他所說的歐洲有許多王宮和修院建築是確有其事。他計劃興建一座衣索比亞從來不曾看到過的王宮。1614年5月開始動工，選定的地點是出產上等白石的地方。裴茲親自訓練一批工匠，首先他讓工匠學會製造鋤頭、大頭錘、鑿子以及他所需要的其他工具，然後他教導他們如何應用這些工具去劈鑿石塊使成正方形，最後他指導

細木工人與木匠幹活。由於時間不夠，他便利用一種接合式的黏土。然而，令大多數衣國人民感到驚訝的，倒不是王宮占地廣闊，氣勢宏偉，而是王宮有兩層樓（「一棟房子的上方建有另一間房子」）以及一大片露天平台，俯視皇帝的兵營以及大公的寓所。

當蘇森約斯國王強迫阿鎬（Agau）歸順，阿鎬懇請裴茲代他們出面攔阻。裴茲開出的條件是：對方必須接受一位基督教傳教士進駐他們國度。他向蘇森約斯國王請求讓自己前往，但皇帝再次將裴茲留在身邊。

有一次伴隨皇帝旅行，裴茲來到了藍色尼羅河的發源地。雖然他是第一位看到這個源頭的歐洲人，他並未聲稱自己是發現這個事實的人。在他所著的《衣索比亞歷史》中，他只簡單憶述在1618年4月21日，他跟隨蘇森約斯國王與他的軍隊到達這條大河的源頭。「我承認喜形於色，」他在書中寫道，「看到了古代塞魯士大帝（Cyurs）與他的兒子甘比西士（Cambyses），還有亞歷山大大帝以及著名的凱撒渴望知道的答案。」一百五十年後的1770年11月4日，下一個來到尼羅河源頭的歐洲人詹姆士·布魯斯（James Bruce），聲稱他本人是到達這個發源地的第一位歐洲人，這個說法既不謙遜，也非事實。

國王的皈依

蘇森約斯愈來愈接受羅馬天主教信仰，但是他認清他正在冒著喪失王位的危險。第一個採取行動的是他的弟弟塞拉·克里斯托斯（Cela Krestos），他在1612年底加入羅馬天主教。1613年初，蘇森約斯告訴他與耶穌會，他本人已發誓將改信天主教，他並且準備接受一位由教宗派任的宗主教。他不想行之文字，以免

機密洩洩，惹來他的前任札登格爾在 1604 年遭遇的殺身之禍。於是他決定透過一位大使傳口信，這位信使者不是別人，就是跟塞拉·克里斯托斯一起皈依天主教的費庫·伊柴（Fecur Eczie）。

皇帝至盼有一位耶穌會神父陪伴他的傳信使者。這個差事落到了費南德斯身上，此人是僅次於裴茲的第二個親信。兩位特使攜帶致教宗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以及印度總督的信函上路。「天主保佑一路平安，上主已明白顯示我應該擁抱真正的信仰。」他在接見前來告別的兩人時說道。

兩位使者在 1613 年 3 月 25 日出發前往梅林德（Melinde）港，但是從來沒有到達目的地。兩人遭到拘留，險遭阿拉巴（Alaba）的摩爾人國王殺害，兩人在次年九月底回到蘇森約斯皇帝的陣營。

暗中派遣使者的消息走漏了，當時衣國的宗主教阿布納·西滿（Abuna Simon）立刻下達開除教籍令，連皇帝也不放過。蘇森約斯毫不退卻，到了 1614 年 7 月，他又託人帶信給教宗保祿五世與菲利普三世，強調他迫切需要軍事支援。決心要做到政教合一的他，早已在裴茲的協助下，準備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阻撓。他此時向裴茲肯定一點：他感受到內在有一股很深的平安。1614 年 9 月間，他召集一個大規模的神學會議，希望解決最大的一個信仰問題：究竟基督是像羅馬天主教會所主張的既擁有神性又擁有人性，或者像衣索比亞教會所主張的只擁有其中之一。

阿布納·西滿在指定的日子抵達，隨他而來的是大批的僧人與女尼。阿布納認為，此事不宜以論理辯說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是要靠戰爭：上主一定會站在勝利的一方。遊行活動變成了叛變行動。他早已推舉自己人來取代蘇森約斯出任皇帝：那是一個住在山區的基督教開教前就已住在衣國的原住民。蘇森約斯發兵

討伐，輕易擊潰對方。

1617年裴茲請求皇帝恩准按照衣國的風格，再興建一座新的教堂。皇帝親自陪伴他選定地點，並且在1620年11月9日主持安放基石的奠基儀式。奉獻教堂的典禮則在1622年1月16日舉行。到了三月份，皇帝召見裴茲，他決定宣布自己已改信羅馬天主教。這一年他連戰皆捷，他認為討伐無往不利，象徵天意肯定他的決心，他召來裴茲，為證明自己的誠意，他遣散除了元配以外的其他嬪妃。他公開承認羅馬天主教的信仰，辦了告解，領受聖體。

至此，裴茲可以像西默盎那樣的大唱〈現在可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的讚美歌。就在從戈戈拉返回王宮途中，他突然發起高燒，同年（1622年）5月3日，與世長辭。

他的去世對天主教會在衣索比亞的發展造成致命的打擊。1625年，羅馬教廷任命新人雅風·孟德斯（Alfonso Mendes）出任宗主教，不久，此人即顯出他喜愛浮華生活以及心胸狹隘的真面目。他既非耶穌會總會長中意的人選——事實上總會長並未被諮詢，亦非教宗伍朋八世（Urban VIII）欽定的人選——教宗還是由孟德斯本人告知的。

1624年，期盼宗主教抵達的蘇森約斯帶著塞拉·克里斯托斯以及兩個兒子，前往古都亞克瑟姆，在這個孕育衣索比亞基督教文化的搖籃，發表告全國子民書，詳述他自己改信羅馬天主教的理由。他以符合1555年克勞迪亞斯皇帝宣布科普特（Coptic）信仰的詞句，來說明他改信的天主教信經。

孟德斯的表現顯示他是一個欠缺宏觀的人，誠屬遺憾。不像裴茲，他看不出衣索比亞基督教的優點，他以為有了皇帝作為靠山，他就可以頒布命令的方式強行推展羅馬天主教信仰。他對繼

尼格斯的最愛：伯多祿·裴茲

承蘇森約斯王位的長子法西斯達斯（Fasiladas）也展現同樣的傲慢魯莽。這位新皇帝的態度與他父親迥然不同。

苦心經營的一切成果，就這樣崩解了。

6. 開教先驅：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前一章提到的鄂本篤修士將我們帶到中國，我們也認識了利瑪竇，不過只有一筆帶過，事實上利瑪竇值得更大的篇幅來介紹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82 年紀念利瑪竇來華傳教四百週年時說過這段話：

「其他歐洲人士比利瑪竇早數百年與中國有所接觸；但利瑪竇是唯一成功深入中國文化核心與打進中國社會的人，他將歐洲科學與科技介紹到這個偉大的國家，同時也將中國的文明與博大精深文化介紹到西方去。利瑪竇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義者，飽讀哲學、神學，藝術學養深厚，同時擁有淵博的數學、天文與地理知識，又懂得當代先進技術應用，他以堅毅、謙恭與令人可佩的獻身態度，獲取廣大的經典中國文化知識，使得他成為歐洲與中國文明真正的『橋樑』。」

謀略家兼開路先鋒

論及利瑪竇在中國開教的偉業，少不了要提另一位指引他方向的重要人物：耶穌會遠東區巡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遠東區範圍涵蓋印度、中國與日本。他是第一位確立傳播福音，不需要漠視，更不要摧毀本土文化原則的人；相反的，必須將本土文化納入，作為傳揚福音的工具。典型的例子如：沒有理由一定要受洗者取個葡萄牙名字。

范禮安在 1573 年 8 月獲得任命，次年 9 月 6 日抵達臥亞，總

計在三年內兩度視察印度境內的耶穌會與學院，足跡遍及印度各地。他在 1578 年 9 月間抵達澳門。據說，他在澳門停留期間，經常透過學院的一扇窗子，面對中國大陸，以他的義大利母語大聲叫嚷：

「你這個頑石，頑石！什麼時候你才願意開放？」

這個頑石無法從外面強迫它開放；只有經過漫長的協調過程，它才會自動對外開放。范禮安花了十一個月的時間，研究中國政府、律法、宗教，以及歷次傳教失敗的原因，他得到的結論如下：首先，中國文化應該受到尊重、同化；其次，起步一定要從學會中文開始，要花一切必要的時間全力以赴，所學並非澳門當地的方言，而是華中與華北所操的標準語文，亦即中國官話。

在他確定了以上的基本策略後，他挑選當時正在印度南部費希利海岸（Fishery Coast）傳教的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范禮安要他到澳門來。他在 1579 年 7 月 20 日抵達；他不理會耶穌會同伴的詆毀評論，熱衷學習中國話，並且吸收中國的風俗習慣。不久他就發現從前關閉的大門又開了。這個戰術果然奏效。

不過其他日常事務讓他無法專心學習，而且他又是單槍匹馬展開這項雄心勃勃的計畫。他覺得需要一個伴，他建議的人選就是利瑪竇。范禮安接受了這項建議，發布命令，於是利瑪竇於 1582 年 8 月 7 日抵達澳門。

藥師之子

利瑪竇 1552 年 10 月 8 日在義大利馬切拉達（Macerata）出生，他的父親喬凡尼·巴第斯塔（Giovanni Battista）是一位藥劑師，熱心活躍，在公家機關位居要津，他的母親名為喬凡娜·安吉蕾莉（Giovanna Angelleli）。利瑪竇是長子，此外還育有七個

兒子、四個女兒。

利瑪竇的聖召，除了內在的恩寵，還受到外在因素影響：他唸的是耶穌會學校，身處宗教氛圍中，吸收到許多理想，使這個年輕人的心充滿熱火。他的父親希望他研習法律，藉此躍登宗教法庭展開輝煌事業。當時這個年輕人還不到入學規定的年齡，因此父親讓他跟在自己的藥局裡工作三年（1565-1568），隨後利瑪竇進羅馬大學 La Sapienza 進修。然而 1571 年，也就是他大三課業結束的時候，他下定決心加入耶穌會，8 月 15 日，十九歲，他前往位於奎里納爾的聖安德初學院敲開大門。由於當時初學院長不在，改由代理院長接見他，這位高大、儀表堂堂的人正好是范禮安本人。利瑪竇遞交帶來的寶物：計有老舊衣衫一件、襯衫四件、手帕三條、毛巾一條、書籍三本，包括一本拉丁文法、一本羅馬市區指南以及一本藥師處方書籍。

那一年共有來自大約十個國家的四十四個初學生進入聖安德初學院，根據當年發給全球耶穌會各地分會的報告：「新生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斯克、伯根第、法國、法蘭德斯、薩克遜、德國、波蘭以及義大利各地人士。」

中國的呼喚

在佛羅倫斯待了數月（1572-1573）後，利瑪竇到羅馬學院就讀四年，前兩年他學的是修辭學，後兩年學的是哲學。哲學包括數學，而數學包括天文學以及精確的科學。利瑪竇對太陽系結構與機械鐘、地球以及星盤很感興趣。他必定對這方面科學展現特別的天分，因為他的同伴給他起個綽號「數學家」。他的教授是克里斯多福·柯拉維（Christopher Clavius）神父，此人是當代最傑出的數學家。

興盛的傳教活動對這羣年輕的耶穌會士構成吸引力，他們一面申請深造，一面伺機而動。鼓舞這羣年輕人的原因是遙遠的東方與美洲傳來的消息。西班牙的勢力已深入美洲地區，葡萄牙的地盤則在印度與其他東方國家，後者徵召的志願者歡迎義大利人加入。利瑪竇申請志願前往東方好多次，直到可能是 1577 年 4 月，總會長穆克安神父從哲學系學生中唯獨指派他與其他三位也是義大利籍的神學家一起同行，這三位的名字是羅明堅、魯道夫·阿奎維瓦及方濟·帕西歐（Francesco Pasio）。

5 月 18 日，利瑪竇經陸路前往熱那亞，從此循海路抵達里斯本。這一年的傳教隊伍成員可觀：計有四名葡萄牙人、七名義大利人、一名法蘭德斯人。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國王在阿梅利姆（Almeirim）古堡接見他們，為他們設宴送別。由三艘船組成的艦隊，包括由船長領隊的聖路易號，與聖國瑞號以及耶穌號。利瑪竇與羅明堅上了聖路易號；阿奎維瓦上的是聖國瑞號。他們在 1578 年 3 月 24 日聖週的星期一黃昏出發，直到當年 9 月 13 日才抵達印度臥亞。

利瑪竇開始修讀神學，但因為生病——好像是得了瘧疾——而不得不中斷學業，彷彿教書具有某種奧祕的治癒力量，洞察事理的上司要他去教授初級班的拉丁文。他的健康並沒有起色，於是奉命到氣候較涼爽的南部交趾去調養身子。雖然如此，他仍然在 1580 年 7 月 26 日主持他的第一台彌撒。此後他被告知要前往臥亞去繼續修神學第二年課程。

他抵達臥亞時，沒有一個朋友在當地：魯道夫·阿奎維瓦已到阿克巴宮廷去了，羅明堅也奉派到澳門。1582 年 4 月間，他還在修讀第三年神學時，接獲命令要他中斷神學課程，逕往澳門去報到。中國的召喚成了他踏上中國傳教的聖召。

大門半開

他在同月 26 日出航，搭乘每年航向麻六甲海峽、澳門以及日本的武裝商船，在中國明朝萬曆皇帝任內第十年 8 月 7 日這一天抵達澳門。

澳門是位於中國大陸領土上的葡萄牙殖民地，中國大陸不准外人從陸路入境，澳門成了通往中國大陸的半島上的堡壘；唯有經由下一個沿海城市廣州，才有可能進入中國大陸，而這是受到嚴格管制的。耶穌會在澳門有一座教堂與寓所（至今聖馬丁教堂已毀但門面建築依然屹立不搖），用來照顧葡萄牙子民。當時羅明堅就住在此地，而利瑪竇就是要到這個地方來。

羅明堅剛剛完成他首度的滲透工作。原來肇慶新任的首長兩廣總督陳瑞傳召駐澳門葡萄牙當局。擔心壞事的葡萄牙當局立刻回應，羅明堅成了代表團的一分子，他利用覲見的機會申請定居許可。所請未能照准，但他得到了保證，這是一次良好的接觸。就像裂開的一條細縫必須繼續拓寬，以便在第一次機會出現時得以抓住機會擠進去。

過了幾個月後，這個機會似乎來臨了。羅明堅有個機會回肇慶，他帶去的禮物讓當地首長大開眼界：一個會報時的鐘，一個威尼斯製造的萬花筒等等。陳瑞批可了他的請求，但是要求他削髮削鬚，同時要穿僧服，羅明堅聲稱一定照辦。

此時正當 1583 年 2 月，就是批准後的四、五個月，陳瑞獲悉他已被革職，便撤銷先前的許可；他擔心繼任者會控告他批准讓外國人進入他的轄區。1583 年 3 月，羅明堅又回到了澳門。

他的第三次努力終於獲得成功。他早就承諾，不論任何人，只要能夠助他取得返回中國大陸的許可，他就會有重賞。一名侍

衛想起了他的這個承諾，斗膽向新上任的總督郭應聘提出請求，讓希望學習中國文學的某些有德之士能夠到中國大陸來。總督把話聽進去了，下令核發相關的許可。安排此事的這名侍衛，在1583年仲夏帶著許可來到澳門會見耶穌會神父。裂縫變寬了，他們終於可以通過。九月初，由於這名衛兵的協助，羅明堅與利瑪竇搭上了定期來往於澳門與廣州的舢板船。

此時兩人的外觀變了：臉上的鬍子刮乾淨了，頭髮也剃光了，外罩像是佛教和尚穿的束腰外衣。1583年9月10日，兩人在肇慶上了岸。

第一階段：肇慶

他們在肇慶的聯絡人是一個年輕的學者姓陳，此人是羅明堅前一次在該地停留期間講授教義的望教友，羅明堅與利瑪竇上岸後暫時居住在此人家裡。兩人一到，此人立刻將妥善保存的祭壇帶來。他將祭壇作了裝飾，還添加了兩個字「天主」。這個新入教者在無意中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原來此前他們一直找不到令人滿意的字眼來稱呼上主。他們認為天主這兩個字非常合適，從此在教理中採用。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此外，由於該城知府王泮的護佑，他們解決了住處與教堂的問題，王泮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們有了這位能幹的行政長官當朋友，得到幾乎無條件的保護。王泮為他們獻計，保護他們免於遭到還不能夠接納「異國魔鬼」的鄰居的攻擊；他還經常造訪他們，甚至成了他們的師傅；他教導兩人中國禮儀，勸他們取中國名字，利瑪竇之名由此而得。

在王泮的指點下學會中國禮儀的兩位神父，此後便以打躬作揖和其他的禮節來歡迎訪客。他們在屋內擺設的一切東西都引起

莫大的好奇，例如掛鐘、威尼斯式的萬花筒、聖母像、安裝在祭壇上會發出香氣敬禮聖母像的香水，以及捐給傳教士生活所需的獻儀。

懂得數學、天文與地理的利瑪竇，名氣愈來愈大。展現在會客室的世界地圖，引起不少人的興趣，並鼓勵他製作另一張以中文標明的世界地圖。王泮非常感興趣，著人印製，並且在上面加註自己的姓名，蓋上印章。

難題出現了：他們的資金已經耗盡。羅明堅前往澳門尋求協助；他帶回一筆款項，用來加蓋二樓，這在當地是稀罕的事，因為所有房子都是平房。人們不斷湧來，為的是欣賞從二樓遠眺的景觀。王泮為此自豪，彷彿那是他的傑作，常常帶著同事到此地開會、獻花敬禮，每當這個時候，他就喜歡聽利瑪竇學識淵博的演講。

第一次危機

王泮的態度突然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原來他接獲皇帝詔令，下令摧毀所有寺廟，因為有些和尚被控煽動叛亂。王泮心想外國傳教士是「歐洲來的和尚」，也把他們納入禁令名單。兩位神父設法使他相信他們是領有學位的，並非僧人，因此逃過一劫。但這只是暫時如此，他們的處境，其實向來都呈現出不穩的警訊，他們隨時可能被驅逐出境。

這位知府像是變了一個人後，使他們更覺得這個可能性很高。因為他早該陞遷卻一直沒有異動，他懷疑是因為自己對這兩個外國人的保護作法，使自己蒙了羞。其實他想錯了，到了1588年初，陞遷令下達，升官的消息傳來，整個城鎮喜氣洋洋，因為他們的地方官得到尊榮。

這位地方官的離去暫時對兩位神父沒有影響，因為繼任者黃時雨一上任便展現出同情。利瑪竇看出這一點，致贈他備受欣羨的威尼斯萬花筒。這位耶穌會士還加送他另一樣稀奇的收藏品：一座置於屋頂公開展示的塔鐘。

此時羅明堅被選為前往羅馬、向教廷洽商派遣一位駐中國教廷大使的人。當時中國既不接受葡萄牙設大使館，也不讓西班牙設大使館，因為這兩國都是殖民國。如果能由一個友好的勢力來開辦官方大使館，或許有助於開拓宣講福音之路。因此利瑪竇一個人留下來坐鎮。

成敗不斷的交替出現，其間發生新的麻煩。這一次是肇慶的和尚與學士，要求新任總督劉節齋將傳教士趕出城，並且沒收他們的房子。這位新任首長聽取了他們的話，於是在 1589 年 8 月 3 日，下達驅逐令：兩位神父必須立刻返回澳門，因為他們膽敢安裝「一座自己會響的鐘」，而且還拜新教，這可能擾亂公共安寧。

最後總督準備給他們一筆錢，作為他們的資產被沒收的補償，然而利瑪竇並未接受，他表示願意遷到他管轄的廣東轄區內另一個城市，但總督不准，利瑪竇滿懷哀傷的和他的新同伴麥安東（Antonio Almeida），搭上駁船順江而下前往廣州，再轉往澳門。

第二階段：韶州

他們尚未離開廣州時，接獲命令要他們返回肇慶。原來總督大人三思之後另有想法：他不希望被人指控沒收了神父們的房子，卻沒給補償金。利瑪竇再次拒絕接受補償金，總督便同意讓他們遷到廣東省另一個城市去。利瑪竇選擇去南雄，此地較有可能直抵帝國的心臟。

8月15日，利瑪竇與同伴溯江而上前往南雄。到了24日，他們抵達一處峽谷時，總督派的使者捎來指令，帶他們到南華寺院。利瑪竇懷疑這是個陷阱：劉總督想強迫他們住進佛寺，他不落圈套。既然寺院的和尚也不想收留他們，他們繼續行程易如反掌。他們轉到韶州，受到了親切的歡迎，於是他們決定就地安頓下來，也就不到南雄去了。在韶州問題也不少：住得不舒服，訪客川流不息，最糟糕的是，不久之後爆發了瘧疾，在1591年7月奪走了麥安東的生命，接著又奪走取而代之的另一個義大利神父石方西（De Petris）的生命。

獲得定居許可後，利瑪竇著手建造住屋的工作，同時繼續學習中文以及向他的許多訪客進行傳教的工作。他的弟子之一是瞿太素，他特別喜愛此人，此人成了利瑪竇的中文老師。這個弟子在當時算是個怪人，一心著迷煉丹術，不過此人極為聰敏、活力充沛而且意志堅決。利瑪竇起初教他數學，不久此人就一頭鑽入宗教；他協助利瑪竇翻譯論文，還幫助利瑪竇正確發音、正確使用中文。他是個一無所懼的人，利瑪竇的鄰居首次向他的屋頂丟石塊的事件發生之後，此人不但挺身而出，還將鄰人告進衙門。

他還幫了利瑪竇一個大忙：他提醒利瑪竇，傳教士打扮成僧人並不好，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和尚目不識丁，貪污腐敗，一般人是看不起，特別是受過教育的社會階層，更是鄙視他們。利瑪竇很想改變稱謂與衣著打扮，希望改穿儒士們穿的服裝，但是沒有長上的許可，他不敢輕舉妄動。他知會范禮安，後者發揮大謀略家的智慧將這件事擺平了，他在1594年11月15-16日出發前往印度之前，作成裁決如下：利瑪竇與他的同伴不應該以和尚的樣子亮相，也不要剃光頭，反而「應該像在德國的神父們，蓄留鬍子與長頭髮。他們在會見中國人與重要人物的場合中，衣著

方面可以仿照中國學士。」

第三階段：南昌

肇慶與韶州位處南方，利瑪竇一心希望往北方發展，接近北京才是他的終極目標。1594年機會來了，當時駐守韶州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赴北京，邀請利瑪竇一起前往。這位將軍後來反悔了，不過最後還是同意將利瑪竇帶到南京。當利瑪竇在1595年5月底，從遠方眺望南京這個美麗的城市時，他看到了跟他過去生活的國度一樣的親水景觀——原來這個南方都城內滿布運河、橋樑，正是馬可波羅回憶錄中所描述的「國泰」首府「汗八里」的景色。

他抵達後不久，就去拜訪肇慶來的一位舊識友人。為了使這次訪問順利成功，他穿上學士的衣服，操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謹守中國禮節。他的名字改為西泰利瑪竇。他的舊識友人大吃一驚。

利瑪竇下一位訪問的對象是他早在肇慶就認識，如今貴為南京官員的徐大任。徐氏看到利瑪竇的優雅以及熟稔中國禮節，也是流露大驚奇。

「你怎麼來到此地？」

「兵部侍郎石星石大人核發護照給我，我一心想在你的護佑下在南京長久待下來。」

徐氏聞言面無表情，最後才開口說：

「你到此地來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很抱歉無法幫助你，你最好立刻離開南京。」

利瑪竇決定撤到一個較小的城鎮南昌市。到了南昌他恢復了精神，不覺得受挫。他領悟到每一次失敗過後，不久就會看到勝利。

果然如此。他在南昌待了一陣子，收穫很大。不久他的名氣響徹整個城市，大家都知道他博聞強記，因為在一次宴會中，他禁不住要求小露了一手。人家給他看一首中國詩，他立刻能夠背誦。有人覺得或許他早已熟悉這首詩，不算數，他接受了另一個考驗：在只唸過一遍之後，他立刻背誦 500 個完全沒有邏輯關連的中文字。先是從頭到尾背了一遍，仍然倒背如流。

「完全沒有錯耶！」下賭注的醫生說。

次日城裡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這位外國籍學士就這樣結交了許多新朋友，他的成功出擊，必有助於他前進北京。事實不然，不過他仍設法再次努力，想盡辦法抵達目的地，只是這其中絆腳石、阻礙以及狀況頻傳。

太監馬堂

宦官勢力大是明朝國力式微的原因之一。愚昧邪亂敏於歛財的太監，攬權自重的結果，使得官方政務滯礙難行。有些官員提出抗議，但是早已得到太監搜括而來的好處的皇帝，選擇站在太監一邊。其中最可畏的人物名叫馬堂。此人負責收稅，是一個肆無忌憚的陰險傢伙，自恃權大勢大，放眼宦官無人能及。

利瑪竇打算毛遂自薦，親自贈交帶來的禮物，藉機提出暫居中國、准許傳教的申請。他歷經千辛萬苦才會到馬堂的面，後者口頭上承諾給利瑪竇一切方便，事實上他收下禮物後，卻將利瑪竇打入地牢，羞辱他，幾乎下驅逐令。

然而馬堂沒有料想到萬曆皇帝會突發奇想，原來他早已寫過兩封信介紹利瑪竇，以及他所帶來的禮物，其中包括兩座「自動報時」的自鳴鐘。這個禮物引起了皇帝的興趣。過了兩個月，萬曆皇帝想起了要送他報時鐘的外國人，開始大叫：

「怎麼沒有把自鳴鐘給我送來？」

於是宦官解釋這批外國人未獲皇帝賜准不能進宮，於是萬曆皇帝在 1601 年 2 月 8 日簽署了文件，下令利瑪竇立刻到北京來覲見，面呈他答應致贈的禮物。同月 24 日，利瑪竇與新的同伴西班牙籍龐迪我神父（Diego Pantoja）一起來到北京城。

這個宦官無計可施，卻又不想讓手中的獵物飛了，自認權力勝過官方指令的他，授權主管各行政部門的官吏，極盡阻撓之能事，不讓這個耶穌會士脫離他的掌控。想不到利瑪竇的聲望與友誼崇隆，得道之助，他與龐迪我依照規定交由地方官吏管轄處理。

紫禁城

利瑪竇在北京的活動分頭並進：一方面透過皇帝身邊的一些宦官，針對宮廷下工夫，二方面廣結善緣，跟知識分子官員做朋友。

這兩個耶穌會士待在京城已經足足一個星期了，宮廷卻不曾傳召覲見。有一天早晨，一個上氣不接下氣的信差來到他們住宿的地方，捎來皇帝的緊急音信：大鐘不再報時了！利瑪竇與龐迪我立刻趕路進宮。兩人越過了宮廷庭院，穿過無數大門，走過無數台階，終於來到放置大鐘的地方，眼前的大鐘靜悄悄的，等著他們兩人來解決問題。他們很快發現負責管大鐘的太監根本一竅不通。

「你教我們調鐘，好嗎？」

「樂意之至，但是這得花兩、三個星期的時間。」

獲得稟報的皇帝，指定四名皇室學府的數學人才向利瑪竇學習如何調那兩座鐘，其中一座大鐘是靠重力計時的，另一座小鐘靠彈簧運作；這兩座鐘要在三天之內送回原址。

另有一天，四名太監上門討教，原來他們是宮廷樂師，奉命向這兩個外國人學習彈奏古鋼琴，這也是利瑪竇贈給皇上的禮物。樂師登門求見，伏服拜倒，懇求兩位耐心傾囊相授，如果他們學得慢，請勿動怒。其實這四人資質不錯，短短一個月內已學會彈奏古鋼琴。然而他們沒有合適的樂譜可用，於是利瑪竇完成切合中國人心的八首小品歌曲創作。四名太監學會了，在皇上面前獻唱。過了幾天，整個北京城人人都在哼唱。

這些象徵性的服務使得龍心大悅，到了二月底，利瑪竇與龐迪我接獲通知，獲准覲見皇上。他們等待這個大日子的來臨，希望獲准跟「天子」講話。

結果他們完全失望了。覲見的時間定在破曉時分，過程行禮如儀十分考究，一切排場可以說是為了提高蒙恩覲見者的期待，益增天子尊威。從頭到尾根本就是空洞的一場秀，皇帝並未現身。其實萬曆皇帝在位的最後十六年，除了嬪妃與宦官，根本不見其他任何人，擔心遭暗殺、自慚形穢的他，無異成了他自己帝國中心的囚犯。長年懶散怠惰，年僅 38 歲的他，一身鬆垮的肌肉，加上細細的假音，使他羞於見人。他是個可鄙殘暴的人，貪婪無度，一心沉迷於後宮的 45 個嬪妃美色，以及把玩的玉器。單單一年之內，他向景德鎮訂購的杯碟，多達兩萬七千個，高腳酒杯六千五百個，養金魚用的大缸七百個。

這個發現讓利瑪竇看清自己的心血白費了。他還想要爭取萬曆皇帝皈依基督宗教，如今看來是荒謬之至！雖然如此，從這個傀儡皇帝口中說出的話，卻是行之於全國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利瑪竇不得不繼續選邊站，以便貫徹引導他來到中國的傳教使命。

利瑪竇以他的科學長才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他因此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權威與聲望之高，無人能及。身為天文學家，他

校正了皇宮太監所做的大而無當的天文觀測台之誤謬；他推出較準確的年曆，這對全國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他預測了日月蝕發生的時間，繪製的地圖為中國前所未見。這些事情後來傳到了皇帝那裡，激發萬曆皇帝無邊的興趣；他要求利瑪竇再繪製一張地圖。憑著最後這項服務，利瑪竇終於爭取到他長久以來企盼獲得的定居中國的許可，這可是空前的特許認可。

廣結善緣 不忘傳教初衷

利瑪竇除了是個學者，懂得天文與複雜時鐘內部的設計，他更是來到中國傳揚基督福音的使徒，隨時伺機而動。他宣揚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並非憑藉科學知識，而是與生俱來的本事：善於與人建立友誼，對人們發揮影響力。

靠著他廣結的善緣，他才能夠克服重重難關，抵達北京。他的友人主動幫助他深入中國文化，了解中國人的心態，協助他寫下不亞於中國文學經典的著作；最後一點，他結交了許多地位崇高的官吏。

同時他從未忘了自己的傳教使命。他帶領最要好的友人信奉基督，使他們成為他有系統的傳教工作中的使徒與合作者。他最早結識的友人包括瞿太素、李之藻與徐光啟三人。

瞿太素是利瑪竇最早認識的中國友人之一，瞿太素幫助利瑪竇度過多次非常危急的場合，不過他與低階層出身的一名愛妾同居，不肯讓她成為合法的唯一妻子。利瑪竇並沒有設法讓他皈依天主教，雖然如此兩人情誼始終堅固。

李之藻這位中國的地理學者，遇到利瑪竇時年四十歲，他出身軍人世家，二十一歲以名列前茅的成績，在全部 292 名進士中排名第八。他歷任朝廷要職，偏重工務與軍務。利瑪竇抵達北京

不久，兩人一見如故，變成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利瑪竇欣賞李之藻身為地理學者的聰穎才幹，李之藻為利瑪竇所繪的世界地圖所震懾，對他精通科學感到嘆服。兩人合作完成許多著作，李之藻懂得製造各式各樣的測量器械，他還翻譯了好幾本柯拉維的著作，完成第一本以中文詳細說明開平方與立方根以及分數小數的數學問題。利瑪竇在名為《天體論》的著作中添加了一首包含420韻的詩，介紹二十八個中國星宿的名字、位置以及亮度，詩句簡易明白。此書由李之藻將它譯成了中文。

皈依天主教

離開杭州老家多年的李之藻，在北京朝廷任職期間罹患重病，此前利瑪竇已經對他傳教九年之久，為此利瑪竇遭到其他耶穌會士批評，說他花費太多時間於一個僅止於理智信服、卻不肯革除納妾習性的人身上。利瑪竇眼光看得遠，他確信李之藻的皈依，可望產生重大的影響。病重的李之藻接受利瑪竇的勸導，只保留一個愛妾做為合法的妻子，其餘的一概遣散，然後接受洗禮，取聖名良。病重的李之藻許下諾言，要是他病癒，他將奉獻餘生給天主。他真的信守承諾。

徐光啟大學士，1562年生於上海，19歲考取秀才，他認識多位在蘇州的傳教士，後來在南京，由利瑪竇親自為他講授教義道理。1601年，他上京應考，成績斐然，名列第七。不料當局發現錄取了301人，多錄取了一名，於是主考官隨便劃掉一人，正好刷掉的是徐光啟。

1603年，徐光啟返回南京與利瑪竇會面，利瑪竇為他付洗，取聖名保祿。1604年春天，徐氏返回北京，參加第二次考試。他雖然過了關，成績卻並不理想，無法待在京城。利瑪竇鼓勵他再

接再厲。1604年6月，徐光啟金榜題名，名列前五名。

徐光啟成了傳教士們的保護者兼友人，是「教會的支柱」。他確信著書立說是傳揚基督教義的最佳途徑，鼓勵利瑪竇文以載道。利瑪竇仿效傳介佛教入中國的印度僧人按照傳統所編纂的《四十二章經》，寫成《二十五言》，徐光啟為這本書寫跋。後來他還與利瑪竇合作，由利氏口述，徐氏筆記，完成公元前三世紀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Euclid）前五本著作的翻譯工作。

這些書全都為了協助傳教工作。「你不必駁斥佛教」，另一位博聞明智的友人告訴利瑪竇，「繼續教數學，等我的同胞發現了世界的真相，他們就會看清佛教的不實。」

這樣做還有另一個因素。中國人自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優越，只有他們才擁有真理。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將削弱這個信念，有助於福音宣講。

播種與收割

利瑪竇想到自己的努力與成果不成比例，為此煩惱不已，在中國皈依天主教的人數，遠比不上印度與日本的教友人數。究其原因，他採取一對一的傳教方式，進度慢是其中之一，此外，中國納妾風氣盛行。

根據克洛寧（Cronin）的描述，這些妻妾，「猶如皇帝般是股看不見的強大力量，她們各以花卉命名，例如梨花、蘭花、菊花等等。她們藏身在每個繪畫屏風的後面，是利瑪竇最可怕的敵手，利瑪竇苦口婆心勸導了半天，只要這些妻妾一撒嬌，就破了功。」利瑪竇曾在一封致總會長阿奎維瓦的書信中提到這個難題，他甚至暗示解決之道。

不久，傳統的宗教禮儀成為另一個難題，後來引發無止盡的

討論。其中一些明顯屬於迷信，利瑪竇毫不遲疑地捨棄它們。不過還有一些禮儀卻有理可解，例如在已亡者墓前以及家家戶戶的祖先牌位前置放祭祀食品的習慣，代表的是慎終追遠的意思，是生者對已故親人的親情愛意與尊敬之心，這樣做能使生者得到安慰，並不意味著死者真的來吃這些祭品。

利瑪竇不想擅自做決定，於是將這個問題提報范禮安。根據中國文化的祭祖行為，是否並未公開違反天主教信仰，是否可以為教會所接受？又西方文化是否應強加於中國文化之上？

范禮安曾面對日本同樣難題的挑戰，經驗告訴他因地制宜的文化適應是必須的。同樣的情況適用於中國。他事先早已懇求教宗授權晉升中國青年當神父，以及准予採用適合中國習慣的宗教禮儀，特別是彌撒中採用中文，讓教友上教堂頭戴頭紗，因為參加宗教禮儀不帶頭紗被認為是不敬的行為。

儘管有這些困難，教會仍蓬勃發展，信友人數大量增加。及至 1610 年利瑪竇去世時，傳教中心增加為五個，包括蘇州、南昌、南京、北京以及上海。耶穌會士增加到 16 人，北京的天主教信徒增加到 150 人，整個中國的教友人數增加到 2,500 人。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初學院。這樣的成績還不壞，利瑪竇的才幹與努力厥功甚偉。他在 1597 年獲任命為中國傳教區會長，正式確認了他的領導地位。

冠冕

1610 年 5 月，利瑪竇的工作忙累至極。當時 500 多名官吏蜂擁至北京，進行每三年一次的朝覲活動，同時許多人赴京趕考，這些人前來拜望利瑪竇，利瑪竇基於禮節必須一一回拜。

5 月 3 日這一天，利瑪竇返家因疲累不堪直接上床休息。當

時他對同伴說他再也起不來了。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儘管他的同伴費心照料，他的友人派來醫生羣開藥治療，一切對他都無濟於事。病人神志昏亂，竟看到了他內心希望引導整個中國與皇帝皈依天主的夢想實現。他似乎看到了萬曆皇帝出宮，來到新建的教堂視察。

「我是既憂且喜，究竟哪個感覺較多，我也說不上來；想到就要去面見天主，內心充滿了喜悅；可是要離開各位，而且傳教工作處於這種狀況，我的內心充滿愁緒。」他對熊三拔神父（de Ursis）說。

八天之後，1610年5月11日，太陽剛在北京西門沉落時，利瑪竇安詳的離開了人世，沒有任何人察覺到異狀。

由於北京城內禁止埋葬，耶穌會士同伴有意將利瑪竇安葬在北京市郊區。然而信徒們堅持利瑪竇應獲哀榮，而且應該向皇帝爭取一塊墳地，傳教工作將會因此獲得鞏固。這是只有偉人才配享的特權，然而利瑪竇是個例外，畢竟他已著作等身，而且大家都知道皇帝相當敬重利瑪竇。結果天子樂於將靠近西牆的一塊地賜予利瑪竇，作為安葬之用。

這一來就好像在中國生了根——一粒麥子落在地裡。

陸德

(Alexander de Rhodes, 1593-1660)

民族英雄

越南分北中南三個地區，在十七世紀這三個區各自為政：北部舊稱東京區，中部是安南，南部是交趾支那。三個地區的語言相同，就像華語，屬於聲調語言。中國統治越南長達一千多年（西元前 207 年或者 208 年到西元 938 年），在此期間，中國引進文書系統，但是很少人學習。第一批傳教士嘗試將羅馬拼音引入，稍有成就。令人稱奇的是，部分聲調的音譯，居然保留當初設計的傳教士所屬國籍葡萄牙與義大利的文字遺緒。當陸德抵達越南時，上述系統多少已經定型，但是他卻是以系統分析越南語的第一人，他的同伴想出來的這套方法經他改良之後，編纂成字典與文法，越南國語於是誕生了。陸德神父的努力推廣有功，越南感佩之餘，公認他是民族英雄，在西貢甚至有一條街道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究竟這位意志堅決的耶穌會士是何許人也？

周遊世界者

陸德出生於法國亞味儂（Avignon），不過他的先祖卻是來自西班牙卡拉塔尤（Calatayud）的猶太人。西班牙的猶太人在 1492 年遭到驅逐，他的祖先則是在此之前即移居法國，並且改信天主教。法國傳記作家在陸德身上發現他兼具普羅旺斯人（Proven-

çal) 與猶太人的特質：同時兼備獅子與鰻魚的性格。也有人指責他好浮誇：聽他講自己，必須打個七折八扣。

用「周遊列國與傳教」來形容他的自傳再貼切不過。他的第一段旅程是 1611 年 4 月 14 日十八歲時前往羅馬進聖安德初學院。他說他進初學院的主要理由是耶穌會將可讓他有機會「走出歐洲，前往東印度。」

他隨身帶的行李不多（行李清單至今仍保留著），可是他憑著在家鄉亞味儂耶穌會接受的充實的人文研究才學，以及與生俱來的語言天分，終其一生優遊於十一、二國之間。

在初學院就讀期間，他申請遠赴日本傳教，不過直到他進羅馬大學研讀神學，才獲得批准，那時正逢 1618 年復活節。他還專心修習數學半年，其中包括天文學。這是受到利瑪竇在北京的成功經驗所啟發。

按照慣例，他從里斯本啟航，在當地等候期間，他利用時間學會了葡萄牙語文。他搭的船在 1619 年 4 月 4 日揚帆啟碇，在同年 10 月 9 日安抵印度臥亞。

正當此時從日本傳來的消息很不樂觀。原來日本首屈一指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已在 1587 年下令禁止基督教傳教；他的繼承者德川秀忠從 1615 年起展開迫害基督教的行動；最好等風波沉寂之後再動身不遲。等了兩年半，陸德接獲出發的指令，1623 年 5 月 29 日，他抵達澳門，開始勤習日本語文。不料自 1623 年起，在第三任幕府將軍德川家光的統治下，基督徒遭到的迫害更甚於前，達到空前地步。日本對外粗暴堅決地關閉了大門，等著進入日本的耶穌會士，接獲其他派令。就這樣陸德奉派到交趾支那。

移居的國家

六名耶穌會士在 1624 年 12 月從澳門出航南下，目的地是會安 (Faifo) 港。當時三十三歲，留了一大把鬍鬚的陸德，也是其中一份子，他首先關心的是學習新的語文。根據他的記載，「我聽當地人講話，尤其是婦女的談話，我覺得那聲音簡直就像啁啾鳥語，我頓時喪失了學話的意願。所有的字都是單音節，聲調不同，意義不同。換句話說，越南話就像在唱歌。」

陸德以年輕時期的滿腔熱誠去學這個像歌唱般的語言。協助他的是「越南話講得非常流利的可敬神父方濟·賓納 (Francisco da Pina)」，陸德還認真研究這位神父的講道，此外還有一個男孩教他學各式各樣的聲調以及發音。「這個男孩聽不懂我的話，而我也聽不懂他的話，可是他非常聰明，他能馬上了解我的意思。」不出四個月，他已學到足以了解別人意思的地步；再兩個月後，他已能上台講道，而他的同學此時還得靠通譯員幫忙。

陸德學會了越南話以後，也就是在抵達越南一年半之後，他奉派前往北部的東京王國去建立一個新的教會，當地的語言是一樣的。到東京王國沒有直通的道路，我們這位周遊列國者，選擇經澳門上路，他在 1627 年 3 月 19 日抵達東京王國。當地國王極熱誠地接待他，為他蓋了一座房子和教堂。陸德的聲名遠播，許多人都前來聽他講道，而他一天只宣講四次，有時候是六次。國王的一個妹妹和十七個親友都接受洗禮。短短一年之內，當地受洗人數增加到 200 人，第二年信友人數躍增到 2,000 人，又過了一年，信眾增加到 3,500 人。

惡運當頭

王室庇蔭下的好景只維持了三年，改信天主教者因遵守新教規而導致他們身邊的妻妾與術士處境不利，開始出現反彈聲浪。這些勢力不費吹灰之力就勸服了國王，因為擁有無數後宮嬪妃的國王，自己也覺得尊嚴與利益受到了影響。至此即便陸德個人的魅力，或者他能事先準確預言月蝕的本事，乃至饋贈前所未見的手錶等等，都不足以扭轉惡運。國王嚴禁他的子民接受基督信仰，違者處以極重的刑罰；第二道敕令最後的結語是：「茲此公布嚴禁探訪基督教傳教士或者研讀教律等行為，違者概以死刑論處。」

陸德將他的 5,000 多名基督徒託付給他的三個傳教員——方濟、安德和納爵。1630 年 5 月初，他搭乘一艘葡萄牙船隻「諾亞號」前往澳門。越南當局事後還公布了另一道官方命令，警告他不得再現身越南，否則越南當局不再容忍。

陸德對越南有功，可是事實上他卻受到不相稱的待遇。他在這個移居的國度所待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不過七、八年；他自己告訴我們，早期的傳教士是「那不勒斯人方濟·布左密神父（**Francesco Buzomi**），他是交趾支那真正的使徒，他辛苦耕耘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他的英勇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表揚，另外一人是在日本殉道的狄歐戈·卡瓦荷神父（**Diogo Carvalho**）」雖然如此，越南人卻尊崇陸德神父，並尊他為越南的福音傳道者。何以如此？

原來陸德初到越南，立刻獲得勞工階層的歡心。這可以說明他所說的眾多受洗人數，與他同時代的人都沒有人否認，雖然有部分現代歷史學家對此抱持懷疑。或許就是因為引領太多人受洗才遭到驅逐出境。此外，另一個事實是：陸德結交不少狂熱的佛

教徒，他還根據佛教僧侶的規定與實修制度，為傳教員訂立了行事法則與實踐準則。

至於採用的方法，陸德跟利瑪竇、諾比理的想法一樣。他也是尊重當地習俗：「我反對強迫新教友一下子切斷他們祖傳習俗的作法，這樣做會使得他們無法在全國自由通行，他們的親族鄰友也不可能接納他們。福音要求他們要從心裡拔除邪惡的根苗，並沒有要求他們剪掉頭上的長髮。」

至於他對宗教信仰的態度，則迥然不同。他認為東方的宗教只是迷信，他也如此大加抨擊。

初期的順利推展，讓人以為遠景看好，想不到他竟然遭驅逐到澳門，在此待了十年之久（1631-1640）。此地離中國非常近，卻不得其門而入，這一點令他非常傷心。他在此地教授倫理神學，為新一批準備領洗的中國望教友講道，然而這位具有語言天分的人，卻學不好華語，不得不請人口譯來傳達他所宣講的道理內容，「這點並不足以讓人改信天主教。」

重返交趾支那

然而陸德確實返回他的第二祖國。1639年，越南王下了一道新的命令，將所有傳教士驅離，交趾支那的傳教事業不得不放棄。一年之後，多位耶穌會會長設法恢復越南的傳教活動，並將此重任託付給陸德，而他總能立刻承擔起艱鉅的任務。

他在1640年2月間抵達會安港，獲得當地首長的協助，一位日本人將他引薦給國王。

陸德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他花盡所有錢財（這筆錢本來應該足夠他一年開銷），去購買禮物贈送國王。他達到了贏取王室支持的目的，彷彿為彌補過去虛耗的光陰，他展開狂熱的活

動；在短短三十五天之內，他走遍歸和（Sinhua）省各地。

不過根據文書記載，他並無法在這個移居的國度長久居住。他回到會安後，接獲來自真成族（Cham）首長的唐突命令，要求他必須離境，「即使他必須走在水上」。他帶著他的耶穌會同伴以及三名年輕的新教徒，一起搭乘一艘小船橫渡海南（Hainan）灣，於 1640 年 9 月 20 日在澳門上岸。這是他第四次來到這個葡萄牙的殖民地。

到了聖誕節，他又返回交趾支那，這一次他帶了一個新的同伴，兩人到南部各省去探視教友。不到半年，他又被過去同一位地方首長發現蹤跡，只好再度離境。但因駛往澳門的船隻已經啟航了，他改搭一艘駛往菲律賓的船，再從菲律賓折返澳門。

越南的第一個殉教者

他並未打退堂鼓，1644 年 1 月間，他再度現身於交趾支那，與過去認識的傳教員重新取得聯絡，可是從前跟他過不去的那位首長，從首都捎來要展開驅離基督徒，以及處決傳教員納爵的敕令。納爵設法逃過一劫，官府的人逮捕了年紀才十九歲的安德，定他死罪。陸德獲准前往探監，並在執行死刑的過程中協助他堅毅不屈。

1645 年 7 月 26 日這一天，陸德整天陪著安德，士兵們無法以矛槍刺戮這個年輕人的心臟，便改以兩把短彎刀砍下他的頭顱。陸德收了屍，將安德的遺體運到澳門，他的頭顱經妥善保存送到了羅馬保存至今。安德是越南第一個殉教者，他的英勇與尊貴，令那位出手迫害他的首長印象十分深刻，從此退隱山林，最後皈依基督。

陸德假裝搭船前往澳門，不過到了離岸三哩處，他卻改搭另

一艘早已等候多時的小船，再度返回越南；迫害基督徒的活動變本加厲，陸德與傳教員納爵逃不過警衛的監視。1644年12月26日早晨，他們兩人躲在小船裡被人發現了。次年3月3日，陸德被判終生驅逐出境，不過他一直拖到7月3日才搭船離開。遭驅離的那一天，地方行政官到場監督，登船宣讀判令，警告船長不得再將陸德載回到交趾支那來，否則將遭砍頭。

三天之後，傳教員納爵與文生雙雙遭砍頭殉難，另有七人遭到割下一根手指頭的嚴厲處分。

7月23日，陸德第七度在澳門上了岸，當時他說了一段話：「我的肉體離開了交趾支那，但我的心絕對沒有離開；我的心留在那兒，也留在東京王國。千真萬確的，我整個心都留在這兩個地方，我想這顆心永遠也離不開那兒了。」

浪跡天涯的猶太人

陸德雖然深愛越南，越南卻對他做出斬草除根的動作。他展開三管齊下的任務：要求教宗任命有權晉升越南籍神父的主教數人，向基督宗教國家的親王募款，同時向耶穌會總會長要人。不過這位老兄個性使然，返回歐洲之路也別開生面。

1645年12月20日，他已不知是第幾次離開澳門了。或許因為葡萄牙船隻在印度臥亞停留時間不夠長久，或者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陸德本人不喜歡葡萄牙人，總之，他搭上了一艘駛經爪哇的荷蘭船。在爪哇有不少法國天主教徒被剝奪了宗教自由，陸德憐憫他們，在主日他邀請這些人來參加他主持的彌撒。這在當地是重罪，他被逮捕、監禁、審判、定罪。過了三個月，來了一個新的首長，此人認得他，這才將他釋放。

離開難以容忍的荷蘭人，他冒險搭上一艘葡萄牙划艇，前往

孟加錫（Macassar）。這個地方距歐洲更遠了，但是他不得不離開那個「不侍奉吾主」的國家。

到了孟加錫，他改搭一艘英國船，在 1647 年 9 月 30 日抵達印度西岸的蘇拉特，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已設址於此。他在當地受到一位法國嘉布遣會神父方濟·傑農（François Zenon）的款待，整整待了四個月才動身繼續踏上返回歐洲的路程。

此後的返家旅程他改走陸路，橫越波斯、亞美尼亞以及安納托利亞（Anatolia）。這是一段艱險但是較近的旅程。1648 年 3 月 3 日，他改搭另一艘英國船，不到一個月就抵達靠近歐姆茲（Ormuz）的一個港口。同月 18 日，他展開漫長的旅程。從歐姆茲到伊斯法罕（Ispahan），他與一名法國人和一名法蘭德斯人同行，「這兩人都屬喀爾文教派。除了這一點，這兩人倒是非常誠實的人。」從伊斯法罕到米堤亞（Media）的古都陶里斯（Tavris），他與共有 150 名亞美尼亞人的旅行隊同行。他橫越緊鄰土耳其的整個上亞美尼亞地區，直抵他旅程中的第一個土耳其城鎮阿如隆（Arzuron）。此後旅行隊一行在冰天雪地中前進，自歐姆茲踏上歸程以來整整一年之後，他在 1649 年 3 月 17 日抵達地中海濱的斯密納（Smirna）。

當地的法國耶穌會士熱烈歡迎他。他跟他們一起共度聖週，不久之後他搭乘一艘熱那亞的船隻，在船上遇到他初學院的同學，1649 年 6 月 27 日，他終於安抵羅馬，「就跟三十一年前滿懷抱負遠赴印度時一樣，傳教心火依然炙熱。」

羅馬錯綜糾葛

他懷著熱誠推動手邊的工作，首先他擬訂了活動計畫，他跟羅馬教廷圈內人取得聯繫，四處登門求見，在許多前廳枯候，他

還設法爭取可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們的支持。

同時在這段期間，他出版了四本著作：1650年出版《耶穌會神父在東京王國宣揚福音快樂征服信眾的故事》（*Story of the happy conquests of the faith preached by the Fath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the kingdom of Tongking*）；1651年出版涵蓋完整文法的《越南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字典》，以及《望教友必備要理問答》（*Catechism for those who wish to receive baptism*）；1653年則出版他的《行腳遊記與傳教心得》（*Travels and missions*），這本書在1854年由奧古斯都·卡拉永（August Carayon）在巴黎重印再版。

不過他過得並不順心。因為由教廷任命主教，將與葡萄牙國王對葡屬殖民地掌有的主教任命權相抵觸。當年葡萄牙對東印度的傳教活動正是獨攬大權的局面。為此有人提議為這些非教友地區任命主教，並且要避免葡萄牙當局以及教廷傳信部之間的衝突。教宗諾森十世（Innocence X）對此感到興趣，便將此事交給傳信部去處理；樞機主教們開了兩次會議討論，責成聖部國務卿狄翁尼吉·馬薩里（Dionigi Massari）和陸德去解決問題。1651年8月1日，馬薩里提議派出一位宗主教以及十二位主教。他將提案呈報教宗簽署，可是教宗擔心大批歐洲高階教士湧到，恐怕會觸怒葡萄牙當局，同時損及在地執政當局的情感，遲遲不肯簽字。

顯然馬薩里行事太草率了，然而陸德並不氣餒。他重提要求，將派遣的主教人數減至一人。傳信部再度討論此事，1652年7月30日作成決議，將任命一位教區神父通盤研究這個問題，範圍擴及整個東方。

這個結果對陸德來說簡直是痛苦的打擊，因為這無異宣告無限期延後解決問題，只怪時機不對，陸德心裡明白最好把注意力

轉到另外兩方面去。

募款高手

1652年9月11日，陸德離開羅馬回到法國。他整個人恢復精神抖擻，心情愉快。「法國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國家，它將會給我人手，我一定能找到法子爭取派遣主教。」他寫道。

他返回亞味儂一趟，然後轉往巴黎。1653年1月31日，他獲引薦到宮廷，喚起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以及母后安妮的興趣。這個人始終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所講述的事情，自然是真實可靠的。

不久捐款源源不斷而來。法國王后捐贈給他八千法郎，聖體聖事協會願支付二十名傳教士前往東方旅途的開銷，總計需要兩萬法郎，外加六千法郎供雜項開支。其他捐款者則承擔供傳教士遠征的兩艘船隻所需的費用。此外，法國耶穌會也熱烈響應。

陸德沒有忽略他的第三項計畫——尋找人力，這方面可是不乏志願者。耶穌會總會長哥斯文·尼可（Goswin Nickel）給他一份名單，其中包括十八名共來自六個省，每省各三人的耶穌會士，要他組團上路。這是磨難的開始，這些人將影響陸德本人的前程。照他本人的意思是希望走他已經歷險過的陸路，其中一個理由是為了避免跟享有特權到令人眼紅的葡萄牙當局發生齟齬。尼可本人與葡萄牙國王若望四世有過節，後者指控他未響應葡萄牙的提議：葡萄牙國王希望在1655年春天以前要到60名傳教士。

在這種氣氛之下，總會長不得不設法滿足葡萄牙國王的部分要求；於是他決定將原本調給陸德的十八人，挪出十一名法國人與兩名義大利人派到東亞，這些人不一定要派往中南半島，這十三人接獲指令要前往里斯本報到；其餘五人加上陸德與一個波蘭

人一行，則可從馬賽港（Marseilles）出發，駛往波斯。

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打擊，讓陸德深受重傷。他本來還指望返回越南，如今他的夢碎了。他據理力爭，但是尼可堅持立場。

陸德爭取派主教到中南半島的努力，運氣也不好。當時共有三股勢力在競爭：教廷傳信部一心想要結合全球的傳教活動；耶穌會耕耘多年，希望保留自己的傳統以及自主權；此外法國主教團，雖然樂意派遣傳教士，也願意資助，卻也熱中於維持自身的獨立自主。

陸德這方面的工作，要等到後來才能看到結果。暫時他只能設法讓一羣法國主教感到興趣，這羣主教是以駐在法國東北部蘭斯（Pheims）市的主教為首，找來了幾位能幹的神父。第一批現代傳教工作的傳教區代牧，就是由這些人當中遴選出來的。然而到了1658年，陸德已來到伊斯法罕。

偏僻的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是一個前哨站，由此東去可通往西藏、蒙古、中國以及遠東。

伊斯法罕是波斯國王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在1598年興建的國都。當陸德於1647-1648年途經此地時，他發現這是他所知世上「最美好的一個城市」。伊斯法罕城內街道寬敞、筆直、一眼望去看不到路的盡頭，城市中央有個美麗的廣場，「正如巴黎的王宮廣場，可是規模更大，是羅馬納弗那廣場（Piazza Navona）的兩倍大。」奧斯定會、跣足聖衣會以及嘉布遣會在此都設有修院，後者更獲得最像基督徒的國王的支持，修院內所有人全是法國人。

兩位前後任耶穌會總會長皮可洛米尼（Piccolomini）（1649-

1651) 與尼可 (1652-1664)，都十分積極地想要找出一條抵達印度與遠東的快速通路，這不但是為派赴這些國家的耶穌會遠征隊著想，也為了通訊之便，畢竟在耶穌會的行政管理方面，這是重要的一環。有些信件竟然要花費五年、七年，甚至十七年才送達目的地。因此陸德奉命前往伊斯法罕，是在回應一項認真的策略，而且，這樣做符合傳教修會的目的。這些都是理由之一，但真正的原因是葡萄牙宣布陸德為東印度「不受歡迎人物」，而且在歐洲他更是不受歡迎。

因此，這位最活躍的人物就被擺到「他所知的最美城市」的僻遠角落，根據多位傳記作家的說法，一致認為陸德在世的最後六年 (1655-1660) 是他一生當中最哀傷的時期。

他抵達伊斯法罕時已經六十歲了，他開始學習新語言，並展開他喜愛的傳教工作：為生命垂危的嬰兒付洗。要知道在回教國家要推展基督宗教的事業是很困難的，陸德始終坦承回教徒是最難引領入教的。雖然如此，回教國王與內閣部長對伊斯法罕市內的奧斯定會士與聖衣會以及嘉布遣會常展現善意。當時有一位好管閒事的耶穌會士方濟·里戈迪，輕率地做出政治性的承諾，幾乎破壞了這種和諧關係，幸虧陸德與他的耶穌會同伴亞米·柴饒德 (Aime Chézaud) 出面，才避免了危機。

不出所料，有幾位耶穌會士循陸德走過的陸路途經伊斯法罕。若望·古魯伯 (Johann Grüber) 與伯納德·狄斯特爾 (Bernhard Diestel) 在前往中國途中，於 1656 年抵達伊斯法罕。陸德建議他們要先到印度臥亞，再搭船到澳門；古魯伯在五年之後反向從中國的甘肅，經西藏拉薩、印度阿格拉、波斯、土耳其，直到 1664 年 2 月 2 日才返抵羅馬。然而在他回程途經伊斯法罕時，卻已見不到陸德。

1658年11月17日由教宗歷山七世晉陞的主教、新任越南東京傳教區代牧方濟·巴祿（Francois Pallu），在兩年後循同一路徑途經伊斯法罕時，也見不到陸德。原來這位開路先鋒，提議設立主教的催生者，早在1660年11月5日離開人世了。

柴饒德在發布陸德訃聞通告時附加的以下幾行字，真可以用來作為墓誌銘：

「支撐我們房子的這根主柱倒下了；照亮我們的火把熄滅了；但是埋葬在此的這位開路先鋒與傳教先驅，將永遠成為這棟房子的基石。」

羅伯·諾比理

(Roberto De Nobili, 1577-1656)

The Paranghis

諾比理神父在 1606 年 11 月 15 日左右抵達印度南部城市馬度雷 (Madurai)，協助龔薩洛·費南德茲 (Gonçalo Fernandez) 神父推廣教區傳教工作，過不久他就發現他的上司只能帶領印度社會低下階層認識天主教，而無法引導更多中上階層人士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原來當地人將他們歸類於 paranghi 同一族羣，這個字是由回教徒自十字軍東征時代以降，用來指歐洲人的 faranghe 一字所衍生出來的。在印度南部，paranghi 這個字專指葡萄牙人以及跟他們有關的任何事物：包括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等等。

其實印度人對 Paranghis 許多特質甚感敬佩：幹勁十足、勇往直前、善於積財、績效卓著；然而印度人對他們的其他許多惡行惡狀也覺得很討厭：放肆不羈、男女雜交、吃牛肉、愛喝酒。所有邪惡行為都跟 Paranghism 有關。難處在於大好人費南德茲神父，跟其他許多傳教士一樣，將基督教與 Paranghism 混為一談，還強迫受洗的新教友接受歐洲的文化習性。這如何能夠吸引自尊心強的人來改信基督呢？

諾比理打從一開始就認清了這一點。上述的身分認同並不正確，且將帶來不利影響，必須設法以言以行加以破除，他認為應該避免引進歐洲的生活習慣，而改採高階種姓印度人的禮儀和生活習慣。他身為修道人，過的是悔罪與貞潔的生活；但他還想採

納印度教僧侶的克己苦修，甚至改穿他們的服裝。至於新教友，他將不要求對方西化，他只管付洗的工作。

他將部分建議草案呈報義大利裔省會長雅伯·雷吉歐，雷吉歐再將這些草案轉呈當時管轄馬度雷的總主教方濟·洛斯（Francisco Ros）過目，洛斯再與臥亞總主教亞歷西斯·孟尼茲（Alexis Menezes）磋商。兩位教長均批可，但雷吉歐並不因此感到安心，他又去找其他可商量的人聽取意見。這些他討教的人只對一點有意見：耶穌會士穿的服裝要跟印度僧侶（Sannyasi）一樣嗎？雷吉歐感到失望，但是並未堅持己見，服裝的問題只好容後再議，同時諾比理神父可以開始實驗他的主張。

分裂

諾比理立刻改頭換面，看得費南德茲怵目驚心，他發覺身旁這個年輕的助理，不再講葡萄牙語，且跟 Paranghi 劃清界線，他講一口純正的泰米爾語（Tamil），絕不吃肉類、蛋類、也不吃魚。儘管省會長與兩位總主教都同意這麼做，費南德茲並不放心；更令他不安的是，雷吉歐以漁場海岸有事要處理，將他調離馬度雷十個月之久（從 1607 年 1 月到 11 月）。

諾比理刻不容緩，在距堂區不遠的地方，為自己興建了兩座茅屋，以示區別。屋內設有餐廳和廚房，還雇用了一個上流社會的廚子。

這一改變果然效果顯著。消息不逕而走，大家都知道新來的神父不是 Paranghi，高階層人士紛紛來到他的簡陋茅屋求見。結果雙方互相吸引，諾比理以溫文爾雅的態度，甚至於無可挑剔的泰米爾語，令印度人折服，而他本人則為來訪者的單純誠懇以及渴望尋求真理的態度所感動。

這些事實讓在教區學校執教鞭的一位年輕貴族印象深刻。他早已同意教諾比里講泰米爾話，但是卻避免跟後者打交道，因為他認為後者還是一個 Paranghi，而今他決定跟他的學生一起聽道理。起先，他對諾比理能操一口純正優雅的泰米爾語，和出色的教學技巧感到驚異；不久他的注意力就從外在形式轉移到教義的內容，這位老師後來成了諾比理的門徒，他接受洗禮。或許是為了感念堅決支持他的省會長雅伯·雷吉歐，諾比理為這位老師取聖名為雅伯。總之在費南德茲神父遠離的這十個月期間，諾比理總共為十幾個人付洗。

等到費南德茲從外地返回，兩人之間的關係出現高度的緊張，最後兩人不得不拆夥。兩人無法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也無法同桌吃飯，要不然諾比理手下的望教友可能會流失。費南德茲抱怨連連，但諾比理讓全城的人都明白，雖然他與費南德茲住得很近，兩人卻吃不同的食物，彼此也不相來往，就連兩人的僕人彼此也不打成一片。

一位起初還心懷疑慮、後來感佩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的精神導師，勸諾比里不要穿 Paranghi 神職人員所穿的黑色長袍，而應該改穿印度僧侶所披的桔黃色束腰外衣。幸運的是，碰巧就在此時，本來反對放棄天主教神父僧服的省區諮議，這時都撤回他們的否決立場。雷吉歐聲稱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改穿大學士儒服並不成問題之後，使他們改變初衷，這個結果真是一大勝利。1607年11月召開磋商會議，同月諾比理開始改穿印度僧侶所穿的桔黃色束腰外衣。

這一步代表他切斷與過去的一切關係——不僅是與龔薩洛·費南德茲的關係。

僧侶貴族

然而這位外國僧侶在印度社會這樣複雜的結構中，究竟處於什麼地位呢？

諾比理神父的年輕友人，開始稱「他的」住屋為「我們的」屋子，稱「他的」教會為「我們的」教會，還以 Aiyer 這個尊稱來稱呼他這位屋主。等到他們有了信任以後，他們開始向諾比理請教許多問題，其中有些是非常私人的，甚至於魯莽的問題，不過他們都以完全開放單純的心以及正確信仰（註一）的態度來發問。譬如問，他出身於什麼樣的家庭？他的種姓可能是哪一種？

這些年輕友人因此得知諾比理來自義大利一個戰將家庭；他的祖先有人曾當過領事，還有人當過船長；有一個叔叔名叫亞斯卡諾·史弗札伯爵（Count Ascagno Sforza），是一位出名的軍事指揮，甚受法國國王查理五世器重。另一位親戚文生（Vincenzo），頭銜是西維提拉伯爵（Count of Civitella），在教宗御林軍中當將軍；而他自己的父親皮耶·方濟（Pier Francesco）曾經帶領步兵在勒班陀打過仗，後來還擔任駐波隆納（Bologna）效忠教宗軍隊的指揮官。據此這些友人獲得以下結論：如果諾比理必須有種姓，最符合他身分的是剎帝利（Kshatriyas）（或寫成 Rajas），既然他選擇修道生活，他應該屬於僧侶貴族（Rajah San-nyasi）這個階級。

有了這個新的身分，諾比理可以在專屬印度高階層人士所住的地區住下去；有關當局撥給他一塊地，他為自己蓋了一間小房子。1608年5月，他搬到新居靜修處去，穿著打扮則與聖哲貴族（Rajarishi）無異。

第一次調查

費南德茲發出抗議之聲，並散播有關諾比理的不實消息：說諾比理已接受印度教禮拜，而且不服從堂區神父以及耶穌會同修。可敬的神父們都開始警覺，省會長雷吉歐神父覺得有必要出面干預。他宣布他將展開徹底的調查，並且採取預防措施，下令諾比理「暫時不要讓異教徒受洗」，直到他澄清某些疑點，「我有意親自到馬度雷來一趟釐清問題。」

諾比理利用這段難得的閒暇時間研習梵文，並且跟馬度雷的最高階層貴族婆羅門種姓建立交情。省會長派給他一位理想的教授，此人名叫西瓦哈瑪（Sivadhama），諾比理的響亮名氣，引起他的注意，不久他就接受天主教信仰，在 1609 年 6 月 7 日聖神降臨節受洗。他是第一位皈依天主教的婆羅門，其他人全是剎帝利。

雷吉歐在 1608 年 8 月底抵達馬度雷，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他與諾比理共同生活，穿一樣的衣服，所有行動在一起，彷彿他是諾比理的門徒。11 月 20 日，他向總會長阿奎維瓦神父報告，說他看到了一個熱心忠誠的基督徒團體。在馬度雷的納亞克（Nayak）王宮的最高階層人士都來看諾比理的住處，並且希望成為他的門徒。由他們的肢體語言看得出來：他們向諾比理鞠躬，合掌在額前，然後雙掌合什垂到胸前躬身作揖。這是門徒確認自己是弟子身分的傳統禮儀。

「這位神父，」報告指出，「操一口純正的泰米爾語，發音之正確，連最愛挑剔的婆羅門專家學者都找不出破綻。他博覽羣書，將書中最精華的部分銘記在心，因此能夠從容不迫的背誦出來，他研讀梵文進步神速。此外他還學會好幾首讚美詩歌，唱腔

完美，所有聽過他吟唱的人，都難掩讚佩神情。」

事實上，他的新教義十分認同印度教經文，還進一步補其不足，有些人因此尊他為 **Munivar**，地位等同於佛陀和耆那教始祖摩訶衍那（**Mahavira**）。據說佛陀與摩訶衍那都曾將婆羅門教的吠陀本集（**Vedas**）補全。諾比理接受這樣的恭維，他告訴慕道友，他遠道而來，目的只有一個：教授他們失落的「第四法」，這跟聖保祿對雅典人說他們敬拜的是不知名的神說法一樣。

雷吉歐跟諾比理共同生活了一個月後，在 1606 年 9 月間帶著第一手資料離開馬度雷，憑著這些資料將足以平息對這位教化先驅的批評聲浪。

耶穌會巡察皮曼塔神父

經過數年的擴張，不少知名印度教大師改信天主教，諾比理還獲得城市當局以及仰慕者的支援。此外，他還喜獲生力軍：他的同胞朋友安東尼奧·維哥（**Antonio Vico**）卸下神學教授的職務，來到印度幫諾比理的忙。就在這個時候，諾比理為了融入婆羅門階層，開始轉變成為婆羅門僧侶（**Brahmin Sannyasi**），而不再是僧侶貴族。他使用婆羅門這個字專指學者，他天生是貴族，職業是婆羅門。

內外存的矛盾是少不了的，內在的矛盾因新領洗的教友彼此間的對立而產生，外在矛盾的出現，則因一再有人指控諾比理事實上也是個 **Paranghi**。諾比理感化的一些信徒開始立場動搖，有些人甚至捨棄跟隨他，不過絕大多數人還是回到他的陣營。

更嚴重的是，他受到了新任耶穌會巡察尼可拉斯·皮曼塔（**Nicolas Pimenta**）的折磨。此人自始就顯露他的敵意，一向不慈憫的龔薩洛·費南德茲，加倍告狀：他在 1610 年 5 月 7 日呈報

巡察一長申備忘錄，譴責諾比理所採取的傳教方法。

接下來的傾軋簡直可以拳擊手在一個接一個回合中輪流獲勝與落敗的情況來形容。

皮曼塔神父假設一切指控屬實，他召集兩位神學家——方濟·弗佳拉（Francisco Vergara）以及安東尼奧·佛南德斯共同評估龔薩洛·費南德茲神父的控訴。兩位神學家確認諾比理的方法是迷信、可恥、違法的，「假設說，」他們謹慎的加了句：「這些指控屬實的話」。

最後這個但書讓皮曼塔神父起疑，他決定參考馬拉巴省諮議們的意見。雷吉歐召集他們，問他們以下兩個問題：

「馬度雷的傳教事業應予廢止抑或改革？」

「若要改革，要做哪些改變？」

雷吉歐於6月20日在交趾（Cochin）召集他的諮商人員，在會中宣讀耶穌會巡察的來函，同時宣讀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來信如下：「我們贊同你所描述的諾比理神父採取的生活方式。」

除了諮商人士，還有其他許多人在場參與，與會人數總共十四人。除了三人之外，其他人一致主張馬度雷的傳教事業要繼續下去，不必做任何改變。

另一波調查

皮曼塔並未因此而收手。7月26日，他下令雷吉歐對馬度雷的新教友就諾比理神父所採用的方法做個調查。雷吉歐自忖不諳泰米爾語，認為最好委託龔薩洛·費南德茲與漁人海岸的一位義大利籍資深傳教士安德·布切里歐（Andrea Buccerio）兩人去辦這件事。

兩人擬就了一份問卷，在9月12日開始調查。見證人的證

詞沒有任何不妥之處。費南德茲神父失望之餘，告假了數天，讓布切里歐單獨承攬調查工作。布切里歐在 9 月 30 日完成調查工作，將調查結果回覆皮曼塔巡察，同時附了一封信，指所有教友都讚揚羅伯·諾比理的作為。

皮曼塔沒等自己下令調查的結果出爐，就在臥亞召集五位想法相同的神學家，以問過方濟·弗佳拉與安東尼奧·佛南德斯的相同問題問他們。這五人的答案不出所料：給新教友披戴神聖織線（janoi）還可以容忍，因為上面有十字架；不過沐浴根本是迷信；新的宗教字彙可能增加嚴重的謬誤；與費南德茲神父拆夥則是製造分裂行為。無論交趾的會議和馬度雷的新教友說什麼都不重要，羅伯·諾比理的傳教方法必須禁止，要是他還有什麼話要說，他最好一吐為快，因為活力充沛的這位耶穌會巡察，就要在下一封信中將破壞力十足的報告呈報總會長，這封信將在 1610 年 11 月間從臥亞寄發。

諾比理立刻採取行動，他請安東尼奧·維哥（Antonio Vico）幫忙。維哥顧及的部分是神學方面，諾比理則針對費南德茲提出的異議一一反駁。這兩人的信分別在 10 月 21 日與 11 月 12 日寄出。此外，克蘭嘉諾爾（Cranganore）總主教方濟·洛斯亦於 1611 年 1 月 21 日寫了一封全面替羅伯·諾比理辯護的信。

阿奎維瓦的謹慎回應

如今競技場已轉移到羅馬，新的裁判是一個有世界觀的人。總會長阿奎維瓦不希望立刻作成判決，顯示對任何一方有利。他為人十分聰明，根本不去查這些猛烈抨擊背後的敵意，他還謹慎地做到不偏不倚，不讓他的同胞占上風，免得與葡萄牙人損上。他的回信在 1612 年 11 月送達印度，距備忘錄送出以後兩年的事

情。同時雷吉歐這位義大利籍省會長，則已卸下省會長職務，繼任者是一位葡萄牙人斐洛·方濟（Pero Francisco），此人一向激烈反對諾比理。

阿奎維瓦的來信主要提到兩點，兼顧雙方的立場：一方面，他建議洛斯總主教與省會長認同諾比理有關改革的意見，但是不要對現有傳教事業構成威脅；另一方面，他又下令諾比理要轉折回頭。最後這一點產生誤導效應，大家以為諾比理是未經長上同意自行其是。第一點對諾比理來說是勝利的，然而第二點，卻要他對他的反對者讓步。諾比理緊抓著第一條不放；而省會長則根據第二點，要求諾比理立刻服從。諾比理以總會長的信為靠山，好整以暇；斐洛·方濟對此的反應是強制要求，結果導致他的事業土崩瓦解。除此之外，諾比理的追隨者之間也發生歧見，因他的對手藉機挑撥。然而，這一切紛擾突然間煙消雲散，只因好鬥的省會長在 1615 年 8 月 8 日猝逝。

繼任者是嘉斯帕·費南德茲（Gaspar Fernandes），此人對諾比理的方法雖然沒有好感，卻秉持公正，跟諾比理展開對話。他在同年 10 月間召他到交趾；諾比理如期赴約，他顯見的聖潔與博學，讓大家開了眼界。同時，阿奎維瓦又寫了一封信取消先前的限制，不過有關許多印度人在頭頂留長一簇頭髮的習慣，還有使用聖線這兩點，羅馬教廷仍在考慮之中。

羅馬 vs 臥亞：2:0

其他高階教士亦加入戰局，情勢更加複雜。洛斯總主教繼續為諾比理辯護；交趾主教兼新任臥亞總主教克里斯托凡·狄薩（Cristóvão de Sá），則出面反對。狄薩急欲執行臥亞省會長的命令，他的前任孟尼茲總主教早已請羅馬處罰這位違反命令、頑抗

的耶穌會士。

教宗保祿五世支持諾比理的做法，他也認為這樣較容易讓印度教徒改信天主教，他在 1616 年 1 月 4 日發布通諭，正如阿奎維瓦早先的做法，在通諭中教宗也諭令兩位總主教應該仔細審查是否准許新教友將髮式以及披戴聖線的用法「基督化」。

教宗通諭於 1617 年 12 月送達臥亞，狄薩總主教感到失望之至；他不願接受，想要宗教法庭出面干預。然而，葡萄牙首席宗教法庭庭長堅持教宗的通諭高於宗教法庭的任何敕令，應該遵守教宗的通諭。

教宗的第二道通諭隨著這個答覆送抵臥亞，力促諾比理與其同伴必須出席會議，就他們的工作與傳教方法參與表決。

會議在 1619 年 2 月 4 日與 5 日舉行，共有二十位神父與主要修會的修士修女與會，其中包括四位耶穌會士，外加洛斯總主教與諾比理。

洛斯與諾比理在會中作了詳盡有力的辯護，然而，除了第二位宗教法庭庭長費璫·狄艾梅達（Fernão de Almeida）以及耶穌會代表，其餘的人都站在狄薩總主教這邊。表決結果壓倒性反對諾比理的做法。

會議紀錄適時呈送葡萄牙首席宗教法庭庭長過目，他研究了之後表示，雖然投票結果反對意見居上風，諾比理的做法卻是正確的。葡萄牙國王接受了這個看法，大批文件轉呈教宗。

繼保祿五世之後上任的教宗是國瑞十五世（Gregory XV），他指定一個由樞機主教與神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去研討這個問題，再把意見呈報上來。當時該委員會主委是愛爾蘭阿瑪總主教伯多祿·隆巴德（Peter Lombard），審定結果對諾比理完全有利，只不過提醒任何拜偶像或迷信的成分都必須去除。教宗接受這個判

決結果，1623年1月31日，他發布了宗徒規戒八書（*Apostolic Constitution Romanae Sedis Antistes*）（註二）。

行腳僧侶

教宗的文件送達印度時是1624年12月，諾比理已經離開馬度雷。原來納亞克王已將王宮遷到提魯契拉帕里（Tiruchirapalli），許多新教友都跟隨他遷徙。諾比理因此放手推動他要其他地方建立中心的計畫，1623年6月，他帶著幾個婆羅門弟子離開馬度雷。

他朝北走到塞勒姆（Salem），敲每一戶人家請人家收留，卻全部吃了閉門羹。最後他在風吹個不停的旅店暫時安棲，住了四十天，病得很痛苦。最後城裡一個地方士紳，將他請到自己的住處安頓。這樣一來，城裡居民的態度立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人們開始聽他講道理，讚佩他，熱情對待他。

當時正在該城尋求庇護的森達曼嘉蘭被罷黜的統治者提魯曼嘉拉·納亞克（Tirumangala Nayak）也常來探望諾比理。此事令塞勒姆的納亞克首席宗教導師感到不安。他想盡辦法不讓提魯曼嘉拉改變宗教信仰，他差一點就成功了。諾比理立刻走人，前往莫拉曼嘉蘭（Moramangalam），提魯曼嘉拉被他的宗教導師所騙，早已來到此地，1625年聖誕節他接受了諾比理的洗禮，全家人跟他同時受洗——共計十二人以及一個不斷茁壯的基督徒社團的核心幹部。

1626年7月31日，一個奇特的人來見諾比理，來者臉上塗滿了灰末，他的身體披掛了許多護身符以及宗教圖案——這是雲遊四海的托鉢僧全部隨身物品。他是一個Valluva，意即賤民階層的僧人。不過在他的兩千名信徒中，除了他所屬的種姓信徒，還

有印度種姓等級最低的首陀羅（sudras）。他看過諾比理的著作《真正宗教記號》（*Signs of the True Religion*），決定成為諾比理的信徒。

他毛遂自薦，乞求諾比理接受他成為信徒之一。諾比理感到尷尬，同時擔心如果他接納了這位 Valluva，他的婆羅門信徒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最後他決定接納這位新的慕道友，由於此人天資聰穎，且精通泰米爾文學，諾比理便按照這個人的資質為他講道理。

這位新入教的信徒捨棄了從前當托鉢僧的所有隨身物件，像個孩童般溫順的受教，謹遵神父的教導，英勇的做了一切必要的犧牲。數月後，10月14日，他受洗了，取名穆克土達揚（Muktiudayan），意即「獲拯救者」。

諾比理終於建立了專屬賤民階層的僧侶型態，稱之為潘達拉老師（pandaraswamis）。第一位信徒名叫巴爾塔薩·達科斯塔（Baltasar da Costa），他在1640年7月4日，露出耳垂，穿上潘達拉服裝，走上街頭。

狂風暴雨

諾比理從莫拉曼嘉蘭來到了提魯契拉帕里，首先他照顧的是當地老早存在的一個小小的基督宗教社團，不久他的注意力就轉移到前來就教的印度人身上。皈依人數不斷增加，上級派了一名助理，又是同胞友人維哥神父。事實上，諾比理要求更多助理，最後他獲得了一名新助理名叫思天·馬亞（Sebastiao Maya）。當時有三個中心：塞勒姆、提魯契拉帕里以及馬度雷（註三）。雷吉歐已再度出任馬拉巴省省會長，他提名諾比理擔任馬度雷的傳教區修會會長。

教務進展神速終於引來迫害。事情發生在提魯契拉帕里，當地的新教友非常狂熱，一心嚮往殉教，隨時找機會捐軀。這樣的事情必須設法節制。穆克土達揚這位賤民僧侶的導師，傾全力感化他從前的追隨者改信天主教，短短時間內便召集了數百人。他們建了一座教堂，他們甚至還未受洗就已從學生跳到老師和門徒身分。他們的活動在 1629 年初一次嚴重的迫害中達到高潮。

穆克土達揚從前的同修瑜伽行者，或稱印度教潘達拉（Hindu Pandarams），十分不滿他的背教與折損這麼多信徒，驚詫之餘怪罪於基督宗教，猶如餓虎撲狼似的，拆毀了教堂，逮捕穆克土達揚以及首要的慕道友，給他們戴上腳銬，無情的毆打他們，逼他們回頭崇拜原來的偶像，然而這些人不為所動。眼看沒輒，加害者只得釋放基督徒；這些基督徒回到家，「對自己為了上主名字的緣故而遭受迫害感到歡欣喜悅。」

諾比理想盡各種辦法低調求見首長，後者立刻應允，且對這個外國人深懂梵文感到驚異。為諾比理的非凡出眾折服的納亞克，馬上批准諾比理可在他的領土內不受限制的傳教與蓋教堂。

潘達拉人暫時按兵不動，而改用巫術對付。其中一人來到諾比理面前，做出扭曲肢體與扮鬼臉等動作，一會兒吼叫，一會兒吐沫，過一下子頓足，甚至以頭擊地。諾比理始終不受干擾，反而還微笑請對方靜下來。諾比理的鎮定激怒了巫師，他取出一盒黑色的東西開始向神父丟了過去，照理神父立刻就會被殺死，但是神父依然安好，這個假巫師就在眾人的譁笑聲中離去。

討不到便宜的這些人，改採老方法對付 Paranghism，這一招向來有效，所有提魯契拉帕里居民都附和反對 Paranghi 打扮成僧侶的抗議聲浪。諾比理以過去遇到這種情況所採取的對策應付：他在棕櫚葉上寫明自己的信仰與行為，將它釘在屋前的一棵樹

上，昭告大家。此後即恢復平靜。

入獄

這場大火就此熄滅了，可是灰燼下爛燒的餘燼仍在，稍微煽風，死灰就會復燃。當時正好有一個林伽派（Lingayat）的富人，請求同屬賤民種姓的新教友將女兒許配給他。後者拒絕了，這個富人發誓報復。他密謀聯合瑜伽行者與潘達拉，決定要除掉諾比理的新助理馬丁斯神父（Fr Martins），以及他所帶的新教友。

這兩派人找到某個有力的盟友，此人名叫凡卡塔拉亞·皮萊（Venkataraya Pillai），這個人頗獲納亞克歡心，因為後者正跟他的妹妹相戀。禁不起大筆金錢的誘惑，加上他自己本人也想參與報復基督徒的計畫，他同意合作行事。1640年7月22日，星期天，馬丁斯神父正準備主持彌撒時，一羣士兵闖入屋內將他逮捕，而準備輔祭的婆羅門人也一起被帶走，同時還有三十名基督徒被捕。

同一天，皮萊派了一個信差到他位於馬度雷的親戚那兒，要他們將諾比理神父以及馬亞抓進監獄。一個年輕的提魯契拉帕里新教友聽說此事，趕到馬度雷通風報訊。兩位神父剛剛藏好聖杯與教堂祭服，迫害者就來到教堂到處掠奪，總計參與掠奪的士兵多達三百人。

劫掠所得全置於奉命執行提魯契拉帕里命令的西凡迪·皮萊腳前。當時的諾比理已經是個半瞎的人，他看不見堆放在那兒的許多聖物，是馬亞告訴他的。接著他以獨特的權威語調痛斥這些冒犯者，警告他們難逃天主的憤怒。

入夜後，兩位神父與三個婆羅門信徒被帶進監獄。逮捕過了十七天，諾比理的同伴講述這件事時，這些人仍在坐監，處境難

堪，既不給衣服換洗，也不給水滌身，吃的東西就只有一點點飯。「但最令我痛苦的，」馬亞後來述說，「是看到羅伯神父風燭殘年，身體脆弱，得不到必需品，只靠意志力在撐的苦況。話說回來，至少我們不像在提魯契拉帕里的馬丁斯神父那樣，帶上手銬腳鐐。」

這件事是趁提魯馬來·納亞克（Tirumalai Nayak）不在的時候發生的，等到他從遠方結束戰事返回，才把被關起來的這些人給釋放了。

諾比理回來後發現自己成了無家可歸的人，除了三十年前開始傳教時住過的那個小茅屋，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如今他只好拖著疲憊的步伐走向這個老屋。

日薄西山

新的紛擾又來了。繼雷吉歐第二任期後上任的省會長是孟諾爾·巴拉達斯（Manoel Barradas），此人在擔任斐洛·方濟與嘉斯帕·費南德茲兩位神父的初學副神師時，便反對諾比理。「時間將證明誰才是正確的。」他曾說過。任何人都看得出來諾比理所採取的方法成效卓著，然而巴拉達斯並不相信。他決定將諾比理調離馬度雷，改派到今天斯里蘭卡北部的港口賈夫納（Jaffna）。他的理由是，該島的氣候比較好，對諾比理的健康有益。諾比理帶四個一向幫他講授教理和寫書的婆羅門一同前往。

然而諾比理的健康並未起色。下一位省會長覺得有必要送他到米拉坡（Mylapore），讓他沒機會傳教，免得健康受損。根據傳統說法，米拉坡是多默使徒告老退休的地方，也是方濟·薩威退休的地方。如今輪到諾比理了。「他高興可以像傳統說法中的多默使徒，在他退隱祈禱的洞室內，沈浸在祈禱的喜悅中，」一

個當代消息人士說，「在城堡外面的花園中，他為自己蓋了一座小小的土茅屋，屋頂用棕櫚葉遮覆。他跟他的四名婆羅門助手一起住在那兒，他每天的時間分成三等分，除了工作，就是祈禱以及作補贖。」

他的工作時間全部用來寫作，他前半生早已完成不少有關指導皈依天主教事宜，福音宣講人員培訓，後期還完成有關傳教士靈修指導等著作。然而他的書籍散落各地，隨時有失落不可復尋的危險；他以梵文寫成的著作早已在他遭到逮捕時被沒收了。儘管如今他已經失明，他仍決定要把所有著作逐一修訂完整。幸虧他有過人的記憶力，他彷彿能夠看著他寫過的文章內容，或者說他之所以想寫書，是因為思潮不由自主澎湃湧來，彷彿就像卷軸在他面前攤開似的。這項艱鉅的工作在 1656 年 1 月初完成，總計他完成了二十大冊。受到忠於教會的感覺驅使，他對他的記述員口述以下最後的聲明：

「我希望我用泰米爾文、泰盧固（Telugu）文以及梵文完成的所有著作，應該都遵從了神聖羅馬天主教會的精神。我懇乞慈母教會俯允更正我可能犯下的任何錯謬失誤，或者會引起反對，或可能造成冒犯的地方。我至誠乞求所有可能複印或者翻譯這些著作者，在每一冊書最後，附載本人的以上聲明。1656 年 1 月 6 日，在聖彤姆（San Thome）。」

他完全失明以後，便無法再主持彌撒，連這個慰藉都被剝奪了，他本想在自己的茅屋終老，然而茅屋正座落在防守的葡萄牙軍隊，與進攻城堡的法國軍隊攻防交火的地帶；因此不得不勒令這位老者遷居。「再會了，親愛的茅舍，」據說諾比理在離開的時候，面向茅屋說了這段話，「他們要我離開你，因為你不再是安全的住所；但我敢說，這個城鎮以及堡壘將因城牆被攻倒，到

處石塊散布而成為廢墟，但你卻仍將屹立不搖。」後來，印度戈爾康達（Golconda）國王夷平了所有房子與城堡的高牆，並命人將石塊運走。

「過了幾天，在 1656 年 1 月 16 日，」年代史編輯在 1656 年度通訊中寫道：「諾比理無疾而終，他蒙受祝福的靈魂直奔天堂。」

註一：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至今不曾出版，也鮮為人知的資料出爐了。似乎有線索顯示，諾比理可能是他生父正式結婚之前，與另一名女子所生的孩子，即使這個男孩子一直是這個家庭中的成員之一。這個資料是由愛爾蘭駐教廷大使傑拉德·歐布洛恩（Gearoid P. O Broin）先生所提供。愛爾蘭大使館設於 Villa Spada al Gianicolo 的寓所，正是由諾比理的兄長文生·諾比理（Vincenzo Nobili）所蓋，歐布洛恩先生是在研究這個家族的歷史時，發現以上真相。

註二：這件事並未就此告一段落，1703 年，查爾斯·湯瑪斯·梅勒·圖蒙（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mon）以教宗特派視察身分，懷著「幾乎無限的權力」，走遍印度各地後，於 1704 年 7 月 11 日頒令譴責同時禁止所謂的「馬拉巴禮儀」（Malabar Rites）。

註三：根據 1644 年的報告，馬度雷教會總共有 4,183 名基督徒；其中 1,208 人是高階種姓人士，2,975 人屬於低階種姓者。

若望·布理道

(John De Brito, 1647-1693)

一位葡萄牙貴族

羅伯·諾比理的案例乍看之下似乎是贊成融合地方文化的義大利人，與持反對態度的葡萄牙人彼此鬥爭的寫照。事實不然，我們看到有好幾位葡萄牙籍耶穌會神父，跟諾比理並肩共事，也遵循同一傳教方法。下面介紹的這一位出身葡萄牙貴族家庭，是葡萄牙爭取擺脫西班牙統治獨立戰爭的英雄之子，他出生於葡萄牙光復後七年（1647年3月1日），是約翰四世國王宮廷前隨侍，也是公主的玩伴。他大可以責無旁貸使自己成為葡萄牙大帝國的典範，經福音磨鍊，達到純淨境地，然而他並未成為葡萄牙或者西方文明的代理人，反而成了上主自由運用的謙卑僕人。他最後的解決方法跟諾比理類似，穿著方面沿襲諾比理首創的潘達拉老師服裝，但最早促成他走向海外傳教的人是柯斯塔（Baltasar da Costa）。

柯斯塔在1671年底造訪孔布拉（Coimbra）時，爭取到布理道加入印度傳教行列。他還延攬另外九名年輕人，一行人於1673年3月1日啟航。十五天後，一支真正的國際團隊亦跟著出發：其中包括十五名葡萄牙人、四名義大利人、兩名比利時人、一名英國人、一名瑞士人、一名法國人、一名薩瓦人（Savoyard）、一名愛爾蘭人，還有一名中南歐帝羅人（Tyrolese）。而在當時大家都傳說，葡萄牙國王是不接受非葡萄牙籍的傳教士。

年老的柯斯塔與年輕的若望·布理道在漫漫航程中病倒了，柯斯塔不幸於4月21日病逝，布理道則逐漸康復。9月4日，印度臥亞美麗的海岸遠眺在望，船隻轉入曼多維（Mandovi）河，大夥就在諸多前輩留下足跡的地方上了岸：方濟·薩威、傑洛尼莫·薩威、利瑪竇、陸德以及諾比理。

開始傳教

一年後，我們這位葡萄牙貴族沿著西海岸南下到安巴拉卡（Ambalakat），去接受耶穌會的卒試，並開始學泰米爾語文。柯斯塔（Baltasar da Costa）所寫的泰米爾文文法，以及安東尼奧·普隆札（António de Proenza）編纂的泰米爾文-葡萄牙文字典，必定對他幫助甚大，這兩本書籍就陳放在屋內。他日益熟悉新語文的奧妙，得知他的基督徒名字，在泰米爾文稱為阿魯蘭南丹（Arulanandam）後，便改用此名，此後他將稱為阿魯蘭南丹導師，或簡稱師父（Swami）。

在安巴拉卡待了一年，他接到派令，奉命前往位於馬度雷東北方的柯雷（Kolei）。既然他的教區神父，熟悉印刷的安德·弗瑞爾（Andrea Freyre），在安巴拉卡幫忙已告一段落，即將返回他的教區，於是這位新來的副本堂便陪著他一起上路。兩人本來可以走海路（柯雷靠近東岸），可是他們寧可步行走陸路，橫越西高止山脈（Ghats），也就是從北到南縱貫的山脊。

他們在六月中某一天出發，當時季風已開始帶來滂沱大雨，兩人脫去教士穿的黑色長袍，換上潘達拉師父穿的衣服（寬鬆長及膝蓋桔黃色短袖束腰外衣，肩上披一塊大披肩，還要包頭打扮）。

起初兩人向北走，然後轉向東南，往東海岸前進。一路上弗

瑞爾以過來人傳授有關印度史，特別是這個地區的歷史背景：印度北部由蒙兀兒大帝牢牢掌控；盤據中部的是德干的馬拉薩（Maratha）英雄席瓦吉（Shivaji），他極盡可能的騷擾蒙兀兒大帝；至於南部則瓜分成三大王國，分別是維查雅瓦達（Vijayanagar），比查普以及戈爾康達，各王國內則由許多族長國組成，其地位重要性不一，族長稱為納亞克，馬度雷就是一例。傳教工作大半有賴於納亞克族長們的善意。

但是說到種姓，最實際的教訓莫過於當天晚上的遭遇，這個經驗令這個新手傳教士刻骨銘心。原來當晚早已淋成落湯雞的兩人，忙著找地方借住一晚。當然屋主讓他們進到屋裡來，可是卻問了他們一大堆問題，關於他們的出身、職業、此行目的等等。最後他讓疲累不堪的兩人睡在硬梆梆的地上，卻不供他們吃東西。布理道領教了種姓不同多麼微妙地影響待遇。屋主是想查出他們的種姓，他之所以未按印度人的慷慨好客款待來者，只因為他認為這兩人是不潔的。

見習

兩人終於 1674 年 7 月 30 日抵達柯雷，弗瑞爾神父負責教務，讓新來的布理道有時間去學泰米爾文。後來他拓展教務，在稍微偏北的地方設立一個新的中心，布理道則在塔圖凡契利（Tattuvanchery）另開中心，這位新的傳教士於是成了教區神父。他的教區範圍很廣，許多教會中心至今還對他念念不忘，這些地點包括烏代亞帕萊揚（Udayarpalayam）、席卡奈昌帕泰（Sikkalnaichanpattai）、以及甘蓋康達卓拉普蘭（Gangaikondacholapuram）。

步行橫越這麼廣大的地方，在當時既沒有公路，也沒有橋

樑，沿路盜匪充斥，野獸出沒，要有很強健的體力與勇氣才辦得到。何況氣溫高，缺乏水，食物單調又吃不慣，這些都是重重困難。布理道一天的工作經常是從某個村子返回，又渴又累，他非但沒能夠淨身沐浴休息，反而打起精神照顧人羣需要，直到天黑。這一點是他跟諾比理不同的地方，後者並不離開居處，他是大師，人們蜂擁而來聽他講道；而布理道則是馬不停蹄的從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子，尋找聽道理的人們。

所幸為這位初生之犢而言，烏代亞帕萊揚的波利嘉（Poligar）是個好人。布理道接掌他的教區後，就去拜望這位地方首長；畢竟是出身葡萄牙宮廷，他展現該有的宮廷禮節，贏得了這位首長的好感，他獲准在其勢力範圍內，布理道可以宣揚基督教。由於首長的保護，消息傳出後，布理道暫時感受不到婆羅門階層的反對。布理道開始要興建房子與教堂時，他又去求見波利嘉，後者批准了他的請求。不過布理道深知不能蓋既大又顯目的建築物，免得引起疑慮，因此他選擇蓋了棟簡樸的房子。

結果這些房子在 167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晚上遭大水沖毀地基。當晚布理道正舉辦慕道班，附近的科勒隆（Coleroon）河水位高漲漫過河堤，最後掏空了建築物所在的土墩。

大水淹來的時候，大夥兒正在睡好覺，無情的水灌進屋內驚醒大家。水順著牆腳排水用的洞口湧了進來，大家費盡全力將這些洞口堵住，距此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樹林，林中有一個荒廢已久的要塞。如果能夠跑到那裡去，可能是比較安全，然而水流湍急，恐怕人還沒到，就會被大水給沖走了。等到第二天早上，水位依然繼續上升，看來那個要塞，才是唯一的出路。正當大夥兒準備動身時，組合牆開始動搖起來，在地基上搖搖欲墜，終於傾倒塌下濺起水花。緊接著來勢洶洶的土石流橫掃而過。大家小

心翼翼的奮勇前進，最後勉強脫身，到達要塞。可是大雨還是下個不停，水位繼續上升。三天之後，雨勢開始緩和，可惜教堂與住屋只剩下一堆瓦礫。

波利嘉知道布理道陷入困境後，他派了一個信差，請布理道到他宮廷來，他要款待布理道，並且主動自掏腰包，為布理道重建住屋與教堂。然而，由於村長反對，教堂並未馬上重建。

見習結束後，布理道奉命負責卡圖（Kuttur）當地的教務，卡圖共有基督徒 2,350 人，當時這些教友必須長途跋涉，越過將兩地分隔開來的廣大濃密森林區，遠赴柯雷去望彌撒和領聖體。必須盡早在卡圖建立一個新的教堂，布理道決定在叢林中心，清理出一片空地來完成這個計畫。當地婆羅門紛紛反對，不過興建計畫不受影響，新建築物的完工，使附近基督徒士氣大振，來望彌撒的教友非常之多。「復活節當天，來新教堂望彌撒的教友非常多，我不分晝夜的工作，總共聽了三千多人辦告解，還主持彌撒，此外還為三百人付洗。」

孜孜不倦的傳教士

接下來的數年間，工作非常忙碌，我們這位潘達拉師父馬不停蹄。並非所有當權者都對他友善；有些官員與他的敵人沆瀣一氣，還有些官員對布理道非常排斥。布理道無數次橫越這個廣闊的地方，涉過一條又一條河流（事實上總共有十七條河流）。他較常渡的河是柯勒隆河，這條河的北部是津吉（Gingi）地區，南部是譚亞伏（Thanjavur），這兩個地區的教友都由他照顧。有時候他為了躲避迫害者，並無法妥善照顧，不過大部分時間他還是做到看好他的羊羣。

就在卡圖安頓後不久，布理道聽說統治譚亞伏的馬拉薩王派

出軍隊前來塔圖凡契利，要來逮捕他。他便喬裝打扮，朝沿岸前進，乘筏來到津吉，待在該地兩個月，探訪他的教友。然後他返回卡圖，此時馬拉薩軍隊已不再抓他；後來他再朝北走，來到柯蘭納帕圖（Koranapatho），再南下回到譚亞伏，為歷經戰爭與迫害等嚴格考驗的慕道友付洗。從這個地方來到譚亞伏王國南界的曼納古迪（Mannargudi）以及卡拉蘭帕提（Kararampatti）。他在1680年7月31日離開卡拉蘭帕提時，教友們「哭得厲害」。他泅水渡過好幾條河，抵達特魯卡魯（Tirukarur）時，整個人累倒了。有一次他甚至受到誘惑，覺得想要放棄這樣的生活，但後來仍打起精神，發誓將繼續傳教，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一康復就返回他最喜愛的中心西魯卡丹班努（Sirukadambanur），在此他為赤貧階層的堂區教友設立了一個教友中心。十一月間他再往北出發，來到津吉地區。聖誕節他在卡圖度過，在此他獲悉村長與一位誓言將除掉布理道的殺人兇手都死了。

由於沒有房子或者教堂可容納他的基督信徒，也因為在固定地點集合教友作禮拜是非常危險的，他經常待在叢林最深處，公開對教友布道。有一次他在森林中前後待了十五天，直到主日傍晚才啟程前往卡拉蘭帕提。「當晚我們的敵人以為我還在森林中，派了一支武裝部隊來劫殺我。我的傳教範圍非常廣泛，我到某一邊去傳教，另一邊就棄置不用，比方有人找到遠方去幫某個病患，往往到了那個地方，這個人不是死了，就是已經沒事了。我們需要更多人手，否則這樣子傳教，恐怕最後會保不住。」

不受重用？

「馬度雷的傳教法」，就是諾比理創辦、布理道等後人沿襲的方法，其特色是無論生活與工作都融入在地文化，這種傳教方

式跟東西岸其他地方的傳教方式不同。與他共事的少數人，也有一樣的憂慮（指傳教恐有面臨消失之虞）。無論葡萄牙國王或者羅馬教廷傳信部，對這樣的憂慮根本不放在心上，而省會長艾瓦瑞茲（Gaspar Affonso Alvarez）則並不同情這些傳教方法，似乎決心要做個了結。弗瑞爾擬訂了一份詳盡的備忘錄，但他想布理道是將這文件送給省會長的最合適人選，當時艾瓦瑞茲人在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托波（Topo），布理道銜命動身。

當時正逢季風，一般船隻都不沿海岸出海。布理道先乘筏出航，頂著逆風與驚濤駭浪，在海上奮戰了十四天，才在馬拉瓦（Marava）登陸，沿著漁人海岸步行繼續他未完的旅程；走過難走的泥沼地，經過一番折騰，筋疲力盡的他終於抵達托波。

省會長就像他一路吃盡苦頭的天氣一樣難對付。省會長認為弗瑞爾與布理道提出的方案太不像話。至於布理道，這個人具有把人帶壞的影響力，最好將他一併除掉。

弗瑞爾竭盡全力為布理道辯護，並且找傳教區內兩位極具影響力且備受尊敬的神父為他的辯護背書。艾瓦瑞茲向羅馬訴願；總會長諾耶爾（Charles de Noyelle）跟弗瑞爾協商，弗瑞爾憤慨的否認一切對布理道的指控與含沙射影。傳教區的所有神父都在弗瑞爾的陳情信函上簽名，表明布理道備受大家推崇。

問題的解決方式是典型的 *promoveatur ut removeatur* ——意即「為了除掉他，讓他晉升」——於是布理道獲任命為安巴拉卡神學院長。不過，由於更高階層的修院院長即將換人，因此布理道仍留任原職。

猶如遭追逐的獵物

布理道再次驛馬星動。從極北端的津吉海岸出發，前往位於

馬拉瓦境內的最南端，過去在馬拉瓦他曾經遭到強大的阻力。1683年復活節，他返回卡圖，這個舉動引起帕拉揚柯泰堡（Palayamkottai Fort）省長的提防，此人計劃逮捕布理道，他下令他的村內不能有基督徒，改信基督者要過賤民的生活方式。不過這個命令並未付諸執行，因為設計這個辦法的主要官員突然暴斃。

布理道還須面對另一個厲害的敵人，那就是警察總長拉瑪·納亞克，此人向該省省長要求，必須燒毀布理道在西魯卡丹班努的教堂，並沒收基督徒的財產。這道命令被一名基督徒士兵攔下來，並未採取行動；同時布理道一直在叢林裡過日子，成了被獵逐的對象。

1683年9月8日，譚亞伏省新任省長接獲新的命令，他奉命逮捕布理道，並沒收他的財物。當晚就要執行的命令，因為部分基督徒讓這位省長明白，如果他們的師父遭到逮捕，他們會遷離他的領域，結果也沒有採取行動。這位省長設法叫人暗中殺害布理道，然而他的衛兵大多數都是基督徒，他們洩露消息給布理道，讓他再次安全脫身。

他暫時不會有危險，但是他並未放下傳教工作。他來到津吉照顧教友，到了十一月中旬才又返回譚亞伏。這一年他總共為1,003人付洗。

最後他中計了。他來到馬度雷指導一位新來的傳教士瑪麗·波吉絲（Maria Saverio Borg-hose），還到卡曼納亞肯帕提（Kamayakken patti）的傳教站。當他回程時，遇到一羣農夫，他們請他到他們的村子去教導他們。這個舉動激怒了同屬納達斯（Nadars）種姓的其他同伴，一天晚上他們捉拿布理道，掌摑他的臉，用木棒毆打他全身，然後關進監獄。由於這是完全非法的，過了幾天，神父就重獲自由。

然而迫害行動並未就此打住。有些基督徒做出魯莽行為，導致譚亞伏總理採取報復行動，下令抓人。布理道在 1685 年 1 月 9 日接到消息，知道這些基督徒將被逮捕，不顧旁人力勸為大局著想，特意前往加入他們。

基督徒以當時罕見的一種武器對應，這種武器是「罷工」，迫害行動暫告平息。原來他們當中許多人受雇於宮廷馬廄，負責照料馬匹與大象（這是國王引以為傲的），由於他們拒絕餵養，馬與象明顯的消瘦下來，國王驚慌之餘，獲悉問題根源，下令展開公正的調查，一場風暴這才消散。

第一次教難

1686 年 5 月 5 日，布理道採取了一個事後證明是重要的步驟。他帶著四千名基督徒越過馬拉瓦邊界，早在 83 年前就已受洗的信徒，多年來一直遭到當局的孤立對待。直到布理道設法從境外邊界附近的一個前哨站去幫助他們；而現在他根本深入其境。

那個地區除了荊棘叢林，沒有其他植被。而當地的棘刺之茂密，連動物都無法通過。當地居民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威權擺布。且當時朝聖者前往拉梅希瓦朗島（Rameshwaran）的唯一途徑，必經此地，傳說神猴（Hanuman）著名的飛躍就是從這裡起跳到錫蘭去拯救悉多（Sita），當局不可能准許當地居民改信基督宗教，這個地區一定要保持百分之百的印度教傳統。

過了一個月，當地居民成為教友的事情發生了，於是布理道決定深入內地；從 5 月 5 日到 7 月 17 日，他寫下總共為 2,070 人付洗的紀錄。

這時候來了一個不改 Paranghi 作風的聖衣修女會，布理道冒險傳紙條通知，提醒對方行事小心。不料這張紙條落到了對基督

徒特別不友善的一位部長庫馬拉·皮萊（Kumara Pillai）手中，布理道與六名教友一起被捕，遭到無情的折磨。其中有一人屈從了，其他人繼續受到更殘暴的酷刑。

7月28日，由皮萊主審，他揚言殺害全體，除非他們回頭朝拜濕婆神。拒絕不從的結果，是挨揍、挨踢以及被鐵棍痛毆，然後再銬上鐵鍊，這位部長前往拉亞（Raja）取得死刑確認令。接下來是更野蠻的酷刑伺候，毆打過後，這些人被拉到大大太陽底下炙烤，躺在上面布滿尖狀物的岩石上，再由許多大塊頭的男人在他們身上跳來跳去。

接著這些犯人被帶到蘭納德（Ramnad），五天的路程，苦不堪言，布理道被關在馬廄、上了鐵鍊。勒瓦（Ranganatha Thevar）派了一些部長，甚至自己的長子，去勸傳教士改信濕婆，或者至少下令他的教友這麼做，但沒有人屈服。

本人也是英勇漢子的勒瓦，相當讚賞這些人的勇氣。他與布理道交談後，更留下深刻印象，他心裡對這個外國傳教士頗有好感，於是下令將所有基督徒犯人給放了，至於布理道則下令驅逐出境。

幾天後，布理道啟程前往托波，在此另一個料想不到的命令正等著他：被任命赴歐洲履新的耶穌會士教會官員，已經過世了，他的遺缺由布理道取代。

布理道在歐洲停留必要的一段時間後，他希望忠於自己決心死在傳教工作崗位上的誓願，連他還健在的母親愛的呼喚都改變不了他再返回印度的心意。1686年12月15日，他從臥亞搭船返回歐洲，到了1690年11月2日，他又回到印度來了。

視死如歸

他十分明白他這一趟回來是走向殉難，雖然如此他仍以極端謹慎的態度低調行事。他並未匆忙趕回馬拉瓦王國，他從外地開始工作；他最喜歡去的一個地方是靠近邊界森林中的一塊空地，「在樹下，四周有老虎和蛇出沒。」他回來的消息不逕而走，不多久馬拉瓦全境都知道他在叢林中的確切「居處」。「自我回來以後，我已為數千人付洗。」他寫下紀錄的時間是在 1692 年 3 月 25 日。省長一聽說布理道又回來了，立刻下令逮捕，布理道差一點難逃劫數：士兵來捉拿他之前半個小時，他才剛離開去探視一個病患。

他的下一步做法是短暫進出；也就是入境宣講付洗只停留短暫時間，在人家還沒發現他的蹤跡之前就退返藏匿地點。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促使他進入這個禁止他入境的王國。原來王室有一位王子塔達亞·勒瓦（Thadaya Thevar），據說是發誓仇視基督徒的人，當時正罹患不治之症，聽說布理道具有治病的神恩，便請他來一趟。

布理道依然謹慎行事。他並未親自前往，他派了一個傳教員代他赴約，不是單單為治好這位王子的病，而是教他要以信仰的心依靠上主；如果上主願意治癒他的病，病就會好起來。結果真是這樣，上主的恩寵臨到他身上，一旦他對上主的恩寵開放自己，他開始覺得病情好轉，直到完全康復。接下來他自己要求受洗。

布理道面臨進退兩難。塔達亞·勒瓦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他改信天主教的事不可能沒有人知道；塔達亞的一位妃子是國王的姪女，她採取暴烈的反應，展開空前的迫害行動。

在這件事上，我們的潘達拉師父謹慎到了極點。他召集傳教員，跟他們商量。這個時刻特別值得紀念，因為他們正要形成新生教會，猶如當年基督徒執事在耶路撒冷建立初生教會的情形。布理道從在柯雷開始傳教，到他在歐里由（Oriyur）走完人生，始終全力以赴。在座有些人曾與他共度第一次教難，如今全體都準備陪同他共赴第二次殉教難關。這些人包括：

席魯拜·納亞克（Siluvai Nayakker）——布理道形容他是「我最忠信的傳教員」，他挑選這個人為他第一次入境馬拉瓦做準備。

蘇蘭（Suran）——牧羊人種姓，皮萊曾特別對此人惡毒的洩憤。

卡納嘉潘（Kanagappan）——此人長得粗壯，就像聖經記載的伯多祿想要勸阻耶穌那樣，他也設法勸阻布理道前往。

納納布嘉善（Gnanapragasam）——深知布理道苦修情形的他，講話語調溫和。

布理道召集這些人，向他們解釋面臨的問題：他到底該不該為塔達亞付洗？大家異口同聲表示他應該這麼做；恩寵的呼召如此明顯，他不可能拒絕，這位王子的受洗可能成為基督徒團體的支柱。

此外，布理道也去找他的告解神父商量，至此他作成了不可逆轉的決定，願意入境去為塔達亞付洗，這件事已成定局。

塔達亞在受洗之前，遣散所有侍妾，只留下一位妻子。國王的姪女在被遣散之列，可以想見她誓言報復。整個宮廷都整裝待發，勒瓦國王比誰都憤怒，他立刻下令逮捕這位外國僧侶。

第二次殉難

布理道有立即遭逮捕的危險，他希望獨自一人前往，他差走了他的傳教員，大家都不願他單槍匹馬行動。卡納嘉潘是這個團體的西滿·伯多祿，他準備聯絡軍方友人，策劃起義選立新受洗的王子為新國王。

布理道施巧計支開了卡納嘉潘，叫後者到譚亞伏去買馬。

「但是，神父，你向來都是步行的！」

「沒錯，但我可能必須加快腳程。去吧，買了馬就回來。」

1693年1月8日，一支小隊伍闖入森林，摧毀布理道安身的地方，將他帶走。國王的侄子提魯敵意特別強，他想斬草除根，因此連同另外三名傳教員也一起逮捕了。被抓的這四人一路被拖行到首都蘭納德，殘暴不仁的情景激怒了所有看到他們通過的人們。基督徒憂悶的大喊：

「Ayo, ayo, 神父！」

看到他們被毆打得淒慘，連印度教徒都發出抗議之聲：「無恥，不義」。

這四人被關進監牢後在獄中熱切地祈禱，渴望殉教，他們的友人則百般設法讓他們重獲自由。國王與他的侄子是絕不讓步的，國王早已對布理道下達驅逐令，如今布理道重返他的國度，無異是對他的蔑視；只因他希望遵守法律程序才沒有立即作處分。至於侄子提魯則不太管法律，但也不想冒險。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敵人是毫無顧忌的宮廷婆羅門宗教領袖龐巴凡納（Pompavanam），此人設法說服國王不必經由審判逕行將布理道處死。他的計謀遭到新入教的王子塔達亞的反對，他堅持舉行公開審判。

公審大會在蘭納德宮殿的大廳舉行，現場沒有基督徒，聽眾

一面倒，舉出的證據荒謬可笑，而且無關緊要。國王下令所有犯人處以死刑。

甚至在第二階段，軍中兩名基督徒將領還曾作最後一搏，想要改變國王的決定。但提魯騙他們說，布理道不會被處死，只會再次被流放。當天傍晚在王宮外第二次集會，國王在場坐鎮，現場擺出大象、層層衛兵、鼓手與吹號手的盛大陣仗。

勒瓦國王下令當場射殺布理道。不過當布理道被帶出王宮處決時，塔達亞卻挺身而出，告訴士兵要殺就殺他本人。提魯見狀「挽救」了整個情勢，他狡猾的獻計，讓犯人都回去坐牢，宣稱布理道要被驅逐出境。然後他祕密下令將布理道從首都遷到歐里由去，在當地處決。

十五名士兵護送他。他在 31 日抵達目的地，但是死刑直到 2 月 4 日才執行。執行官是維拉揚，後來他以對自己表現感到自豪的心態，見證布理道臨死受人敬仰的表現。他接獲命令後就前往處決地點，看到布理道跪地祈禱，他就站到一旁去磨利手中的劍。該城堡的總管不耐煩了，就差自己兒子去告訴執刑官快一點把神父的頭砍下來。聽到總管兒子講話的聲音，布理道就起身走到處決地點（不是斷頭台，而是一座小丘），臉上表情充滿喜悅，他低下了頭。

「我一次就把他的頭砍下來了。」維拉揚難掩自豪的誇道。

參考書目：

- SWEENEY, Francis: *Bernardin Realino renaissance man* (New York, 1951) .
- GUITTON, Georges: *Saint Jean François Régis* (Paris, 1941)
- GAUD, Christiane: *Jean François Régis. Du Languédoc au Vivarais* (La Louvesc, 1980) .
- HEROUVILLE, Pierre: *Le Vincent Ferrier du XVIIe siècle. Le Vénérable Julien Maunoir* (Paris, 1932) .
- HARVEY, Martin: *Good Father in Bittany. The life of Bl. Julien Maunior* (Boston, 1964) .
- GUITTON, Georges: *Perfect Friend. The Life of Blessed Claude La Colombière, S.J.* (St Louis and London, 1956) .
- ROIG, Rosendo: *Alonso Rodríguez el Santo de Montesión* (Bilbao, 1981) .
- AGUSTI, Vicente: *Vida de San Alonso Rodríguez* (Madrid, 1913) .
- VALTIERRA, Angel: *San Pedro Claver. El Santo que libertó una raza* (Cartagena, 1964) .
- SANTOS HERNÁNDEZ, Angel: *Jerónimo Javier, Apóstol del Gran Mogol* (Pamplona, 1958) .
- CORREIA-AFONSO, John: *Letters from the Mughal Court* (Anand, 1981) .
- BRODRICK, James: *Hunting for Cathay: An Episode of Mission History* (The Month 175[1940] pp.411-430) .
- CARAWAN, Philip: *The Lost Empire.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Ethiopia* (London, 1985) .
- BECCARI, C.: *Rerum Aethiopicarum Scriptores Occidentales*, vol.XI (Rome, 1911) .
- PAIS, Pero: *História da Etiópia* (Porto, 1945, 1946) .
- RICCI, Matteo: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hina* (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i", (Rome, 1949) .
- BORTONE, Fernando: *P. Matteo Ricci, l'isaggio d'Occidente* (Rome, 1965) .
- CRONIN, Vincent: *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 (New York, 1955) .

若望·布理道

- RYAN, Thomas: *Sucesores de Javier. Los jesuitas en China* (Bilbao, 1966) .
- SAULIERE, Augustine: *His Star in the East* (Madras-Anand, 1994) .
- CORREIA-AFONSO, John: *The Jesuits in India 1542-1773* (Anand, 1997) .
- RHODES, Alexandre de: *Voyages et missions* (Paris, 1854) .
- BERNARD-MAÎTRE, Herri: *Vietnam-Iran. Le P. Alexandre de Rhodes 1660-1960*
(Etudes 307, 321-336) .
- SAULIERE, Augustin: *Red Sand. A Life of St. John de Britto* (Madurai, 1947) .
- NEVETT, Albert M.: *John de Britto and His Times* (Anand, 1980) .



III
血的見證

介紹完了若望·布理道的殉教，從這一章起我們將專注於這個時期無以計數的耶穌會士殉道事蹟。在那種情況下，無以計數是必然的：渴望殉教的心態普遍存在，每一個狂熱的耶穌會士都有殉教的精神，也都懷抱著希望成為烈士的心理；這也是一個漫長的時期，其間發生無數次慘烈的宗教戰爭，祿茂之夜（the Night of St. Bartholomew），宗教法庭的火刑，英格蘭、蘇格蘭、法國與匈牙利等地爆發無情的新教徒迫害事件。有些人為信仰而死，其他人為信仰的緣故遇難；前者的英勇行為令我們景仰，而後者承受的偏執殘暴則令人髮指。

基督宗教的國家發生以上情況，非基督宗教國度也少不了殉教與迫害，其範圍遠從北美洲的依洛郭亦（Iroquois）印第安人與南美洲的瓜拉尼（Guarani）印第安人，乃至遠東的日本與馬里亞納羣島。

耶穌會在這些國家都派了人去傳教，它既憂愁但也驕傲的看著耶穌會士堅持信仰至死不渝的英勇表現。

這是耶穌會史上漫長光榮的篇章。

1. 英國國教的絞刑

德國人馬丁·路德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將《九十五條論綱》釘在威騰堡（Wittenberg）的萬聖教堂大門，宣告脫離羅馬教會，自創新教路德派。接著英國國王亨利八世（1509-1547）自封為「英國教會唯一最高首長」，甚至要求宣誓效忠，對「拒不服從者」處以極刑，因此犧牲生命的包括時任內閣大臣的湯默斯·莫爾（Thomas More）以及若望·費雪（John Fisher）。繼任的愛德華六世（1547-1553）更加緊迫害。直到瑪麗·都鐸女王（1553-1558）在位期間，情勢才見緩和，天主教有過一段短期的復甦，但事後證明這卻帶來反效果。伊莉莎白女王一世長期執政，終於鞏固了英國國教的地位，然而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卻也變本加厲，而且有計畫的進行。

新教起先以喀爾文教派的變貌從法國傳進蘇格蘭，不久就發展成聖公會（Episcopalian）。在政治方面，便宜行事與聯姻風氣盛行，勝過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敵對態勢，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1567-1625），亦即英格蘭國王一世（任期 1603-1624），設法將兩國王冠合而為一。他和兒子查理一世（1625-1649）繼續對天主教徒的迫害。

造成情勢惡化的因素有好幾個：教宗碧岳五世宣布伊莉莎白女王引進異端邪說，為此喪失女王的合法地位；1588 年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威脅；1605 年爆發火藥陰謀案，天主教徒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企圖炸毀正在議事的國會大廈，陰謀炸死詹姆士一世，當場被抓獲而遭處決。

迫害者遵循英國的傳統，謹慎堅守迫害準則：此即按照法律程序，正式判刑，然後執行處決，無論斬首與否，無論仔細搜證與否，反正都備有絞刑架。

艾蒙·坎庇恩
(Edmund Campion, 1540-1581)

登陸

耶穌會總會長穆克安（Mercurian）神父考慮很久，遲疑不決是否要正式授權耶穌會神父登陸英格蘭。他深知耶穌會士一旦入境，勢將面臨危險，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希望耶穌會神父捲入政治與宗教糾纏不清的利害關係，免得危及他們的使徒身分。他下了兩道嚴厲的命令：不准干預政治，也不要做任何可能被解釋為企圖獲得長遠影響力的事情。前者指的是提防英國政府，後者則針對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的教區教士而發。

耶穌會士赴英展開傳教工作的計畫，並未做到保密，謹慎為上的明智準則並未被遵守。所有羅馬人都知道這件事，英國女王布建在羅馬的爪牙，對耶穌會神父將赴英國傳教的事瞭若指掌。英國準備在耶穌會神父來到多佛（Dover）上岸時，一舉成擒。

事實並非如此。第一位帶頭「入侵」英國的耶穌會神父，也是這個傳教團首長的天才人物是羅伯·珀森斯（Robert Persons）。他決定打扮成官員，準備從荷蘭返回英國。他穿著考究，這位外表浮誇的官員就這樣避過了政府的注意。他與公務人員交談，向其中一人借了一匹馬，還留話說他有個做鑽石生意的朋友艾蒙茲，後來也會通關，請他們照應照應，讓他快速通關。

從英國國教會聯盟 (Anglican Communion) 到耶穌會

自從艾蒙·坎庇恩為避開他所受的騷擾而橫渡英吉利海峽遠走他鄉以來，九年已經過去了。如今化名為艾蒙茲先生的他，原本是英國教會的一位執事，在牛津大學執教，素享盛名，他是一位非常傑出而且備受愛戴的教授，他同時也是個作家和名演說家；他的影響力大到門生羣起模仿他講話，甚至學他為人處事的作風，新教會事業正需要像他這樣嚴謹而又有影響力的人，要是他夠理性的話，他的事業勢必耀眼奪目。當時大多數人都接受眼前的情勢，委曲求全，對未來不抱期望卻又盼望情勢能夠改觀；新興教會不乏老的教會遺緒，英國國教的祈禱書文字典雅，讓受過教育的階層人士感到欣慰，畢竟在內容方面，差異並不大。

坎庇恩對這種態度並不感到滿意。他內心深切的宗教熱忱，促使他全面完整的表達自己的立場。因此他被懷疑對教宗表示同情，當局要求他在倫敦宣教以自清。他的確澄清了疑慮，但他卻橫渡英吉利海峽（1572年6月）遠走他鄉。當時不列顛王國內最強而有力的人士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聽說他離國時講了這麼一段話：

「看到這麼有名望的人離開自己的國家，真是太令人遺憾了，因為此人的確是英國的一顆耀眼鑽石。」

起初他來到不久前剛剛在杜埃（Douai）設立的英國修院，後來他被天主教會所接納。1573年1月21日，他動身前往羅馬，一心希望加入耶穌會。他「獨自一人，全程步行」，猶如羅耀拉派出來的朝聖者。

坎庇恩被指定到奧地利省，進該省在布拉格（Prague）設立的初學院，當他還是初學生，就已在該校開始教授修辭學。當時

整個歐洲的文化是相同的，一個英國人可以在波西米亞（Bohemia）當教授。坎底恩的教學非常成功。

儘管他在授課、講道、與學生相處以及活動各方面都很開心，此時他卻接獲來自杜埃修院創始者兼院長、亦即未來的亞倫（William Allen）樞機主教的來函，在1579年12月9日的這封信中，宣布了總會長穆克安的決定。坎底恩一直等到接獲總會長的命令才動身，匆忙起程，懷著惦記布拉格的心，在1580年6月24日以艾蒙茲先生的身分，抵達多佛。

地下活動

他的運氣實在不好，又沒有珀森斯的沉著，一上岸就被捕了，在護送人員監督下即將被帶到倫敦去，可是最後卻又將他放了。他到了倫敦以後，有個稱呼他艾蒙茲先生的人來接應他，把他帶到一個名叫喬治·吉伯特（George Gilbert）的家中。

吉伯特頗獲珀森斯歡心，此人擁有鉅富，所有的財產用來資助天主教活動。他與珀森斯在英國，與在杜埃的亞倫合作，領導一羣忠信的天主教徒，籌劃神父傳教工作。

坎底恩待在全英國各地挨家挨戶走動，其間總是由忠實的知己領路、保護安全。可是不久，就在他的地下活動歲月初期，他就清楚看出即將落入陷阱的危機。他在一封信中精采描述自己的心情：「我無法逃出異端者的掌心；敵人眼線太多，口舌太多，刺探者太多，詭計多端。我覺得自己穿的衣服非常可笑，我經常更換，名字也是。我有時看到有些關於我本人的信件，說我被捕了，無論我到何處，總是傳得沸沸揚揚，聽多了以後，竟然無所畏懼了。」

「坎庇恩的自吹自擂」

某個名叫湯默士·龐德（Thomas Pounce）的人，依照作家艾弗林·瓦（Evelyn Waugh）的描述，是個「虔誠、聰明而又古怪的人」，他在馬夏爾西（Marshalsea）監獄坐牢期間，設法買通一名獄卒，提出表面看來似乎非常高招的建議。他和一起坐牢的朋友，擔心英國政府會提出片面說詞，偽造叛國自白書，如此將無人能夠辯駁。因此龐德要求神父們擬訂文書聲明，說明他們真正的活動與目標，由他本人保存，必要時可以提出來反駁。坎庇恩坐了下來，不到半個鐘頭就完成一項至今仍被視為文學鉅著的宣言。這份聲明後來外洩，落到英國政府手中，英國政府以「坎庇恩的自吹自擂」名之，在歷史上永垂不朽。

這份聲明的對象是「女王樞密院勛爵閣下」，而在提到「這個高貴的王國，我親愛的祖國」，以及致「女王，我的君主」，並且宣告他活動的真正目的後，他作了以下鏗鏘有力的聲明，並做出了挑戰：

「觸及我們的修會問題，但願各位明白，我們已結成聯盟——遍布全球的所有耶穌會士，其前仆後繼與規模，必然超越英格蘭的一切行徑——只要我們還有一人在享用你們的泰伯恩（Tyburn）刑場，或者受到你們的折磨，或者被關在你們的監獄，我們都將歡欣喜悅的背負你們給我們的十字架，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這筆帳已經算計好了，這個事業已經開展了，這是上主的事業，不可能阻擋得了。信仰的秧苗已經播下，因此必定會有收割。要是我的這些請願遭到拒絕，我的努力付諸流水，我千里迢迢前來為你們好，卻獲得嚴苛的對待，那我也沒有話好多說，只好把你我的案例呈到賜與人恩寵的萬能天主、心靈的搜尋者面

前，讓祂在結算日之前讓我們和好，為此我們或許在天堂將可化敵為友，畢竟在天上一切的傷害都將被遺忘。」

「即使現在，」艾弗林·瓦寫道，「過了三個多世紀之後，這場戰役發生在另一個國度，對付的敵人不一樣，捧讀坎庇恩的自吹自擂，依然令人感到激動。在當年，這封信可是造成大轟動。」龐德在同一夜捧讀這份聲明，將它傳給獄中朋友。完成的多份複本，快速流傳；到馬夏爾西監獄探監的人們將文件帶到城裡、鄉下，到後來整個英國都曉得這份文件。宮廷與大學中有人想起了曾在牛津大學執教的坎庇恩，而今到處有人在談論他。文件內容在 1580 年 11 月送抵女王的樞密院。他開始被稱為「煽動民心的耶穌會神父」，逮捕他成了緊急迫切的事。

逮捕行動

坎庇恩的落網其實可說是獵捕者走運。時間是 1581 年 7 月 16 日，主日；叛徒是一個名叫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人，他是典型專門獵捕神父的卑鄙人物，他假裝是天主教徒，進入一個天主教友家庭工作；這個莊園豪宅一直保留到今天，它的庭院四周有圍牆，還有一座門樓，一道護城河，以及一座吊橋。

這個房子是天主教徒定期聚會的地點，艾略特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個主日他來了，希望發現有舉行彌撒，不過他渾然不知他就要大有斬獲。他認得廚子，叫了對方名字，兩個老友相見彼此問候了一番，最後他被帶到一個「寬敞堂皇的室內」，那裡正在舉行彌撒聖祭。他溜了進去，跟著行禮如儀，表現虔誠，但是內心興奮得要命，因為他發現主持彌撒者不是別人，正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坎庇恩。

彌撒一結束，艾略特立刻飛奔到最近的司法機關去通風報

訊。七、八位到訪的天主教徒留下來用餐，當警報響起，整棟屋子被包圍時，這些人仍在用餐。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帶著一隊人馬來到大門外要求入內。坎庇恩與另外兩位神父被帶到一處剛好容納他們三人並肩躺在一張長榻上的藏身地點，等他們躺好，一塊鑲板蓋了上去。過了半個鐘頭，地方行政長官與他手下才獲准進入屋內。

他們到處搜查，床下、窗簾後面都不放過，結果一無所獲。地方長官準備放棄時，艾略特語帶威脅，於是展開二度搜查工作，結果有三個人被逮到了。這個發現鼓舞了士氣，他們井井有條的仔細查遍整個屋子，每個房間都不放過，敲敲鑲板，如果發現聲音空洞，就將它砸碎；他們查到好幾個祕密地點，但是找不到神父的蹤影。黎明時分又展開第三波搜查行動，到這個時候連艾略特本人也失望了，就在他們放棄一切希望時，其中一人注意到越過樓梯另一端的井中透出一點亮光。他抓過一根鐵撬，拉開鑲板，發現了坎庇恩與另外兩位經常來訪的神父。

艾略特跑到法院去報告這個天大的消息，回來的時候威風凜凜，要坎庇恩等人隨他到倫敦去，好像這羣人是他的犯人似的。

然而接下來的旅程像是坎庇恩的勝利之旅，而非艾略特的凱旋之路。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大批羣眾蜂擁出來觀看，有人公開表示同情，而當告密者通過的時候，羣眾中總有一、兩次出現難掩敵意的騷動，高喊「猶達斯」的聲音更是此起彼伏。

為了避免坎庇恩像是凱旋進入倫敦，遊街方式有所改變。坎庇恩被綑綁在馬上，被人牽著走在最前面，有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坎庇恩是煽動人心的耶穌會神父」。就這樣在倫敦市區遊街，最後來到了倫敦塔，被關進監獄。

這一天是 1581 年 7 月 22 日，他在英國的傳教工作前後達一

年又一個月。

倫敦塔

坎庇恩被關進倫敦塔地牢的單人牢房，這種小牢房既不容人直立，也無法直著全身躺平，直到今天，這種小牢房仍是觀光客感興趣參觀的景點。坎庇恩是極重要的人犯，倫敦塔負責人歐文·霍普頓（Owen Hopton）爵士也特別苛待他。

7月30日或31日，他被帶到他的老友萊斯特伯爵（the Earl of Leicester）的家。穿過過去他經常造訪的候見室前廳，大廳的門打了開來，一旁的士兵筆直而立，原來他來到了女王面前。在女王座椅一旁站立的是萊斯特本人，坎庇恩曲膝跪地，身上仍可見地牢的煤灰。

在此之前他曾覲見過女王一次。那是在1566年9月3日，當時他還是執教於牛津大學的年輕教授，伊莉莎白女王一世蒞臨該校訪問，暗中希望爭取學界的支持。坎庇恩當時致詞歡迎，讓年輕的女王十分欣慰，而今第二次見面，他除了向女王致意，還不忘向伴隨女王的萊斯特伯爵問安。

這次會晤是謙恭有禮的，女王的眼神似乎減少了一些嚴厲的成分。

坎庇恩被問到來英格蘭的目的是什麼？還有羅馬教廷對他的指示是什麼？他簡易而平靜的回答。女王突然問了一句：他是否承認她是他的女王？坎庇恩答道，他的確承認她是他合法的女王和統治者，一切世俗的事情，他都得聽從。

教宗碧岳五世除了在1570年2月25日以伊莉莎白女王為異端分子將她開除教籍，還宣布伊莉莎白喪失戴上冠冕的權利。到底坎庇恩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女王想要知道。

坎庇恩直言神學家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他談到了教宗本身職權（*potestas ordinata*）與非教宗本身職權（*potestas inordinata*）的區別。旁人不准他再說下去，他們告訴他，他們在他身上找不出毛病，除了他是擁教宗派。

「那是我至高的榮耀。」坎庇恩反駁道。

於是他們極其客氣的向他提了一個建議，這也是他被召見的原因：過去十年的帳可以一筆勾銷，只要他公開發誓棄絕羅馬天主教會，加入新教的傳教事工，那麼他今後將可前途無量。

坎庇恩仍然回到倫敦塔，五天之後，萊斯特簽署令狀，命人酷刑伺候坎庇恩。

漫漫長路到達泰伯恩刑場

接下來是在酷刑之下展開了偵訊工作。逮捕坎庇恩的人目的是要判定他與他的朋友觸犯叛國罪名。坎庇恩至少被偵訊四次，有三個場合遭到酷刑。主審官在這方面是專家，他們百般設計，但就是無法構成罪名，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傷害到他的任何朋友。

各式各樣的謠言開始流傳：謠傳坎庇恩已改信新教，又說他已接受主教職務，還有的說他指控從前的朋友叛國以求自保。全國各地有不少紳士被捕，罪名來自坎庇恩「自白」的權威性。真相是政府組織龐大的情報網搜集到情資以後，再加以拼湊，鎖定漏洞，再將結果算到坎庇恩頭上。

坎庇恩必須跟英國國教神職菁英分子展開神學討論，他來者不拒，漂亮的回擊。英國國教的神職人員只能證明坎庇恩在提到迦太基基督教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時有誤；那就是他們稱勝告捷的全部內涵。會議不再召開，犯人還押地牢。

對他的指控罪名有好幾個，可是後來都揚棄了，最後重新擬

定起訴罪名，將坎庇恩送上審判庭：他被指控曾策劃一項謀殺伊莉莎白女王的陰謀，並企圖引進一支外國軍隊來個裡應外合，而這也就是他分別於 1580 年 3 月 31 日在羅馬，與 1581 年 4 月 30 日在法國東北部的蘭斯，以及同年 5 月 20 日再度在羅馬，跟亞倫修院院長和珀森斯神父會晤的目的。

這是他和另外七人於 11 月 14 日星期二，在威斯敏斯特市政廳（Westminster Hall）法庭被傳訊時的罪名，次日又有七人依同樣的罪名被提訊。

公審日期是在 11 月 20 日，三名法官對當天司法能夠公正自主運作心存懷疑，而不願接案；他們的遺缺由另外三個比較沒有道德良心的法官取代。

坎庇恩代表所有犯人發言，對指控一一作答，點明指控的前後不一、矛盾百出，而且絕對證據不足。倒不是為了避免一死，而是讓所有人看清他們受死的原因。

「喔，猶達斯、猶達斯！」當艾略特出面作證時，他這麼稱呼艾略特。艾略特作證說，坎庇恩在萊福德（Lyford）講道時，曾經提到「一個偉大的日子」即將來到，根據這個指控者的說法，這個必然指的是女王被暗殺或者被廢的日子。「我要提出抗議，在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日子比重振信仰、取悅天主、可怖的審判將揭露所有人良知的這一天更偉大。這是造成改變的日子，這是我苦口婆心宣導的偉大日子。」

這有什麼關係嗎？早在前幾天，在另一個法庭中就已作成判決了，然而主審的勳爵以適切的嚴肅態度宣讀判決結果，還要求提出任何不該判這些犯人死刑的理由。

坎庇恩再次勝利的發聲：「我們並不怕死，我們現在必須說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們的信仰讓我們成為叛國者，那我們被定

罪也是值得的，但我們直到現在一直都是女王順良的子民。」

處決日期在12月1日。薛文（Sherwin）與布萊恩（Briant）被選為坎庇恩上絞刑台的同伴。那是一個陰雨天，市區道路泥濘難行，雖然如此大批羣眾仍蜂擁到倫敦塔大門前。

「天主保佑大家，各位紳士。」坎庇恩向大家打招呼。

一共有兩匹馬，馬尾各有一個囚籠，坎庇恩一個人占用一個，布萊恩與薛文合用另一個，他們就這樣在泥地裡淋著雨被拖往泰伯恩刑場。坎庇恩的臉被泥水濺污了，一個紳士上前為他擦拭乾淨。

坎庇恩站上位於絞刑架下方的推車，絞索套上了他的脖子。他開始發話，不過羣眾嘈雜聲音不斷，只有靠近他身邊的人才聽得到他講話，他為自己的清白提出抗議，但他表示願意原諒法官。然後一位官員宣讀文件聲明處決的原因是叛國，並非為宗教信仰的緣故。坎庇恩站著祈禱，議會勳爵要求他必須懇請女王寬恕。

「我什麼地方冒犯她啦？在這方面我是清白無辜的。這是我的遺言；請相信我——我一向為她祈禱。」

「為哪一位女王？」

「呀，為伊莉莎白你的女王，也是我的女王，我祝願她在位長久，天下太平，繁榮可期。」

接著他站立的推車被拿開了，坎庇恩身子懸吊半空，直到不醒不事，或許已經氣絕。執刑者將繩子割斷，屠夫開始他的工作。

有人設法拿到了坎庇恩被綁在馬後拖到泰伯恩刑場的繩子。後來這段繩子輾轉到了珀森斯神父的手中。1610年珀森斯在羅馬臨死時，他要求將這段繩子套在他的脖子上。這條繩子輕柔的將他與他的前屬下連繫在一起。

亞歷山大·布萊恩 (Alexander Briant, 1556-1581)

繼坎庇恩之後上絞刑台的是亞歷山大·布萊恩，時常面帶微笑的他時年 25 歲，他是在倫敦塔被囚期間加入耶穌會的。

他在牛津大學就學期間，受到珀森斯神父的影響而皈依天主教，1577 年被送到杜埃修院，次年 5 月 29 日晉陞為神父，1579 年 8 月 3 日，他喬裝化名橫渡英吉利海峽來到英國。

在倫敦，他跟珀森斯神父一起住；1581 年 4 月 28 日當緝捕者前來逮捕珀森斯的時候，他不在家，於是他們抓了布萊恩，把他帶到倫敦塔。

布萊恩受盡可怕的折磨，但是他對 13 個問題一個也不答。因此他被抬上肢刑架，受到極度的痛苦。某個名叫諾頓的施暴者，揚言要「把他的身子拉長一呎」。

「難道你只會這招嗎？我的確認得珀森斯神父，我們是親密的朋友；但是我絕不會告訴你他曾到過什麼地方，又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我也絕不回答你任何其他的問題。」

第二天他再度被抬上肢刑架，他的四肢被拉扯得十分厲害，他以為自己就要被肢解了。就在這樣的痛苦中，他許諾加入耶穌會。他後來說，當痛苦開始的時候，他決定默想基督的苦難，他是如此的全神貫注，以致不覺得痛苦。等到酷刑結束，他才又感受到巨大的痛苦。

諾頓無計可施，為了瓦解布萊恩的抵抗意志，他整夜被架在肢刑架上。

「隨你高興怎麼做，但我就是不會說。」

他被擠進一個無法移動的地洞裡，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下度過了八天，然後再被拉出來架在肢刑架上受磨難。

英國當局對他的指控罪名也是一樣，他跟坎庇恩受到相同的處罰。

羅伯·邵思衛／亨利·葛內

(Robert Southwell, 1561-1595) / (Henry Garnet, 1555-1606)

詩人兼音樂家

邵思衛是一位詩人、一位作家；葛內有一副好歌喉，他是音樂家。邵思衛正如一般藝術家，容易衝動，而且敏感；而葛內則較文靜，但是為人並不冷漠；兩人結伴為友，互補長短，猶如詩人寫詩詞，需要作曲家譜樂曲。在遭迫害的歲月裡，邵思衛是下屬，而葛內是上司。

我們也可以舵手與船長來形容這兩個人。葛內向總會長阿奎維瓦報告他的朋友被捕時，他在信中是這麼寫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們這位非常溫文的親愛夥伴，已遭海盜擄走，如今我們是在少了舵手的破敗船上繼續航行。」

「兩支箭射向同一個靶心。」1586年5月8日，邵思衛與葛內離開羅馬城，準備前往英國，在米爾維恩橋（Milvian）跟羅伯·珀森斯神父告別時，邵思衛說了這麼一句充滿詩意的話。珀森斯是羅馬總部主管英國傳教工作的首長，他伴隨這兩位青年走到這座橋。這兩隻箭射向同一個靶心，當然指的就是殉教。

邵思衛與葛內從一認識就結為朋友。兩人在前往法蘭德斯的漫長旅途中，有機會長談，彼此互相了解。葛內在羅馬大學代替著名的天文學家克拉維教授數學，本來應該接下教學棒子的。他也很喜歡音樂，他的判斷力強，注意細節；他喜愛與人接觸，喜歡憑直覺而非按照邏輯作決定。他保證要當一個出色的上司。

身陷危險

兩人來到法蘭德斯，設法不引起注意地通關。不過，有一個住在巴黎的間諜叫湯瑪斯·莫根（Thomas Morgan），卻接獲以下的訊息：「兩名非常年輕的耶穌會神父將前往英國，其中一人名邵思衛，另一人名葛內。」莫根將情資呈報他的上司法蘭西斯·華辛翰（Francis Walshingham）爵士。

7月17日，下午兩點鐘，兩位神父在法國加來（Calais）登船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為防萬一，兩人上岸後即分道揚鑣，約好在倫敦相聚。

兩人在倫敦的聯絡人是關在馬爾夏西監獄的天主教徒；他們指引這兩位神父到威廉·威斯頓（William Weston）經常去住的一家客棧，威斯頓是英國初期耶穌會的會長。事實上他在幾天之後就跟兩人取得聯絡。

當時情勢非常緊張，每天都有突襲查巡；當天早晨這家客棧也遭到突襲查巡。五天之後，大家都知道兩位耶穌會神父來到英國的事情。神父們必須趕快從倫敦遷往安全地點。

緝捕隊再過數小時就會逼近，三位耶穌會士騎馬離開倫敦，到三十哩外的赫利福之家（Hurleyford House）安頓，這是一座人跡罕至的寬闊莊園。屋主里察·波德（Richard Bold）是威斯頓最近才領引進教的教友，他是一位熱情洋溢的音樂家。他自設教堂，備有管風琴，還訓練全家人與僕人成立合唱聖詠團。期待三位神父到來的他，召集了一些友人，其中包括英國音樂之父威廉·伯德（William Byrd）。

這羣人聚在一起大約十天，每天都以詠唱的方式舉行彌撒，還有神父講道。三位耶穌會神父利用這段平安的日子策劃未來。

威斯頓有預感自覺自由的日子無多，他希望將自己的經驗和計畫傳授給新來者。許多天主教徒建議神父到自己家中住，好為他們的信仰傳播提供基礎。在赫利福之家，三位神父研究這些教友家庭家數與地點，以及未來的分工事宜。葛內願前往各省區，將為各省指定它們的「堂區」；而邵思衛則願在倫敦建立一個歡迎中心。

他們八天假期的高潮是在聖女德蓮紀念日 7 月 22 日當天，獻唱〈莊嚴彌撒〉（或許是伯德的作品之一），據邵思衛事後記載：「各種不同的樂器與人聲混聲織成奇妙和諧的音效，不過獻唱的事延到第二天，而我早已受邀到另一個地方去，沒有辦法參加。」

他所指的「另一個地方」就是倫敦的馬爾夏西監獄，邀請函來自監獄中的天主教友，他要去為他們講道。他一大早就騎馬返回倫敦。他的聽眾當中有一個間諜潛伏其間，他當然向上司華辛翰報告此事，連神父講道的內容都一一呈報。

威斯頓在 7 月 25 日的文字紀錄顯示：「我被每天的危險包圍，連一刻都不安全。」所謂「每天的危險」，隨著他的工作日增與跟人接觸增加而升高。威斯頓在 8 月 3 日遭到逮捕，葛內接任會長，直到 1606 年去世為止。

包圍圈縮小

邵思衛的傳教工作獲得成功，這是構成他處境日益危險的原因，他愈是擴大行動範圍，他身後留下的線索便愈多。此外還有其他不利因素：之前的反天主教的迫害活動，以及西班牙無敵艦隊入侵事件。天主教徒被懷疑是西班牙入侵的因素，因此必須予以鎮壓。

他有兩次稱得上奇蹟的逃脫經驗。一位政府代表發現了他的蹤跡，不過他沒有立刻下手逮捕，反而跟蹤他一長段路，想要找到他到的地方，希望一舉擒住更多人。邵思衛繼續前行，絲毫不察被人跟蹤，最後是跟蹤的人把人跟丟了。

另有一次，政府人員硬闖邵思衛住的地方，看門者努力抵拒搜尋者入內的時間，讓邵思衛有時間藏匿起來。他聽到來人大喊大叫，拆毀木造物，敲牆偵測可能藏人的角落，然而「他們找不到我，」他事後寫信給總會長阿奎維瓦，「雖然我跟他們之間只隔著一層薄薄的隔板。」

他接下來住的地方是位於倫敦河岸的阿倫黛女伯爵（the Countess of Arundel）的莊園。由於濱河占有地利之便，必要時他可以溜出去到街上或者河上。他只有在入夜後、經過偽裝的情況下才敢出門；白天則花許多時間祈禱、寫文學作品以及通訊。

危險愈大，他愈是大膽。如果說他在橫渡英吉利海峽前，幾乎失去勇氣，此時的他，已因使徒傳教成果卓著而感到興奮。面對危險，他展現鋼鐵般的意志，這種熱誠是造成他詩作產量大增的原因。他最佳的詩作都完成於這段時期，兼具藝術與深遠的宗教熱望。

他甚至獲得阿奎維瓦的支持，總會長似乎不像一般以為的是個冷靜的官僚，事實上他流露出關愛的友誼之情。

不久，邵思衛與葛內作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使得他們自身的處境更加危險。他們決定設立印刷廠，出版書籍。葛內有印刷的經驗，而邵思衛是個多產作家，這兩個友人再次截長補短。然而，要設立印刷廠必須取得王室的許可，祕密設立是違法行為，再多的預防措施都不可能充分。幸虧一羣忠信的平信徒協助，書一印好，一夜之間就分散倫敦各地，有的時候，在同一

天，可以做到同一天，同一時間，分送全英國各地。

歐洲大陸為捍衛教區神父掀起的文字運動，正是導致邵思衛神父被捕的原因。

最後的挑戰

怒濤阻擋了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入侵，然而來自西班牙的威脅依然存在。英國當局考慮重新發動迫害天主教徒的新措施。1591年10月18日頒布的聲明，痛斥「一羣神學院教士與耶穌會神父因為反對王國惹出重大麻煩，準備採取非常必要的措施，以為補救。」

新的措施並非對原先的法令有所增添，不同之處只在於，聲明的用詞更為狠毒。被貼上神學院教士標籤的是一大羣放蕩的年輕人，其中部分因為在英格蘭境內犯案，已成了亡命之徒、叛徒等等；他們被斥為「天生非常卑劣」而且「險惡的人」，或者「我們王國不正常的子民」。這種宣傳對天主教徒造成的傷害，可能遠大於迫害措施本身。

邵思衛致函女王提出辯答，在這封他名之為「謙卑懇求」的書信中，他寫出了個人最佳、最生動的散文。他的靈感來自他對從前的學生，而今同為神父的兄弟，受到誣陷誹謗的義憤。他或許想過要透過葛內的印刷廠出刊，不過在他於1592年6月25日被捕時，流傳在外的還只有手抄本。被關在威斯貝奇監獄的威斯頓也拿到了一份抄本；另一份則落入逮捕邵思衛者手中，此人名里察·托普克利夫（Richard Topcliffe），他對邵思衛折磨有加。

邵思衛的命運已經註定。自從坎庇恩之後，還沒有人為天主教理想作過如此有力的辯護；他或許是英國紋章院助理托普克利夫最積極緝捕的天主教神父。

雖然托普克利夫的官銜只是女王的侍從，他卻擁有幾近暴虐的權勢。他與他的私人殺手團只聽命於女王，後者則與他共享戰利品；他既是主審官，也是折磨人的專家，根據他本人的說詞，他可以私下施以酷刑。他推出新式的折磨方式，比舊式的肢刑架更省錢、更有效率。

這個卑鄙無恥之徒，發誓要抓到邵思衛，並讓他坦承認罪。他利用一位名叫安妮的年輕女子設下陷阱。這名女子是羅伯·貝拉米（Robert Bellamy）之女。她為了信仰的緣故被關進監獄後，發現懷了孕（據她父親說，是托普克利夫強姦了她），他們告訴她要是她能引誘邵思衛到尤克森登（Uxenden），讓托普克利夫在那兒逮到人，她們全家就可以免去迫害。

逮捕

貝拉米家族是堅定不屈的天主教徒，他們的房子是耶穌會在英國最常去、最安全、歷史最久的一個地方。威斯頓、珀森斯、坎庇恩等人都曾在此住過，葛內與邵思衛也來過好幾次。邵思衛在1592年6月25日早上抵達，在那裡主持彌撒。熬不過屋主的殷切邀請，他準備待到第二天早晨再走。

到了半夜，邵思衛被太熟悉的嘈雜聲音給驚醒了：沉重的腳步聲，砸碎玻璃的聲音，木頭碎裂的聲音，還有托普克利夫野獸般的咆哮聲音。邵思衛收拾跟神父有關的一切東西，跟這家人講了些鼓勵的話，就躲進藏匿地點。

大隊人馬在全棟屋子內展開搜索，托普克利夫看到貝拉米夫人就口出惡言，然後讓這家人大吃一驚的是，他接著拿出一張紙條，開始唸他要找的躲藏地點。貝拉米夫人雖想抗拒不從，但她也了解這場戲已經完了。她向邵思衛傳遞一個預先說好的訊號，

這位隱藏起來的耶穌會神父便自行出現在托普克利夫面前。

當這個新來者進入大廳時，這個惡人慷慨激昂的訓話倏然打住。眼前這人纖瘦、長了一頭赭色頭髮，嘴角稍微上揚，要不是他溫和有禮，簡直就像在嘲笑他人，一副不可捉摸的樣子，要抓的就是此人。托普克利夫頓時怒氣沖天。

「你是誰？」他擠出一句話。

「一位紳士。」

「你不是！你是神父！叛國者！耶穌會士！」

「那你得拿出證明。」

邵思衛是在設法避免這戶人家給毀了。托普克利夫氣瘋了，他拔出劍來，衝向面前這個人。地方官與站在旁邊的另一人急忙擋住了他，不讓他下手，邵思衛不為所動。他說：

「原來如此。你要的是我的血。你高興要，隨便你，反正是我母親給我的。」

旭日初升之前，搜刮工作已告一段落，教會家具全部被丟到一輛車上，同時邵思衛手腳被綁著也被帶上車。這輛車迅速祕密地開到托普克利夫位於威斯敏斯特的家。然而「有關邵思衛被捕的消息傳遍整個城市，甚至整個王國。天主教徒的悲愁，筆墨難以形容，彷彿痛失了一個親愛的親人似的。」葛內寫道。

折磨迫害

托普克利夫急忙呈報女王，並開始展開偵訊與迫害邵思衛的工作，他向女王報告說：「就在我位於威斯敏斯特的堅固內室」。他太了解這項工作了，急著要證明他有本事從受害者身上榨出他所要的東西。

可是他碰到的對手是邵思衛，他拿這位神父一點辦法也沒

有。經過二十四小時的折磨，他不得不坦承失敗，神父口中逼不出一個字能夠用來構陷為叛國罪。女王認為他是無用的愚人，她本人和她的諮議將接手邵思衛的審訊工作。

她選定樞密院的高官威廉·魏德（William Wade）爵士，在許多神父的聲明中牽涉到此人。但是他也沒輒，眼前這位被吊在牆上吃盡苦頭的人物，硬是能夠理性的作答，要不然就是在面對觸及招待他的教友屋主的生命與下落時，三緘其口。羅伯·塞西爾（Robert Cecil）爵士本人也參與偵訊工作。他遇到了一個可以為師的人，這個對手態度溫文，思想敏捷，意志十分堅決。若干年後，他跟某個朋友坦露心聲：「他們總是誇耀古人，可是我們推出一種不可能有人受得了的新式酷刑，雖然如此，我卻目睹邵思衛身子被吊，猶如樹幹一般，在那種情況下，還是沒有人能夠逼他說句話。」葛內向阿奎維瓦上報告時這麼形容他：「堅韌剛毅的巨人」。

大家都知道他被折磨了十次之多，可是最後一次的時間，沒有人知道。大概是在七月間，人家似乎放棄了他，認為進一步再審也無益。到了七月底，他仍被關在城堡門樓監獄，身子十分虛弱，無力為自己辯護，全身布滿了自己的大小便，身上長蛆，但是精神依然不屈不撓。

全英國都知道他受到酷刑的事，他的父親里察（Richard Southwell）也有所耳聞。他是屬於都鐸王朝建立之後才興起的新貴族階層，靠搜刮教會與修院的財物致富。女王本人跟里察的夫人一起被帶大，後者還教過她拉丁文。里察爵士正式致函女王，以既然他的兒子是個紳士，就應該以此身分相待懇求她，「即使他是個耶穌會神父」，所求照准。邵思衛被轉回倫敦塔監獄的單人牢房，還仁慈的准他看書。其後兩年半間，他只有與書為伴：葛內

冒險送去的聖經，還有他的聖納德（St Bernard）全集。他的獄中生活，令獄卒大開眼界。

審判

1594年冬天，邵思衛向他父親的表兄塞西爾爵士作了私人請願，希望他能被公審，否則就讓他的朋友能夠來探監。塞西爾粗暴的答覆：「如果他那麼急著要被絞死，他的心願很快就會實現。」到了2月18日，根據塞西爾爵士簽署的特殊令狀，邵思衛移監到紐蓋特監獄去。葛內說：「這是倫敦十二個監獄當中最嚴峻的一個。」

所幸他在一個專門關待處決犯人的小牢房裡只待了三、四天而已。在這幾天裡，他受到了很好的照顧，吃得比倫敦塔監獄的膳食還要好，他還可飲一杯酒，而且就在他接受公審之前，一名老婦人送給他一碗湯，告訴他：

「喔！先生，天主安慰你，你今天就要上法庭了，把這湯喝了吧！這會使你勇氣倍增，內心愉悅的。」

「這碗肉湯是為優勝者，而非被定罪的人。」

這是首次他獲悉他的大限已來到。

他在戟與鉤鏟槍的簇擁下被帶了出來，他的雙臂被繩索網綁著，一大羣人押著他，來到法庭。眼前三位法官，分別是主審法官約翰·波普漢（John Popham）爵士，此人身形碩大，滿臉橫肉；檢察長是愛德華·柯克（Edward Coke）爵士，此人英俊、面帶微笑，為人機警；第三位是托普克利夫，一副咬牙切齒，等著報仇的樣子。

雙方熱烈的你來我往一番，邵思衛顯然絲毫未受損傷，緊接著偵訊的問題，被告在不違反宣誓的原則下，提供模稜兩可的答

案。

「偽證！」柯克咆哮，「耶穌會的信條是：作偽證合法！」

經過熱烈的討論，陪審團退席去思索如何作成判決。邵思衛其實可以離去的，但是他乞求讓他留下來。過了三十二個月的單獨監禁生活，此時能夠看到在場每個人的臉孔，實在令他感到欣喜，在座者有人微笑，有人含淚以對；他能夠辨識每位朋友，他感謝他們的出席與支持。

法官回座，宣布判決結果，並且詢問邵思衛有無任何理由覺得不該給他這樣的判決。他只答了這麼一句：

「我祈求上主原諒造成我死亡的所有幫凶。」

托普克利夫打斷他的話：

「我發覺他有所隱瞞！」

邵思衛開心的反駁：

「當托普克利夫來到，本來就該隱藏起來。」

首席法官不讓托普克利夫再回話，他作成判決如下：被告「移送至紐蓋特監獄，從那兒再移往泰伯恩刑場接受絞刑，在他斷氣前割斷吊繩，要在他面前焚燒他的大便，他的頭要被砍下來，他的身體要被肢解，任憑女王陛下處置。」

「邵思衛先生謙遜的鞠躬致意，大大感謝庭上的判決。」一位不知名的目擊者轉述道，「他的許多友人和舊識都等在外頭，只為了見他一面，大家很高興能看他一眼，覺得他充滿慰藉，他的表情沒有絲毫沮喪，他們從來沒看過他這麼好氣色，這麼快活。」

曙光漸曉，獄吏來通知他，馬匹已在大門口等候，邵思衛張開雙手抱著對方：

「從來沒有人帶給我這麼好的消息，天啊，我除了能給你擁

抱，沒能給你什麼。」

邵思衛摘下帽子，遞給獄吏說：

「如果我有更好的東西可以給你就好了。」

就在他五花大綁上馬之前，人家給他一杯熱飲。「好喝，」他還杯子時說，「讓我的心充滿喜悅。」

在前往泰伯恩刑場途中，沿路有人毫不畏懼地向他表示同情與敬仰之情，他保持一貫的有禮與溫文。最後一行人來到了絞刑場，人家將他鬆綁，托著他的雙腳從旁協助，讓他從馬上直接跨到推車上。

照判決他必須在未斷氣前被割斷吊繩，但羣眾不允許此事發生，行政司法官的手下三次上前來割吊繩，每次羣眾都大喊：「停久一點！停久一點！」為了縮短他的痛苦，他們甚至要求「拉他的雙腿！」

劊子手照辦了，他用全身的力量去拉，直到他覺得在他上方的身體逐漸軟弱，終至靜止不動。然後他非常輕柔的將屍體抱到懷裡——「極罕見的好意」——再以幾近宗教敬禮的態度，擺放到木板上。

站在羣眾外圍的一個紋章官助理，內心受到感動，告訴同伴說：

「你騙了我！我從未見過有人像這個人死得這麼莊嚴。」

沒有朋友

邵思衛這一走，讓葛內神父覺得非常孤單，羅伯並非只是他的下屬而已，他還是同伴、朋友、心腹知交。過去他的焦慮、決定或者希望都與對方分享，少了羅伯為伴，葛內神父喪失了自信；他害怕肉體的痛苦，同時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像別人那樣堅

忍到底。他向總會長阿奎維瓦尋求支持，他寫的信愈來愈長，愈來愈親密，愈來愈不設防。此一奧妙關係彌補了他的朋友不在人世的缺憾。「脆弱如我們，」他寫給阿奎維瓦的信中指出，「我們覺得，透過他的痛苦，愈顯天主光榮，鞏固祂的教會，使祂的敵人不知所措。要經歷這些酷刑，必須要有非常特別的勇氣。一個人似乎難以忍受的事情，如果由全體分擔，的確就變得甘之如飴了，倒非因為痛苦程度減少，而是因為將我們結合在一起的大愛。而事實是相互承受彼此的負擔：個人的軟弱將因另一人的堅強而獲得支持。」

葛內將非常需要這股力量。因為除了外在的困難，還有英國政府密探滲透到修院，故意製造的許多內部問題。他的管理手法高明，他的人普遍愛戴他，然而誤解還是少不了。阿奎維瓦收到不少抱怨信函，但他始終表現對葛內神父的了解與信任。

在迫害期間要當個省會長並非易事，既要避禍，又很難跟總會長取得溝通聯繫。即便如此，在他的領導之下，跟隨他的人從三人增加到四十二人，令他頗感滿足。他是最享盛名的天主教領導人物，這使他成了英國政府的眼中釘，他成了污蔑運動的對象。最特別的是，他捲入了著名的火藥陰謀事件。這是一樁企圖炸毀國會大廈與炸死國王事件，包括天主教徒福克斯（Guy Fawkes）在內的同謀者，在直通國會大廈的地下室，埋置了二十多桶炸藥，陰謀炸死詹姆士一世。

葛內神父並不認識同謀者，他覺得事有蹊蹺後，盡全力勸阻大家不要做傻事。1605年11月5日，星期二這一天，是新國會開議的日子，天主教徒福克斯被捕的時候，就站在火藥旁準備要點燃火藥，事成的話，正在進行國王演講的國會大廈，將整個被炸毀。

葛內被指控是此一陰謀的唆使者，因此遭到逮捕、監禁。「他們每天對他疲勞轟炸問話，詰問過程中還對他施暴，可是無論用什麼方法，他們都無法從他口中找到絲毫可利用的資料，他們以奸詐的策略，設法找出他自暴的內心祕密，以便善加利用。」傑拉德（Gerard）的回憶錄有這一段文字記載。

他們找到一名獄吏凱里（Carey）當內賊，此人開始時展現得很友好，甚至意欲皈依天主教。一旦獲得葛內神父的信賴，他受命教葛內神父透過牆上的一個小洞，跟關在隔壁監牢的另一位耶穌會神父愛德華·歐康恩（Edward Oldcorne）交談。兩支竊聽器就安裝在附近。葛內從頭到尾被蒙在鼓裡。兩位神父彼此告解，絲毫不疑有他。即便這個奸詐的手段也無法抓到羅織罪名的證據。葛內神父受到多次的折磨，但他堅持不多說。等到1606年3月8日，迫害都過去了，他出於自由意志，坦承事先知道上述陰謀，但「（照傑拉德的說法）這事是祕密獲悉的，他在告解中都不能說，否則就違法。」

葛內作此供詞或許是希望拯救其他人的生命，許多人受苦多少是因為他的關係；唯有經歷折磨之後，他在自由意志下發表的完全、真實的聲明，才可能終止多人走上肢刑架。然而他的表態卻被解釋成軟弱表現，因此他死得很不光彩。英國政府對拿到所謂他的自白書這件事情歡呼不已，而他的朋友和祝禱者則譴責他的行為。

不過並非所有的人都這麼想。當葛內神父被處決的時候，根據一位支付了十二便士搶站靠近絞刑台牆壁的目擊者說法：「觀眾離開的時候，心中疑慮都消除了，認為葛內神父是無辜與聖潔的。」葛內死得英勇，他在絞刑台上的行為表現，跟有關他的傳聞不符。處決完畢，許多人衝到葛內神父的遺體前搶東西，希望

獲得殉道者的遺物。有一人拿到了葛內神父穿過的襯衫，有的人拿到了他不同的衣服，「如今看來這些東西的價值勝過黃金。」

部分的污點依然洗刷不去，葛內受此影響被阻擋在殉道者行列之外。忠信到底的阿奎維瓦總會長，本來想將他的名字一起列入，但或許是出於謹慎，最後並沒有這麼做，葛內的英勇行為並未獲得正式的承認。

尼古拉斯·歐文

(Nicholas Owen, 1560 ? -1606)

藏身祕洞的建造者

葛內神父真的不好抓。他落網時正與歐康恩神父、歐文修士以及艾希禮 (Ashley) 修士在湯瑪斯·哈賓頓 (Thomas Habington) 的家——辛利普府第 (Hinlip Hall)。當時渥契斯特郡 (Worcestershire) 郡長亨利·布洛姆利 (Henry Bromley) 爵士，帶著逮捕令與百名手下闖入辛利普府第。一行人「配備軍隊才該有的槍枝與各式各樣武器，展開雜亂無章的搜查。」這一天是 1606 年 1 月 20 日早晨。經過非常仔細的不斷搜索，徹底搜查整個府第，耶穌會神父才在 27 日被發現。原來搜緝者早已接獲密報，確定有耶穌會神父藏匿其間，因此他們才會鏗而不捨的追蹤獵物。

辛利普府第的藏身洞穴之多與複雜無處能及，這些都出自歐文修士之手。布洛姆利爵士太了解這座府第了，他以前就搜查過它。首先他檢查位於門樓之上的長畫廊，在這裡他發現兩個藏身的地方，可藏身的地方總計有十多個。搜查工作繼續，又再找出三個祕密地點，每一天都能發現一、兩個隱密洞穴。布洛姆利在他的報告中，對歐文的巧技推崇備至：這些洞穴「結構超羣，技藝高超，花費許多力氣才找出來。」

布洛姆利的堅持，到第四天有了收穫；歐文與艾希禮自動現身，希望搜查者就此收手。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們拒絕直接答覆他們是否為神父，希望對方就此認定，但他們的計策沒有奏

效。布洛姆利掌握確切的情報，知道兩位神父在屋內，他們一直搜查下去，直到對方餓得發慌自動現身為止。

由歐文建造隱藏洞穴的房子共有二十座，辛利普府第只是其中之一。這些洞穴彼此互不相同，因此發現其中之一，不可能導致另一個的發現。他幾乎總是設計一個緊急出口，無論何時都能將這些出口連結在一起，如此便可以利用其中一個與另一個共同運作。此外他還喜歡在一個洞穴內建造另一個藏身地點，有時還會建造第三個洞穴，如此當其中之一被發現，人家會以為空了。他的計策是朝堅固的磚石建築挖掘地道，數吋厚的磚石抹上灰泥後，就不會發出空洞的聲音。

歐文習慣在動工前祈禱，並在開挖一個新的藏身洞當天領聖體；他只在半夜獨力建造藏身洞，他也不跟人提起他建造藏身洞的任何地點。

至今這些藏身洞還未全部找出來，有些藏身洞在早已停用很久之後被發現，1870年發現了一個，1927年發現了另一個。今天這些已知的藏身洞遺跡已成了觀光景點，供後人佇足憑弔，緬懷先輩堅守信仰的精神。

殉教者

歐文個子小，綽號叫「小若望」；有一次一匹馬受到驚嚇，踩斷了他的腳，造成他跛腳；他向來直言無諱，不過他懂得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他起先與坎庇恩為伴，後來與葛內神父作伴；他是個技藝非常高超的木匠，眼看藏身的地方建構不佳，安全可虞，葛內便用他來建造較可靠的藏身地點。

歐文來自牛津一個堅信天主教的家庭，此前已有兩度入獄的

經驗，他之所以能夠恢復自由之身，完全是因為他證明自己有利用價值。這是他第三次被捕，最後這一次是跟葛內神父一起被捕。

在倫敦塔監獄，他每天被折磨七小時之久，好幾次遭到異常殘酷的待遇，最後一次是在 1606 年 3 月 1 日。他的供詞都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他沒有多說一句連累葛內神父的話。

當局並未判他死罪，他是被折磨至死的。多年來他一直有疝氣的毛病，按照當時的習俗，他可以免受折磨，然而這個慣例並未應用在他身上，他的腸子都迸出來了；迫害他的人想要完成工作，就在他的肚子圍上一塊鐵板，藉以支持他的腸子，然而劇痛迫使他的內臟被擠出來，鐵板反而割傷了他的肉體。他被人從加重吊掛的牆上卸下來以後，在無可言喻的劇烈痛苦中拖了一晚，到了次日早晨 3 月 2 日才斷氣。

「馴順、天才、沈默寡言、勤勉的小若望，守口如瓶的去世了，正如他隱晦的一生。但是他的工藝作品，也就是他的無言禱詞，卻遺愛於人間。尼古拉斯在他不為人知的痛苦中去世，至死他都緊守口風，偽裝身分到底，坎庇恩與所有殉道者都歡迎他加入殉道行列，在那裡不需要用到人類語言。」（引自瑪格麗特·瓦芙 Margaret Waugh）

從 1581 到 1678 年間，另有二十二位耶穌會神父殉難，人數太多，無法一一詳列他們的名字。

儘管教難不斷，耶穌會也以同樣的步調成長；在 1586 年，很少人會想到英國的耶穌會神父人數會在未來四十年間增加到 300 人。這些人站在歷史悠久的宗教的最前線，他們受到部分人的敬仰，也成了其他人的眼中釘。讚賞者的溢美之詞，徒增嫉妒之心；那些詆毀者的作為，反而成了推動聖召的最佳力量。除了這些理想的呼召，還應記上一筆以下幾位傑出人物的影響力：坎

基督的僕人 II

庇恩、邵思衛、葛內、珀森斯，「這些人格無論在哪個時代出現，都是傑出卓越的。」（引自菲力普·休斯 Philip Hughes）

若望·歐吉威 (John Ogilvie, 1579-1615)

喀爾文教友皈依為天主教徒

蘇格蘭也展開宗教迫害，有不少人殉道。1579年，若望·歐吉威出世那一年，蘇格蘭改革運動達到高峰。他的父親華特爵士是長老教派，1588年出任地方司法行政長官，負責查緝設法入境的耶穌會神父。清楚地顯示若望是在喀爾文教派的家庭中長大的，根據蘇格蘭學院新生入學註冊的資料：「若望·歐吉威是原喀爾文教派，現皈依天主教。」

事實上，他在1592年離家前往歐洲深造時，還是個喀爾文教派信徒。當局為防止天主教家庭將自己的子女送往海外接受天主教教育，出國一律必須申請政府許可，不過華特爵士的身分特殊，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因此沒有人表示反對。

若望的家族長久以來都堅信天主教，這個傳統戰勝了他父親暫時改信喀爾文教派的插曲，出國兩、三年足以自行抉擇要追隨他的祖先，還是他小時候就接觸的喀爾文教派。若望在十七歲皈依天主教；1596年他懇求進入杜埃的蘇格蘭學院；1599年他申請加入耶穌會。蘇格蘭學院已遷到莫拉維亞（Moravia）的奧爾米茨（Olmutz），他從奧爾米茨一路步行來到維也納，懇請省會長准他入會。他加入同樣位於莫拉維亞布洛諾（Brno）的奧地利初學院，此地讓人想起過去來自英國的另一位初學生艾蒙·坎庇恩。十一年之後的1610年，若望奉派到巴黎晉鐸。這是他返回家鄉

的第一步。

當時蘇格蘭已找不到耶穌會神父的蹤跡了，面對耶穌會蘇格蘭分會崩解的局面，總會長阿奎維瓦下令蘇格蘭耶穌會會長召集所有同胞舉行緊急會議，商議當前情勢。剛剛升神父的若望，跟好幾位資深的神父並肩而坐。

這次會議點燃了他的心火，他希望到蘇格蘭服務，他一直等到 1613 年 5 月 21 日才接獲阿奎維瓦同意他請求的來信。同年 11 月，他喬裝從歐洲大陸參戰返鄉的士兵，兼營販馬副業，在愛丁堡（Edinburgh）附近的里斯（Leith）港安全上岸。

短暫的使徒工作

他在蘇格蘭的使徒工作沒超過一年——從 1613 年 11 月到 1614 年 10 月——其間還曾赴倫敦與巴黎從事一項祕密工作，這趟差事的目的並未揭曉，但據推測可能是受到國王的差遣。

起先他定居愛丁堡，成為威廉·辛克萊（William Sinclair）的座上賓，後者是一位成長於新教家庭但皈依天主教的年輕人。他冒著很大的危險照顧支持神父。最後他為此被判死刑，其中特別牽扯到歐吉威神父，然而他的死罪後來減判為放逐。

1614 年 8 月下旬，歐吉威開始伸入格拉斯哥（Glasgow）發展。他主要的聯絡人是一位名叫羅伯·黑給特（Robert Heygate）的年輕人，此人開了一家店。歐吉威自我介紹是馬匹販子，他請羅伯代他前往開泰爾（Kyntyre）去買匹馬。後者了解這趟差事真正的目的是宣布一位神父已經來到，將為大家主持彌撒聖祭。

10 月 4 日早晨，歐吉威為平常的小團體主持彌撒。然而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亞當·鮑依德（Adam Boyd）自我介紹是個尋求天主教教義的望教友。如果神父肯跟他在當天下午四點鐘到市場廣

場走走，某個傳口信者將會帶他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參加集會。

鮑依德直奔前長老會部長、最近剛出任格拉斯哥聖公會大主教的史波提斯伍德（Spottiswoode）面前，交給他當天早上跟歐吉威神父在一起的人士名單，並安排隨他當天下午前來捉拿神父。

當天下午四點鐘，歐吉威果然依約到了市場廣場；鮑依德也準時到達，還帶了一名陌生人，此人走到歐吉威身邊，請神父跟隨他到他主人的家。歐吉威還沒移動腳步，就被推擠進某個屋內。獲報後，主教親自來到這屋子，掌摑歐吉威一大巴掌，說：

「你好大的膽子在一個宗教改革的城市裡主持彌撒。」

「你攻擊我的行為像個劊子手，不像個主教。」

彷彿這是個訊號似的，旁人一擁而上，對歐吉威拳打腳踢，有人拉扯他的頭髮、鬍子，有人用指甲抓破他的臉，還粗暴的將他剝個精光。

「可恥的畜生，你們想要怎樣，人沒個人樣。」

這就是他對捉拿他的人說的話；他從來不缺膽識，也不會啞口無言。「他吼過來，我就吼回去。」這是他事後對此事所作的解釋。

第一次偵訊

「你有沒有在王土之內主持彌撒？」

「如果這算是罪行，必須由見證人證明此事為真，不能根據被告者的誓詞。」

「你是神父嗎？」

「如果你證明了我有過主持彌撒，你將以同一證據證明我是神父。」

接下來的問題需要極細緻的答覆，若望都輕鬆自如的應付過

去：譬如王權的問題，他的神權問題，宣誓效忠的義務問題，火藥陰謀，葛內神父等。關於最後的問題，大主教說：

「如果有人向我供認意圖謀取國王生命的陰謀，那麼，我應該背棄告解者。」

「果真如此，沒有人應該向你坦白。」

「但教宗為此將葛內神父封為聖者。」

「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在羅馬他已被畫入殉道者之列。」

「根據詩人、畫家選擇的主題提出你的論點是愚不可及的。不過要是他的死是為維護神父聽到的告解內容絕不能洩露，那麼他的確是個殉道者。」

歐吉威以貼切的言論為他首次的審訊作了結論：

「我來到我的國家宣揚的是基督，並非葛內神父。我今天必須專注於我的事情，就像當年他專注於他的事情一樣。各司其職，而天主照顧我們全體。」

進入十二月的第二週，他從格拉斯哥被移送到愛丁堡去接受更多的審訊，為了逼供，他們動用了酷刑。

徹夜不眠

第二次審訊在 12 月 12 日舉行，主要目的在獲取接納安頓他的人們，以及他在天主教會接待的人們相關資料。然而事實上，他受審的重點卻是有關他對教宗權力與國王權力的想法，以及他是否同意伯敏與蘇雷亞斯（Suarez）的觀念。

其後歐吉威經歷最痛苦的一段時期。當局決定一連八天九夜不讓他闔眼，他們用帶尖的棒、釘子、針刺他，用拳頭猛擊他。四個有名有姓的大男人日夜不停的輪流逼他。等到他筋疲力竭，

肉體對他們的刺戮與拳擊無動於衷，他們讓他直立再倒下，震撼他整個身體。川流不息的羣眾聚集在他的牢房，等待他受苦的心靈熬不住而洩露祕密的重要一刻。最後，醫生宣布他只能再活幾個小時，這個支離破碎的受害者終於進入無意識的睡眠。

「有關我晚上不睡的報導傳遍了整個蘇格蘭，」歐吉威事後寫道，「許多人為此感到憤怒，同情我的痛苦遭遇，許多貴族與領主慫恿我照國王的意思做，但是一無所獲。」

聖誕節前，史波提斯伍德大主教帶著他的犯人返回格拉斯哥，接下來數週歐吉威獲准外出到花園裡走動，也可以有時間寫下個人坐監日記。對他的警戒多少有點鬆懈，他乘機將寫在紙片上的東西從門縫底下塞出去，交由前來探監的其他犯人妻子家屬偷偷帶出去。我們今天能夠得知他被捕後對話的內容，就是從這裡來的。

其中一次是他與另一位長老會的安德魯·諾克斯（Andrew Knox）的對話，此人後來接受主教的職位。

「你在白斯理（Paisley）宣講不利聖公會的言論，公開說你將以魔鬼稱呼當上聖公會主教者，是的，而且還要向他的臉吐口水。可是你自己卻在十五天後當上了主教。」

「如今我們看得比從前清楚。」

「十分正確。你看清了主教有數千元的年收入，而當個宣教員只有數百元的俸給。不過請你告訴我，如果這些教規當時是正確的，何以現在它們不正確了呢？」

「歐吉威先生，你腦筋很靈活，我希望擁有你的機智，我會好好利用它們。」

「我寧可跟著斷頭台的劊子手，因為你將直接走向魔鬼。」

「你跟我用這種方式講話？」

「請你原諒，大人。我還沒學會客套，我們耶穌會神父講話都直來直往。」

指控與判刑

接著出現一段暴風雨前的寧靜。史波提斯伍德在 1614 年 10 月接獲來自國王有關處置歐吉威的命令。命令指出：「如果只找到他是耶穌會神父，主持過彌撒的證據，應該將他驅逐出境，他要再踏上國土一步，必須先獲得許可，否則將觸犯死罪。但要是說他一直都在煽動子民叛亂，或者他確實維護教宗的權力勝過國王，而且不肯宣誓效忠，那麼就應該依法處置他。」

於是成立了一個由傳教士和平信徒組成的五人委員會，目的在徹查歐吉威「對英國國王和教宗聲稱擁有的宗教轄權的意見，過去伯敏、蘇雷亞斯等人都堅持教宗的轄權高於英王。」歐吉威對五個問題的答覆呈送國王過目後，被告被勒令還押；這是死前最後的刑期。

此時大主教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他此前明顯的友好一下子轉為嚴厲。原來看守監獄者是個隨和友善的人，如今被更換了，接替者是一個陰鬱、脾氣暴躁的粗人，此人待歐吉威非常苛刻。此人用鐵鍊綁住歐吉威，讓他絕對逃跑不了。雖然如此歐吉威還是設法寫成了最後一封信給奧地利省會長；他以迂迴的方式表達希望他的獄中日記，必須送達省會長手中。

最後國王的信差遠從倫敦來到此地，確定要是歐吉威繼續堅持從前的答案，他將受審並予以處決。審判日期定在 3 月 10 日，當天上午十一點鐘，歐吉威走進大廳，在受審台站定，面對十二名法官，其中包括史波提斯伍德大主教。

他口若懸河的說明自己的觀點，然後選出的十五名法官，經

宣誓後再次宣讀起訴罪名，國王的提問由他一一作答，他獲准以被告的身分說話。其間史波提斯伍德大主教經常插嘴、打斷，漸漸變成兩人的辯論。法官退席考慮判決結果。「所有人一致認為犯人觸犯叛國罪，」法官宣判處以死刑，「要在市場樹立絞刑架吊死他，他的頭要被砍下來，他的身體要被肢解成四大塊，放在四個不同的地點公開展示。」

這位殉教者表示謝意，擁抱宣布判刑的法官，還祝福了他；他同時感謝其他人，包括大主教在內。他與他們每一位都握了手，說他打從心底原諒他們。他將自己交託給任何在場隱匿身分的天主教徒，請他們代禱，只見法庭內全體人員起立。

處決

當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大主教的一位僕人來帶他出來，隨行的人包括行政司法長官與劊子手。歐吉威擁抱了劊子手，告訴他不必喪氣。他被捆綁著帶到處決地點，來自蘇格蘭與英格蘭各地的好幾千人聚集在此。

新教閣員羅伯·史考特（Robert Scot）陪同他走向絞刑台，即便在這最後時刻，他都試圖勸服歐吉威改變心意。

「你在跟我玩遊戲。」歐吉威說。

「我以全權正經嚴肅的跟你講，」閣員回答，「大主教要我向你許諾，只要你願意改信我們的教會，他保證將他女兒嫁給你，並以自己教區內最高的牧師薪俸作為嫁妝。」

就在此時，兩人已來到絞刑台前，登上台階，走到絞刑架的主平台，閣員繼續催促著。

「你能否說大聲點，好讓人們都聽得到你說的話。」

「那是一定的。」

這位閣員轉向民眾，高聲說：

「我答應歐吉威先生保全性命，而且還能與大主教的女兒成親，未來還能支領豐厚的薪餉，只要他願意加入我們的教會。」

「你們都聽到了嗎？如果真有這情況發生，你們都願意出來作證嗎？」

「我們都聽到了，我們願意作證。下來吧！歐吉威先生，下來吧！」

有一瞬間所有旁觀者以為歐吉威將會退縮，天主教徒表情驚恐，新教徒則是喜悅以待。

「我此後不必擔心叛國罪名？」

「完全不必。」

「那麼，是單單為了宗教的緣故，我被當成罪犯帶到此地來？」

「理由就這麼一個。」回答的聲音宏亮。

最後他們將他的雙手反綁，他奉命登上梯階。站在最高一階，他最後一次祈禱，起先以拉丁文祈禱，接著以蘇格蘭語祈禱。劊子手本人鼓勵他說下面幾句禱詞：

「若望，請說，上主求你垂憐我，上主請你收受我的靈魂。」

歐吉威重複這幾句話。劊子手「深富同情且頗不情願的擊倒他，讓他跌落階梯外」，歐吉威的身體依然懸吊在半空中。根據習慣，劊子手得跳到被吊死者的肩膀，加速絞死的過程；劊子手對歐吉威並沒有這麼做，他走下台階，從腳部拉他一把，好讓他快點斷氣。接著他割斷吊索，歐吉威的屍體砰的一聲，掉落到下方的木板上。

死刑執行完畢，羣眾集體哀嘆，一致抗議歐吉威死得不公。或許因為民眾的反應激烈，其餘死後處置方式，包括砍頭及肢解身體都免了。

道明·柯林斯

(Dominic Collins, 1566-1602)

愛爾蘭遭英格蘭入侵，在十二世紀早已是既成事實；然而在後來的三百年間，英國國王的權力其實並未伸入愛爾蘭。直到1494年都鐸王朝建立專制政權後，愛爾蘭才感受到壓力。在這期間，武裝衝突不斷發生，處決罪犯之事屢見不鮮。1541年，所有抵抗行動都收平了，愛爾蘭成立了一個溫順的國會，承認英王亨利八世是愛爾蘭的國王；後來伊莉莎白一世女王以在英格蘭採取的勸導手法，建立了英國國教。

在柯克(Cork)郡有個重要的漁港約爾(Youghal)，當地的居民大體上可以接受伊莉莎白女王為他們的統治者，然而他們無法接受她想強制推動的新宗教。道明·柯林斯大約於1566年在這個城市誕生。

軍人出身

兩位耶穌會神父來到這個港埠住下來，創辦了一所小學的時候，道明必定已十一歲左右。然而兩年後發生的反英國政權武裝叛變，遭致該地許多建築物被摧毀，耶穌會小學被迫關閉，從此未曾復學。這或許是道明受到的教育不多的原因。

步入青年期的他，長得高壯英俊，滿腹雄心壯志，繼續待在愛爾蘭已不能滿足他，於是他決定像當時跟他同年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前往歐洲大陸去試試機運。

大約在二十歲左右，他獲得一個機會搭船前往法國，從法國

轉往布列塔尼的南特（Nantes）。他想去從軍，他具備當軍人的一切條件，既勇武又主動，只可惜沒錢買匹馬。在客棧當僕役兩、三年後，他終於入伍了，投效墨柯伊爾（Mercoeur）公爵，加入天主教聯盟對抗新教軍隊的戰爭。當時領導新教軍隊的是信奉喀爾文教派的納瓦拉（Navarre）的亨利（Henry）。

道明的軍旅生涯持續了九年之久，他出人頭地，帶領一支騎兵。他攻下布列塔尼的拉潘納（Lapena）戰略古堡，聲名大噪，獲得榮耀的他獲任命出任該地區的軍事首長。

等到天主教聯盟開始四分五裂時，亨利四世想要以兩千金幣收買他的古堡。道明拒絕賄賂。相反的，他反而將古堡與周邊領土交給西班牙將領、代表菲利普二世國王的阿桂拉（Don Juan del Aguila）。他自己隨即動身前往西班牙，身上帶著一封阿桂拉的推薦信，獲得菲利普國王每個月二十五克郎的津貼。

這個來自約爾漁港的年輕人，前往西班牙北部愛爾蘭士兵駐守的拉科魯那（La Coruña）海軍基地去報到。不過這位騎兵隊長太純真了，他太和善，逐漸對軍旅生活感到失望，反而愈來愈喜愛祈禱，以及閱讀靈修方面的書籍。就在此時，1598年，他遇見了一位愛爾蘭耶穌會神父懷特（Fr White），此人對道明往後的一生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

耶穌會

懷特神父在四旬期來到泊靠拉科魯那的船上，聽愛爾蘭軍人辦告解，根據他的記載，他就在這個時候看到「這位軍官——道明·柯林斯，他告訴我，至少十個月來，他無法感受到任何喜悅，或者內心平安，因為上主催促他要選擇另一種生活，離開這個俗世，盡棄世間的虛榮，為此他內心頗多掙扎。他已向不同修

會的托鉢修士談過此事，但是他一點兒都不想要過他們的生活方式。當他聽到我是個耶穌會神父時，他覺得內心湧起一股莫名的喜悅。」

此外道明告訴懷特神父，在法國從軍的那幾年間，他一直跟在隨軍教士身邊，而這些教士卻跟一般軍人一樣既賭博也發虛誓。而他見過的耶穌會士則令他印象深刻，因為耶穌會神父常做默想，顯得超凡入聖。他最想要加入耶穌會當神父。

懷特並不懷疑這些願望的誠懇，但是他不免對實現理想的可能性感到疑慮。道明沒受過正規教育，不可能有望成為耶穌會神父；要是他肯當修士，或許可以找到需要他這樣的人的職務，但是他必須屈就了。道明毫不氣餒，只要耶穌會肯接納他，他樂意做任何事情。

懷特寫信給西班牙省會長，後者不願接納道明入會。道明不死心繼續寫信央求省會長，直到省會長同意試用他。省會長要他到西班牙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的聖地牙哥（Santiago）耶穌會學院報到，開始他的試用期。

他要離開拉科魯那成了一件大事。上自將軍，下至基層的軍方全體，都對他決定放棄軍旅生涯與皇家厚祿感到驚奇。

同樣的，在西班牙的聖地牙哥，一身戎裝匆匆趕來的這位愛爾蘭軍官，也引起大驚奇，報到後的他無論在洗碗碟鍋盤或者擦拭地板，都仍穿著奪目的軍服。過了不久，耶穌會學院面臨黑死病傳染的打擊，許多人一一離去，道明繼續留下來照顧病患。危機過後，離去的人不好意思的一一返回，至此道明是否適合加入耶穌會已不再成問題。他終於卸下了軍裝，改穿耶穌會士的黑色長袍。

再度置身軍人之中

看來彷彿他將告別爭戰歲月，從此在這個平靜的地方度過餘生，但接下來的發展並非如此。不願接受英王統治的愛爾蘭，再度陷入混亂，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決定幫助愛爾蘭反抗軍；西班牙準備派一支艦隊，由阿桂拉指揮，並率領一支軍隊前往支援。隨軍神父有好幾位，其中包括一位愛爾蘭神父詹姆士·阿徹（James Archer），他設法安排讓道明與他結伴同行，就這樣道明再次置身軍人之中。

艦隊於 1601 年 9 月 3 日啟航，但正如十三年前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它也遇上惡劣的天氣，艦隊的船隻失散了。主力艦隊於 9 月 21 日在愛爾蘭南岸靠近金塞爾（Kinsale）的地方登陸，攻占了這個城鎮。其餘的艦隊直到 12 月 1 日才在距金塞爾以西三十哩的卡索雪凡（Castleshaven）停錨。當他們抵達此地時，一支戰鬥分隊奉指揮官歐蘇利文（O'Sullivan）之命，從西柯克凱利（Cork and Kerry）趕到；道明加入他們，想要與阿徹神父在當地集合。歐蘇利文的手下正要趕去金塞爾跟當地的西班牙軍人會合，結果發現這個城鎮已落入一支龐大的英國軍隊之手。

愛爾蘭軍隊從四面八方會合，攻打夾在愛爾蘭與西班牙軍人之間的英國軍隊，但是愛爾蘭的戰略出了差錯，結果潰敗了。歐蘇利文回到了他的領土柯克凱利，他相信他在鄧波依（Dunboy）的古堡必能作為進一步抵抗的中心，道明·柯林斯隨同他回到這個地方。

鄧波依古堡地處偏遠是個優點。英國人要進攻此地得先對付在家鄉活動的游擊隊，加上大雨暴風將持續到五月底為止，他們的攻勢難上加難。到了 1602 年 5 月 31 日，天氣終於放晴，6 月

6日英國軍隊出奇的在古堡下方的沙灘成功登陸。

翻開愛爾蘭歷史，鄧波依古堡是極其難攻的一處。來犯的英軍至少有四千人，而守軍只有區區一百四十三人，不過守軍英勇抗敵。英國將領體認到，攻占這個古堡唯一的方法只有砲轟。於是在6月17日清晨，英軍開始重砲轟擊。古堡出現一道夠寬的裂口後，領軍的喬治·凱瑞（George Carey）爵士下令軍隊向古堡推進。雙方打了一整天的仗，守軍被迫退到古堡的地下室。夜幕低垂，英國人才不敢再追擊。

就在此時，一個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冒著硝煙的瓦礫堆中，只見他越過成堆的屍體一路走來。原來是道明，他想設法安排一場隆重的停火。

道明深知英國指揮官亟欲捉個耶穌會神父，他希望藉著自己的犧牲，能夠拯救自己同胞的生命。凱瑞拒絕停火協議，反將道明抓起來當犯人，等到第二次黎明，又恢復攻擊。

殉道

原來戍守古堡的人只剩七十三人沒有戰死，這些犯人當中凱瑞只保留三個活口：道明·柯林斯，湯瑪斯·泰勒（Thomas Taylor），以及麥克史文尼（Turlough Roe MacSwiney）。其餘的人都被絞死了，6月18日當天就有五十八人被吊死，其餘十二人在四天後絞死。同一天6月22日，凱瑞下令炸毀古堡。

倖存的三人被帶回柯克問訊。泰勒與麥克史文尼不久就被處決；至於道明，英軍想好好利用他。凱瑞在7月9日親自問話，但是根本得不到任何軍事好處。看來沒有理由延遲處決他了。

凱瑞自有計畫。正如當代許多英國新教徒，他對耶穌會神父有一種近乎莫名的恐懼。他確信耶穌會士是阻礙新教發展的主要

阻力。如果能夠說服一個耶穌會神父放棄效忠教宗，改信新教，那將會是個重大的勝利。

他立刻展開擊垮道明心志的舉動。道明遭到殘暴的酷刑，他們告訴他只要改信新教，就保證讓他享有豐厚的報酬；宗教部長奉命去說服他接受天主教的謬誤；他自己的一些家人也力勸他為救自己，姑且假裝改信新教，等日後再公開駁斥得了，但道明不為所動。

處決地點已定，就在他自己的家鄉約爾。1602年10月31日，一支軍隊押著他遊街示眾，來到處決地點。他穿著耶穌會黑色的會服，跪在絞刑架基柱下，欣喜的說：

「萬福，聖十字，我長久以來渴望擁抱的！」

他以西班牙語、愛爾蘭語和英語交雜著向羣眾發表演講，告訴他們他來到愛爾蘭是為了捍衛神聖羅馬天主教會的信仰，這是唯一的得救之路。他十分的快活，以致一名英國軍官說道：

「他渴望赴死的心情，猶如我渴望去參加一場盛宴。」

道明聽到他這麼說，就回了他一句：

「為此緣故，我願意死一千次。」

他的言行如此感人，以致劊子手不肯執行他的工作。士兵抓來一個正好路過的可憐漁夫，逼他去做。這個漁夫先請道明原諒，道明在登上絞刑台的梯子之前對他微笑，當漁夫將套繩套在他的脖子上時，道明做了以下的祈禱：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的手中。」

這個漁夫拉開了站人的梯子，道明就這樣斷了氣。他被吊在原地好幾個鐘頭，最後繩子斷裂，他的屍體落到地面，留在那裡直到晚上。乘著暗夜，當地一些天主教徒將他的屍體取走，恭敬地埋葬在一處祕密地點。

2. 胡格諾派教徒暴亂： 雅各·撒肋／威廉·索特慕

(Jacques Salès, 1556-1593) / (Guillaume Saultemouche, 1557-1593)

在英格蘭，王室為擴張它的權力，由上而下強制推廣新教；在法國，新教運動是全民運動，因此更加無法無天、違常、暴亂。法國新教的發展並不均勻，在有些地區生了根，有些地區則完全不受影響；因為新教，法國爆發了屠殺、暗殺以及長期內戰，這就是始自 1562 年 3 月 1 日的「三十年戰爭」。導火線是一羣聚集在瓦西 (Vassy) 一座農場的胡格諾派教徒，被古斯 (Guise) 的軍隊殺害；最後在「西班牙納瓦拉的亨利，成為法王亨利四世，頒布南特詔書 (Edict of Nantes, 1598 年 4 月 13 日)，賦與新教徒平等權利之後」，這場戰爭宣告結束。

最狂熱的新教徒集中在法國東南部，特別是維瓦瑞斯一帶，今日名為奧比納斯的所在地，這個城市早先掌握在新教徒手中長達 25 年之久，直到 1587 年 2 月 10 日，聖灰節前一天，蒙特婁男爵紀堯姆·巴札魯斯 (Guillaume de Bazaluc) 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這個城堡為止。狂歡作樂直到半夜的新教徒，睡得深沈，根本聽不到爆炸聲，貝爾維茲 (Belvèze) 大門附近被炸開了一個洞，新教徒就這樣束手就縛。遍及全省的全面停火協議在 8 月 8 日簽訂，表面上似乎確保了和平。

五年之後，擢升為該城總督的蒙特婁男爵，請耶穌會派一位神父前來宣講將臨期以及封齋期的道理。獲選的神父就是雅各·撒肋。

神學教授

真的是選對了人。22 歲成為龐塔摩森（Pont-à-Mousson）大學第一批畢業生的他，24 歲就當上哲學教授，當時他尚未完成神學研究，31 歲他修得神學博士學位兼任神學教授時，他除了會拉丁文與希臘文，還熟讀希伯來文與其他東方語文，是一位出色的教師。然而他的健康不佳，教學工作因此中斷了數次，但也多次恢復教學，正如一個人返回他真正的聖召工作崗位。

他還有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因此之故他才獲選派赴奧比納斯：他熱愛領聖體，而這正是胡格諾派極力反對的部分；此外他也渴望殉教。

他還待在梅茲（Metz）時，有過與胡格諾派宣教員對峙的經驗，六年後他在奧比納斯再度與胡格諾派交手；在第一次的經驗中，胡格諾派宣道員以為他們能夠封住撒肋的嘴，想不到事與願違。撒肋神父的論述清晰有力，凸顯對方的可笑，公開的論戰就此打住了。

耶穌會省會長試探他的意願，他毫不加思索的答覆：

「你帶給我再好不過的消息，這一直是我的心願。」

顯然撒肋想到了這項傳教任務可能殉道致命。

省會長想要安排另一人作為他的同伴，因此挑選了威廉·索特慕修士（可能有義大利人血統），此人十分單純，極其無私而且虔誠。

接觸

撒肋神父在 1592 年 11 月 29 日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布道。聽眾中有些胡格諾派教徒，他們對撒肋神父清晰冷靜的講道既感欣

喜又覺得驚異，並沒有作任何的抨擊。甚至還有人說，自己從未聽過如此飽學、又能尊重旁人的觀點。

由於雙方都接受，一個曾經擁護改革教會的好人便提議讓天主教傳教士與新教牧師來一場公開討論。他說，撒肋是一個講理的人，可以跟他討論。

此時有人獨排眾議，他確信推出皮耶·拉巴特（Pierre Labat）無人能擋。人人一致認為他會接受徵召，天主教徒提高警覺了。撒肋讓其他人去接洽會面的地點與時間。最後確定討論會地點在魯翁斯市（Ruoms）的喬西夫人古堡的大廳堂。

到了約定的日子，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一起來。撒肋跟奧比納斯行政首長在一邊，主動提議者也在場，周遭都是胡格諾派教徒，唯獨不見拉巴特，他居然沒來。天主教徒克制不作任何可能冒犯對手的舉動，新教徒這一邊則愈來愈緊張；到底出了什麼事情？最後新教徒一臉羞愧地魚貫離席。

拉巴特的缺席對新教與牧師造成不可容忍的打擊。其實這是刻意安排的，拉巴特與其他新教領袖都知道，這場討論將會十分嚴肅，不可能耍花招，任何花招都逃不過這位天主教神學家的注意，最好暫時丟臉，再設想其他。如果奧比納斯繼續在天主教徒的掌握中，而傳教士根據停戰協議條件，繼續在當地傳教的話，那麼全面的災難勢將不可避免，一定要不計代價防堵此事發生。

撒肋返回奧比納斯，當地籠罩在一片詭異的靜默中。

三階段引爆

這其實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撒肋神父能夠感受到；他確定胡格諾派將會違反休戰協定，攻擊這個城市，那麼他將會是他們報復行動的第一個受難者。他通知行政長官，但後者不以為然，

認為是撒肋擔憂過度。

2月5日，撒肋花整個下午的時間對一些喀爾文教派信徒講授道理，接著就去休息了。

第一階段

到了深夜兩點鐘，他被一種說不出來的聲響給驚醒。接下來他聽到喊叫的聲音，混亂的原因再清楚不過了：

「殺了他！殺了他！」

他衝到教堂去將至聖聖體安置到安全地點，給同伴和自己領終傅，兩人祈禱自己的言行絕不能配不上耶穌與耶穌會的名。

對方顯然有備而來，完全是一場突襲行動。來者只有十五人，卻能夠爬過高牆，製造驚慌。跟在他們之後的軍隊，在薩爾亞斯（Sarjas）領主金·波塞（Jean de Bosse）的指揮下，順利占領了整個城市，對方沒有一人傷亡。

三名新教牧師伴隨著以下三人：伯納丁·裘林（Bernardin Guérin）、賈克斯·萊赫，以及皮耶·拉巴特。拉巴特的光芒不久就超過前兩人。經過五年的流亡，如今拉巴特以勝利者之姿重返奧比納斯，更加堅定決心要斬草除根。等不及天亮，他趕忙去會薩爾亞斯，要領主去逮捕那位耶穌會神父，免得他逃離了。指揮官派皮耶·蘭托傑（Pierre Lantouzet）與另兩名他迎面遇到的軍人去執行任務。

三人來到了耶穌會士的住處，破門而入，發現兩人正跪地祈禱。

「報上名來」

「我們是耶穌會士。」

「交出錢包來。」

「我們沒有錢。」修士回答。

「有的，我們有錢，」撒肋插嘴，「我們在托隆（Toulon）的弟兄給我們這條手帕，裡面有一點錢，供我們簡單開銷。」

手帕中只有幾個銅板，少得可憐。來人將整個屋子徹底搜查了一遍，然後押著這兩個犯人交到薩爾亞斯手中，不過他對神學討論並不感興趣。

「帶他們到牧師那裡去，他們將決定如何處置。」

第二階段

牧師們正在該城另一端的司法部長路易·拉法亞（Louis de la Faye）的家參加宴會。耶穌會士被押來到的消息，獲得全體一致的歡呼。大廳的門敞開，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這兩人身上。

最後，滿懷自信的拉巴特，與神父展開了漫長的辯論，從週末一整天，持續到主日上午。他首先為改革教會的舉動說了很長一段致歉的話，希望撒肋能夠加入新教的陣營。神父一開口，他這個幻想立刻破滅了。接下來侮辱的言語取代了理論，新教徒明顯的落敗了，他們便以消遣娛樂試圖遮掩過去。

一名侍者說，兩個犯人必定餓壞了。三個牧師假惺惺地致歉，要人送上吃的東西。於是話題轉向守齋禁食，結果又是以辱罵告終。

到了傍晚，話題改變了，選擇談論自由意志。撒肋輕易地證明對手們的論點虛偽，最後談到了一個議題：聖體。

這個新議題的討論跟前兩個議題一樣。

撒肋向羣眾說：「給我聖經，我會指出你們的牧師如何欺騙各位。」

他的話刺痛了他們的心，在場的幾位牧師開始稱呼撒肋是冒

名者、偶像崇拜者、假先知、反基督。喧鬧聲中大家聽到了拉巴特高亢的聲音說：

「殺了他！單單他一人所含的教宗毒害，感染整個世界綽綽有餘。」

當時夜已深，這兩個犯人像野獸般被關在又冷又濕的地下室。

第三階段

1593年2月7日，星期天清晨，還有一場有關聖體的討論尚待完成；拉巴特又是辱罵有加，而撒肋仍然以理服人。此時胡格諾教派的主日崇拜時間已到，現場揚起一個聲音，解救牧師脫離困境：

「講道，講道！」

拉巴特到羣眾廣場宣講，公開教唆殺害假先知。羣眾的情緒並沒有被炒起來，反而逐漸散去。只有一小羣喀爾文教徒繼續聽講。拉巴特惱怒羣眾反應冷淡，轉而向薩爾亞斯領主籲求，後者下令三名手下奪取兩個犯人的性命。

士兵們面面相覷。

「我絕不幹這種事。」其中一個說。

「我也不幹。」另一個附和。

「我要是加害這兩個無辜的人，魔鬼會要我的命。」第三個人接口道。

他們來到隊長面前，重申拒絕執行任務之意。拉巴特更加氣憤，硬拖著薩爾亞斯和他的軍隊到撒肋與索特慕還在的地方。撒肋看到薩爾亞斯時，有禮的招呼他，但薩爾亞斯粗暴的抓住撒肋的手臂，告訴他說：

「跟我來，你這個偽善的法利塞人。」

「你要帶我到哪兒去？」

「跟我來，你要死了。」

「馬上去，讓我們以上主之名一起去。」

修士發現自己落在後面，很難跟得上；他最後設法穿過擁擠的人羣。拉巴特、其他牧師們，還有許多人都在廣場上等著他們。

「快把他給解決了，他不配活在這世上。」拉巴特再說了一次。

或許感到恐懼，或者出於憐憫，羣眾開始四散了；只剩下胡格諾派士兵留在原地，他們似乎也感受到同樣的不安。薩爾亞斯的一名手下，綽號辛普頓的維塔·蘇中（Vital Suchon），向前邁進一步，表現出英勇的樣子，近距離發射手中的火繩槍；然後以匕首刺進撒肋的胸膛，撒肋死前喃喃自語：

「我的天主，請原諒他們！」

辛普頓接著轉向修士，手中揚著帶血的匕首，索特慕張開雙臂迎接他，最後他被其他人以劍和帶尖的鐵棒結束了生命。

3. 在科希策的困境：

雅各·龐格斯／麥基奧·柯樂茲／瑪爾谷·柯利吉

(Stephen Pongrácz, 1582-1619) / (Melchior Grodzieci, 1584-1619) / (Mark Križevčanin, 1588-1619)

一大堆麻煩

今天的科希策 (Kosice) 屬於斯洛伐克，但在十六世紀，它卻是匈牙利北部的一個省會。此地見證了三十年宗教戰爭典型的一幕：英勇事蹟與背叛行為並行，愛國主義與嗜權當道，政治與宗教牽連難斷。

在這場所謂的宗教戰爭中，不乏政治因素摻雜，宗教與政治因素的分量一樣重要，都是決定性的因素。以下所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事蹟。

新教徒人口占大多數的當地人，聲稱擁有自主權，不願接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波西米亞以及匈牙利國王菲迪南二世的統治。1618年爆發叛亂，雙方發生衝突；王子與傳教員，軍人與宗教領袖都捲入漩渦，雙方都有人殉道。1995年7月2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三位殉難的天主教徒封聖的講道中，他特別提到「同時屬於其他基督教的許多人，這些人曾經遭到酷刑迫害，被判重刑。」他還說：「我們怎麼能夠不承認在普瑞索夫 (Prešov) 遭暗殺的二十四位忠信聖公會教徒靈魂的偉大？」

教宗甚至進一步以行動表示敬意。同一天教宗一行驅車到普瑞索夫訪問，經過為紀念新教徒殉道者而豎立的紀念碑時，他下令停車，他下了車，在紀念碑前祈禱，讓隨行的樞機主教們感到

驚奇。

重要人物介紹

加波·貝斯連（Gábor Bethlen, 1589-1629）：一位手腕高超的政客，敏於作大膽的決定，是個絕頂的善變者。他先是個天主教徒，後來改信希臘正教，接著變成喀爾文教徒，最後差一點變成回教徒。他起初是川西凡尼亞（Transilvania）的一個小王子；他首先背叛他的保護者加百利·巴托利（Gabriel Báthory），後來背叛菲迪南二世皇帝，一度以匈牙利國王自居。在天主教徒眼中，他是個壞人，新教徒則視他為民族英雄。

伯多祿·艾文奇（Peter Alvinczy）：喀爾文教派傳教士，「是所有政治與宗教不合諧的主導者，上匈牙利為此分裂，尤其是凱索維奇市（Kasovic）」，他誓言與天主教徒為敵，尤其是耶穌會。教唆貝斯連做出惡劣行為的正是他。

喬治·拉科奇一世（György Rákoczy I, 1593-1648）：出身匈牙利最尊貴的階級，誓言與奧地利大多數人為敵。獲選為川西凡尼亞王子的他，經常侵入匈牙利，支持造反行為。他與貝斯連結為很好的盟友。

安德拉斯·杜奇·南吉（Ándras Dóczy de Nagy）：匈牙利人，堅貞的天主教徒，科希策總督兼御林軍將軍。護衛天主教不餘遺力，是喀爾文教派的眼中釘，他請了兩位耶穌會神父來到科希策，安置他們住在他的宮殿裡。遭到貝斯連囚禁的他，拒絕接受賄賂的提議，結果因受到虐待，死於獄中。

雅各·龐格斯（Stephen István Pongrácz）：匈牙利人，生於川西凡尼亞；他在二十歲加入位於莫拉維亞布洛諾的耶穌會；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研習哲學，又前往奧地利格拉茨（Graz）修讀神

學；1618年奉派到科希策，熬不過安德拉斯的懇求，負責照料當地僅存的少數天主教徒。

麥基奧·柯樂茲（Melchior Malchor Grodziecki）：波蘭人，生於席勒西亞（Silesia），他也是在布洛諾初學；會講好幾國語言的他，在1618年被借調到科希策總督身旁，協助照料軍中的德國兵與波西米亞軍人。

瑪爾谷·柯利吉（Marc Križevčanin）：克羅埃西亞人，維也納、格拉茨、德匈學院、羅馬國瑞大學的耶穌會校友，當過特納瓦（Trnava）修院的教授及院長，後來在伊斯特恭（Esztergom）當詠經司鐸。1619年初，他出任管理克拉斯納（Krásna）古老本篤修道院財產的總長，此地距科希策不遠，因此他與上述兩位耶穌會神父成為朋友。

事實真相

1619年9月5日，星期四，拉科奇受到一名叛徒的幫忙，輕易混入了科希策市。同一天，他派遣一支十人部隊，前往逮捕三位神父。

市議會集會，擔任主席的雷能（Reyner）與喀爾文教派的傳教士艾文奇，共同提出一項動議案，要求將全市的天主教徒趕盡殺絕。這個提議嚇壞了大多數議員，科希策不該蒙上這樣的恥辱。根據與拉科奇達成協議的條件，全體市民的生命都應該受到尊重，其中包括效忠教宗的天主教徒。不過三位天主教神父並未納入協議的條件，因此可以犧牲。拉科奇不得不讓步了。

士兵開始硬闖教堂。後來他們設法勸說柯利吉，提議他交出所管轄的財產，就可以放他自由。瑪爾谷斷然拒絕了。

6日半夜過後，來了一批可怕的惡棍。龐格斯前去應門，門

一開，其中一人即以狼牙棒重擊他，任他昏倒在地上。其他人衝上去，對著他與他的同伴柯樂茲拳打腳踢，剝光他們的衣服，弄斷手腳造成肉體毀傷，還口出穢言。就這樣兩位神父倒臥血泊中，這羣人轉而尋找柯利吉，重複惡搞。

接下來開始了駭人聽聞的迫害。他們將龐格斯的鼻子、耳朵割下來，塞到他的口中，不讓他呼喊耶穌與瑪利亞的名字；他們又將他的手指一根根打斷；最後還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繩子，繩子拉得好緊，使得他雙眼暴凸。

三位神父受到最殘酷的迫害還在後頭。他們被懸吊在天花板的橫梁上，脫光衣服，全身是血；然後被熊熊熾燃的火把，燒烤他們的腰側，直到他們的肋骨和腸子都露了出來。

看到柯利吉與柯樂茲半死不活，這批人才把他們兩人斬首，將屍身拋入一個化糞池內。龐格斯則再度被毆打，然後拋到他的兩個同伴屍身上面。那時天色漸亮，他們以為這三個人已經死了，就此離去。

龐格斯並未立刻斷氣，他又撐了二十四小時，在極端痛苦中，於9月8日主日清晨離開人世，永遠的安息。

三位神父的屍身留在惡臭的污池中好些時候，新上任的長官貝斯連對天主教徒的請求充耳不聞。到了1620年3月，西吉斯蒙德伯爵（Count Sigismund Forgachand Goris）代表菲迪南二世皇帝，前來協商；他的夫人凱塔琳·帕菲（Katalin Palfy）一起隨行。貝斯連邀請伯爵與伯爵夫人參加他在王宮所設的晚宴，舞會時間到了，貝斯連非常殷勤地請伯爵夫人賞臉共舞。她藉口推拖、多次拒絕，但是對方繼續堅持，於是她利用機會要到了她想要的。她說，她願意接受邀舞，但是有個條件：貝斯連必須交出三位神父的遺骸，貝斯連無法說不。

4. 哥薩克的暴虐： 安德·保保拉 (Andrew Bobola, 1591-1657)

波蘭

綜觀波蘭史，波蘭國土最擴張的全盛時期，除了波蘭本國，還包括了北到立陶宛大公國、南到烏克蘭，可以直抵紅海。雖然如此，問題也增加了不少。

其中之一是欠缺內部凝聚力，加上極權王權制度，內部更加不團結；另一個問題是欠缺清楚的天然疆界，第三個問題是強鄰環伺，文化與宗教多元。波蘭領土的擴張，加上它所征服的民族並非同種族，使得以上問題益趨嚴重。在烏克蘭尤其如此，導致爆發一場激烈的戰爭，耶穌會神父在戰亂中殉道犧牲。

烏克蘭肥沃的平原是波蘭理想中的殖民地，烏克蘭人口複雜，包括來自全歐洲的亡命之徒與流亡人士，根據西吉斯蒙德國王的定義，是「各國小偷等人渣之集大成」。這些外來者不打仗的時候就遠走高飛，人家稱之為哥薩克人（Cossacks）。遭到波蘭地主剝削的他們，只要有一點點託詞藉口，就起來抗暴。

他們找到了能夠滿足熱望的理由，1596年路德派教會政治上歸波蘭管，但宗教上卻聽命於與羅馬復合的俄國東正教會。因此，這次復合具有強有力的政治意味，俄羅斯政客與東正教會一起猛烈的展開抨擊。俄羅斯人找到哥薩克人結盟，後者從此不必再過游牧的生活，不必再當盜匪，而將納編成為拜占庭東正教會的十字軍。哥薩克人在維特斯克（Vitebsk）殺害了聖若瑟·昆契

維奇（St. Josaphat Kuncewicz），此時本章的主角保保拉剛剛在尼斯威茲（Nieswicz）完成耶穌會第三年初學訓練。

熱情洋溢的人

我們掌握到的有關保保拉的資料顯示，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衝動的脾氣。但是瑕不掩瑜，他為人誠懇、魄力幹勁十足，身心活力充沛。他承襲了祖先的特質，他的先祖有人曾在十三世紀為「大鬍子亨利」立過汗馬功勞，獲頒一件鐵甲，並且獲贈位於西勒席亞的席周瓦村（Sychowa）。還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叔叔安德·保保拉，是國王的內侍，對耶穌會慷慨贊助，是這個家族中最耀眼的人物。

至於我們要談的安德神父，誕生於波蘭南部薩諾克（Sanok）附近的史川周欽（Stranchoin）；他上過位於布拉尼沃（Branievo）的耶穌會學校，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a）研習哲學與神學，1611年7月31日加入耶穌會，1622年3月12日晉鐸神父，這一天也是耶穌會會祖羅耀拉·依納爵以及方濟·薩威封聖的日子。

1623年，他結束第三年初學的時候，他的省會長決定多留他一年在尼斯威茲當堂區助理。熱情如火的安德顯露不高興的神色，消息傳到了上司那裡，紀錄顯示：「保保拉神父嘴巴不緊，似乎欠缺服從長上的精神。」

展開傳教

後來的二十年間，他做過五個不同的傳教工作，最後在1624年被派到品斯克（Pinsk），擔任瑪利亞善會（Marian Sodality）的指導神父；1630年，到白俄羅斯的波布魯斯克（Bobruisk）擔

任修院院長；1633 年，他住在伯拉克（Plock），在當地的作為「猶如一顆石頭投到了池塘」（引述拜拉 Hugues Beylard 語），名列客席的他，其實負責整個善會的事情；1636 年，他被調到華沙；1638 年他離開華沙到距此以北 130 公里的隆札（Lomza），在此待到 1643 年。最後才又回到維爾紐斯，大大受到重用。

傳教依然是他最喜愛的牧靈工作，不過事實證明他也是個很好的主管和教授。唯一的缺點是他顯得愈來愈不喜歡私下的交談，而比較喜愛公開的宣講，他從前的不耐煩脾氣也跟著消失了。「他的慈善心火以及他的意志力，將在他生命的高峰期展露無遺，過去的一切衝動跡象都磨掉了，塑造成一種成熟的高貴性格」（引述自多諾文 Gallagher-Donovan 語）。

如今的他已經作好了殉道的準備，他只要踏進即將出現的這個階段，讓迫害順勢發展。

1643 年他奉派到白俄羅斯的品斯克——抵抗分裂運動的堡壘。當地 13,000 位居民當中，只有 40 個天主教徒。拉濟威爾（Radziwill）王子興建了一所學院，聘請保保拉當院長兼教務長。保保拉的影響力改變了這個小城市的風貌。許多家庭都放心地把子女送到他那兒去接受教育，反天主教的偏見開始消失了。不過他工作得太努力了，1646 年假期間發現他健康受損，因此獲准解除職務，希望恢復健康。

到了 1648 年他還在療養期間，哥薩克人侵犯品斯克，搜刮掠奪：總計 5,000 棟房屋被毀，4,000 名居民被殺害，學院頓成廢墟，教堂的屋頂和家具全被燒成了灰燼。一切有待重頭來過，保保拉再度被召回來，他在離開六年之後，於 1652 年重返當地。

殉道

這次回來他不限於在城區活動，不過他繼續講道，並與有影響力的市民接觸，藉此達到傳教目的。他的傳教工作範圍拓及四周鄉下地區，一改過去漠視鄉區的現象。名義上遵循東方禮儀的鄉下基督徒，只曉得熟悉的「上主，求祢垂憐！（Gospodi pomilui）」。他經常去造訪的一個村子是亞諾（Janow），他希望使這個地方成為一個附屬中心。

他的努力有成，贏得了「靈魂搜尋者」的稱號。事實上他的努力主要是針對搞分裂的分子，然而這些人卻反過來嘲笑他、羞辱他，沿街跟在他後面齊聲呼喊：

「男巫、天主教神父、耶穌會走狗、教宗至上主義者、波蘭人！」

波蘭統御下維持的脆弱平衡瓦解之後，在品斯克馬上看到影響效應。瑞典猛攻波蘭西部，俄羅斯占領維爾紐斯和整個北部和東部地區，哥薩克再度襲擊品斯克市及其郊區。這一次沒有任何事情阻擋得了哥薩克人的暴虐行事。

哥薩克人是在 1657 年 5 月 16 日攻抵亞諾的。保保拉人就在附近，有人密報他所在的地點。果然哥薩克人找到了他，他們剝光了他的衣服，將他綁在圍籬上鞭打他，其手法之殘暴，連正在附近田裡工作的農人都嚇得走避。

然而他們奉命必須將保保拉神父帶到亞諾，因此他們又把他繫牢在馬鞍上，由兩個人騎馬拖著他走了兩哩路進入村子。隨後又用鞭子重重地抽打他，並以長矛挑起他，讓筋疲力竭的他在痛苦中跌落到地面。

根據教廷禮儀部的結論，保保拉神父所受到的苦刑，是他們所知最殘酷的。四名哥薩克人拖著他，想要獨創一格，於是想到要在他肉身上烙上神父的印記。他們拖著他的一隻腳來到了市場

一個屠夫的店裡，把他拉到長檯子上，關上大門。然後拿著用來燒烤小豬的充脂材火把，將倒吊的他，全身上下燒烤一番。其中一人注意到他的禿頂，便提議將他剝皮。然後又將他接觸祝聖聖體的大拇指與其他四指，也同樣剝了皮。接著讓他面朝下趴著，在他雙肩切道刀口，從這裡剝了一張像神父在舉行彌撒聖祭時穿著的寬大無袖長袍似的人皮。

在剝皮的過程中，保保拉不可避免的起痙攣，四名哥薩克人見狀反而興奮。他們繼續惡整，將一切能摘下的器官都給切除：包括耳朵、鼻子、嘴唇。保保拉神父忍著沒叫，他只說了句：

「我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在幹什麼？願上主與你們同在。上主，願祢的旨意承行。耶穌、瑪利亞，我把我的靈魂交在你們手中。」

最後一道酷刑：拔掉能說善道的舌頭。他們從後頸切一刀，從舌根處切掉它，殉難者昏厥了過去，施加酷刑的這幾個人以為他死了，這才罷手離去。事實上，保保拉神父還拖了一個鐘頭才離開人世。

5. 長崎十字架：
保祿·三木／若望·五島／雅各·喜齋
(Paul Miki, 1564-1597) / (John de Goto, 1578-1597) /
(James Kisai, 1533-1597)

薩威的傳奇

薩威離開日本時，他的心並沒有跟著離開，同時他留下了兩位耶穌會士：德樂士神父（Fr Cosme de Torres）以及歐偉度修士（Br Juan Fernández）。無論薩威神父或者他的兩位接棒者，都不曾放棄這個前途光明的地方。當薩威在上川島生命邁入末期之際，還有兩位耶穌會神父也在同時啟程前往日本；繼他們之後，許多神父陸續在九州與本州兩個大島展開傳教工作。這一切心血並沒有白費，到 1570 年，大約有三萬日本人領洗入教。

緊張情勢開始出現。繼德樂士之後出任省會長的方濟·卡布爾（Francisco Cabral）反對沿用薩威提倡的盡量採納日本文化的主張，而且不接受任何日本人當神父——這是致命的打擊。

范禮安於 1579 年以視察身分來到日本後，才更改了這個政策。情勢似乎利於發展，基督徒享有盛譽，擁抱基督教不再被視為離間行為，受洗的人們都是誠懇的基督徒。1582 年有四個受洗的日本人前往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羅馬訪問；他們在 1585 年抵達，受到了菲利普二世國王以及國瑞十三世和思道五世兩位教宗的盛大歡迎。

未來的展望甚是可喜，不料因為人的愚蠢，一切希望都破滅了。

失望連連

日本國四分五裂，大名割據一方，幾近自立的情景，逐漸演變成中央集權，掌控大權者豐臣秀吉當時正準備進犯中國。耶穌會省會長嘉斯帕·柯荷（Gaspar Coelho）考慮不周，竟讓對方以為他不但得到九州信奉天主教的大名支持，還可獲得葡萄牙提供的船隻。此一荒謬的自吹自擂，讓秀吉心生疑慮，認為耶穌會神父跟殖民勢力暗通款曲，於是他在 1587 年 7 月 24 日，下令驅逐耶穌會神父出境。幸賴范禮安圓融的外交手腕，才爭取到暫停實施這項命令，但是有個條件：此後耶穌會神父只能默默地低調工作。

後來又碰到另一個複雜情況。迄至當時，葡萄牙當局一直獨占商業貿易，而耶穌會則獨占傳教事業版塊。西班牙勢力進入菲律賓，成了亞洲第二大西方強權後，西班牙商人與西班牙方濟會士也開始注意到日本，認為這裡是他們可以各領風騷的新領域。葡萄牙商人反對西班牙勁敵進入日本；耶穌會則據理力爭，以不久前教宗才通報日本為耶穌會專屬傳教區，不讓方濟會勢力伸入。耶穌會認為方濟會神父要是進入日本，以缺乏文化適應的方式傳教，將會帶來問題，傳教工作勢必難有進展。

雙方互不相讓；總督和菲律賓主教派遣四名方濟會士於 1593 年抵達日本，次年又多派五人，全部安頓在首府京都——這個舉動多少有點挑戰的意味。充滿熱誠的方濟會士在大阪蓋了一座修道院，又在長崎蓋了另一座修院。

聖菲利普號商船擱淺事件

1596 年 10 月，西班牙大帆船「聖菲利普號」駛往墨西哥途

中在日本海岸擱淺了。秀吉下令將這艘船和船上貨物收歸國有，一名官員登船正式沒收財物。西班牙船長設法恐嚇對方，拿出一張世界地圖，顯示西班牙國王的勢力範圍大到「日不落國」，他還信口開河說傳教士其實就是為兼併做準備的使節。

這位官員迫不急待呈報秀吉。這個消息證實了他原有的疑慮：新來者原來就是西班牙的代辦！再也沒有理由縱容；因此他頒令：「既然菲律賓派來的這些人是大使，繼續住在京都宣揚我早已嚴格禁止的基督教律法，我下令將這些人以及接受基督教的日本人一併處決。」

受到這道政令影響的共有二十六個人：六名方濟會士、三名日本籍耶穌會士以及十七名日本平信徒。

殉教者山頂受難

負責處決的人是長崎知事的弟弟寺澤半三郎，他還是保祿·三木的朋友。執行死刑的地方在西坂山上，這座山海拔 360 公尺，俯視長崎市，有著起伏的山坡，但朝向長崎市的坡度逐漸降低。山麓最後突出的部分猶如外彎的船舷般伸入灣內。在山頂上有一片大草原，有一片山坡面向長崎市，另一邊則導向黝暗的山谷，那裡充滿了人的遺骸、野狗以及遭掠捕的禽鳥。這個地方是專為處決罪犯而設的，因此在此架設了二十六座十字架。一些地方上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懇求半三郎不要將殉道者視同罪犯，何不將十字架放到山頂上去？言之成理，半三郎同意了。

一行人在 1597 年 2 月 5 日早晨十點半左右開始抵達。他們在寒冷的冬天，綁著手赤著腳一路從京都徒步而來，沿路留下血跡腳印。

十字架早已被仔細地鋸好了，為每一個人量身定做，在平行

的雙臂間安置一個座位。即將殉教的一行人抵達後，各自尋找自己的十字架，擁抱了它。

最後一人抵達後，護送他們的士兵加強人牆警備，不讓觀眾接近。處決過程變成了一場莊嚴的彌撒，神父們與信徒對話，一起歌頌。

行刑者並未將這二十六人釘在十字架上，而是用鐵鍊將他們的手、腳與脖子綁住。負責綁保祿的那人發現這個耶穌會士太矮了，雙腳構不到下面的橫樑，於是這個人決定不用鐵鍊，改以布條將保祿緊緊綁在十字架上。為了將他綁緊，這個人還把一隻腳踩到保祿的胸膛上。一位神父見狀斥責他態度惡劣，但躺在地上的保祿說了：

「別管他，神父，沒事兒。」

當一切就緒，二十六座十字架幾乎在同一時間豎立起來。

最後祭壇

整座山看起來好像滿地開花。每隔三、四公尺豎立的十字架，全都面向山腳下的長崎市。四千名基督徒聚集在山坡上，彷彿站在層層階梯的露天劇場內，大家高聲喊叫，祈禱、哭泣，目光始終不離開十字架，神父們與人們交替詠唱聖歌。加入殉道者行列的三個小孩子，唱著他們在道理班學會的聖歌：「讚美主，祢的子女，讚美祂的聖名。從日出到日落，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三木看到在他面前擺著死罪的敕令，他一直保持泰然自若，對周遭環境一清二楚，他身為傳教士的本能告訴他要抓住機會作最後的一次布道。立在十字架上的他，俯視下面的人羣，提高聲調說：

「在場的各位請注意聽！」

頓時整個山頭靜了下來，他再度揚聲發言：

「我並非來自菲律賓；我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我是耶穌會的修士。我沒有犯錯，我的受死是因為我宣講吾主耶穌基督的律法。我很高興為此緣故送命，這是上主賜我的一大恩惠。各位可以相信我，我不說謊，我向各位保證，獲拯救之道無他。既然基督教誨我要去原諒任何傷害我的人，我在此誠摯的原諒君王與所有跟我的死有關的人，我祈求他們能夠接受洗禮。」

然後他轉向靠近他的幾位受難同伴，鼓勵他們勇敢面對最後的時刻。

最後的時刻終於來到，四名處決者開始從左右兩端的十字架起，一一刺戮這二十六名殉教者的胸膛。當他們走到中間時，殉道者的聲音逐漸消弱，羣眾的聲音反而變大了。

處決者在幾分鐘之內就完成了工作。羣眾衝破人牆，湧到十字架前，以手帕去沾殉教者的血，割下殉道者的衣服一角。士兵們想強力驅散他們，羣眾反而緊抓著十字架不放手。等到秩序恢復後，寺澤轉身離去，由士兵負責看守這些殉道者。許多人注意到寺澤哭了。

英雄

六名方濟會神父包括四位西班牙人，一位墨西哥籍，另一位則是來自緬甸勃生（Bassein）的印度人。至於日本平信徒包括一名木匠、一個鑄劍工人，一個製弓箭師傅，還有一位武士，一個十三歲的男孩（長崎人，名安東尼），另一個孩子十二歲（來自尾張的茨木磊思），一位醫生，以及一位化學專家，此人本來脾氣暴躁，後來因聖寵變成慈祥的傳教員。

三木時年 33 歲，他的父親三木半太夫是一位英勇的隊長，

三木很小的時候就在安土與高槻的修院度過，他臨死前即將晉鐸，是日本一流的傳教士。

若望·五島雙親都是基督徒，時年 19 歲，先在長崎的耶穌會學校就讀，後來前往志岐學院接受傳教員訓練。他是在大阪家中被捕的。

雅各·喜齋出生於異教徒家庭，在僧院長大。改信基督教的他，娶了一個基督徒女孩，可是這個女孩堅持要回復異教信仰，他決定與她分手，最後加入耶穌會當修士。

殉道者的教堂

出乎秀吉的意料，二十六名基督徒的殉教事蹟傳揚開來，反而促使基督徒更加堅定信仰：人人都想殉教。他們在十字架留下的洞裡栽植樹木；他們每個星期五都來祈禱、合唱聖歌，樹上懸掛了許多小燈；一大羣人每年 2 月 5 日聚集在一塊兒，直到迫害變本加厲為止；總計有 650 多人殉教。

1600 年德川家康繼位，他雖然沒有撤銷迫害令，卻也准許傳教自由。1610 年起，他才變得對基督徒不友善；1612 年在東京與京都都發生了迫害事件；最後在 1614 年頒令驅逐所有傳教士。不少人祕密重返，1615 年起，繼位的秀忠幕府將軍，對全國展開宗教迫害；直到 1651 年家光將軍去世為止，總計超過五千人。從 1617 到 1632 年，總共有 33 位耶穌會神父殉教。

接下來的一段歷史是教會隱密活動、頻遭迫害的時期，全賴內部信仰力量維繫生機，完全看不到外在信仰活動的表徵。要是有人被發現是基督徒，他或她要不是叛教，就是殉教成仁。等到多年後天主教傳教士再度踏上這個國家，偶然間才發現原來在日本還有一批在暗中朝拜天主的基督徒。

6. 大洋洲的圈套： 狄雅哥·維多 (Diego Luís de San Vitores, 1627-1672)

十字架與利劍

在太平洋地區，我們面對的是迥異於日本的情勢。耶穌會傳教士懇乞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力促落實王室信件指示對新發現的太平洋島嶼傳教的工作；菲利普國王致函菲律賓總督，下令他協助維多推廣傳教工作。因此，由王室出資建造的「聖狄雅哥號」，於1668年6月16日，在關島的一條溪河下錨停靠。維多請求島上的貴族容許他向島民傳教，一支軍隊負責保衛他，必要時這些軍人會採取行動。跟長崎的傳教先驅以十字架開路的做法不同，在此地是以利劍作為先導，闢路通往十字架。當年西班牙人的心態是，征服後合法化的頭銜，唯有靠接踵而至的傳教來確保。就這樣十字架與利劍頗不協調的並駕其驅。

麥哲倫（Magellan）於1521年5月6日駛經關島與北馬里安納羣島最南端的羅塔島（Rota）之間，是史上首位知道這個盜賊羣島（Ladrones）的西方人。不過以西班牙國王之名正式占領這些羣島的人是雷佳茲皮（Legazpi）；1565年他在關島上岸，並在海灘上舉行彌撒。當地居民看到西班牙船隻帶來的諸多鐵器，眼花繚亂之餘，紛紛以當地產品跟西班牙人交換，有的乾脆下手搶劫據為己有，從此這些羣島被稱為盜賊羣島。

改變這些羣島名字的人似乎是耶穌會神父維多，他為紀念聖母瑪利亞以及他的主保奧地利女王瑪里安納，而將島名更改為馬

里安納羣島。

馬里安納羣島共由十六個島嶼組成，最遠的的島嶼與日本相去不遠；事實上，王室的信函授權馬里安納教會述及日本；而在菲律賓，大家都了解馬里安納羣島指的就是盜賊羣島。

聖召

維多神父在關島溪邊上岸時，他體認到自十三歲以來一直頑強奮戰的聖召。原來他的聖召是三合一：加入耶穌會、致力傳教、殉道。

出生於西班牙布爾戈斯（Burgos）一個貴族家庭的維多，在馬德里的「皇家學校」就讀，從小就感覺到強烈希望加入耶穌會的意願。他的父親傑洛尼莫（Don Jeronimo）竭盡全力反對到底，卻無法改變兒子堅決的意志與計策。最後兒子贏了。1640年6月25日，時年十三歲的兒子，終於進入位於福恩特斯（Villarejo de Fuentes）的初學院。

他始終展現堅毅貫徹傳教聖召的意志力，不斷找方法達成傳教願望，例如發誓要是病好了，一定獻身傳教工作，又致函總會長哥斯文·尼可表達心願，總會長將他的信急速轉給省會長，坦率直言：「閣下必須派他到菲律賓去，要是我不指派這位維多神父到他切盼申請前往的東印度地區傳教，那我就大大有違本職且昧著良心了。」

當時通往菲律賓的航程都經由新西班牙（如今的墨西哥），因為此地總督轄權被及菲律賓。維多與新任總督雷巴（Don Juan de Leyba）同行，於1660年5月14日自卡迪茲（Cadiz）出發，7月28日抵達維拉克魯斯（Veracruz），在此地停留了將近兩年，等候駛往菲律賓的船隻。他在這兩年間，為只剩名號的聖母會注

入新生命。當時他所做的工作，事後證明非常有用。

他與另外十五位耶穌會神父一起在 1662 年 4 月 5 日自阿卡普爾科（Acapulco）搭乘一艘小船「聖達米安號」啟程，不到三個月，他們看到了盜賊羣島，在當地停泊充實補給。狄雅哥在馬德里臥病期間，看到的正是這些羣島以及這些島民，當時他還聽到上主邀請他去傳福音的旨意：「我派你向這些貧窮人宣揚福音。」

漫長的等待

到了 7 月 10 日，一行人終於在菲律賓的藍彭（Lampon）登陸，再從這裡前往馬尼拉。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到首都附近的一個村子泰泰（Tay-Tay），主要學習當地土話。他輕輕鬆鬆就學會了，許多人相信他有語言天才。三個月後他返回馬尼拉，準備在當地人羣中工作。

他全心投入工作，除了學校指定工作，最主要的是在市區與附近地區推動教務，此外他也作短途旅行，前往聖雅妮（Saint Agnes）以及馬來西亞山區傳教。他以在新西班牙短暫停留期間所採用的方法，一再獲得成功。「無以計數的羣眾遠從各地山區走出村子、屋子，放下子女、放下田裡的工作前來聽講道理。」

不過跟後來在民多洛島（Mindoro）的情況比較起來，上述情況還只能算是前奏曲罷了。因為民多洛島民必須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歷經險惡的大海、河流，沼澤區、陡坡、山區僻靜地帶以及荊棘叢生的小徑，頂著大太陽，冒著風雨以及其他險惡天氣等種種難關，才能一遂心願。他向島上的原住民宣揚福音，他花了五個月的時間走遍他們所在的海灘與山巔。

維多始終未曾放棄到盜賊羣島傳教的心願。他甚至設法學習當地的語言，還完成當地語文文法編纂工作。他向修院長、總

督、大主教請願，請他們在旅經盜賊羣島的旅程中讓他搭一程。這些人都設法勸阻他，一致表示他的計畫愚不可及，但是他堅定如昔。

第一個軟化立場的是耶穌會會長以及大主教；總督則繼續反對他的請願，認為維多的計畫瘋狂，不考慮給後者任何資金。維多下定決心，轉向國王請願。1665年1月22日他向菲利普四世國王請願，到了6月24日，國王發函授權這項傳教計畫，不過他本人卻在同年9月17日去世，由瑪利亞·安娜王后以攝政王身分代理國政。

這場戰役尚未獲勝；還欠缺船隻與資金援助。此時總督狄雅哥·薩塞多（Don Diego de Salcedo）心軟了，他下令建造一艘武裝大帆船，取名「聖狄雅哥號」，然而資金的問題只能由派駐新西班牙的總督批准。我們這位有膽識的耶穌會神父不假思索的立刻從菲律賓啟程，前往墨西哥再返回原地。

維多提議資助的金額高達一萬披索，令新西班牙總督大吃一驚。幸好維多前一次在新西班牙停留期間所認識的許多人願意預付款項，為他解決了問題。

1668年6月16日星期六，下午四點鐘左右，「聖狄雅哥號」在一條種植了一排椰子樹的溪流前泊碇。維多以即將履新的會長身分，帶著四位神父、一羣學生、一名菲律賓人，以及三個西班牙士兵，安抵目的地。

好的開始

許多獨木舟駛近這艘大船邊，當地土著高聲大喊：「mauri, mauri!」，告訴西班牙人他們是和平的人。但不管船上的人怎麼招呼他們，這些土著就是不敢靠近大船，他們心存疑慮，獨木舟

跟大船始終保持距離。等到維多吟誦連禱文，聽到第一句呼求聖人代禱的禱文「聖母瑪利亞，為我等祈」，大船上的人們看到當地島民排除懼心，紛紛開始駛近大船，送來各式各樣的東西，大船一下子堆滿了水果、鮮魚以及其他日用品。

維多派兩位神父以大使身分去跟島上的酋長會談。兩位剛一踏上岸，一大羣攜著矛槍與弓箭的武裝島民立刻出來迎接他們，只聽到四面八方高喊著：「mauri, mauri!」。大夥兒朝向某位最具影響力的酋長住家前進，酋長出來迎接，給大家熱烈的歡迎。兩位神父送給酋長的金屬耳環、帽子等禮物，酋長立刻把帽子戴到他理光的頭上。酋長准許神父們可以在島上各地自由行動、傳教，並為人付洗。

第二天 6 月 17 日，主日上午，維多與同伴上岸時，受到盛大的迎賓儀式歡迎。海灘上到處擠滿了人。當傳教士走下大帆船上岸時，當地土著將他們扛在肩膀上，送到離岸邊不遠的一個地方。維多主持彌撒，並以道地的土話向土著解釋此行的目的。

這些神父們不久就發現了大驚奇。原來有一個名叫伯多祿的西班牙人，早在 1638 年左右發生船難之後，就一直生活在島上。他們還找到一個中國人，名叫周哥，他是因為一場風暴把他的船帶到了這個島。他後來成了隱患。

這場接待儀式極為友好，但論誠摯，則有待保留。後來據說有人對當地土著作過這樣的描寫：「雖然他們看起來單純、率直，卻具有欺騙、背叛的本性；他們可以表面說好聽的話，卻隱藏心裡的傷痛長達一、兩年之久，直到找到機會報復。」

維多後來的遭遇，可以驗證這段話。1668 年 6 月 17 日上岸當天，氣氛一片寧靜，如果有敵人的話，那時尚未公然現身。

維多快速的分派工作，他與布斯提洛修士（Br Bustillo）留在

大村子阿干尼亞（*Agaña*），梅迪那（*Medina*）神父接掌南方島嶼的傳教工作；卡薩諾瓦（*Casanova*）前往札巴那（*Zarpana*）或羅塔島（*Rota*），卡迪歐索（*Cardeñoso*）與莫拉勒斯（*Morales*）到提尼安島（*Tinian*）去。

傳教工作進展迅速。兩年之後，維多為「島上大教堂」舉行啟用儀式，他並且計劃興建一所專供男童就讀的學校，另建一所供女童上的學校。為籌募資金，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工作成績：「島上所有一百八十個村子已經一一造訪過，有的還去過兩、三次；受洗的島民人數共計 6,055 人，幾乎其他所有人都是望教友，因為他們已經準備領洗。」

最後這一句可說是過分樂觀了，周哥早已埋下惡毒的種子：原來用來施洗的水已被下了毒，傾注在許多孩童身上的施洗用水，造成多人死亡。這一招果真管用：1670 年 1 月 29 日，梅迪那神父在塞班島（*Saipan*）被人用矛槍攻擊喪命。

下一個目標將是維多神父本人。

終於殉道

原本沈潛的反對勢力逐漸化暗為明。例如兩位酋長喜拉奧（*Hirao*）與吉普哈（*Kipuha*），早已嘗試殺死兩位神父。1672 年 3 月 31 日，維多神父來到了關島的四個傳教區中的一個尼希翰（*Nisihan*）。在阿干尼亞的聖依納爵教堂服務的方濟·索拉諾（*Francisco Solano*）神父，派了一個名叫狄耶戈·巴占（*Diego Bazán*）的西班牙裔年輕人，去報告維多神父有關卡迪歐索神父抵達的事情。巴占行經丘丘古（*Chuchugu*）時，遭到兩個年輕土著的攻擊；其中一個以大砍刀戮刺他，另一個緊跟著一擊，解決了他的性命，然後兩人將屍體丟到溝壑中。接著充滿敵意的酋長

吉普哈，帶著手下想去燒毀傳教中心。幸虧狗吠讓士兵提高警覺，火燒行動才未能得逞。

由於巴占始終沒有回來，索拉諾神父便派了三個新的信差到維多神父處。三人在尼希翰找到了後者，維多神父卻命令他們即刻返回阿干尼亞的聖依納爵教堂以策安全。結果三人並沒有回來，他們在途中遭到伏擊致命。

四月一日早晨，維多神父正在法法克（Fafac）村的一個基督徒家中休息。主持彌撒過後他開始踏上返回聖依納爵教堂的路途。他本想在屯洪（Tumhon）停留，探訪他剛到這個島時發現的一個離羣索居的西班牙人，此人為了過跟土著一樣放蕩的生活，早已下落不明。維多剛剛進入屯洪，就聽到一個新生兒的哭聲，他停止前進，進入曾經接受他洗禮的馬塔潘的家，此人本性陰險，後來成了極力反對傳教士的人。維多建議為新生兒付洗。

馬塔潘答道：「你可以為我家中的一顆腦袋施洗，停止殺害兒童吧，你這個可惡遭天譴滿口謊言的 *guirrago*！」他直奔喜拉奧酋長家，當時維多神父找來幾個兒童，開始在街上誦唱教義。

「喜拉奧，看你是否夠稱英勇之人。如果你要拿出證明，就請你殺了這個 *guirrago*。」

喜拉奧開始顯得頗不情願，到後來同意幫忙。兩人在村子近郊找到維多神父。馬塔潘撲上去壓倒神父，用尖矛刺穿了他的心臟；喜拉奧則以短彎刀將神父的頭顱割下。

神父殉道的這一天是 1672 年 4 月 2 日，聖週六，時間大約是上午九點鐘。

7. 印第安戰斧： 若望·卜瑞伯／依撒格·饒格

(Jean de Brébeuf, 1593-1649) / (Isaac Jogues, 1607-1646)

最艱難的傳教工作

一般認為新法國或稱加拿大的傳教工作是最艱難的，因為當地的氣候條件欠佳，加上土著的性格難馴，生活習性野蠻。直到 1608 年，只有有限的幾個航海者與販售毛皮的商人到過此地；這些人並不曾深入內地，就回到本鄉去了。卜瑞伯曾無心地使用野蠻人這個字眼來指稱他至愛的土著。

他對想志願到此地傳教的年輕耶穌會士，也常以率直的語氣說明：村裡的生活極為艱苦，一切都極不方便；糧食不足，反叛的事情司空見慣；晚上的常客包括跳蚤、蚊子、寄生蟲；又嗆又濃的煙，讓你幾乎無法好好的做完日課。土著的風俗充滿驚駭，稍不如意一惱怒就拿起戰斧來，將你的頭劈成兩半。

法國探險家雅克·卡提耶 (Jacques Cartier) 於 1535 年發現新法國 (即加拿大)，不過直到漫長的宗教戰爭結束之後，也就是直到 1593 年以後才積極展開殖民統治。至此法國才聯合英國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西歐低地國家，追尋殖民目標，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規模形成分庭抗禮的態勢。

這段時期也是法國耶穌會神父向外傳教事業大大擴張的時期。兩位列聖品的聖人——「外方傳教神父薩威的影響力勝過依納爵」——當年盛名遠播的影響，使得法國耶穌會迅速茁壯，它們只需找到能夠讓他們實現理想的傳教地區，結果他們在大西洋

彼岸的土地與民族找到了對象。

殖民強權的利益在他們將需進入的情勢中早已成形。當地主要的部落是休倫（Hurons）以及依洛郭亦（Iroquois）。休倫族除了與依洛郭亦族不和，跟其他鄰族都和平相處；而依洛郭亦族則與所有部落都交戰：阿爾岡昆（algonquins）、蒙塔奈（Montagnais）以及休倫族。法國人選擇支持休倫族，跟後者維持毛皮貿易，互相蒙利；荷蘭人與英國人則支持依洛郭亦族，並為他們提供武器裝備。

「休倫尼亞」（Huronie）是一個小國家，它境內最長的部分要三、四天才橫越得了。法國人選擇休倫族的原因，可能是休倫族過的是相對定棲的生活，他們與法國人保持友好關係，此外，他們占有緊扼深入其他族通路的戰略地位。

諾曼第的驕傲

卜瑞伯是最早奉派到新法國的五人之一，他在 1625 年 4 月 25 日從迪耶普（Dieppe）乘船出發，同年 6 月 19 日抵達魁北克。

他身材魁梧，活力充沛，為人和善。諾曼第民族至上的特質在他身上都可以看到：有耐性，溫文儒雅，堅韌剛毅，慷慨大方。他的血管裡流的是戰士的血液，不過他是在宗教戰爭結束那一年出生的，他在和平的氣氛下成長，家族位於康德—蘇—維爾的農場充滿溫馨的氣氛，此處距諾曼第文化中心岡城（Caen）不遠。他二十一歲中斷神學學業，三年後加入耶穌會。他本來想當個修士，但未能如願。

他抵達魁北克時，只想深入內地。然而到城裡來做皮貨生意的休倫人，沒有人願意讓他搭乘自己的獨木舟，他體型太大了，獨木舟載不動他。等到 1626 年春天，他以乘客體重等重的禮物

相贈作為交換條件，才有一個休倫人讓他搭上獨木舟。他在 7 月 25 日出發，8 月 29 日抵達湯契鎮（Toaniché）。

這個村鎮共有十五戶人家，卜瑞伯在當地待了三年，學講休倫族語，以及生活習慣。他取了個新名：Echon。1629 年，法國殖民地快要拱手交給英國人，他被調回魁北克。他在 7 月 17 日抵達，兩天後法國探險家尚普蘭（Champlain）向英國大衛·科克（David Kirk）將軍投降。投降條件是確保法國傳教士與法國商人安全返回法國。卜瑞伯與其他耶穌會神父於是在 28 日踏上歸途。

根據 1632 年 3 月 29 日簽訂的聖吉爾曼條約（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英國必須將魁北克交還給法國，因此卜瑞伯再度來到新法國，他在 1633 年 3 月 23 日安全抵達，這一次他不再離去。

獨木舟生活三十天

這次赴魁北克的旅程有撒慕爾·尚普蘭作伴，整整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他抵達魁北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個願意以獨木舟載他的休倫族人。結果沒有人願意這麼做，他一等就等到次年 1634 年 7 月 7 日。

他要去的的地方是湯契鎮，距此 1,300 公里遠，全程靠獨木舟的話，必須逆流而上的地方多達三十五處之多，別無他法，只得帶著獨木舟和貨物經陸路長途跋涉。

搭乘獨木舟規矩可不少，首先你永遠必須準時現身，絕不能掉一滴水或一粒砂到獨木舟上；上了獨木舟你必須在行李堆中找個位置保持跪姿，像隻刺蝟般的蜷縮著；你不能做任何可能引起休倫人生氣的事情，例如問些沒有用的問題，像是他們的語言或者路線之類的。「緘默，」卜瑞伯的警告，「是不可或缺的，一

個人必須臉帶微笑，忍耐所有野蠻人的一切缺點，不講一句話。」休倫人非常暴躁、衝動、不可預測，任何懷疑、任何氣惱，都足以使他們大發脾氣，撇下你不管，甚或殺害你。1638年傑洛姆·拉勒曼（Jérôme Lalemant）神父幾乎被絞死。達沃斯特（Davost）神父被迫丟棄所有裝滿了書籍、筆記與衣物的行李，一個人被留在一個島上。丹尼爾（Daniel）神父也是如此，他在經歷兩次船難後被迫換到另一艘獨木舟，最後遭到遺棄。

第一次航程的結局頗令人失望。「我的野蠻人留下我一人，沒有提供任何補給，也沒有住的地方，他們只管朝自己的村子繼續前進。」

獨自一人被留在荒地裡，卜瑞伯面對另一個驚人的狀況：他在湯契鎮住過的老村子不見了，他認得的人都遷到別處去。要怎麼找到他們新遷的地點呢？他試試自己的運氣，結果幸運得很，走不到三哩路，他發現自己來到了新的湯契鎮：新名為伊洪納提里亞（Ihonatiria）。

過休倫族人的生活

他受到了盛大的歡迎。全村的人都來了，圍著他叫他的名字，還加了許多有趣的、充滿感情的頭銜：「Echon，我的賢侄、我的兄弟、我的表兄，你回來啦？」

他們的熱情多少含有自私的成分。原來在1632年春天，村人曾經殺害一名法國人伊田，村人害怕遭到報復，卜瑞伯大可以用來作為人質。

這個村子建在一座小丘上，既避風又防淹水，俯瞰一個深潭。它並非最重要的村莊，卜瑞伯卻以該村居民心地善良，將會歡迎福音，而選擇在此定棲。他與同伴以及僕人總共九人在當地

人家住了一個半月。這段時間讓彼此雙方都碰到了不少困難，因此卜瑞伯決定建造自己居住的地方。

他想建休倫人住的房子，也就是挖個地道，既沒有窗也沒有隔間，一個月內就完工了。儘管造得簡樸，當地人卻認為有如一座宮殿，整天都有大排長龍的人要來參觀，他們欣羨屋內的一切工藝品陳設：磨坊、磁鐵、放大鏡，令他們最感稀奇的是大鐘，全村的人都聚集來聽它報時的聲響。

然而，卜瑞伯更感興趣的是學當地的語言，而非建造自己的住屋。因為不懂當地語言就無法溝通。休倫語與依洛郭亦語類似，除了這兩種語言，還有十二個族的語言。

根據尚普蘭的記載，卜瑞伯打從一開始「就比其他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勤於學講當地話，並且親自編纂文法與字典。

謀略家教學有方

1634 到 1638 年間他擔任傳教事業的總召，這段期間證明對休倫族傳播福音的工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既然他對休倫族的語言與生活習慣懂得很多，大家期待他提出一套策略以及教學辦法。

他選擇的策略是以小會所為核心，跟當地人打成一片，大家生活在一起。隨著福音傳播工作的進展，這些小會所也以相同的速度拓增。作業模式都根據「他的超自然實驗規定：適應現實」。

他的教學法是透過講授教義要理傳揚福音，並且默默行善向患者伸出援手為福音做見證。

從 1634 年 9 月到 1637 年 6 月，只有伊洪納提里亞一地設有傳教會所，後來歐索桑內（Ossossané）在 1637 年開始有小會所，接著天瑙斯泰（Teanaustayé）在 1638 年也設有傳教會所。

1637年6月7日聖三節當天，卜瑞伯為他的第一個成人教友皮耶施洗，兩天後另一個家庭也堅持要求神父為他們付洗。

然而這時候爆發了一場風暴。這年冬天休倫族人村子流行天花疫情，村子裡的巫師放話說這場時疫是黑袍神父帶來的。皮耶受洗當天，這個謊言好像獲得證實。

神父們展示耶穌、聖母以及最後審判的畫像，休倫族以為這些像和畫像是活生生的人。有人因此開始傳播，說最後審判畫像中那些痛苦扭曲身子的人物，就是染病去世的村人，至於龍、蛇等動物就是神父用來毒害他們的媒介。

其實天花的爆發根本是自然原因造成，只因當地人生活衛生環境欠佳，更使疫情加劇罷了。事實上有五位神父也感染了天花，其中一位是剛剛來到新法國的依撒格·饒格神父。

火的洗禮

饒格出身於聖女貞德的古城奧爾良市，他與母親很親愛，從他常寫給母親的信中，不難看出這一點。「我不知道天堂會是什麼樣子，」他在1636年7月間抵達時寫給母親的信中指出，「我只知道當我踏上新法國的土地，在聖母往見節在魁北克主持彌撒的時候，內心感受到無比的喜悅，大概在天堂也不過如此吧！」

他隨後立即被調往歐索桑內，這是因為休倫族一位酋長覺得自尊心受傷，因為他村子裡的兩位神父離開了，卻沒有人接替。於是耶穌會會長尤恩（Le Jeune）神父答應他會派依撒格·饒格去陪伴他。這位奧爾良之子剛剛寫完他給母親的平安信，聽到他要被調往休倫族人的村落去，隨手在信末附加了一句：「我剛剛獲悉即將在三、四天內轉往休倫族村子去。寫於三河域（Trois Rivières），1636年8月20日。」

饒格讀著卜瑞伯所寫的旅途需知，他了解此去狀況會很多，他料想不到的是在被當地人接納之前，他得改個名字。他一路上一再使用自己的本名。這個名字的發音對當地人根本沒有意義，當地人反而根據這個名字的發音連想到他們語言中的一個字，認為切合他。他們叫他翁迪松克（Ondessonk），意思是食肉猛禽。

8月24日主日，他主持最後一次彌撒，用過一頓豐盛的早餐後，他將長袍掖起塞緊，小心翼翼地把手上的砂子去除乾淨，再踏進獨木舟。帶隊者給了個訊號，這艘小舟就在第一道划槳帶動下，搖搖晃晃的迅速滑入了主流，展開漫長的水路。

一行人在9月11日抵達了目的地，登上了位於伊洪納提里亞山丘下的寧靜河岸，饒格對夢想的實現感動不已。他的英雄，高大的卜瑞伯，給了他熱情的擁抱，另外三位耶穌會神父也上前來歡迎他。

雖然旅途勞頓，饒格健康狀況不錯，上岸後的頭幾天，他常在村子裡走動到處拜訪。然而到了第五天，他感覺到異常的疲憊，第七天他開始發高燒，顯然他感染了天花。不多久消息陸續傳來，附近村子都有人染病去世。所幸饒格的病情有了起色，但其他五位神父卻一個個接著病倒了。

誹謗神父們帶來疾病的說法愈來愈囂張。有的說神父們保證的天堂，只不過是透過魔術帶來了死亡；還說神父在兒童病危時傾注在他們額頭上的洗禮用水，根本是扼殺兒童的毒劑。酋長們詛咒神父們去死，而神父們則按照族人的風俗，為整個村民設下盛大的告別筵席。他們還寫信給其他的耶穌會神父，告知他們「為服事主耶穌基督」已作好了犧牲性命的準備。發信的日期註明是1637年10月28日。信上簽署的名字除了卜瑞伯與待在歐索桑內的另外四位神父，還附上饒格與另一位不在場的傳教士的名

字。

對剛來乍到的翁迪松克而言，這真是一場火的洗禮。

隨時可能破裂的休戰協定

懷著痛苦的期待過了數日之後，突然間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一切恢復了平靜。「從 11 月 6 日（為此意向舉行的彌撒的數目達成之日）開始，我們享受到無法相信的平靜；想到不過八天前情勢還滿嚴重的，我們每天都感到驚奇。」

正當迫害最嚴重的時候，當地人若瑟·契瓦騰瓦皈依受洗了，這給大家帶來莫大的希望，不只因為這顯示上主的恩寵大能，也因為這位新入教的基督徒開始展現活力。他改信天主教後除了展現信仰熱忱，還發揮關懷的醫護慈心。

到 1637 年底，傳教工作主要有兩個中心：一個在以卜瑞伯和其他三位神父為中心的歐索桑內，另一個在伊洪納提里亞，此地由饒格與另外兩位神父管理。他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的講道受到熱烈歡迎，甚至獲得讚賞。然而事實不盡然如此。

1638 年 8 月 26 日，卜瑞伯卸下了傳教事業總管的職務，由傑洛姆·拉勒曼接掌大任，不過卜瑞伯仍然擔任在天璣斯泰新中心的指導司鐸。拉勒曼上任後改採新的傳教策略：放棄過去在各地遍設小會所的做法，他新設了一個大的傳教會所，以此為中心向外傳教。

1638 至 1639 年也是鞏固成果的一年，雖然傳教成果顯著，卻依然脆弱不堪一擊，飽受威脅。1639 年夏天又爆發了天花流行病，同時出現更暴力的迫害。在天璣斯泰，傳教會所遭人以石頭攻擊，十字架被拔除、砍斷、燒毀。村內的首長教唆年輕的勇士去摧毀傳教會所，屠殺神父。

在這種氣氛下，基督徒退縮了，好幾個人叛教了。在天璣斯泰，教友人數減少到 60 人。卜瑞伯的傳教工作似乎面臨崩潰。

在此危機期間，他發誓：「如果上主無限仁慈有朝一日賞我殉道的恩惠，我這個無用的僕人絕對獻身無悔。」1640 年 4 月 11 日他與兩個同伴遭到痛毆，差一點實現諾言。

天璣斯泰中心關閉後，同年 11 月 2 日卜瑞伯展開傳教之旅，走訪與休倫人和依洛郭亦人都和平相處的中立派族羣。這是一趟徹底失敗的旅程，他面對的是公開的敵對；早在他抵達前，就有人惡意中傷說他帶來流行病與惡運。1641 年 3 月 19 日，他一無所獲的返回聖瑪利中心會所，他的鎖骨被打斷了。拉勒曼將他送回魁北克休養，請了一位醫生來醫治他的骨折。

是否因為他的存在會導致休倫人的敵意升高，因此藉口將他送走嗎？或許在回魁北克的路上，卜瑞伯心中有過痛苦的揣測吧！

血的洗禮

事實上，情勢已經平靜下來。卜瑞伯仍待在魁北克以總管身分協助傳教工作的推動，而他的同伴們則繼續留在原地工作，反對聲浪平息了。殉道心願的成全並非藉由休倫族人之手，而是依洛郭亦族人。

饒格在新法國的前三個冬季期間，他作了幾次遠行，深入西部地區，幾乎直抵蘇城（Sioux）邊界一帶傳教，此處即今天的美國伊利諾州。冬季除外的其餘月份，他都在聖瑪利城監督興建中央會所事宜。新會長拉勒曼夢想以聖瑪利城為核心建造媲美西班牙耶穌會士在巴拉圭為印第安人所設的隔離村。

此外他還負責帶領為耶穌會工作、作出類似發願承諾的平信徒。修會總會長對此倡議態度保留，不過到了 1644 年，他終於

授權批可。

在此期間，依洛郭亦族對休倫族展開阻斷通路的行動，使得來自魁北克的補給無法運抵目的地，神父們物資短缺。1642年作成決議，要求饒格帶領探險隊再度嘗試跟殖民地的首府取得聯絡。

出發的旅途一路順暢，饒格設法越過封鎖線。但是回程就沒那麼順利了，回程途中他們遭到了依洛郭亦族人偷襲，一行人被帶到歐瑟尼儂（Ossernenon）——今天紐約州的奧瑞斯村（Auriclesville）。

饒格祈禱能獲得殉道的大恩，天主應允了他。他被抓後的幾天，依洛郭亦人以木棍和鐵棒無情的痛毆他，扯下他的鬍子，拔掉他的指甲，壓碎他的指尖，砍掉他的右手大拇指；小孩子拿熾熱的煤炭和鐵器烙他的身軀，以此為樂。最後將他懸吊在兩根柱子中間，用繩子緊緊綁住他的腰部。

年輕的古皮爾（Goupil）遭人用斧頭砍了三下。陪同神父們的休倫人待遇更慘，他們被帶往一個又一個村子，一而再地遭到嘲諷、酷刑伺候。

饒格被捕了一年又一個月，在這段期間，他被當成奴隸使喚，盡幹最重的粗活；後來他逐漸獲准享有多一點的自由，唯一的條件是他不得踰越村子裡的某些地點。他思索逃亡，跟依洛郭亦族人打交道的荷蘭商人，提議釋放饒格，但是他拒絕了，他想跟他的休倫族同伴在一起。直到對方多次堅持，又經祈禱分辨後，饒格才接受這個計畫，成功脫逃了。當他抵達新阿姆斯特丹，亦即今天的紐約時，荷蘭籍的喀爾文教派將他捧為烈士。

他返回法國受到各界的褒獎表揚，他的名氣如日中天，基督教的世界都讚揚他，將他捧到與古代殉教者同等崇高的地位。

然而他的心卻始終惦念著加拿大，到了1644年春天，他再

度回到加拿大來，如願殉道成仁。

殉道

饒格離開加拿大的這段期間，情勢變得惡化了。法國人已控制不了依洛郭亦族，因此等到依洛郭亦族顯示軟化的跡象，蒙特婁的法國總督便想與對方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一項正式和約。然而總督並不確定依洛郭亦族人真正的意圖為何，他想派遣一個代表團去鼓勵其他族人一起加入和平協議。找誰來領導這個和平代表團呢？沒有人比饒格神父更適合當團長了。

饒格第一個反應自然不願再回到他第一次受難的地方去，他很擔心會再受到另一次苦難，不過他沒有推辭。談判顯然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令人驚異的是，他的傳教心火顯然轉旺了：他居然夢想要感化這些依洛郭亦人。當他返回魁北克後，向長上提報了自己擬訂的計畫，上司認可了他的計畫。1646年9月24日，他再次前往依洛郭亦人的地盤。陪同他前行的有拉蘭德（Jean de Lande）和少數休倫族人。

各式各樣不利於他的謠言滿天飛，攻訐的內容包括當時爆發的時疫以及當年的歉收，都是因為他留下來的一個盒子惹的禍，盒內藏了帶來惡運的邪靈。

10月17日他抵達他熟悉的歐瑟尼農村，他一進入村子，村人便一擁而上，剝光他的衣服，將他痛打一頓。

「明天你就會死，」人家告訴他，「不過不用怕，這一次你不會吃烙鐵的苦頭，我們會用我們的戰斧將你的頭砍下。我們會把你的首級放在我們村子的大門口，讓你被捕的兄弟們看得見。」

饒格斥責他們未能恪守他們跟法國人簽署的友好條約，他正告依洛郭亦族他是以朋友的身分來教導他們走升天的道路。一名

依洛郭亦人割下饒格身上的肉，當著他的面生吃起來，然後說：

「我想知道白人的肉是否跟印第安人崇拜的大神的肉一樣。」

次日 1646 年 10 月 18 日，饒格返回他的茅舍時，遭到一名依洛郭亦人用戰斧攻擊，當場被砍了頭，他的首級插在尖木樁上。第二天，他的屍體被拋到附近的河裡丟棄。

最後講道

卜瑞伯預感自己死期已近，卸下了休倫族傳教區的管理職務，在 1644 年 9 月間，第三度，也是最後一次，前往休倫族——猶如耶穌進耶路撒冷彰顯他最高的愛情，卜瑞伯也步上他的求仁之路。

兩位神父、六十名休倫族人與二十二名士兵陪同他，這支隊伍浩浩蕩蕩展開最後一次旅程，希望這年夏天能夠避開依洛郭亦族人的攻擊。

他為兩樁出乎意料的事情感到驚異：聖瑪利是個固若金湯、自給自足的大村子，基督徒社區活力充沛，備受其他休倫族社會敬重。基督徒社區不是沒有遭到反對排斥，但它勇敢地面對困難，信徒中不乏足以做為榜樣的英勇者。教會努力的心血沒有白費。

卜瑞伯負責管理依賴中央會所的幾個村子。1645 年 11 月，他來到休倫族人為躲避依洛郭亦族而尋求庇護的村子，受到了猶如來自天堂般的熱情歡迎。

「Echon，你的話帶給我們生命；上主透過你發言，你說的話都能打動我們的心。」

火與血的磨難

然而依洛郭亦族勢如破竹的近逼，他們愈來愈自大猖狂，一次比一次大膽入侵。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剷除休倫族。1648年7月間，依洛郭亦族攻擊天籟斯泰，次年3月16日，進攻聖依納爵與聖路易兩地。當時卜瑞伯與拉勒曼都在聖路易。

婦孺都逃到森林裡避難，男人則準備應戰。前兩次都成功地逐退了來犯的依洛郭亦族，但是第三次失敗了，依洛郭亦族人突破了防衛柵欄，攻占了整個村子。兩位神父成了囚犯。

依洛郭亦族的戰略是，攻擊一結束就立刻退出。這一次他們在聖依納爵紮營，準備對聖瑪利這個「固若金湯」的中央會所發動大規模攻勢。為戰果豐碩興高采烈的依洛郭亦族人，更以折磨兩位神父為樂。

兩位神父被帶到村子大門口，被迫穿過兩排又吼又叫的人牆，任憑他們以棍棒、刀子攻擊。正式的酷刑在下午一點鐘登場，所有依洛郭亦戰士奉命集合，酷刑持續到下午四點鐘。卜瑞伯這位白人頭子是他們的頭號目標，有人拿著火炬上上下下燒他的雙腿；有的人拿熾紅的刀子戮進他的肉體，撕下肉塊，還當著他的面吃起來。卜瑞伯依然無動於衷，反而鼓勵一起受苦受難的同伴們，教大家要英勇的堅忍到底。被依洛郭亦人俘擄的一個叛教的休倫人，曾經受教於卜瑞伯，還接受了他的洗禮，此時居然以嘲諷的洗禮儀式回敬他。他倒了一壺滾燙的熱水到卜瑞伯的頭上，以挖苦的語氣說：

「Echon，你說接受洗禮，此生的痛苦將帶領我們直接升天。我以此洗你……」

他們還拿燒得炙紅的小斧頭做成的護領圍在他的頸部，只聽

他的皮肉嘶嘶、哧哧作響，他依然不動如山。依洛郭亦人再用一大片富含樹脂的樹皮包住他的髓骨、腰部以及腋窩，然後點火燒。他們取下他的頭皮，再用燒紅的灰覆蓋。

「你看我們待你像個朋友，因為我們讓你獲得永恆的快樂。」

他們看到或許他就要斷氣了，便決定給他最後的致命一擊。聲稱卜瑞伯是囚犯的首長，挖出了他的心臟，烤熟了，吃掉它。其他酋長與戰士則以雙手接捧汨汨流出的鮮血來喝，大家都對這位黑袍神父的過人勇氣感到驚奇。

休倫族的悲劇結局

依洛郭亦族達到了摧毀休倫族的目標。士氣渙散的休倫人逃到鄰近的部族去尋求庇護所，然而即便躲到鄰族部落，他們依然被敵人找了出來。饑荒與疾病加速休倫族滅種的過程。在這悲慘的 1649 年 6 月 14 日，神父們自己焚毀了位於聖瑪利（註一）的會所遺址。

據估計，受洗的休倫族人總數達六千多人，占其總人口約一萬人的六成。換句話說，絕大多數休倫人都成了基督徒。黑袍神父帶領他們認識基督，將救恩帶給他們，而且還希望為他們保存文化認同。外來勢力掐掉了原本可以發展成為文化與宗教大業的嫩芽。總會長伯多祿—韓斯·柯文巴赫（Peter-Hans Kolvenbach）為 1999 年 9 月 5 日舉行的殉道者三百五十週年紀念活動寫了這麼一段文字：「對休倫族的實驗性福傳工作，僅僅維持大約十五年，然而神父們留下的福音見證，直到今天依然對整個耶穌會有所啟發。」

非但對耶穌會神父們有所啟發，這些前輩神父的英勇事蹟在兩百年後繼續發揮影響力，我們看到了無法想像的旁支發展。一

羣遷徙到洛磯山脈的依洛郭亦族人，鏗而不捨地尋找一位跟他們的祖先所認識的神父們一樣的黑袍神父，結果他們找到了他，把他帶到美國的扁頭印第安人那裡去，這就是斯梅特（De Smet）寫下耶穌會英勇事蹟另一章的源起。由前輩法國耶穌會神父點燃的火炬，傳承到復興的法蘭德斯耶穌會神父手中。

註一：聖瑪利這個地方向來被稱為舊堡（Old Fort），位於距安大略省米德蘭三哩處。由於原有的工事地基依然可見，塔樓與牆壁均已按照原貌重建，為紀念這些殉道者，另外加建了一座教堂。這一切使得「殉道者聖地」（Martyrs' Shrine）成了朝聖與觀光中心。

8. 瓜拉尼 (Guarani) 的石斧： 羅格·公沙來

(Roch González de Santa Cruz, 1576-1628)

瓜拉尼

瓜拉尼的原意是戰士，但事實上瓜拉尼人是愛好和平的；天性獨立的瓜拉尼人，除非遇到戰爭，整個社羣為了自衛必須展現唇齒相依的緊密關係，否則他們享有無限的自由。瓜拉尼人推選出一位酋長，這位領袖勇武過人，其職銜採世襲制。

然而真正掌握大權的是巫師，在戰鬥中總能看到他們的存在。

第一位西班牙征服者早已提出報告，指瓜拉尼人是和善的民族，不過他們懷疑瓜拉尼人的可信任度。西班牙探險家卡北薩·狄瓦卡 (Cabeza de Vaca) 在 1542 年展開兩千哩的長途跋涉，從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來到亞松森 (Asunción) 途中，不曾對瓜拉尼人做過任何傷害的事情，因此瓜拉尼人紛紛從森林裡現身，出來迎接這些西班牙人，為他們帶上花圈，提供他們食品飲料。

方濟會神父是天主教會在此地生根的先鋒。然而直到 1575 年，波蘭諾斯 (Fray Luís de Bolaños) 來到，首府亞松森附近以外地區才出現對瓜拉尼人有系統的福音傳播。他帶瓜拉尼人到城裡來，向他們學習語言，完成第一本瓜拉尼語文法，首次建立瓜拉尼字彙，完成第一本祈禱書，並且將 1582 至 1583 年在利馬 (Lima) 舉行的第三屆教省會議的教義翻譯成瓜拉尼文。

耶穌會神父後來才來到：1587 年先有一個國際會士團來，

1593年再來一個全是西班牙籍的會士團體。第一批神父成了巡迴講道員；第二批神父建立了亞松森大學。

1602年正當他們根據經驗正開始擬訂各項計畫之際，他們卻奉命要撤出巴拉圭。下達撤出令的是駐秘魯的耶穌會省會長，然而贊成刪減的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也認可這個決定。全體神父都抗議，要耶穌會放棄傳播福音較困難的內陸，而轉去新世界的黃金國（El Dorado）秘魯，實在匪夷所思。

耶穌會會祖的侄子、方濟會神父馬丁·羅耀拉（Martín Ignacio de Loyola）也加入反對行列，傾全力阻止此事。他在1601年10月9日獲提名出任亞松森第五任主教，不過卻是第一位實際掌管教區事務的主教。不出兩年他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主教會議結束不久，他獲悉耶穌會神父決定撤離。他憤慨的寫道，要是他早知如此，他絕不接受主教一職；他將致函總會長，必要的話要上書到馬德里，甚至教宗。

阿奎維瓦讓步了，耶穌會神父終於留下來。「馬丁·羅耀拉可說是巴拉圭共和國耶穌會的始祖。」（引自卡拉曼 Caraman）

介乎森林與城鎮之間

1598年晉鐸的一個年輕人羅格·公沙來，也參加了主教會議。他是出生於亞松森當地的西班牙後裔，這次宗教會議的一些決議對他個人影響頗大。

當時瓜拉尼印第安人被西班牙殖民者剝削利用，這些西班牙人濫用保護區（encomienda）制度，使印第安人淪為奴隸，教會有責任去保護他們。主教會議規定，對這些印第安人，必須以其母語教導，至於住在原住民保護區內的瓜拉尼印第安人，必須將他們聚集到隔離村。

主教挑選羅格擔負這個重任，羅格從小就會講瓜拉尼語，他奉命負責管理巴拉卡又 (Mbaracayú) 印第安人的各堂區。

這位年輕的耶穌會神父搭乘獨木舟上溯巴拉圭河。印第安人一開始對他並不信任，然而羅格天生的和善贏得了他們的信賴。即便各保護區也都接納他，並不反對他的工作。

在印第安人的世界與瓜拉尼人的第一次接觸，僅只持續一年。主教在 1606 年 6 月 9 日去世了，代理主教任命羅格到主教座堂當本堂神父。

任命一個有印第安血統的神父出任這麼重要的職務，這個決定並不受西班牙人歡迎。批評者說，羅格學識不足。羅格所受教育不多，也沒有跡象顯示他喜歡讀書，因此批評者的話可能是正確的。

新任主教連納多·利札拉加 (Reinaldo de Lizárraga) 並無這類偏見；相反的，他有意讓羅格擔任自己的祕書，因而任命他為教區的主教代表。羅格立即辭謝，只是懇求讓他進入耶穌會。

初學院陶成期與奉命派遣

這是一個草率的決定，他就這樣封住了晉身教會尊貴階層的大路，選擇為窮人服務，為社會公義獻身。

他的初學陶成教育是非傳統的。他在 1609 年 5 月 9 日進亞松森耶穌會初學院，結束長期退省後，立刻被賦與重要的艱難任務。

瓜拉尼印第安人住在距首都不遠的查科 (Chaco)；他們非常好戰，根據記載，一個瓜拉尼人可以對付二十個其他部族的印第安人。瓜拉尼人對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始終是個威脅；他們常突襲各村莊，取走一切：牛隻、物品、甚至兒童；撤退之前，還會放火燒掉房子。

總督提議殲滅他們，耶穌會省會長則建議採取較符合人性與基督精神的解決之道，這個看似理想的方案最後獲得採納：「安撫至上」。省會長指派兩人擔負此一重任：義大利人文生·葛利菲（Vincenzo Griffi）神父，以及羅格·公沙來。

三天後，這兩個人終於來到了位於巴拉圭河右岸的查科，瓜拉尼人居住的地方。首先看到他們的哨兵認為來人是西班牙間諜，立刻發出警告。戰士現身，經過三個小時的談判，兩位神父才獲准去見酋長——馬丁·圭庫魯。酋長冷淡地接待他們，最後兩位神父的單純與明顯的親和力讓他感到滿意，他批准兩人可以在當地待下來。

一切進展順利，圭庫魯帶著一大批隨從到亞松森，邀請耶穌會省會長來訪，自己來選擇未來可做為隔離村（reduction）的地點。

可惜這個遠景遭到一連串的挫折——印第安地區出現豪雨肆虐，洪水成災，時疫頻傳，內鬥傾軋不斷，還有葛利菲神父病倒。然而奉派的這位初學並不放棄他的瓜拉尼福傳計畫。

第一個隔離村

1611年羅格剛剛結束初學期，這位新出爐的耶穌會士便奉命出任古亞如（San Ignacio Guazu）隔離村主任一職。這個隔離村是已知的最早成立的原住民隔離村，後來所有其他隔離村都以它為典範（註一）。由酋長阿拉皮然杜（Arapizandu）倡議成立的原住民隔離村終於在1610年實現，耶穌會神父熱衷支持這個構想。馬契爾·羅倫札納（Maciel Lorenzana）校長，卸下教職，前往僻遠的巴拉納（Paraná）地區，相中了一塊地，不過他被召回繼續擔任原職，至於新的這項工作則由羅格接手。

羅格在 1613 年 10 月 8 日呈報耶穌會省會長的報告顯示他熱中於自己的工作，他也熱愛瓜拉尼印第安人。他的熱情不減，甚至眼光關注到巴拉納河對岸的數千名原住民，不過他暫時專注於自己的職責，夜間隨時應召去照顧急需者，要是有印第安人被認為已無生命跡象而遭放棄，他都會充滿愛心地去照顧患者，代為清洗臉孔、雙眼、嘴巴，用青草和煤灰覆蓋他，直到重症患者甦醒，領受臨終聖事。

他不僅關懷屬靈的事情。「他還是個木匠、建築師以及石匠；他會使用斧頭，砍伐木頭；他甚至會為公牛套上軛，因為沒有別人會做這件事情。」這是他的同伴方濟·瓦勒 (Francisco del Valle) 對他的描述。

他除了是個神父、建築師、農人，還是原住民大無畏的護衛者。這一點可由 1614 年 12 月 13 日他寫給兄長——亞松森的副總督方濟的信中得到證明。這些印第安人愈來愈清楚了解自己的權益，開始不能忍受他們在保護區內所獲得的不公待遇，於是羣起作亂。保護區內的殖民者怪罪耶穌會改變這樣的狀態，總督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提到這些怨言。羅格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不是昨天才開始的。這些士紳們老早就怨聲載道，甚至更過分：他們強烈反對耶穌會。事實上，這是我極大的光榮。我這麼說是因為印第安人的訴求是公正的，因為他們有權要求免於以私人服務為名的苛刻奴役以及強迫勞役。」

沿著巴拉納河上溯

他這封信發揮了效力。根據日期明載於 1615 年 2 月 23 日的一份文件，副總督以書面特准他「照他個人判斷為最佳的選擇，在巴拉納河對岸以及聖安娜湖另一頭，面對伊達普安 (Itapua)

的地方」，再設立三、四個新的隔離村。

羅格再度溯河而上，這一次他沒有帶任何武裝的衛隊，單槍匹馬越過沼澤地，與一些被認為是「難纏的」印第安部落取得聯絡。那個地區大權在握的首長出來迎接他，同時以告誡的語氣說：

「你好大的膽子敢進到這個西班牙人不曾踏過的土地。難道你不知道是我創造這塊地、這片湖海，在此人人都得服從我嗎？」

羅格既坦誠又謙遜的回話，使得首長的態度軟化了，開始問有關天主與宗教的問題，最後首長請羅格為他的族人宣揚福音。

這就是巴拉納河沿岸伊達普安、聖安娜（Santa Ana）以及亞瓜波阿（Yagapoá）隔離村的起源。

羅格第一件事是選擇合適的地點，架設十字架。接下來他著手蓋了一座茅屋和一座教堂，「這個教堂只比主持彌撒的祭壇寬一點點，十字架的犧牲威力在當地顯露出來。過去會顯現給印第安人的惡魔，再也不敢擾亂。我們幾乎什麼都欠缺，此地擋不住的酷寒讓我們無法入睡，至於食物，我們有時吃一些煮熟的玉米，有時吃印第安人吃的穀粉。」

許多時候羅格不得不挺身而出，向隨時使用武力對付印第安人的西班牙當局交涉。他適時有力的干預，使西班牙人不止一次打退堂鼓。

烏拉圭河沿岸

伊達普安與亞瓜波阿兩個隔離村都成立了之後，羅格的注意力移到南方的烏拉圭河岸。

在烏拉圭河岸面臨的困難立刻顯現。起先各首長都贊成這個構想，因此容許羅格著手進行設立隔離村的事。神父們派遣印第安木匠到該地去架設十字架，並興建教堂。接著神父們在 1619 年

11月25日抵達，到了12月8日聖母無染原罪慶節，十字架、教堂與鐘樓都蓋好了，這個隔離村就以無玷聖母之名命名。

這時候有些部族開始流傳說羅格神父來此是為西班牙人鋪路的。有一天晚上，有些印第安人，乘著他熟睡之際，順河而下準備殺掉他，羅格施巧計躲過一劫。他在印第安人緊追不捨之際迅速逃跑，直到夜幕低垂。然後他在對方預期的過夜地點升起營火，等到對方人馬來到，羅格早已安然脫身。

接著爆發的疫情，導致印第安人四散，後來又發生乾旱與饑荒。這些災疫男巫全歸咎於羅格神父的到來。

反對勢力使羅格神父整整六年無法進入無玷聖母隔離村。到了1626年4月底，他才有機會過河，當時印第安人滿懷喜悅的張臂歡迎他，還讓他在當地住下來。禁忌終於破除了。5月3日他在皮拉提尼 (Piratini) 河岸設立了聖尼古拉斯 (San Nicolás) 隔離村；同年在亞瓜來提斯 (Yaguaraities) 成立聖方濟·薩威隔離村；1627年成立亞培由 (Yapeyú) 隔離村與康迪拉里亞 (Candelaria) 隔離村，以及卡札帕米尼 (Caazapá Mini) 隔離村；1628年又成立亞松森、萬聖節 (Todos los Santos) 以及卡洛 (Caaró) 隔離村。

至此他開始走上殉道之路。

男巫尼祖 (Nezú)

有一個權大勢大的男巫酋長尼祖，統治著烏拉圭河支流尤希 (Yjuhi) 河兩岸。此人天生口才極佳，且善於巫術，他的地位高於當地另外一些酋長，有些背教的基督徒也來依附他。這羣人的首腦是波提瓦拉 (Potivará)，此人企圖奪取一個傳教士的性命。

尼祖手下約有500名印第安人，駐守在尤希河右岸。羅格神

父預見他的隔離村可能面臨的危險，因此決定跟對方結為朋友，他前往拜訪尼祖。

尼祖假裝為神父的親和力所傾倒，同意他的邀請隨同他前往聖尼古拉斯，親自了解基督徒隔離村的生活情形。尼祖獲得盛大的歡迎，他返回後即下令為傳教士蓋一座房子，同時為基督徒蓋一座教堂供他們禮拜之用，他甚至鼓勵其他酋長也這麼做。

這些發展令羅格神父感到鼓舞，他派若望·卡斯迪（Juan del Castillo）神父在尤希一帶建立亞松森隔離村。然而當羅格神父讓卡斯迪神父領導這個新成立的隔離村時，他竟不禁覺得自己像是留下一頭羔羊在狼羣中。

許多原住民來聽卡斯迪講授教義，卡斯迪也嘗試讓尼祖來聽道理，但是後者是愈來愈逃避。他號召隨從與該地區的酋長，力勸他們放棄西班牙人的宗教信仰，改信他們傳統的宗教，他們殺害了烏拉圭河兩岸的所有神父，摧毀神父們的住屋、十字架以及畫像等等。

在此同時，新一批耶穌會士的抵達，在教會間掀起了樂觀氣氛。除了卡斯迪，還有阿隆索·羅德里格斯（Alonso Rodriguez），在他的懇求下，他如願伴同羅格神父踏上前往卡洛的旅程。他們兩人在11月1日抵達，立刻架設十字架。接下來數日，附近一帶的酋長們紛紛求見；尼祖派了三個曾見過酋長卡魯佩（Caarupé）的使者，威逼他必須殺掉這兩位天主教神父。除掉這兩位神父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卡斯迪以及其他神父。

背叛

1628年11月15日，星期三，天剛破曉，在卡洛的托達斯洛桑托斯鎮，出現了許多陌生的印第安人。彌撒過後，羅格神父走

出教堂，指揮工人豎起一根從附近林區買來、高達十七公尺的巨大樹幹，準備做為剛啟用的教堂的鐘樓。

阿隆索神父進屋裡去主持彌撒。羅格神父站在柱杆頂端旁，忙著指揮一個巴拉納男孩對樹幹鑿洞好放置塔鐘。許多印第安人聚集四周，顯得好奇、歡欣、無憂無慮。滲透到內圈的卡魯佩和他的奴隸留意神父的行動，等候下手的時機。

羅格彎身去繫鐘錘；卡魯佩見機不可失發出訊號，奴僕立刻用石斧朝羅格神父的頭砍下去，神父根本還沒來得及抬眼看到他，就這樣立刻斃命了。巴拉納少年飛奔去向阿隆索神父報告，聽到不尋常聲音的阿隆索神父，正步出教堂，他根本來不及發現真相，一羣印第安人紛紛以石斧朝他的頭部攻擊，他們把死者拖到教堂門口。

攻擊者又回到羅格神父的屍體旁，將他的頭、臉搗個稀爛。他們撕裂了神父的衣服，從腰部將阿隆索神父的屍體砍成兩段，再把兩具屍體拖進教堂內。在教堂內極盡搜刮、搗毀所有陳設之後，再放火燒毀教堂與神父的簡陋住處。

卡魯佩派兩名信差到尤希河去通知尼祖他的命令已被徹底執行。於是尼祖下令他們殺掉卡斯迪。惡人在 17 日星期五清晨抵達皮拉波 (Pirapó)，當時卡斯迪正在做他的日課，他們假意詢問他手中的祈禱書。尼祖的岳父、夸來比巫師對最勇猛的阿拉吉拉 (Araguirá) 發出訊號，後者撲向神父，攔腰抱住他，讓其他人上前來掌摑他。接著印第安人告訴卡斯迪，他們已在卡洛殺死了兩位神父，以後也會對留在聖尼古拉斯的其他神父下手。卡斯迪請他們帶他到那裡，他們把他推倒在地，用繩子綁著他，拖著他走進森林。一名尼祖的奴隸用大石頭攻擊他的腹部，他們拖著他來到一處沼澤地，一路上被石頭、木頭摩擦的他，渾身是傷。

到了沼澤地，他們停住腳步，用石斧砍削他的頭，把他丟在那裡，以為花豹會來解決他。不料第二天他們回來一看，居然他還好端端的留在原地。於是印第安人再度以石頭攻擊他，將他拖到一棵樹旁，捆在樹幹上，堆起一個大大的柴堆，點燃了它。

印第安人回到尤希，大肆劫掠教會財物，直到心滿意足為止。尼祖穿上一件神父穿的白長袍和一件無袖長袍，全身用鮮花綴飾，聚集他的妻妾、子女，尋歡作樂。

註一：巴拉圭原住民隔離村（Reductions）聲名遠播的特點如下：擁有自治制度；跟西班牙殖民區有一段距離；民宅幾乎一模一樣，教會與公共廣場是集會中心；經濟上幾乎自足；有著類似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

基本觀念是讓印第安人接納穩定的生活型態，有正規的工作，養成儲蓄習慣，以及善度基督徒生活。許多物資（鐵、銅、紙張等）的獲取，是經由出售農產品（如棉花、菸草、巴拉圭茶葉等）而得。美術的造詣也提升了，從數百件倖存下來的彫像可以得到證明，這些作品之優秀足與十八世紀歐洲最佳美術品媲美；音樂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而且廣為流傳，較之歐洲的流行標準還更上一層樓。學校教育採義務教育制，包括讀、寫、算以及工藝。至於土地所有權，當地盛行基督教公有制；行政管理由酋長、教區神父以及民選委員負責。家長有權處分他的工作成果，但是有一塊地規定要由

每一個人協力合作共同來開墾。

經過多年的強行實施，如今巴拉圭原住民隔離村公認是原住民締造的非凡合諧兼美麗世界的傑出成就。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形容，這是「人類的勝利」；英國作家切斯特頓稱之為「失樂園」。

直到今天，在巴拉圭、阿根廷的米西奧斯 (Misiones) 與科達特斯 (Corrientes) 兩個省，以及在巴西的南里約格蘭德 (Rio Grande do Sul) 州內所謂的七個印第安人村莊 (Siete Pueblos)，都還可看到早年巴拉圭原住民隔離村的後遺影響。

參考書目：

BASSET, Bernard: *The English Jesuits. From Campion to Martindale* (London, 1967) .

WAUGH, Evelyn: *Edmund Campion*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53) .

DEVLIN, Christopher: *The Life of Robert Southwell, Poet and Martyr* (London, 1956) .

CARAMAN, Philip: *A Study in Friendship. Saint Robert Southwell and Henry Garnet* (Anand, 1991) .

Do.: *Henry Garnet and the Gunpowder Plot* (London, 1964) .

WAUGH, Margaret: *Blessed Nicholas Owen* (London, without a date) .

FORD, C. Desmond: *A Highlander for Heaven* (Rome, 1976) .

FORRISTAL, Desmond: *Dominic Collins. Irish Martyr, Jesuit Brother* (Dublin, 1992) .

BLANC, Jules: *Les Martyrs d'Aubenas* (Valence, 1906) .

ANGELINI, Nicolas: *Les Bienheureux Marc-Etienne Crisin, Etienne Pongracz et Melchior Grodecz* (Paris-Lyon, 1904) .

GALLAGHER, Louis J. and DONOVAN, Paul V.: *The Life of Saint Andrew Bobola* (Boston, 1939) .

基督的僕人 II

BEYLARD, Hugues: *La vie et la mort héroïque de Saint André Bobola* (Paris, 1938) .

G. GUTIERREZ, Fernando: *Los Mártires de Nagasaki* (Sevilla, 1996) .

PACHECO, Diego: *La Colina de los Mártires* (Nagasaki, 1962) .

DELPLACE, L.: *Le Catholicisme au Japon. L'Ere des Martyrs 1593-1660* (Bruxelles 1910) .

CIESLIK, Hubert: *The Case of Christovao Ferreira* (Monumenta Nipponica, XXIX, 1974, pp.1-54) .

RISCO, Alberto: *The Apostle of the Marianas* (Guam, 1970) .

WYNNE, John J.: *The Jesuit Martyrs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925) .

LATOURELLE, René: *Jean de Brébeuf* (Québec, 1993) .

DEVINE, E.J.: *The Jesuit Martyrs of Canada together with the Maryrs slain in the Mohawk Valley* (Toronto, 1925) .

CARAMAN, Philip: *The Lost Paradise. An account of the Jesuits in Paraguay, 1607-1768* (London, 1975) .

McNASPY, G.J.: *Conquistador without sword. The Life of Roque González* (Chicago, 1984) .

KOHLER, Leo: *Los tres héroes de Caaróy Pirapó* (Posadas, 1978) .

MORENO, Fernando Manía: *"Para que los indios sean libres". Escritos de los mártires de las Reducciones guaraníes* (Asunción, 1994) .

基本訂戶新辦法

爲了滿足讀者們不同的需求，基本訂戶有了新的辦法讓您選擇：A. 全面訂閱光啓新書；B. 僅訂閱神學類的新書；C. 只選擇神學類以外的新書，如靈修、人物傳記、心靈小品等等。

光啓文化每月固定有新書出版，國內訂戶請先預付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國外訂戶預付美金二百元以上，我們會逐月扣款，當餘額不足時再主動通知您，您不但不需要每月跑郵局，更不必爲繳送帳款而煩惱，「人在家中坐」，卻可以享受「書從光啓來」的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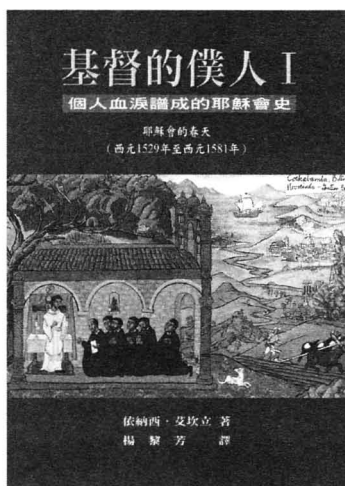
列印下列表格填妥後傳真至光啓文化，我們將有專人爲您服務！再次謝謝您的支持！

基本訂戶資料

年 月 日

基本訂戶辦法：				
1. 國內預付NT \$3,000以上，國外預付US\$200以上，逐月扣款寄書。				
2. 基本訂戶有三種選擇，請勾選：				
<input type="checkbox"/> (A) 全面訂閱每月出版的新書，一年約二十餘本				
<input type="checkbox"/> (B) 只訂閱每月出版神學類的新書，一年約十本				
<input type="checkbox"/> (C) 只訂閱每月出版非神學類的新書，一年約十餘本				
3. 基本訂戶享有的優惠：				
訂戶A享有光啓文化出版之新書及所有本版書籍定價之七五折優惠 (不含代理書、特價書、非書籍類及教材類)				
訂戶B、C享有光啓文化出版之新書及所有本版書籍定價之八折優惠 (不含代理書、特價書、非書籍類及教材類)				
姓 名		E-mail		
聯絡電話		手機	傳真	
寄書地址				
付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劃撥預付 \$ 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預付 \$ 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統一編號 (個人發票免填)				
劃撥帳號：0768999-1 戶名：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10688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洽詢電話：02-2740 2022 Ext. 526，傳真：02-2740 1314)



基督的僕人 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春天

(西元1529年至西元1581年)

本部耶穌會史共分四冊，涵蓋一百多位具代表性的耶穌會士；而本書則為其中第一冊，內容由耶穌會創會寫起，是欣欣向榮的耶穌會的春天時期。

在耶穌會四百多年的歷史巨畫當中，繪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有聖人與學者、傳教士與殉道者、知識分子與探險家、巴洛克式音樂家以及創意十足的英國詩人，也有不遵從會規者、廷臣、神視者、闖禍的不智管理者以及從酗酒惡習中起死回生的流行歌手，都在此巨畫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書作者不只提供宏觀的角度，也鉅細靡遺地捕捉現實生活中的每個鏡頭，深入刻畫出一幅真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基督的僕人 I / 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著；尤淑雅譯，--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
2006〔民95〕 面；公分
第1冊：spring 1529-1581；第2冊：summer1581-1687
譯自：Passion and Glory: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II Summer1581-1687
ISBN 978-957-546-556-8 (第1冊：平裝) --
ISBN 978-957-546-573-5 (第2冊：平裝)

1. 耶穌會-歷史

248.85

95000481

基督的僕人 I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譯者：尤淑雅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中文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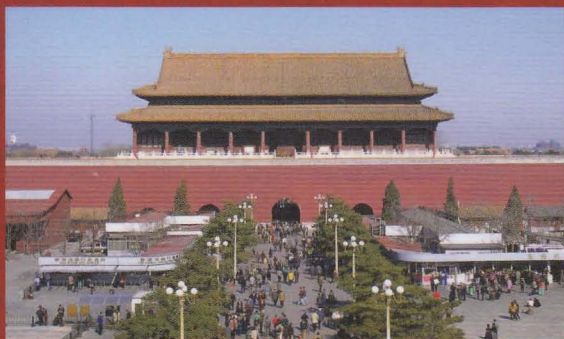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320 元

光啓書號 20926-2

ISBN-13 978-957-546-573-5

ISBN-10 957-546-573-3



本書為《基督的僕人——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的第二冊，這段時期是耶穌會的黃金世紀，是聖教廣揚的輝煌夏天。海外傳教網絡遍及全球，遠從日本、東印度、非洲，到達拉丁美洲。

活力充沛的宣教，意謂著無數血淚的付出。耶穌會會士在全球前仆後繼地宣揚福音，用他們的血肉之軀見證基督的大愛；耶穌會名列聖人與真福的184位會士當中，即有多達144位屬於這個時期。

無畏的勇者，因著基督的愛，傳教心火，始終熾熱；他們克服重重難關，在世界各個不同的種族中穿梭宣講，雖然有許多人因此而悲壯殉道，但在他們的身後都種下了真理的幼苗，等待有朝一日開出絢麗的花朵。



ISBN 957-546-673-3 \$320



光啓書號 20926-2

定價 32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